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二卷

目 录

* 德国 1890 年的选举	3—6
今后怎样呢？	7—11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13—57
一	15—24
二	25—34
三	35—57
论反犹太主义。(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	58—60
“共产党宣言”1890 年德文版序言	61—68
伦敦的 5 月 4 日	69—76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	77—79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80—82
1891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83—87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88—92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93—99
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	100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101—102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布达佩斯)	103—104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	105—106
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	
事情的经过和文件.....	107—218
一.....	111—115
二.....	116—120
三.....	121—126
四.....	127—130
五.....	131—136
六.....	137—142
七.....	143—154
文件.....	155—213
一 被指控的引文.....	155—159
第1号 成立宣言.....	155—156
第2号 “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版	157—159
二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160—185
第3号 控告。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	160—161
第4号 马克思的答辩。1872年6月1日星期六“人民 国家报”第44号.....	162—166
第5号 匿名作者的反驳。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 第27期.....	166—171
第6号 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1872年8月7日“人民 国家报”第63号.....	172—181
第7号 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驳。1872年8月22日“协和” 杂志第34期	181—185
三 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186—196
第8号 塞·泰勒的攻击。1883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 ...	186—187
第9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1884年2月“今日” 月刊	187—189

第 10 号 塞·泰勒的反驳。1884 年 3 月“今日”月刊.....	189—191
第 11 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1884 年 3 月 “今日”月刊	192—196
四 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197—213
第 12 号 摘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 写的序言	197—203
第 13 号 布伦坦诺的答复。“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	203—206
第 14 号 布伦坦诺答复的附录的摘录	206—210
第 15 号 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报纸上的议会报道摘录	210—211
第 16 号 格莱斯顿——布伦坦诺。1890 年 12 月 4 日 “德国周报”第 49 期	211—212
第 17 号 恩格斯对第 16 号的答复。1891 年“新时代” 第 13 期.....	212—213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214—215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216—229
关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版。 (给霍赛·梅萨的信)	230—231
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 委员会	232—233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 年单行本导言	234—24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序言	244—245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	246—259
给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贺信	260—261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263—280
一 绪论部分(十段).....	265—272
二 政治要求.....	272—277

三 经济要求	278
第一部分附件	279—280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	281—283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281
欧洲局势	281—283
德国的社会主义	285—303
一	288—292
二	293—303
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	304—305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声明的附函	306
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致“每日纪事报”编者	307—308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 (托登楠街)	309—310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	311—325
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	326—328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329—330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331—332
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	33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334—361
致奥地利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362
卡尔·肖莱马	363—366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367—383
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	384—385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386—387

美国的总统选举	388—391
马克思,亨利希·卡尔.....	392—404
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	405—408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409—413
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414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	415—417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418—426
一.....	418—420
二.....	420—423
三.....	423—426
致意大利读者。“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429—431
欧洲能否裁军?.....	433—467
序言.....	435—436
一.....	437—439
二.....	440—443
三.....	444—448
四.....	449—451
五.....	452—455
六.....	456—459
七.....	460—462
八.....	463—467
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468—469
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	470—471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1848年回忆片断	472
尽管如此。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	473—474
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	475—476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	477—478
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上的闭幕词。记录	479—480
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 演说。报纸上的报道	481—482
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 演说。报纸上的报道	483—485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486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	487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	488—491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	492—493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494—510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	511
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512—513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514—518
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及法国工人党全国 委员会	519
致奥地利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520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 委员会	521—522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523—552
一	525—530
二	531—510
三	541—552
致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	553—554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给卡·德拉瓦勒的信).....	555—556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	557—558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	559—560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	561—562
法德农民问题.....	563—587
一.....	567—578
二.....	579—587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	588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589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	590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591—612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	613
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	614

附 录

1892年4月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	617—623
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	624—630
1893年6月底弗·恩格斯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	631—636
注释.....	639—772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73—822
人名索引	823—851
期刊索引	852—855
地名索引	856—861
译后记	862—863

插 图

载有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一章的 “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封面	16—17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的扉页	65
弗·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手稿的 开头部分	267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第二版的第一页和第二页	328—329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的扉页	335
弗·恩格斯开列的卡·马克思著作的书单	395
弗·恩格斯开列的他本人的著作的书单的第一页和第二页	401—402
“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扉页	427
“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 (载有弗·恩格斯给“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写的跋)的扉页	495

弗·恩格斯

1890年1月—1895年8月

德国 1890 年的选举

* 德国 1890 年的选举¹

凡是注意观察近十年来德国政治发展的人,都不会怀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890 年的普选中将获得巨大的胜利。1878 年德国社会党人受到了严酷的非常法² 的迫害,根据非常法,他们的一切报刊被查封,会议被禁止或被解散,组织被破坏,而任何想恢复这些组织的企图都在这些组织是什么“秘密团体”的借口下遭到迫害;法庭判决的结果,党员总共被判处了一千多年的徒刑。尽管如此,社会党人仍然秘密地每周定期地把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大约一万份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³ 运进了德国,并分发出去,数千本小册子也是这样传播的;他们把自己的代表选进了德意志帝国国会(九个议员)和许多市政管理机关,其中包括柏林的市政管理机关。党的力量的增长,甚至对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社会党人在 2 月 20 日获得的胜利,甚至连他们中间最乐观的人也没有预料到。已经获得了二十一个席位,也就是说在二十个选区里社会党人的力量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强大。还要进行五十八次重新投票,这意味着,在五十八个选区里,社会党人在那些提出候选人的党派中不是力量最强大的,便是居第二位的党,而重新进行的选举将在两个得票最多但是都没有得到绝对多数的候选人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至于社会党人总共得到的票数,我们只能做大概的计算。1871 年社会党人得到的选票不超

过 102 000 张 ;1877 年—— 493 000 张 ;1884 年—— 550 000 张 ;1887 年年—— 763 000 张 ;1890 年他们可能得到不少于 1250 000 张选票 ,也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目。党的力量三年来至少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在 1887 年只有三个党的选民超过了 1 000 000 人 :民族自由党—— 1678 000 人 ,中央党即天主教党—— 1516 000 人 ,保守党—— 1147 000 人。⁴ 在这一次 ,中央党将保持住自己的阵地 ,保守党失掉了相当多选民 ,而民族自由党则失掉了非常多的选民。这样 ,社会党人在选民的人数上同中央党比起来仍然处于劣势 ,但是却完全比得上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 ,或者甚至会超过它们两者了。

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它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它意味着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当前的局势就是这样。

年轻的威廉由于自己颁布了关于劳工保护法和关于国际劳工保护会议的诏令 ,摆脱了他的老师俾斯麦的监护。⁵ 俾斯麦认为 ,最明智的作法是给自己年轻的主子以充分的行动自由 ,并且安静地等待威廉二世连同他的拿手好戏—— 扮演工人之友—— 陷入窘境 ;那时候俾斯麦就会得到以 *deus ex machina* 的资格出面干预的良机。这一次俾斯麦没有对选举的进程表现出焦虑不安。一个当年轻的皇帝一察到自己的错误就要予以解散的不顺从的帝国国会 ,甚至会对俾斯麦有利 ,而社会党人的巨大成功可能帮助他在帝国国会解散的时刻到来时献给国家一个适当的选举口号。狡猾的首相现在也真的得到了一个谁都不能驾御的帝国国会。威廉二

直译是 :“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场里 ,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 ;转义是 :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 编者注

世很快就会认识到 ,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以及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目前的情绪 ,他在诏令中所提到的那些意图甚至一点也不可能付诸实现。同时选举已经使他相信 ,德国工人阶级只是把他所能提供给它的一切当做分期付款的债款来领受 ,而不会在它的原则和要求上作丝毫的让步 ,而且不会缓和它对那个只有靠奴役人民中的劳动者大多数才能生存的政府所采取的反对立场。

这样 ,皇帝和帝国国会之间很快就会发生冲突 ,角逐着的政党就会把发生的事情完全归咎于社会党人 ,一个新的选举口号就会应运而生 ,那时俾斯麦在给他的主子和元首一顿必要的教训之后 ,就会采取行动 ,解散帝国国会。

但是俾斯麦以后会发现 ,情况已经变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和果断了。俾斯麦从来都不能信赖贵族阶级 ;贵族一向把他当做真正保守主义的叛徒 ,并且准备一旦皇帝想摆开他 ,就把他甩掉。资产阶级是俾斯麦的主要支柱 ,但是它不再信任他。俾斯麦和皇帝之间的不大的家庭争吵成了众所周知的事。这次争吵说明俾斯麦已经不再是全能者 ,而皇帝也不保险不产生危险的怪念头。德国的资产阶级庸人究竟会信赖他们之中的哪一个呢 ?明智的人不再有权力 ,而有权力的人却不明智。的确 ,对 1871 年建立起来的秩序的稳固性的信念 ,这个在老威廉作皇帝、俾斯麦执掌政权、毛奇统帅军队的时候对德国资产阶级说来是不可动摇的信念 ,现在已经消失了 ,而且是永远消失了。赋税负担的加重 ,由于对所有进口物资、不论是食品还是工业品都课以不合理的关税而引起的生活费用的高涨 ,难以忍受的兵役重担 ,对于战争、而且是全欧洲规模的、将会有四五百万德国人被征入伍的战争所始终抱有的和不断加深的恐惧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作用 ,

使得农民、小商人、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只有从政府所建立的垄断组织中获得利润的那一小部分人除外)愈来愈离开政府了。当老威廉、毛奇和俾斯麦构成一个似乎不可战胜的政府三执政的时候,人们曾像忍受某种不可避免的事物那样忍受了这一切。但是现在,老威廉死了,毛奇已退休,俾斯麦必须和年轻的皇帝打交道,俾斯麦曾亲自挑起了皇帝的漫无止境的虚荣心,因而使这个年轻的皇帝自认为是第二个弗里德里希大帝,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自负的、渴望摆脱自己首相的控制的纨绔子弟,而且还是宫廷阴谋家手中的一个玩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不能再毫无怨言地忍受这种过度的压迫了。过去对于局势巩固的信念已经消失了。以前看来是没有希望的反抗,现在成为必要了。所以,如果说这个帝国国会不是那样顺从,那末下一个帝国国会在这方面也许还要大大地超过它。

因此,俾斯麦显然是打错了主意。如果他要解散帝国国会,那末甚至 *spectre rouge*(赤色幽灵)——反社会党人的口号——也帮不了他的忙。然而他具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特性——不顾一切的蛮干。如果他要这样,他可能挑起暴动,尝试少量“放血”的作用。但是他这时不应当忘记,德国社会党人至少有一半在军队里呆过。他们在那里学会了遵守纪律,这一点至今帮助他们抵制了任何挑起他们暴动的做法。此外,他们在军队里还学到了一点别的什么。

写于 1890 年 2 月 21 日和 3 月 1 日
之间

载于 1890 年 3 月 3 日“新堡每日
纪事报”,并稍加修改后载于 1890
年 4 月 6 日“柏林人民报”第 8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新堡每日纪事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60 年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 6 期

今后怎样呢？

1890年2月20日是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容克地主和金融巨头为了剥削德国人民群众而结成的联盟(因为这个卡特尔⁷正是这样的联盟而不是别的)正在收获自己的果实。烧酒税、食糖出口奖励金、谷物和肉类的关税使千百万的钱财从人民的口袋流进容克地主的口袋;正当德国工业用自己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在世界市场上争得了地位的时候,实行了工业品的保护关税,实行这种关税很明显只是为了工厂主能够在国内以垄断价格、在国外以倾销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整个一套间接税的重担压在最贫困的人民群众身上,差不多不触动富人;为了抵补不断扩大的军备开支,过分地加重赋税的负担;随着军备的不断扩大,世界战争的危险也日益增大了,这次战争可能使四五百万的德国人“倒下去”,因为对亚尔萨斯—洛林的侵占已把法国抛到俄国的怀抱里,从而使俄国成了欧洲的仲裁法官;在出版界盛行前所未闻的贿赂行为,每当重新进行帝国国会选举时,政府就通过出版物系统地向人民群众倾泻大量令人惊慌的谎言;贪赃受贿的警察当局利用收买或暴力迫使妻子背弃自己的丈夫,儿女背弃自己的父亲;出现了在德国几乎前所未闻的暗探诱捕手法;警察的专横远远超过了1848年以前的专横;一切权利都遭到德国的法院,首先是高贵的

帝国法院的无耻蹂躏；由于反社会党人法，整个工人阶级变成了无权阶级——所有这一切在相当时期里存在过，而且这样的时期由于德国庸人的怯懦延长了很久，但是现在就要结束了。构成卡特尔的多数已被粉碎，而且是彻底地和不可挽回地被粉碎了；因此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重新把它拼凑起来，而且只是在某个时机，那就是政变。

今后怎样呢？为支持旧制度而拼凑一个什么新的多数吗？啊，这不仅仅是政府当局所梦寐以求的事情。在自由思想派⁸中将有不少胆小鬼，他们宁愿自己投奔卡特尔，也不愿让阴险的社会民主党人提高地位；同弗里德里希三世一起被埋葬了的那些关于政府作用的幻想，又从棺材里钻出来了。但是政府不能利用自由思想派，因为自由思想派目前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和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地主结成联盟，而后者却是帝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阶级！

那末中央党呢？中央党里也有不少容克地主，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伐利亚的以及其他地方的等等，他们都渴望投入易北河以东地区自己同胞兄弟的怀抱，并且兴高采烈地投票赞成对容克地主有利的税收。在中央党的队伍里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也是够多的，他们力求比政府所应当做的倒退得更远，一旦他们有能力做到，他们就会重新把整个中世纪行会制度强加给我们。要知道，道地的天主教政党，也像任何一个道地的基督教政党那样，不可能不是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可能有同中央党组成的新卡特尔呢？

这很简单，因为实际上中央党的统一不是靠天主教而是靠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来维持的。中央党完全是由敌视普鲁士的人组成的，他们是：莱茵河流域的农民、小资产者和工人，南部的德国人，汉诺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天主教徒，不言而喻，他们在天主教地区

特别有势力。所有其他的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反普鲁士分子：例如韦耳夫派和其他分立主义者、波兰派、亚尔萨斯派，都聚集在中央党的周围。⁹一旦中央党成为政府的党，它就会分裂成容克地主行会反动派和农民民主派；属于前一派的老爷们知道，那时候他们将不会再在自己的选民面前露面了。尽管如此，还是会作这样的尝试，而且中央党的大多数都会赞同这种尝试。而这样做对我们只会有利。道地的反普鲁士的天主教党本身是俾斯麦时代的产物，是道地的普鲁士主义统治的产物。随着后者的垮台，前者也必定要垮台。

因此，中央党和政府结成暂时的联盟是可能的。但是，中央党不是民族自由党，相反，它是第一个在同俾斯麦的斗争中成为胜利者而迫使俾斯麦去卡诺萨¹⁰的政党。可见，旧的卡特尔在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俾斯麦只能利用新的卡特尔。

今后怎样呢？解散帝国国会，举行新选举，利用对社会民主党这一洪水猛兽的恐惧吗？这样做的时机也已经放过了。如果俾斯麦想这样做，他甚至不应当同他的新皇帝发生任何的争吵，尤其不应当到处散布关于这种不和的谰言。

当老威廉在世的时候，三执政——俾斯麦、毛奇、威廉——在德国庸人的眼里是稳固的、永远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在，威廉不在世了，毛奇已被迫退休，而俾斯麦正在犹豫不定，是等别人叫他退休呢，还是自动退休。而继承了老威廉地位的年轻的威廉则以他的短时期内的全部政绩，特别是以他的著名的诏令表明，殷实的资产阶级庸人无论如何不能信赖他，他也不希望受任何人的控制。庸人所信赖的人已经没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庸人不能信赖。相信 1871 年建立的帝国内部秩序永恒不变的那种旧信念已经

死亡，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复活。以前政策的最后一根支柱——庸人——动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散帝国国会能有用吗？

实行政变，但是这不仅将解除对人民的束缚，而且也会使隶属于帝国的各邦君主不再有义务遵守被这次政变推翻的帝国宪法。改变将意味帝国的崩溃。

进行战争？发动战争将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旦把战争发动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却是不能预料的。如果克雷兹渡过加利斯河，或者威廉渡过莱茵河，就会毁灭一个大国。但是，是谁的国家呢？是自己的国家还是敌方的国家？要知道，目前之所以还能维持住和平，只是由于军事技术发生不断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任何人都不能认为自己已对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由于对世界战争中的胜负完全无法估计普遍感到恐惧，而世界战争是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

只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政府用残酷的手段挑起暴动，然后用加倍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在各地实行戒严，在普遍恐怖的情况下举行新的选举。然而，即使这样做也只能使毁灭延缓几年。可是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我们知道，俾斯麦是属于那种不择手段的人。威廉不是也说过吗：一遇到极轻微的反抗，我就要下令把所有的人当场杀光？所以这个办法一定会被采用。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刚获得了光辉的胜利，他们正是由于自己的坚毅和沉着、铁一般的纪律、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才获得这样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对他们自己来说大概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它也使得全世界感到惊讶。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每次新的选举中都像不可改变的自然进程那样不断增加；暴

力、警察的专横、法官的卑鄙勾当——一切都白费力气；一支人数不断增长的突击队一直在向前挺进，愈来愈快地向前挺进，现在它已成为帝国的第二个最强大的党。难道德国工人会仅仅为了把俾斯麦从致命的危险中拯救出来而使自己卷入无望的骚动，从而把自己的事情弄糟吗？当他们自身的无比的勇气受到外部情况的鼓舞，当一切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都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他们的一切敌人也不得不像得到报酬那样地为社会民主党效劳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难道我们应当丢掉纪律和镇静，而自己冲向那对着我们的刀剑吗？不，决不能这样。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给了我们工人够好的教训，在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够多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够多的人已经学会，在弹雨的袭击下持枪待命，直到冲锋的时刻到来。

写于 1890 年 2 月 21 日和 3 月 1 日
之间

载于 1890 年 3 月 8 日“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 10 号和 1890 年 3 月 14 日
“工人报”第 11 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并根据“工人报”校对过

德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¹¹

写于 1889 年 12 月—1890 年 2 月

(英译文完成于 1890 年 3 月)

译成俄文载于 1890 年 2 月和 8 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 1 册和第 2 册,德文原文载于 1890 年 5 月“新时代”杂志第 5 期,由作者译成英文载于 1890 年 4 月和 5 月“时代”杂志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并根据英译文校对过

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双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威胁和危险。

第二,——对于这一点,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直还没有足够地加以强调,——因为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挠和破坏我们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其目的是占领一些可以保证它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的地理据点。

卡尔·马克思的一个功劳就在于,他第一个在1848年指出,并从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强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的工人政党不得不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在这里,当我根据这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见时,我也仅仅是作为我的亡友的继承者,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英译文中不是“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而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西欧任何国家的每一个进步政党”。——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而是“使进步的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沙皇的铁蹄之下”。——编者注

这一段在英译文中是:“在英国,论述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是不能不提到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名字的。五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向自己同胞介绍他所认真研究过的俄国外交的目的和方式,而对他的全部劳绩的唯一奖赏就是:他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国内,关于这一切只容许官方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有任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分是由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政府的无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它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

成了取笑的对象,并被称为讨厌的饶舌者。的确,平凡的庸人总是这样称呼任何一再谈论不愉快的事情的人,而不管这些事情多么重要。不过,乌尔卡尔特虽然痛恨庸人,但是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本性,也不了解他们在我们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在他这位旧派托利党人看来,至今在英国只有托利党人能给俄国以有效的抵制,而英国的和外国的自由党人的活动以及大陆上的各种革命运动通常只对俄国有利,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地反击俄国的干涉,就得成为托利党人(或土耳其人);每个自由党人或革命家都无意地充当着俄国的工具。对俄国外交的系统的研究使乌尔卡尔特深信:它是万能的,它确实是现代历史中的唯一积极因素,而所有其他各国政府只是它手中的消极工具;因此,如果不是他那么夸大土耳其的实力,那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这个万能的俄国外交不早已把君士坦丁堡夺去。因此,为了竭力把从法国革命起的全部现代历史归结为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象棋戏,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中只是充当俄国的小卒,乌尔卡尔特就必须装扮成这样一个东方先知,他不是宣告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用玄秘的夸张的外交语言宣告一个秘密的、神秘性的学说,即充满了许多关于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是难以肯定的事实的暗示的学说。他建议恢复那种把叛国的大臣误交法庭审判的做法,并用枢密院代替内阁,认为这是克服俄国外交对英国外交的优势的万应良药。乌尔卡尔特是一个有巨大功劳的人,而且是一个地道的英国旧派人物;但是,俄国外交家完全可以说:«Si M. Urquhart n'existait pas, il faudrait l'inventer» [“即使不存在乌尔卡尔特先生,也应该创造出这样一个人来”]。——编者注

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任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茨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谢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如利文。它的创始人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级贵族还有过多的私人和家族的世俗利益,因此他们不绝对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绝对可靠的。由于不能强迫贵族放弃个人财产,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天主教耶稣会神甫的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以及驻外代表、使节之类的职位委托给他们,这样来逐渐培养出本国外交官的班子。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赂,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德涅泊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拉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斯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国主义的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连串的征服、沙皇政府的威力和表面的光彩,绰绰有余地足以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

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夸耀绰绰有余地足以弥补一切拳打脚踢。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群情细节在俄国越无人知道，它们越被官方的奇谈所代替（那些好心肠的政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了刺激他们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鲁士就是如此），这种现象就越厉害。因此，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像我们从吉霍米罗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可是这样一帮冒险家怎么竟能够对欧洲历史的进程起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非常简单。他们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正确地利用了现存的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

我们来看看上一世纪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拥有一大片国土，它的居民完全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稀少，但增长迅速，因此，单是时间的推移就足以保证国家威力的增长。这些居民在精神上停滞不前，缺乏创造性，但是在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范围内，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坚韧顽强，大胆无畏，忠诚不二，吃苦耐劳，对于由密集的群众决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来说，他们是最好的兵源。这个国家的本土只有自己的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只有这一面可以受到攻击；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道途梗阻，幅员广阔，补给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搞各种能把任何一个别的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的勾当。

强大的、在防御方面几乎是不能攻破的俄国，在进攻方面却相应地软弱无力。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武装和调动，都碰到极

大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也极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能够大规模地采取攻势的试图都遭到了失败;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作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¹²的尝试,也会遭到完全的失败。可以说,在这里障碍几乎与需要组织的群众的数字的平方成正比地增长,更不用谈在少得可怜的城市居民中找不到现在所需的大量军官了。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来说从来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只愿意进行这样的战争:由俄国的盟国担负主要的担子,由它们的变成了战场的领土承受破坏,由它们提供最多的兵士,而俄国军队则担任后备军这种在大多数战斗中都备受珍惜、但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较少牺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在1813—1815年的战争¹³中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只是在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时,才自己把战争担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无须跟任何人分享战利品。

然而再回过头来看看1760年的俄国。这个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不可攻克的国家的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了真正的 *matière à conquêtes*〔侵略对象〕。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的;查理十二以此葬送了瑞典,并清楚地向大家表明了俄国是不可攻克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

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摧毁，他们的防御力量暂时还算可观，但也已减弱；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徒（构成巴尔干半岛大多数居民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中已开始骚动。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又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保护被压迫的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的使命，这里就会马上为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山脉以南，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小的基督教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阿尔明尼亚人，对于他们，沙皇政府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而且，在这里，在南方，还有一件使贪婪的侵略者着迷的、在欧洲无与伦比的战利品：东罗马帝国的旧都，整个正教世界的都城，这个城市，单是它的俄国名称——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就表明了对东方的统治，表明它的统治者在东方基督教徒中间享有的威望。

然而，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洲的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独占统治。这会意味着，只要沙皇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封锁黑海，禁止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别的商船和舰队航行，会意味着把黑海变为俄国的军港和俄国舰队独占的演习场所，俄国舰队可以在任何时刻从这个安全的后备阵地通过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偷袭，然后返回这个港口隐蔽。那时，俄国只要再取得对松德海峡和两个贝耳特海峡的同样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从海上也就无法攻破它了。

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将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亚得利亚海。但是如果不对应地扩展俄国整个西部边界,不大大地扩张它的势力范围,西南部的这段边界就是不稳固的。而在这方面,形势可以说是更加有利的。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它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他们的客栈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karczma zajezdna*),而且他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们还有“民族原则”¹⁴这样一个借口。波兰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古人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归并于所谓立陶宛公国以寻求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并¹⁵。此后,由于波兰有较高的文明,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十六世纪,耶稣会教徒统治波兰,迫使波兰的信奉正教的俄罗斯臣民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了大俄罗斯的沙皇们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提出领土要求,尽管根据最著名的现代斯拉夫学家来克洛希奇的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并不就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正教的维护者,要保护东方礼天主教徒¹⁶,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的现状。

在波兰后面是另一个似乎已最终陷入完全崩溃状态的国家——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起，德意志罗马帝国就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帝国诸侯的权力愈来愈接近完全的自主。他们不服从皇帝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相当于波兰的 *liberum veto* [自由否决权]）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条款得到法国和瑞典的明确保障¹⁷；因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得取决于其全部利益在于阻挠这一加强的外国的同意。而且瑞典由于在德国拥有它的征服地，所以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它在帝国议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在每一次战争中，皇帝都发现德意志帝国诸侯是他的外国敌人的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乎帝国所有较大的诸侯和中等诸侯都被路易十四收买了，而且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已经被破坏到这种地步，要不是每年流入这笔用于购买的法国钱，它就根本不可能在国内维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因此，皇帝早已不是在只要他花钱而除了麻烦和忧虑之外什么也不带给他的帝国内部寻找他的政权的支柱，而是在他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地中寻找了。于是普鲁士王朝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手开始显露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决不是像彼得的继承者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恭顺奴仆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的“伟大”）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清楚地（比他那大概是由某个后裔编写的所谓遗嘱¹⁹中所写的要清楚得多）看到了、制定了并开始实行了无论是对瑞典、土耳其、波斯和波兰的还是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除瑞典之外，德国

见 G 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etc.》Jena 1830, 2 Band, S. 201—206¹⁸。

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注意。瑞典他一定能打垮；波兰只要他一伸手就能拿到；至于土耳其，离它还太远；但是要在德国站稳脚跟，在那里占据法国所充分利用的而瑞典还没有力量利用的那种地位，——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他曾经尽一切方法想取得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从而侧身于德意志帝国诸侯之列，但是徒劳；他只是成功地采取了同德意志帝国诸侯通婚以及在外交上利用德国内部纠纷的办法。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鲁士的兴起，这种情况进一步变得有利于俄国了。普鲁士的成长使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差不多与他势均力敌的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不能离开法国或俄国——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愈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愈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

由上可见，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而要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许诺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领比利时和德国领土的前景引诱法国；可以用向法国、普鲁士，而从约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诺言引诱奥地利。因此，只要善于利用相互冲突的利益，就能保证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这样，与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是这样三个大国，它们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是几乎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

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领和野心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不论地点,不择手段,只求取得真正权力、能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找到真正用武之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地方啊!而“开明的”十八世纪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是在为“人类”服务的名义下走遍全欧,谒见所有开明的君主,——而在那时有哪个君主不想成为开明的呢!——在找到好差事的地方安居下来,组成一个“没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开明国际。这一国际拜倒在北方的塞米拉米达的脚下,拜倒在那位在俄国被叫做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也没有祖国的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的脚下。这位叶卡特林娜正是从这个国际中为自己的俄国外交耶稣会搜罗人材的。

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²⁰中说明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十八世纪变成了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地活动,怎样地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

在英译文中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二

1762年,当大淫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丈夫被杀后登上王位的时候,国际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政府推行其侵略计划。七年战争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²¹。英国摧毁了法国人在海上、在美运去摆布。这后者,在1762年,当登上俄国王位的彼得三世停止对普鲁士作战的时候,已经濒于毁灭;被自己最后和唯一的同盟者英国所遗弃、跟奥地利和法国长久闹翻、在七年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弄得筋疲力竭的弗里德里希,只得投身到刚即位的俄国女皇脚下,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这样做,他不仅能获得强有力的保护,而且还有希望兼并那块将东普鲁士和他的帝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波兰土地,而占领这块土地现在已成了他一生的主要目的了。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叶卡特林娜和弗里德里希签订了一个彼得堡同盟条约²²,根据这个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双方承担了用武力保护波兰现行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免遭任何改良的义务。这就预先决定了波兰在将来要被瓜分。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给普鲁士的一根骨头,使它在整整的一百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链上。

我不来详细谈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事²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瓜分是违反守旧的玛丽-泰莉莎的意志,主要由欧洲“开明”政治的三大台柱叶卡特林娜、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进行的。后两人以拥有把传统的国际法准则当做成见而加以践踏的开明的治国才智

而自负,然而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把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

这些开明的至尊的邻居对于叶卡特林娜是再有用不过了。“开明”是十八世纪沙皇政府在欧洲高喊的口号,就像十九世纪的“解放各族人民”一样。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就像同样幼稚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²⁴,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均势,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大资产阶级党派。它,也只有它,被许可同时既是正统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既是传统派又是开明派。因此,这种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

波兰之后就轮到德国了。177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权打了起来²⁵,这又只对叶卡特林娜有利。俄国现在已经强大到不要再像彼得那样想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了;它现在力求在那里取得它已在波兰取得的和法国在德意志帝国所占据的地位,即能防止任何改良企图而保持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的地位。它终于争取到了这一地位。根据1779年的帖欣和约,俄国和法国共同负责保证这项和约以及它所确认的以前各项和约,其中包括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执行。这样,德

在英译文中不是“开明”,而是“‘进步’和‘开明’”。——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都相信这一点”,而是“直到今天还相信这一点”。——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而是“通过获得某个小的德意志公国的办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编者注

国的软弱就被固定下来,它本身也成了法国和俄国未来瓜分的对象。

土耳其也没有被遗忘。俄国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总是在俄国西部边界太平无事,而欧洲在别处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叶卡特林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²⁶。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得到了阿速夫海沿岸地区,克里木宣布独立,并在四年之后成了俄国的一个省份。第二次战争使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德涅斯特河。在这两次战争当中,俄国的代理人都煽动希腊人起义反对土耳其人。自然,起义者最后都被俄国政府抛弃而听任命运的摆布。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叶卡特林娜以自己及自己同盟者的名义首先提出了“武装中立”的原则(1780年),即要求限制英国认为党的军舰在公海上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一要求从那时起便成为俄国政策的不变目的,并且按照1856年巴黎和约的条款已基本上为欧洲和英国本身所承认。²⁷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予以考虑。

法国革命的爆发给叶卡特林娜带来了新的时运。她毫不惧怕革命思想渗入俄国,而只是把这一事件看做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吵起来,从而使俄国能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在她的两个“开明的”朋友和邻居死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鲁士,列奥波特在奥地利企图实行独立的政策。革命给了叶卡特林娜一个大好机会,使她能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作幌子重新把这两个人拴在俄国的锁链上,并且在他们两人忙于法国边界的时候,在波兰进行新的掠夺。普鲁士和奥地利都陷入了罗网。虽然普鲁士(它从1787年到1791年扮演了波兰反对叶卡特林娜的同盟者的角色)及时地醒悟过来,并且这次要求在掠夺波兰的勾当中获得较多的份额,虽

然也不得不分给奥地利一块波兰土地,但是猎获物的最大部分仍然落入叶卡特林娜手中。²⁸差不多整个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在都并入了大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由于对波兰的掠夺也分散了 1792—1794 年同盟²⁹的力量,使得同盟进攻法国的力量削弱了,法国在这时就得以巩固起来,以至完全独立地取得了胜利。波兰倒下了,但是它的反抗拯救了法国革命,而随着法国革命开始了连沙皇政府也无力对付的运动。波兰人的这一作用,我们西方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我们将看到,波兰人并不只是这一次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在叶卡特林娜的政策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俄国目前政策的所有主要的特征:兼并波兰,虽然最初还不得不把一部分猎获物让给邻居;把德国变成未来的瓜分对象;把君士坦丁堡当做永不忘记的、可以逐渐实现的最主要目标;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而把挪威并给瑞典作为补偿,——叶卡特林娜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就是这样向国王古斯达夫三世提出的³⁰;用国际法的限制性条款来削弱英国的海上优势;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莱雅中煽动起义;最后,把自由主义的和正统主义的词句巧妙地结合起来,俄国按照需要用它来愚弄西欧酷爱词句的“有教养的”庸人,以及他们的所谓舆论。

到叶卡特林娜逝世的时候,俄国的领地已超过了甚至最肆无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少数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这个继承者现在完全可以称自己为全俄罗斯君主。俄国不仅夺得了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占领了广阔的滨海地区和许多

港湾。受俄国统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鞑靼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立陶宛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其他民族来说,这是足够了。可是对于沙皇的外交来说(民族是不去问的),这只不过是现在才得以开始的真正掠夺的基础。

法国革命已经平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的镇压者——拿破仑。它似乎证实了没有被大规模人民起义吓倒的俄国外交的高度英明。拿破仑的崛起现在给了俄国外交取得新胜利的机会:德国日益接近于遭遇和波兰一样的命运。但是叶卡特林娜的继承者保罗是个固执、任性、不可忖度的人;他时时刻刻打乱外交家们的计划;他变得使人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除掉。这件事情的執行者在近卫军军官中很容易就找到了;皇储亚历山大参与了这一阴谋并掩护了这个阴谋。保罗被勒死了,立刻开始了为新沙皇争取更大光荣的新的进军,这位沙皇由于他登极的方法本身而成了外交家的耶稣会匪帮的终生奴仆。

这帮人让拿破仑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并使它的混乱局面达到顶点。但是当要最后结算的时候,俄国便重新出面了。根据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³¹,法国获得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地区,同时约定,因此而丧失领地的德意志诸侯应当在莱茵河右岸从帝国僧侣(主教、神甫等)的土地中得到赔偿。这时,俄国援引它根据1779年帖欣条约所取得的保证人的权利宣布,在分配赔偿的时候,决定性的话应当由它和法国这两个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来讲。而德意志诸侯的割据和贪婪,他们习以为常的对帝国的背叛,已经保证了俄国和法国讲的话成为真正决定性的话。结果是俄国和法国拟定了失去领地的诸侯瓜分教会土地的计划,并且这个由外国根据外国的利益拟定的计划的全部要点都上升成了德意志帝

国的法律(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决议)。³²

作为联邦国家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经瓦解;奥地利和普鲁士开始作为独立的欧洲大国行动,而且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把帝国各小邦仅仅看做是供侵略的领土。什么在等待着这些小邦呢?普鲁士还太小,太年轻,因而还不能僭望对它们的霸权,奥地利则刚刚彻底丧失了这种霸权。但是俄国和法国也希望得到德意志帝国的王位继承权。法国用武力摧毁了旧的帝国;它利用自己沿整个莱茵河与德国毗邻的关系对各小邦直接施加压力;拿破仑和法国军队胜利的荣誉完成了其余的工作,——德意志的小诸侯都俯身在它的脚下。而俄国呢?现在当它世代追求的目的几乎要达到的时候,当德国已陷于彻底瓦解,已弄得筋疲力竭、软弱无力和走投无路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时候,俄国能容许科西嘉岛的暴发户从它的鼻子底下把猎获物夺走吗?

俄国外交立刻为确立对德意志各小邦的霸权而开始了进军。不言而喻,不战胜拿破仑要达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德意志诸侯和德国的所谓舆论(如果那时能谈得上什么舆论的话)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开始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在各个宫廷充满了俄国人的献媚、威胁、欺骗和贿赂的同时,给公众散发了神秘的小册子,其中把俄国捧为唯一能够拯救并且有效地保护德国的强国,而根据1779年的帖欣条约,保护德国是它的权利和义务。当1805年战争爆发时,只要稍微懂一点事的人都会明白,问题仅仅在于各小邦是做法国的莱茵联邦,还是做俄国的莱茵联邦。

命运保佑了德国。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奥斯特利茨城下被打败了,新的莱茵联邦也就没有成为沙皇政府的前哨。³³而法国的

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当时制度中最不能容忍的旧时代残余。

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普俄联盟,耶拿战役,埃劳战役,弗里德兰德战役和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³⁴这里又一次表明,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虽然它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

这个同盟的第一个成果是占领芬兰。俄国人不经宣战,只是得到拿破仑的同意,便开始了进攻;瑞典将军们的笨拙无能、卖身投靠以及彼此意见分歧,使俄国人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俄国军队大胆横越冻结的波罗的海这一行动,引起了斯德哥尔摩的暴力的宫廷政变和芬兰的让与俄国。³⁵但是三年后,当沙皇亚历山大准备同拿破仑破裂时,他把被选为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元帅召到亚波,向他许诺,如果他加入英俄同盟反对拿破仑,就把挪威让给他。³⁶这样就在1814年实现了叶卡特林娜的计划:芬兰归我,挪威归你。

但是,芬兰不过是一个前奏曲。亚历山大追求的目的,像往常一样,仍然是沙皇格勒。在提尔西特和爱尔福特³⁷,拿破仑曾坚定地答应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他,并且给了他以瓜分土耳其的希望,但是君士坦丁堡得除外。从1806年起,俄国开始同土耳其作战;这一次,举行起义的不仅有希腊人,而且还有塞尔维亚人。³⁸但是,对于波兰来说只是讽刺性的话,对于土耳其倒是符合真实情况:它靠混乱维持着。钢铁般坚强的士兵,钢铁般坚强的土耳其农民的儿子,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得以补救被卖身投靠的帕沙所破

坏了的一切。土耳其人可以被打败,但是要把他们粉碎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国军队向沙皇格勒推进得非常缓慢。

但是,这种在东方“行动自由”的代价是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³⁹,同英国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而这对于当时的俄国意味着商业的彻底破产。这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已经从亚当·斯密那里得知,

国家是怎样富起来的,

.....

当它有天然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它不需要黄金。

可是,另一方面,

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

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输往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才能获得钱;而俄国已经是太欧洲化的国家,没有钱是不行的。贸易封锁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提尔西特和约的条款被破坏了,于是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

拿破仑率领着整个西方的联军越过了俄国的边界。波兰人在这方面是够格的评断人,他们劝告他停留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第7节。(在原文中恩格斯的散文体的德文译文是:《wie ein Staat reich wird und wie er kein Geld braucht, wenn er nur Ueberflu an Produkten hat... sein Vater das nicht begreifen konnte und ein Landgut nach dem andern vorhypotheekiren mu te》.)——编者注

边,改组波兰,并在那里等待俄国人的进攻。像拿破仑这样的统帅应当懂得,这个计划是正确的。但是,拿破仑由于站在令人目眩的高处,他所依靠的基础又很不稳固,已经无法下决心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他需要迅速获得成功,取得辉煌的胜利,通过突击争取签订和约;他忽视了波兰人的忠告,直向莫斯科挺进,从而把俄国人引进了巴黎。

拿破仑的大军在从莫斯科撤退时全军覆没,这成了西方普遍起义反对法国统治的信号。普鲁士全民奋起,迫使怯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拿破仑作战。奥地利刚一完成作战准备工作便加入了俄国和普鲁士的行列。在莱比锡会战⁴⁰以后,莱茵联邦脱离了拿破仑,而在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之后过了大约十八个月,亚历山大便作为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

被法国所出卖的土耳其,于1812年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把贝萨拉比亚让给了俄国人。维也纳会议把波兰王国给了俄国⁴¹,因此,过去波兰的领土现在差不多有十分之九已并入俄国。但是,更重要的是沙皇现在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在欧洲大陆上,他不再有对手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听他使唤。法国波旁王朝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王位,因此也对他俯首听命。瑞典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挪威。作为它实行亲俄政策的保证。甚至西班牙王朝的复辟也应更多地归功于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胜利,而不尽归功于威灵顿的胜利,因为后者的胜利永远也不能消灭法兰西帝国。

俄国从来还没有获得过如此强大的地位。但是它也在自己的天然边界之外又跨出了一步。如果说对于叶卡特林娜的侵略,俄国的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词——我不愿说是理由,那末对于亚历山

大的侵略,就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了。芬兰是芬兰人和瑞典人的,贝萨拉比亚是罗马尼亚人的,会议桌上的波兰⁴²是波兰人的。在这里根本谈不到使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亲属部落重新合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

三

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但是，当达来朗想用他所臆造的这个词儿使沙皇亚历山大上钩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却更加成功得多地借助这同一个词儿愚弄了整个欧洲。它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⁴³，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其他的君主都相信这一借口；但是沙皇及其外交如何看待这个借口，下面我们就看到。

对俄国外交说来，问题只在于利用在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步向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这是个以经商为业的民族，而商人最苦于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地方都优越。他们保留着在土耳其人统治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实行充分的自治；只要他们缴纳赋税，土耳其人照例不管他们；他们只是间或受到像中世纪西欧农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贵族的压迫。这是一种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也并不怎样不适合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斯拉夫的莱雅才发觉这种生存不可容忍。相反，希腊人的贸

易从土耳其的统治使它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以后，迅速地繁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连土耳其的统治也不能再容忍了。的确，土耳其的统治，也和任何别的东方的统治一样，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不相容的；所取得的剩余价值无法保证不受总督和帕沙的贪婪的劫掠；没有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即保证商人的人身及其财产的安全。所以毫不奇怪，自1774年起已做过两次起义尝试的希腊人，这时又一次举行了起义⁴⁴。

这样，希腊人的起义便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但是要使沙皇的外交能在这里展开有力的活动，必须防止西方的干涉，也就是说，要设法使西方忙于自己内部的事务。而正统主义这个词儿就出色地为此准备好了土壤。正统主义的君主们到处招致了深仇大恨。企图恢复革命前的秩序的尝试，使整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群情激情；在法国和德国开始酝酿风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义⁴⁵。这一切阴谋和起义都有沙皇外交插手其间。并不是说这些阴谋和起义都是由它搞起来的，或者它们获得暂时的成功至少是得到它的重大支持。但是沙皇外交曾通过它的半官方代理人尽可能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它完全公开地庇护那些在同情希腊人的幌子下进行活动的西方叛乱分子，而这些募集金钱、往希腊派送志愿军及成批的武装辅助部队的希腊之友，不正是那些烧炭党人及西方其他的自由党人吗？

在英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而是“从事有利可图的贸易”。——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而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臣民中煽动不满和内部不和”。——编者注

所有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亚琛、特劳波、莱巴赫、维罗纳的会议上号召自己的正统主义同行们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来对付他们的叛逆臣民,并且为了镇压革命于1821年派遣奥地利人进入意大利,于1823年派遣法国人进入西班牙⁴⁶;这并不妨碍他甚至装模做样地谴责希腊人的起义,虽然同时它却给这次起义煽风点火,并怂恿西欧的希腊之友加倍努力。愚蠢的欧洲又受到难以置信的愚弄;沙皇政府向各国君主和反动派宣扬正统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庸人宣扬各族人民的解放,宣扬开明;而前者和后者都相信了它。

在维罗纳,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沙多勃利昂完全为沙皇所迷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就有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理十世时又以一些明确的诺言来加以充实)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且直到1830年,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隔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政策。

尽管有这一切,力图在解放希腊基督教徒、使之不受伊斯兰教压迫的幌子下而自己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的沙皇,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因为正如俄国驻伦敦大使利文公爵所写的(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

“整个欧洲都怀着惶恐的心情望着这个俄国巨人,他的大军只待信号一发,就会向它压将过去。因此,欧洲的利益是,支持土耳其强国这个我们帝国

英译文中在“正统主义”的后面补充有:“和保持现状”。——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宣扬开明”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这句话中的“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在英译文中是:“世界以不信任或者充其量是冷漠的心情看待沙皇的‘仁爱’政策”。——编者注

的天然敌人”⁴⁷。

希腊的战争仍然是胜败无常,俄国想得到欧洲的崇高的许可,即允许它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从而迫使土耳其投降的全部企图都没有成功。而在此同时,土耳其于1825年得到了埃及的援助;希腊人到处被击溃,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俄国的政策面临着抉择:要么失败,要么作出大胆的决定。

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向自己的大使们征询意见。驻巴黎的波茨措-迪-博尔哥(1825年10月4日(16日)报告)和驻伦敦的利文(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无条件地主张大胆行动:应该不理睬欧洲,甚至不理睬欧洲大战的危险,立即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显然,整个俄国外交界的主张都是这样。但是亚历山大是一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人,他自命不凡,充满神秘主义的幻想;他不仅由于他的狡猾和虚伪,而且还由于犹豫不定和缺乏毅力,活像《grec du Bas- 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拿破仑这样叫他)。他当真地推崇起正统主义来,他已经讨厌希腊的起义者了。他无所事事,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几乎不可捉摸地在南方塔干罗格附近旅行。忽然传来了他的死讯。谣传他是被毒死的。是不是外交界又像以前除掉父亲那样除掉了儿子呢?无论如何,对外交界说来他死得再适时不过了。

沙皇尼古拉登极。外交界不能希望有比他更好的沙皇了,因为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于一切,为了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现在开始更坚决地行动起来,终于发动

在英译文中不是“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而是“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做毅力的表现,把任性执拗当做力量的表示”。——编者注

了对土战争,而同时却避开了欧洲的干涉。对英国用自由主义的词句,对法国则用上面提到过的许诺,使它们两者都出舰队与俄国舰队联合起来,于1827年10月20日突然不宣而战,在纳瓦林袭击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并把它一举消灭。⁴⁸诚然,英国不久就退出了联合,但是波旁王朝的法国仍然忠于俄国。当沙皇向土耳其人宣战,他的军队于1828年5月6日越过普鲁特河的时候,15000名法国士兵已准备乘船开往希腊,并且在同年8月和9月间在希腊登陆。这对于奥地利来说,是一个足够明显的警告,使它不敢在俄国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从侧翼进攻他们,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引起同法国的战争,那时,规定由一个同盟者占领君士坦丁堡、由另一同盟者占领莱茵河左岸的俄法同盟就会生效。

于是,吉比奇推进到了阿德里安堡。但是他在那里陷入了这样的处境:只要土耳其人再支持两个星期左右,他就得赶忙翻过巴尔干山脉退却。他只有两万人,并且其中四分之一患了鼠疫。这时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出面调停,用所谓俄国人行将发动进攻(实际上根本发动不起来)的虚假消息促使土耳其人媾和;用毛奇的话说,这使俄国统帅摆脱了

“这样的处境,只要再延续那么几天,就会把他从胜利的高峰抛进毁灭的深渊”(毛奇“俄土战争”第390页)⁴⁹。

无论如何,这次媾和使俄罗斯帝国得到了多瑙河口、亚洲的一块土地以及经常干涉多瑙河各公国事务的新口实。⁵⁰多瑙河各公国从这时起直到克里木战争为止,成了俄国军队的《karczma zajezdna》,在这整个期间,它们不受俄国军队侵扰的时间是很少的。

在英译文中,《karczma zajezdna》的后面是:“(小饭店)”。——编者注

在还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优势达到下一步的目的以前,七月革命⁵¹爆发了。这时俄国的代理人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的自由主义词句,现在的问题只是保卫“正统主义”了。神圣同盟向法国的进军已经准备停当,可是忽然爆发了波兰起义,这个起义把俄国牵制了整整一年;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⁵²。

我不来详细谈 1830—1848 年期间的俄土关系。其中重要的是,俄国第一次能够出面保护土耳其不受它的发动叛乱的埃及附庸穆罕默德-阿利的侵袭,派遣三万军队去博斯普鲁斯海峡保卫君士坦丁堡,并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许多年内把土耳其置于俄国的实际统治之下⁵³;其次,它后来在 1840 年,由于帕麦斯顿的背叛,能够在转瞬之间把威胁它的欧洲同盟变成反法同盟⁵⁴;最后,它通过不断的占领,对农民实行剥削以及用《Règlement organique》⁵⁵(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8 章)将贵族引诱到自己方面来等办法准备好了多瑙河各公国的兼并。而这个时期主要的事情是征服高加索并使之俄罗斯化,而这只是经过二十年的斗争之后才终于完成。

这时,沙皇外交遭到了一个惨重的失败:当康斯坦丁大公 1830 年 11 月 29 日为了躲避波兰起义者被迫逃出华沙的时候,他的全部外交档案、外交大臣的指示原本和使节们的一切重要报

在英译文中不是“对农民实行剥削”,而是“把自己的士兵驻屯在农民当中”。——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在英译文中改成了一个脚注:“这是一种为农村居民制定的法典,它规定农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由贵族(地方上的土地贵族)支配,并且完全无偿。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 10 章第 218—222 页。”⁵⁶——编者注

涅谢尔罗迭。——编者注

告的官方复本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1825—1830年间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被揭露了。波兰政府通过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转交给了英法两国,按照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的指示,戴维·乌尔卡尔特于1835年将它们发表在“公文集”⁵⁷上。这个“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使它们全都服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阴谋的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

俄国外交已经经受住了这么多次西欧革命,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而且还得到直接的益处,所以当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国外交竟能够把这个革命作为对它极为有利的事件来欢迎。革命扩展到了维也纳,不仅除掉了俄国的主要对手梅特涅,而且还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些沙皇政府的可能的同盟者,从沉睡中唤醒;革命席卷了柏林,从而治好了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渴望脱离俄国而独立的病症。还有什么更称心的事呢?俄国保证不会受任何传染,波兰被重兵驻守着,动也不能动弹。而当革命一延伸到多瑙河各公国⁵⁸,俄国外交就得到了它所希望的东西,——重新侵入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以便在那里恢复秩序并且进一步巩固俄国的统治的口实。

不仅如此。奥地利,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边界上最顽固最倔强的对手,因匈牙利和维也纳的起义已经于毁灭。但是匈牙利人的胜利意味着欧洲革命的重新爆发,而在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人这一事实,将保证这次革命不会在波兰的边界上停留下来。所以尼古拉宽大为怀。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开进匈牙利,以优势的兵力镇压了

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和它在1825—1830年间所搞的全部阴谋被揭露了。”——编者注

匈牙利军队,从而肯定了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当普鲁士仍然企图利用革命破坏德意志联邦,并且至少使德国北部诸小邦服从于普鲁士霸权的时候,尼古拉就传普鲁士和奥地利到华沙去受他的裁判,并且作出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判决。⁵⁹普鲁士许多年来顺从俄国所得的报答是,当它稍微表示了一点儿抗拒的意图时就遭到了难堪的侮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尼古拉也以不利于德国的方式解决了,他并且预先看到了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符合于沙皇政府的目的而指定他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⁶⁰不仅匈牙利,整个欧洲都俯身在沙皇的脚下,这就是革命的直接后果。所以,俄国外交不是很有理由对于西方的革命暗中感到高兴吗?

但是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的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意外的福份;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爆发了克里木战争;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中于 *d'annoncer le monde par la grandeur de son ingratitude* (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因为奥地利知道,作为对于在匈牙利的军事援助以及在华沙的判决的报答,期望于它的是对俄国在多瑙河地区的侵略保持中立或者甚至予以支援,而这就等于让奥地利的边界由克拉科夫到沃尔肯伐和泽姆林被俄国包围起来。而这一次奥地利竟敢于有自己的主张,这在它几乎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克里木战争是一出无与伦比的大型误会喜剧,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你时刻都会问自己: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但是这出喜剧花了无数的钱财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联军的头批队伍一在保加利

据说这是奥地利政府首脑施瓦尔岑堡在奥地利采取敌视俄国的政策时讲的一句话。——编者注

亚登陆,奥地利人就进入多瑙河各公国,而俄国人则退到普鲁特河以东。这样,奥地利便在多瑙河地区插入交战双方之间,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只有得到它的同意才行。而在俄国西部边境进行战争是需要奥地利的。奥地利知道,俄国永远不会原谅它这忘恩负义的行为;所以奥地利决心加入联军方面,只是为了进行一场旨在恢复波兰并大大推回俄国西部边界的认真的战争。这个战争必然会把普鲁士也卷入同盟,因为俄国是通过它的领土获得自己的全部给养的,欧洲同盟会从陆上和海上封锁俄国,并以肯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

但是英法两国根本没有这种打算。相反,它们两国都很高兴,因为奥地利的行动方式使它们免除了进行一场认真的战争的危险。正是俄国所希望的事情——联军开往克里木,牢牢地陷在那里,——由帕麦斯顿提了出来,而受到路易-拿破仑的热烈赞同。要从克里木向俄国腹地进军,那在战略上是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战争就被顺利地变成了假象的战争,而使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感到满意。但是沙皇尼古拉不能长期容忍敌军在他帝国边陲的俄国土地上稳稳地住下来;假象的战争对他来说很快又成了认真的战争。但是这个地方对假象的战争最有利,对认真的战争却最危险。当尼古拉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于边疆的一点,集中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使俄国在防御方面强有力的因素——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便反过来不利于俄国本身了。本来应该成为入侵的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成了那些直到严冬时节还被尼古拉以其特有的凶残和愚蠢一批又一批地驱赶到克里木去的俄

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这个战争将使普鲁士不可能中立。”——编者注

国军队的坟墓。当最后一支匆忙拼凑起来、武器装备和粮草给养都很差的军队在途中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员(整营整营地死于暴风雪),而剩下的人也不能对敌人进行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时候,妄自尊大、头脑空虚的尼古拉完全陷于绝望,只好服毒自杀,以逃避他那凯撒式的狂妄行为的后果。

他的继承人 匆忙缔结的和约,条件极其宽大。⁶¹ 比较起来,战争的后果对国内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善于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热狂,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顺。而现在沙皇政府遭到了惨败,并且是发生在它的外表上最显赫威武的代表人物身上;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战争中的庞大牺牲使俄国人民太激动了,沙皇太滥用了俄国人民的忠诚,要立即使他们回到从前那种机械服从的消极状态是不可能了。而且俄国在经济方面和思想方面也逐渐发展,除贵族阶级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开明的阶级——资产阶级。总之,新登极的沙皇不得不装扮成自由派,但这一次是在国内。而这就为俄国的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会舆论奠定了开端,这社会舆论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愈来愈具有重要意义,愈来愈不容人忽视。这样,在沙皇外交面前出现了一个同它势不两立的敌人;因为只有当人民还完全消极容忍,除了政府的意志之外没有别的意志,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实现外交家所追逐的目的而提供炮灰和缴纳赋税的时候,这种外交才有可能存在。

但是既然俄国已开始了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内部的党派斗争,那末赢得使这一党派斗争能在不引起暴力震荡的情况下进行的立宪形式,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到那时,原先的俄国掠夺政策就将成为过去;在各党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外交将失去它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无条件地支配全民族的力量将成为不可能,——俄国将和以往一样难于攻破而在进攻方面和过去一样相对地软弱无力,但是在所有别的方面,它将成为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欧洲国家,它以往的外交的那种特殊力量将永远被破坏。

La Russie ne boude pas, elle se recueille(俄国不生气,它在积聚力量),——总理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战争结束后说道。⁶²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话多么正确。他说的只是外交的俄国。但是非官方的俄国也在积聚力量。而且在作这种积聚(recueillement)时,政府本身帮助了它。战争证明:哪怕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俄国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但是这个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是无法存在的,而为了创造无产阶级分子,不得不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农民为了人身自由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土地给了贵族。他们手中剩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饿死嫌太多,活命嫌太少。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却由于给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大大得到鼓励;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再不让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平静下来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作虚无主义的运动中。这就是俄国的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俄国农民的自治公社”。——编者注

《recueillement》的真正后果。

然而外交界看来还没有注意到,它在国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相反,在国外,它好像接二连三地获得胜利。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奥尔洛夫扮演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追求的主角;他不但没有作出牺牲,反而获得了新的成就;英国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俄国从叶卡特林娜时代起就提出异议的海上作战权利,被彻底取消了,并且缔结了反对奥地利的俄法同盟。⁶³而在1859年,当路易-拿破仑决定向奥地利为俄国报仇的时候,这个同盟便付诸行动。当时马志尼揭露了俄国与法国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如果奥地利进行长久的抵抗,便准备提出俄国的一个大公作为独立匈牙利的国王候选人;而奥地利由于迅速缔结和约避免了这些后果。但是从1848年起,各国人民时常打乱外交家的计划。意大利既违反沙皇的意志,也违反路易-拿破仑的意志而成了独立统一的国家。⁶⁴

1859年的战争也震惊了普鲁士。普鲁士几乎把军队增加了一倍,并且找了一个至少在完全不择手段这方面能跟俄国外交较量的人物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俾斯麦。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他用一种做戏似的夸张的姿态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法、英三国,竭尽全力保证俄国获胜。⁶⁵他以此使沙皇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放弃了他通常采取的政策;经沙皇许可,这两个公国在1864年脱离了丹麦。⁶⁶然后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这里沙皇又有了高兴的机会,因为奥地利又受到了惩罚,而普鲁士这个甚至在1849—1850年挨了耳光之后仍然忠诚不二的唯一的附庸则增强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奥尔洛夫是中心人物,起了领导作用”。——编者注

起来。1866年的战争导致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沙皇又站在他的普鲁士“好样的舅舅”一边,他直接威胁奥地利,这样就使法国失去了能帮它避免完全溃败的唯一盟国。但是正如路易·波拿巴在1866年一样,亚历山大在1870年也由于德国武器的迅速成功而受了愚弄。接着到来的不是使交战双方都弄得筋疲力竭的持久战,而是迅速的打击,结果在五个星期之内,波拿巴的帝国就被打垮了,它的军队作为战俘开进了德国。

当时欧洲只有一个地方正确地理解了所造成的局势: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它发表了一篇宣言⁶⁷,其中把1866年战争跟1870年战争作了类比。宣言中说,1866年的战争是经路易·拿破仑同意进行的,但是一当普鲁士获得胜利,力量增强,法国立刻就采取与普鲁士敌对的立场。同样,1870年的新胜利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鲁士德意志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会迫使俄国沙皇和德国敌对,尽管在战争期间他曾给过德国以外交上的支持。俄国对欧洲发生极大影响的必要前提,是他那现时被破坏了的对德国的传统的控制力。在革命运动开始在俄国内部成为威胁性的力量的时刻,沙皇是不能容许这样一种国外威势的丧失的。假若现在德国再以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那末它不是必将成为俄国掠夺计划的公开的工具,就会是在短暂

在原文中这几个字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文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好样的舅舅 [Uncle's a b r i c k] 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收到威廉的报捷电报时惯用的赞语。”——编者注

在英文文中不是转述宣言的内容,由此到本段末尾是援引宣言中相应的一段话,从“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起到“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编者注

的喘息之后开始准备同时对俄法两国作战，——这个战争很容易变成一场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种族战争。

新德意志帝国给俄国效了劳，它从法国夺去亚尔萨斯—洛林⁶⁸，从而真的把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沙皇外交现在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它得以把由于这一兼并而成为死敌的法德两国都控制在它手中。它又利用了这个有利的形势来发起对沙皇格勒的进攻，在1877年向土耳其宣战。在经过长久的战斗之后，俄国军队于1878年1月来到了土耳其首都的大门口，这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忽然出现了四艘英国装甲舰，迫使已经能够看见索菲娅教堂圆顶的俄国人停下来，把自己拟定的圣斯蒂凡诺条约提交欧洲会议审查。⁶⁹

尽管如此，似乎还是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由于俄国的帮助而扩大了领土，得到了独立，因而它们都欠了俄国的债；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土耳其的这个强有力的棱堡⁷⁰被暂时破坏了；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掩蔽物巴尔干山脉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了，并且被解除了武装；形式上是土耳其的附庸的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庸；收复了1856年失去的那部分贝萨拉比亚领土；在阿尔明尼亚占据了新的重要的阵地；奥地利在占领了波斯尼亚以后就成为瓜分土耳其的同谋者，它必定要反对塞尔维亚人要求独立和统一的一切意图；最后，土耳其由于领土丧失、筋疲力竭和过重的战争赔款而完全从属于俄国，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只能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暂时地为俄国守护

在英译文中不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是“这一点俄国外交界也十分清楚”。——编者注

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看来俄国只需要选择适当时机来实现它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即攫取《la clef de notre maison》(“我们房屋的钥匙”)君士坦丁堡了。

然而,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并吞亚尔萨斯-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末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这一或那一阵营周围。但是这意味着,俄国沙皇政府要采取最后的决定性的步骤,要真正占领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胜负机会大致相等的世界战争,而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不取决于交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因为奥地利和德国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会使俄国的粮食不能再由陆路运往整个西欧。而所有西欧国家都是靠从外国进口粮食来维持生活的。那时只能由海路输入粮食;而英国在海上的优势使它有可能断绝法国或德国的这条运输线,从而用围困法来攻占这一或那一国家(这要看当时它站在哪一方面)。但是,要知道,

这是亚历山大一世在1808年和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时的用语。——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这里加了如下的脚注:“英国没有那种长期以来它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按照1856年的巴黎宣言最后放弃了的海上权利,它在对一二个大陆强国的普通战争中也一样能够应付的。这些大陆强国甚至在海上被封锁的情况下,在我们的铁路畅通的时代也总是可以通过陆路从与它们毗邻的中立国输入它们所需的任何数量的货物;正是在这方面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时给予俄国以最大的帮助。但是在目前威胁着我们的欧洲战争中,整个欧洲大陆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保持中立归根到底将是不可能的;各国之间的陆上贸易如果不是完全中断,也会近于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因为放弃自己的海上权利而感到遗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的海上优势将在这场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而除此之外,其实也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编者注

通过一场将由英国决定其结局的世界战争来夺取君士坦丁堡,这正是俄国外交一百五十年来力图避免的事情。这已经是俄国外交的失败。

其实,就连与共和制的法国(它的执政者经常变动)的同盟对沙皇政府来说也决不可靠,而且更不符合它的宿愿。只有君主制复辟的法国,沙皇政府才会充分相信它是自己在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可怕战争中的盟友。这就是五年以来沙皇政府将奥尔良王室置于自己的十分特殊庇护之下的原因;他们甚至必须通过和丹麦王室(俄国在松德海峡的前哨)的代表通婚来同沙皇俄国结成亲戚。

在英译文中,下面加了这样一段话:“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清楚地了解,使英国不能反抗俄国对波斯普鲁斯海峡的彻底控制是多么重要。克里木战争以后,特别是1857年的印发起义⁷¹以后,早在1840年就已开始的对土尔克斯坦的征服⁷²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865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从而在亚克萨尔特河上建立了据点;1868年合并了撒马尔汗,1875年合并了浩罕,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被变成俄国的附庸。然后,开始了从里海东南角对麦尔夫的缓慢的进军;1881年占领了沙漠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前哨格奥克-帖彼;1884年麦尔夫投降,于是里海东岸的铁路就填补了里海的米海洛夫斯科耶和奥克斯斯河的查尔朱伊之间的俄国交通线上的空白。目前俄国人在土尔克斯坦的地位还远不能为他们进攻印度提供可靠的和充分的基地。但是,它至少造成将来入侵的严重威胁,并且在当地居民中间不断引起骚动。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还没有出现可能的竞争者的时候,甚至1857年的起义以及对它的残酷镇压都可以看做是归根到底加强了英国人的统治的事件。但是当在土尔克斯坦出现一个头等的欧洲军事强国的时候,当它正在用暴力或劝诱的方法把波斯和阿富汗变为自己的附庸,并且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兴都库什山脉和索利曼山脉推进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的统治对印度来说已不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命运;在当地居民面前展现了另一个前途;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也可以用暴力推翻;现在如果英国企图阻挡俄国通向黑海的道路,俄国就会设法在印度给英国制造许多麻烦。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海上威力还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看来正在逼近的大战中,英国能给俄国造成的危害,会比俄国能给英国造成的危害大得多。”——编者注

布朗热将军被利用来准备奥尔良王室(现在也成了俄国的前哨)在法国的复辟,这位将军的信徒们在法国自我吹嘘说,他们大肆挥霍的那些金钱的神秘来源不是别处,正是俄国政府,它供给他们1500万法郎从事复辟运动⁷³。这就是说,俄国又在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这一次是公开以反动派的庇护人的姿态出现,利用了与法国工人的革命精神相对抗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躁的沙文主义。

一般说来,正是在1878年以后可以看出,从各国人民愈来愈敢于起来发表意见并且得到成功的时候起,俄国外交的处境严重地恶化了。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在俄国 *ex professo* [专门] 以各国人民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地区,也毫无收获。是罗马尼亚人使俄国人得以在普勒夫那城下获得胜利的⁷⁴,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不得不重新让出自己的那块贝萨拉比亚,现在他们未必还会相信关于将来合并塞米格腊迪埃和巴纳特的诺言了。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派到他们国家去的沙皇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只有塞尔维亚人,也许还有希腊人,暂时还没有被吓坏,而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直接站在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沙皇认为把他们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自己的使命——从那时起,至少是在帝国的息斯莱达尼亚部分,本身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⁷⁵关于万能的沙皇解放各国人民的空话已经过时,它至多还能适用于克里特岛或者阿尔明尼亚,但是在欧洲,甚至对虔信基督教的英国自由党人,它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自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⁷⁶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一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国人民”,而是“解放受压迫的信仰基督教的各国人民”。——编者注

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甚至连格莱斯顿这样的沙皇崇拜者也已经不会为了克里特岛或阿尔明尼亚而冒欧洲战争的危险了。

现在我们谈到了主要的问题。为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从 1856 年开始的俄国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国越来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一切实物贡赋之改用货币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俄国进行着。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以同样的速度日益显现出来。成立了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党，政府只有用越来越粗野的暴力才能使它们屈服。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经不远，——到那时，俄国人民由于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干夺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儿戏了。1848 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

当你读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中于沙皇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和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着什么样的枷锁；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见

英译文中在“自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的后面补充有：“自从虐杀西吉达女士以及俄国人的其他‘暴行’被公开以后”。——编者注

解的话,那末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绪,即新兴资产阶级的
情绪,而资产阶级自然是热中于作为扩大俄国市场手段的新的侵略
的。但是这种城市居民在全国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一旦国民议
会使俄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即农村居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
们所听到的就会完全不同。政府曾经试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而
随后它又被迫把这些地方自治机关化为乌有⁷⁷,这个经验可以作
为这样一点儿的保证,即俄国的国民议会为了克服哪怕是最主要的
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

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亚尔
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
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
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
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
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
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
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
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
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只有当在
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
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

在原文中这里和下面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
字母拼写的,并在括号中作了注解:“(郡参议会)”。——编者注

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到那一天,俾斯麦将失去他的一切反对法国的同盟者,因为这些同盟者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才投入他的怀抱的。不论对于奥地利来说还是对于意大利来说,为俾斯麦火中取栗,去参加欧洲大战,都不会有丝毫的好处。德意志帝国又将陷于孤立,在那种情况下,用毛奇的说法是:大家全都怕它,可是谁也不喜欢它⁷⁸,这是它的政策的必然结果。那时,为自由而斗争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相互接近,对两国的局势来说将是非常自然的,而对欧洲整个局势来说将是非常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本人或他的继承者在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之前也必须三思,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不会牵制奥地利,奥地利也不会牵制俄国,来掩护他的侧翼,两国反而都会为他遭到的每一个失败而高兴,这样,即使单是法国人他是否能对付得了,也是值得怀疑的。那时所有的同情都会在法国一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障法国不再丧失领土。因此,那时德意志帝国将不会采取战争的方针,相反,它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孤立地位难以忍受,因而将诚心诚意地去同法国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可怕的战争危险就会消除,欧洲就能裁军,而从这里得益最多的会是德国自己。

到那一天,奥地利将丧失它存在的唯一的历史根据——作为防止俄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屏障。只要俄国不再威胁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对于这堆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存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

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意志帝国”。——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为俾斯麦”,而是“为德国皇帝”。——编者注

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洲)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时很快就会发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爱琴海之间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民族的残余部分实行自治和实行自由联合的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以解放这些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

到那时,法国将摆脱由于和沙皇结盟而陷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反常的处境。如果说沙皇厌恶与共和国结盟,那末革命的法国人民对于与暴君,与波兰和俄国的刽子手结盟则更加厌恶得多。法国如果站在沙皇一边作战,一旦失败,法国就不可能使用自己伟大的、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1793年的挽救手段——进行革命,通过恐怖来动员全民的力量,在敌对的国家进行革命宣传。一旦如此,沙皇就会立即与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因为从1848年起时代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从那时候起沙皇已经在俄国国内亲身体过什么是恐怖了。因此,与沙皇结盟根本不会加强法国的力量,相反,在最危险的关头,它会妨碍法国拔出自己的刀剑。但是,如果俄国国民议会在俄国取代了强大的沙皇的地位,那末新的解放了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同盟就是十分自然和完全正常的了,那时这个同盟将促进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阻碍它,那时这个同盟对于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也会是有利的。由此可见,沙皇的万能威势的破灭对于法国也有好处。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英译文中在“希腊人”的后面补充有“阿尔明尼亚人”。——编者注

与此同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乎当做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至连德意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不断增长的军事拨款的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则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波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之害。所以,一旦这个主要堡垒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

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编者注

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编者注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原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皇政权,可是这一定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步骤”。接着还加了这样一

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国或法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的力量每隔三年便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的政党,在总数700万张选票中,它拥有1437000张,一切惩治法和非常法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步,同时也满怀决心——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决心更是空前地坚定——去争回1848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会给他们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证明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着专制和宗法权力的德国皇帝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编者注

论反犹太主义

(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⁷⁹

……然而难道反犹太主义不是给您带来害处多好处少吗？这就是我要请您认真考虑的问题。反犹太主义，这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因而只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如果是在英国这里，或者是在美国，有谁打算鼓吹反犹太主义，那他简直会被人耻笑，而在巴黎，德留蒙先生的著作（这比德国反犹太主义者的作品高明得无法比拟）也只是微不足道地和毫无影响地暂时耸动了一下听闻。况且，现在当他以市镇参议员候选人身份出现的时候，他本人也不能不表白，他要像反对犹太人的资本那样地反对基督徒的资本！不过要知道，即使德留蒙先生说出相反的意见，也还是有人读他的著作的。

在普鲁士，反犹太主义的传播者，是一些收入一万马克、支出两万马克，因而落到高利贷者手中的小贵族、容克地主；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随声附和反犹太主义者的，是一些因大资本的竞争而没落的小资产者；行会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如果说资本在消灭社会上这些反动透顶的阶级，那末它是在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在做一件好事——不管这资本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是行割礼的还是行洗礼的，反正都是一样；它在帮助落后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前进，促使他们最终达到现代发展水平，在这种发展水平下，先

前的一切社会差别溶化成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一个巨大对立。只有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地方,即在还不存在强有力的资本家阶级,因而也不存在强有力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地方;只有在资本还薄弱得不能支配全国的生产,因而证券交易所是它的主要活动舞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还是掌握在农民、地主、手工业者以及诸如此类由中世纪保存下来的阶级的手里的地方,——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的资本才占优势,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反犹太主义。

整个北美有一些很难用我们的可怜的马克、古尔登、或法郎来表现其财富的百万富翁,在这些百万富翁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同这些美国人比较起来,连路特希尔德家族也简直是叫化子。即使在英国这里,譬如说同韦斯明斯特公爵比较起来,路特希尔德也只能算是一个家财微薄的人。甚至在我们的莱茵河两岸,九十五年以前我们靠法国人的帮助曾从这里赶走了贵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而在这里又何尝有犹太人?

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反犹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只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还不够发达。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彼此密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资本愈强大,雇佣工人阶级也愈强大,从而资本家的统治也就愈接近灭亡。因此,我希望我们德意志人(我把维也纳人也算在里面)能够真正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绝不希望它停滞不前。

况且反犹太主义还歪曲事情的真相。它甚至不了解这些它所

声嘶力竭反对的犹太人。否则它就应该知道,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有着成千上万的犹太无产者,而且正是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发生了三起犹太工人罢工事件⁸⁰,——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说成是反对资本的斗争手段呢?

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得感谢犹太人。海涅和白尔尼不待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我的朋友维克多·阿德勒(他为了效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目前正在维也纳坐牢)、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爱德华·伯恩斯坦、我们最优秀的帝国国会议员之一保尔·辛格尔——所有这些人我都因为同他们建立了友谊而感到自豪,而他们全都是犹太人!“凉亭”⁸¹杂志甚至把我也算做犹太人,假使要我选择的话,我无论如何情愿做一个犹太人,而不愿做一个“贵族老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4月19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5月9日“工人报”
第1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⁸²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⁸³以来,已经又有必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译本,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⁸⁴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由‘钟声’⁸⁵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无产阶级运动所包括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

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不是“1848年1月”,而是“1847年12月”。——编者注

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在“各种”之前还有“各国”两字。——编者注

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使用自己劳动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一起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⁸⁶,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末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过的那个解体过程呢?

“使用自己劳动的农场主”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不是“农民公社”(Bauerngemeinde),而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公社”(Obschtschina)一词。——编者注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义宣言”⁸⁷。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Socialdemokratisk Bibliothek》)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⁸⁸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在不少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较为细心一点,他是能够把它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⁸⁹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艾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⁹⁰。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在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阿尔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

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封面印的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同意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上注释,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出版社,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⁹¹。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把它们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过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⁹²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以后它就被那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面去,而在1852年11月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刑⁹³之后,它更被“依法”宣布为非法了。随着与二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面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 摒诸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⁹⁴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是连巴枯宁和无政府派也不能不承认的。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智慧的发展。反资

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主张靠国家帮助的人和主张自我帮助的人。

Sozialdemokratische Bibliothek.

XXXIII.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Vierte autorisierte deutsche Ausgabe.

Mit einem neuen Vorwort von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Wm. Lawrence & Co.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

114 Kentish Town Road NW.

1890.

“共产党宣言” 1890 年德文版的扉页

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善于透彻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道地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1887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⁹⁵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由此可见，“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

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⁹⁶，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标准工作日。⁹⁷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共产党宣言”1890年版

伦敦的 5 月 4 日⁹⁸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单单是因为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它还使我们能够证实各个国家里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 ,他们都同意一点 ,即无产阶级的节日活动在欧洲大陆所有各国中 ,以奥地利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 ,而在奥地利的城市中 ,又以维也纳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 ;因此 ,奥地利的 ,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在运动中就取得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就在几年以前 ,奥地利的运动几乎完全停顿 ,各德意志省和各斯拉夫省的工人分裂成两个互相敌视的党派 ,把自己的力量都消耗在内部斗争上面 ;仅仅在三年以前 ,如果有人断定说 ,1890 年 5 月 1 日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会向全世界做出如何庆祝无产阶级的阶级节日的示范 ,人们一定会报之以嘲笑。当我们必须对在其他国家 ,例如在法国仍然消耗着工人力量的那些内部纷争作出自己的判断时 ,是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的。谁能肯定说巴黎不能做到维也

纳已经做到的事呢？

可是在 5 月 4 日这一天 ,伦敦使维也纳黯然失色了。在全部五一节活动中 ,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 :1890 年 5 月 4 日 ,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要理解这一点 ,必须熟悉一下 5 月 4 日以前的历史。

去年年初 ,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工人区——伦敦东头——开始逐渐行动起来。1889 年 4 月 1 日成立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Gas Workers' and General Labourers' Union) ,目前会员总数达十万人。这个工会同码头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很多工人冬季在煤气企业做工 ,夏季在码头做工) ,码头工人大罢工主要就是在它的积极协助下举行的 ,这次罢工使伦敦东部最底层工人也一改其消极状态。⁹⁹目前 ,在这些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中间 ,工会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了 ,而他们那些迄今毫无生气的原有工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然而这新旧工联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旧工联所网罗的都是“有技术的”工人 ;它们带有闭塞的性质 ,根本不接纳没有受过行会训练的工人 ;这样一来 ,它们就自己促使非行会工人来同它们竞争 ;它们有钱 ,但是越有钱 ,它们就越退化为单纯的患病职工补助会和丧葬基金会 ;它们保守 ,千方百计地尽一切可能躲避“可诅咒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反 ,“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新工会则接纳每一个同行 ;它们基本上是 ,而煤气工人的工会甚至纯粹是 ,为了进行罢工而组织的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 ;它们的行列中虽然还不是人人皆社会主义者 ,但它们至少是坚定不移地只愿意要社会主义者而不要其他任何人来做它们的领袖。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已经在东头积极进行了许多年 ;在这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最近四年里 ,他们在

几乎全部由工人组成的“激进俱乐部”¹⁰⁰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最好的场所,他们坚持进行宣传,而且现在已经看出成绩很大。在码头工人罢工时期,艾威林夫人是三位负责分发津贴的妇女之一;海德门先生——特拉法加广场的逃兵¹⁰¹——却用诬蔑来答谢她们,说她们硬要罢工基金会为这项工作每星期付给她们每人三英镑。去年冬天也是在东头举行的银镇罢工,几乎完全是由艾威林夫人一人领导的¹⁰²;在煤气工人委员会里,她代表她本人所创建的女工支部。

去年秋天,煤气工人在伦敦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在伦敦南部,却因罢工失败而又被取消了¹⁰³,这向他们充分证明,在伦敦北部,这个胜利果实也绝不是永远保了险的。这些工人坚决响应了艾威林夫人提出的根据巴黎代表大会决议在伦敦为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举行五一节活动的建议,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同某些社会主义团体、激进俱乐部以及东头的另外一些工联一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为此在海德公园组织一次大示威。在发现今年任何想在 5 月 1 日(星期四)举行这种示威的企图必遭失败以后,示威决定改在 5 月 4 日(星期日)这天举行。

为了尽可能使伦敦所有的工人都参加示威,中央委员会天真地对伦敦工联理事会也发出了邀请。这个组织是由伦敦各工联,而主要是“有技术的”工人的那些旧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自然,其中占大多数的目前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工联理事会看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发展大有非它所能控制之势。旧工联也赞成八小时工作日,但是不赞成由法律加以规定。他们对八小时工作日的理解是这样的:八小时的工作付给常规日工资,——每小时的工资照此折算,——但同时允许每个人一天加班随便多少小时,条件

是提高每个小时的加班费,譬如说,提高到相当于平时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工资的数目。因此,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把示威导向这样一个方向,即争取可以按照“自由”协议来规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而不是争取以议会法案形式写成硬性条文的工作日。抱着这样的目的,工联理事会就同前面提到的那位海德门先生的社会民主联盟联合了起来,社会民主联盟是这样一个团体,它仍然以英国社会主义的唯一能救世的教会自居,它完全合乎逻辑地同法国的可能派¹⁰⁴永远结成了联盟,派代表团参加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五一节活动是一种亵渎圣灵的罪过。对于这个组织说来,运动也已经不是它所能控制的了。但是加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边就意味着服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相反,如果工联理事会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如果节日活动不在 5 月 1 日而在 5 月 4 日举行,那就不是险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五一节活动了,那就可以去参加了。所以,尽管社会民主联盟的纲领中订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样一条,联盟还是满心欢喜地跟工联理事会勾结了起来。

于是,两个以这种古怪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新盟友就对中央委员会耍了这样一种狡猾手段,这种手段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大概会被认为不仅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但在欧美工人们看来,却无疑是极端卑鄙的。原来,在海德公园举行人民集会,其组织者应事先向公共工程部(Board of Works)提出申请,并报告具体细节,其中包括取得让用来做讲坛的四轮车在草地上通过的许可。此外还有一条规定是,一经有人申请在公园举行集会,即不得有第二个集会同日在公园举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提出这种申请。这两个为了对付中央委员会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一

知道这个消息 ,立刻就申请 5 月 4 日在公园举行集会 ,并被批准设立七个讲坛 ,这一切都是背着中央委员会干的。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 ,这样一来 ,在 5 月 4 日那一天公园由他们租定了 ,胜利毫无问题。理事会随后就召开了各工联代表的会议 ,也邀请了中央委员会派两位代表出席 ;中央委员会派去了三位代表 ,其中一位是艾威林夫人。工联理事会在他们面前以全局主持者自居。理事会宣布 ,只有工会才能参加示威和携带自己的旗帜 ,也就是说 ,不许社会主义的组织、政治俱乐部这样做 ;既然如此 ,为什么社会民主联盟却能参加示威 ,这还是一个谜。理事会向会议提出了一个事先拟好的决议草案 ,草案中恰恰把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条抽掉了 ;主张恢复这一条的提议既没有加以讨论 ,也没有提付表决。最后 ,理事会竟拒绝艾威林夫人以代表的身分参加会议 ,说什么她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是不对的) ,尽管理事会主席希普顿先生自己已经足足有十五年的时间 ,连想也没想干干自己的本行。

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人们对于他们这种狡猾手段很气愤。看来示威似乎已最终地落到只代表着伦敦工人中微不足道的少数的那两个组织的掌握之中了。而且看来对此似乎毫无别的办法 ,只好去抢夺工联理事会的讲坛了。煤气工人就曾表示要这样干。于是爱德华·艾威林就到公共工程部去 ,结果争取到破例批准中央委员会在公园也设立七个讲坛。靠欺骗手段利用示威来达到少数人目的的企图破产了 ;工联理事会变得和气起来 ,情愿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央委员会就组织示威一事进行商议。

必须知道示威前的这一段过程 ,才能理解示威的性质和充分估计它的意义。由不久前投入运动的东头工人们倡议举行的示威 ,

得到了如此普遍的响应,以致两个互相敌视的组织(它们互相敌视的程度并不下于它们共同对举行示威这一基本思想的敌视)也被迫联合起来,以便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利用这次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宣扬劳资平等的保守的工联理事会,另一方面是在不会招致危险时总要大谈其社会革命的标榜激进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施展卑鄙的阴谋诡计,企图靠它们二者都深恶痛绝的示威来大捞一笔资本。由于这些缘故,5月4日的集会分成了两边。一边是眼光超不出雇佣劳动制度框子的保守的工人,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个软弱无力但又热中于权势的社会主义宗派;另一边是不久以前投入运动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对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义¹⁰⁵听也不愿再听了,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并且要同他们自己选择的同盟军,而不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小集团强加给他们的同盟军一道去争得这种解放。一边是以本身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行会习气的工联和依靠最坏的同盟军的狭隘宗派为代表的停滞状态;另一边是重新觉醒起来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气勃勃的自由的运动。即使眼力最差的人也会一下就看得出,在这次包含两面的集会上,哪一面生气勃勃,哪一面死气沉沉。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人海,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而来的有十万多人,个人加入进来的差不多也有十万人;每一处都是万众一心,斗志昂扬,同时又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与此相反,在勾结起来的反动分子们的讲坛那边,一切都毫无生气;他们的队伍人数少得多,组织得很坏,一片混乱,而且大多数都来迟了,以致有几处在中央委员会那边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工联理事会那边有个别激进俱乐部的自由派领导人以及某些工联的头面人物参加,可是正

是这些组织的一般成员，甚至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的整整四个分部的一般成员在内，却在中央委员会的行列里行进。虽然如此，工联理事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是在中央委员会这边。

许许多多观察了这次示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离开时都已深信，充当伟大自由党的附属品和执票工具达四十年之久的英国无产阶级，已经终于觉醒过来，投入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活动。1890年5月4日英国工人阶级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军，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它的漫长的冬眠——一方面是1836—1850年的宪章运动遭到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1848—1880年工业获得巨大发展的结果——终于打破了。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了战斗队伍。八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风潮一直此伏彼起，时有发生。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团体，但是没有一个超出宗派的水平之上，宣传鼓动家和所谓党的领袖——其中有的甚至是纯粹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都是些没有士兵的指挥官。这差不多总是使我们想起1849年巴登运动¹⁰⁶中著名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上校一名、军官十一名、号兵和列兵各一名。而这些各式各样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还为了争夺对未来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而互相争吵，这种景象更是令人难以乐观。现在，所有这一切将很快像在德国、在奥地利那样停止下来。强大的群众运动将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团体不复存在，它将把士兵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给指挥官指出他们应守的岗位。谁不喜欢这样，可以走开。事情不能没有摩擦，然而事情终能做成。不久以后，比很多人预料的还要早一些，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军将同任何其

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成为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坚强有力的大军，大陆和美国的所有同志都将为它热烈欢呼。

写于 1890 年 5 月 5 日和 21 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0 年 5 月 23 日“工人报”

俄文译自“工人报”

第 21 号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 答复的草稿¹⁰⁷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该报 105 号(1890 年 8 月 31 日)上发表的告别辞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一点点怀疑的话,那末这些大学生的主要机关报之一的前编辑部的这一极端无耻的行为则应该擦亮我的眼睛。前编辑部同我“一起希望”——结果好像我也同它一起希望——以奥艾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这样一些人为代表的那一派很快将拥有德国工人的少数,而以前编辑部为代表的“有原则的一派”则将拥有多数。这就是说,把前编辑部的希望简直是诬蔑性地硬加在我身上,因而我得为此向它追究个人责任。

我不曾有任何愿望要去参与大学生和文学家老爷们挑起的无谓纠纷。但是我曾坦率地向每一个希望知道我的意见的人谈了我

的意见。如果爱闹纠纷的老爷们也希望公开地听我的意见，那就照这样办吧。

当这些老爷们开始大吵大嚷地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反对党团的时候，我曾惊奇地问自己：他们究竟希望什么呢？这一切是为的什么呢？据我所知，所有这些大吵大嚷都是毫无根据的。在有关庆祝五一节的争论问题上，党的执行委员会也许阐述自己的观点稍微迟了一点。但是执行委员会包括五个人，他们居住在四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商讨出一致的意见。然而，当执行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意见却是正确的、唯一符合局势的意见。汉堡事件完全证实了它的正确性。¹⁰⁸

党团的或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在辩论时无疑是犯了错误。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会发生的，这要归罪于个人，而不能归罪于整个机构。党团在自己的章程草案中有某些地方违反了民主准则。但是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草案，党的代表大会可以通过它，拒绝它，或者修改它。1871年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¹⁰⁹也同样违反过某些手续，巴枯宁主义者老爷们立即抓住这点，当作他们攻击总委员会的表面的借口。尽管如此，现在谁都知道，真正的民主是在总委员会这里，而不是在巴枯宁主义者的委员会那里，这些人为了使国际从属于自己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秘密阴谋机构。

在争论航运津贴时，当时的党团曾有一度不知所措，而企图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变成它自身束手无策的替罪羊，当时我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反对党团。¹¹⁰即使在现在我还是会这样做，如果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真正做了任何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

情的话。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

写于 1890 年 9 月 6 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第 1 版第 16 卷第 2 部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签署人敬请贵报刊登下面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昨天寄给德勒斯顿“萨克森工人报”的现任编辑部。

* * *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1890年8月31日第105号)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刚卸任的编辑部的这个声明对我来说是非常出乎意料的事。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问题,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今后愿意“希望”什么和“希望”多少都可以随它的便,只是我并不打算同它“一起”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怀疑的话,那末看到这种企图宣布我是支持这些老爷的阴谋的极端无耻行为之后,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刚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

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東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东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觀;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有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受到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小宗派也不至于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关于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这些老爷们已经亲身体会到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绪,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老爷乐意去滤出蠅虫,那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德国工人为了感激这一点就应当吞下骆驼。¹¹¹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

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对待党的状况和党内存在的一些观点,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老爷们坚决接受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东西。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不是那么深信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应该让他们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深刻的批判性自我检查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官衔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9月7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9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和1890年9月14日“柏林人民报”第214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柏林人民报”校对过

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¹¹²

在利物浦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上(1890年9月)¹¹³,比利时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邀请了工联出席将于明年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比利时人受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委托在比利时召开国际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我为了简便而用这个名称)只是委托他们召开代表大会,而且是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当时并没有确定。

如果这里不是存心模棱两可,那末比利时人是邀请了英国人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他们有单独邀请权的唯一的代表大会。而英国人则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将不可能向非熟练工人的新工联解释清楚,说他们的信任受骗了,1891年将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而他们答应参加的正是那个坏的代表大会。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那些曾呕尽心血想把工联吸引到国际运动中来的人的意见。1889年“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进行的反对英国的可能派之友的运动¹¹⁴,这一次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获得成功了。既然召开两个代表大会,那末为什么不邀请我们也去参加另一个代表大会,让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呢?现在已经太晚了,——这些讲究实际的人会这样说。他们既接受了比利时人的邀请,就要去参加在比利时举行的代表

大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比利时人和可能派不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蠢事而把他们碰回去的话;但是这样的蠢事比利时人和可能派是不会做的。

既成的现状是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犯错误的必然结果。留下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下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解决。更糟糕的是使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决,因为把召开代表大会的事委托给了两个全国委员会——比利时全国委员会和瑞士全国委员会,若它们事先不取得协议就寸步难移,——这是使什么都做不成的最可靠办法。此外,比利时人也像在海牙代表会议¹¹⁵以后那样,不是严守他们所受委托的范围,而是按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想要在比利时召开代表大会,于是他们就召开代表大会,而置与他们同受委托的瑞士人于不顾。我决不是要怀疑比利时全国委员会的真诚和善意;但是实际上,它采取的行动路线却是有利于可能派而有损于我们的。我们不去责备别人,而是承认我们只是得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我们不要过严地责备比利时人;我们所给予他们的委托,几乎是责成他们不要太就字面来了解它。)

我们是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使自己陷于寸步难行,而我们的竞争者却能继续活动的境地。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呢?

首先,毫无疑问,将要作出种种尝试来防止召开两个唱对台戏的工人代表大会这样的“丑事”。我们也不能放弃这种尝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这种“丑事”再一次发生,就要使发生这种“丑事”的责任落在可能派及其同盟者身上。每一个多少有点国际运动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发生分裂,制造分裂的人或被公认为制造分裂的人始终是工人心目中的罪人。因此,如果在1891

年召开两个代表大会,我们就要使制造这种分裂的过错不能落到我们身上。

既然这种争取联合的尝试是要做的,而且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末我们是否应当消极等待呢?那时我们就要冒这样的危险,即在最后关头,可能派及其同盟者会向我们提出布满明显圈套(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些圈套)的最后通牒,而这些圈套又是用甜言蜜语掩盖起来的,广大群众不能看穿其中的毒计,然而这又是我们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们的处境才妙呢:要么接受最后通牒,睁着眼睛投入圈套,要么拒绝最后通牒,对工人承担我们因过于固执而破坏社会主义统一的责任!

总之,我们的处境糟透了。必须寻找出路。但如何寻找呢?用行动寻找。不要再仰赖已给予比利时人和瑞士人的委托了,我们要自己把事情承担起来。

如果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我们是否会感到遗憾呢?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想。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靠:(1)法国集体主义派¹¹⁶和布朗基主义者(而且后者的人数由于大批转入布朗热主义者阵营而减少了), (2)德国人,(3)奥地利人,(4)西班牙社会主义者,(5)占丹麦社会主义者五分之一的丹麦“革命派”¹¹⁷, (6)瑞典人,可能还有若干挪威人,(7)瑞士人,(8)俄国和波兰的流亡者。

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代表大会可能包括:(1)法国的可能派;(2)代表人数可能较多的英国工联,及可能利用英国国内运动的普遍高涨为自己服务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3)比利时人;(4)荷兰人;

以下到“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一句前的六段在手稿中用垂直线划掉。——编者注

(5)巴塞罗纳等地的西班牙工团的代表;(6)可能有葡萄牙工团的代表;(7)意大利人;(8)占丹麦所有社会主义者五分之四的丹麦“改良派”,他们大概还能吸引若干挪威人。

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可能根据情况同时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相反,瑞士人也可能派几个代表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由此可见,这一次可能派将拥有一支比1889年更庞大得多的队伍。如果德国人加入我们这边,那末可能派会用英国人来弥补,这些英国人是由于我们毫无作用和不够灵活而失去的;在这以外,我们拥有多少民族,他们也拥有多少民族,可能还要更多。而且,由于他们具有制造假代表资格证和假代表的才能,他们将使我们远远地落在后面。加之,如果我们继续采用至今还在使用的毫无作为的办法,那末,分裂的罪名必将落在我们身上,结果将使我们代表大会的人数再一次受到损失。

现在假定实现了合并。那时我们的力量就会由于得到所有因分裂“丑事”而不得不至今抱中立态度的人,即比利时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而壮大起来;联合有虽不十分坚定但是正直而且易于接受知识的优秀分子的英国新工联必将归附我们。我们已经在他们中间扎下了根;他们只要跟法国集体主义派以及德国人一接触,就会坚决地靠拢我们,何况以独裁作风令他们厌烦的社会民主联盟又是可能派的亲密伙伴呢。比利时人所需要的只是那种他们能够在其中起显著作用的代表大会(可能派就是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而首先是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规模巨大的代表大会。如果我们帮助他们做到在他们国土上实行合并,那末,作为他们队伍中优秀分子的佛来米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可以抵消布鲁塞尔人的可能派倾向。荷兰人是合并的热烈拥护者,但是他们决不是可能派。

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1)共同的代表大会应由受 1889 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人来召开。比利时人召开代表大会是由于受可能派的委托,而比利时人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则是由于受我们的委托,到底采取哪种方式,必须确定。

(2)代表大会应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过去几次代表大会的规章、议程和决议对它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可以不受任何先例的限制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规章、代表资格证审查方法和自己的议程。任何一个委员会,不论是以前某一次代表大会任命的还是在关于合并问题的谈判期间成立的,都无权使代表大会受到任何约束。

(3)各工人组织选派代表的条件和名额都要事先规定好(最好提出一定的建议,但提出建议不是我的事情)。

(4)委托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应予规定)拟出关于规章、代表资格审查方式和议程的建议,并提交代表大会批准。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 读者的告别信¹¹⁸

请允许我也向读者告别。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退出舞台。这不仅是因为曾经时常向其他政党作过这样的声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肯定会变，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都会变。然而，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篇幅、而且只有它的篇幅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十二年的报纸，——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的面貌的。它应当像它原来的那样，否则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们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必然会造成一个缺口。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能代替它。对党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损失，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但是对于本报的撰稿人来说，特别是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的损失。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

第一次是 1848 年到 1849 年为“新莱茵报”¹¹⁹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在维登代表大会上重新恢复了党，此后党又重新“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始了斗争。¹²⁰“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既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也不存在帝国刑法典和普鲁士邦法。“社会民主党人报”无视帝国的和各邦的法律，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防岗哨——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订户的手里，差不多像期票一样准，任何一个斯蒂凡也不能阻止德意志帝国邮局把它分送到收件人手里。而且当时在德国有一万多订户，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 1848 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被禁止的刊物，那末工人却在十二年的过程中都非常认真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我看到在编辑部、发行处和订户之间的这种安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得 businesslike，也就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在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地一刻不停地进行，我这个年老的革命者的心里常常是多么高兴啊！

这个报纸也是值得为推销它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的。这无疑是在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

出版自由。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我们的资产阶级报刊笼罩着一片死寂的时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却反映出我们的工人通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时的那种生动幽默。

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1885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国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4月2日宣布禁令,而在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¹²¹

过了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有机会领受了一下备受赞扬的瑞士避难权。¹²²正如1830年以来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那样,在这里也暴露出了每当这种避难权真正应当发生效力的时刻,它却总是失灵的。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自从1830年瑞士实行民主化以来,邻近的大国只准许这个小共和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国内的民主实验,即它只能在与每次事件有关的大国的监督下实施流亡者的避难权。瑞士太弱了,它不能不做出让步。这不应责怪它。马克思正是在提到荷兰、瑞士和丹麦的时候常常说,今天没有比具有伟大历史的小国的处境更糟的了。不过,现在终于停止胡说什么在“自由瑞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权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十二年的斗争,党获

得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破产,俾斯麦已被推翻。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帜。现在帝国政府又企图在普通法的范围内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也试图利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关于“合法”手段那一条重新列入纲领,这并不那么重要。应当说法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利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超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修筑街垒,诉诸武力吗?党一定不会使自己的敌人得到这种满足。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所赋予它的力量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有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投给了党,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如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末,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百分之二十对百分之八十,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

行暴动 ,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

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经受住了考验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点提出异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现。为这种情况而保存下来的旧的机构将重新进行活动,这将是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顿了的机构。而且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下一次德意志帝国一定撑不住十二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90 年 9 月 12 日和 18 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0 年 9 月 2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9 号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我的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份 9 月 16 日的马格德堡的“人民呼声报”¹²³。这份报纸刊登了一篇署名保尔·恩斯特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既然恩格斯现在把我们反对派叫做‘大学生骚动’,那末我就要请他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坚持过同他自己的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那就请恩格斯只要看一看他本人 1887 年在自己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的序言中写的什么好了。”

我同德国作家们的交往多年来不断使我得到许多极其离奇的经验。但是看来,这种交往注定还要变得更为开心。看,我必须向保尔·恩斯特先生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坚持过不同的观点云云。至于说“我们”,即前不久曾经那样趾高气扬地登场又那样垂头丧气地退场的那个被我叫做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的“反对派”,那末可以简单地回答说:几乎在他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里。

至于说恩斯特先生本人,我认为没有必要还要就这个问题同他谈什么。我在四个月之前就已经对他谈过了,可是现在,不论愿意与否,我都不得不用我的这次《ernst》的通信来打扰议者。

双关语:Ernst[恩斯特]是姓,《ernst》是“郑重的”。——编者注

今年5月31日,恩斯特先生从格尔伯多夫写信给我说,海尔曼·巴尔先生在“自由论坛”上责备他错误地把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运用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¹²⁴,因此问我能否给他

“用三两句话谈一谈,我的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此外,请允许我在同巴尔论战时利用您的信”。

为此我在6月5日回答他说,我不能参与他同巴尔先生的争论,而且我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一无所知。接着我这样写道:

“至于说您试图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处理问题,那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定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到小市民阶层这一个范畴里,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到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仅仅在自己的祖国法兰西才激起了这样大的恐惧,使复辟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却制定了一部比当时欧洲所有的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最近二十年来,挪威出现了在这个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的文学繁荣。不管他们是不是小市民,但是这些人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创作的多得多,而且还给其他国家

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对德国文学也毫不例外。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必须把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点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倒退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发展的洪流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它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烙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全德的典型,直到我们的工人阶级才最终打破了这种狭隘的框框。德国工人是最坏的‘没有祖国’的人,恰好是从他们已经完全抛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这个意义上说的。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夸张到了极点的可笑的模仿,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可笑的模仿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同德国的小资产者绝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相反,在挪威,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纪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这里,谈不上由于巨大运动的失败和某个延续三十年的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绝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总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但是对于资本积聚的最强有

力的杠杆——交易所来说,这里还没有它的地位。而且海上贸易的猛力扩展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当其他各地都是轮船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运,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占世界上第二位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1720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在这种停滞状况下也开始了运动,而且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正像加斯梯里亚的情形一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因而比起蜕化的德国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论有怎样的缺点,它们还是反映出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性格和首创精神,并且是行动独立的,虽然有时在外国人看来相当奇怪。这类东西,在我对它们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先彻底研究一下的。”

可见,我在这里尽管是客气地,但是却足够清楚和明确地向恩斯特先生指出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他自己寄给我的“自由论坛”上的那篇文章里。如果我向他说明,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做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这正是我责备文学家老爷们“显然不懂”这个世界观的一个例子。接着我通过他自己引用的一个例子,即通过挪威的例子向他指出,他按照德国的样子来公式化地理解小市民阶层,并把这种理解搬到这个国家来,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这样我就在事先而且也是针对他本人说明了

我为什么责备这些老爷“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

而现在请看，恩斯特先生是如何假装正经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在柏林大街上被头一个遇上的高等流氓当做“那路货”来对待的纯朴的乡村姑娘。在收到上面那封信以后过了四个月，他带着美德被侮辱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说什么我必须向他指出——“在什么地方？”看来恩斯特先生经历了文学情绪的两个阶段。起初他勇敢而自信地冲过来，似乎在这里除了空洞的喧嚷真的还藏着什么其他的东西；而当人们起来自卫的时候，他就急忙声明说，他什么也没有说，并且抱怨别人轻蔑地和侮辱地对待他的纯洁的感情。被侮辱的美德是在他给我的信中，在那里他抱怨巴尔先生“极端蛮横地对待了他”！被侮辱的纯朴是在他给我的答复中，在那里他最天真地质问：“在什么地方？”然而他在四个月以前就应当知道这一点了。被误解的善良的心灵是在马格德堡的“人民呼声报”上，在那里他也质问曾经理所当然地训斥过他的老布雷梅尔：“在什么地方？”

我叹息着问：在什么地方？

我总是要问：在什么地方？

可能恩斯特先生希望知道还“在什么地方？”——那末，譬如说，还在他发表于“人民论坛”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险”的文章中，¹²⁵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

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这个人竟能把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本身混为一谈,让别人去帮助他吧,我可不干这种事。

但愿我被许可不再回答以后提出的“在什么地方?”这种问题。恩斯特先生是如此多产,文章从他的笔尖下出来得如此迅速,以致他的文章到处都碰得到。当你认为它们终于有了个尽头的时候,他却宣布自己还是这篇或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这时我们这些人就再也忍不住了,禁不住希望恩斯特先生哪怕能有片刻筋疲力竭的时候也好。

其次,恩斯特先生写道:

“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那就请恩格斯”云云。

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在那篇发表于“萨克森工人报”上并迫使我提出反驳的文章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我说,关于这点我一无所知。现在恩斯特先生想只提出这样的论断:党团似乎只有“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又是被误解的善良的心灵,凶恶的人们把各种可耻行为强加在这个善良的心灵上。但是什么时候曾有人不同意不仅在党团的成员中而且在整个党内也有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代表呢?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至于说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按其性质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却是事物的本性。如果全部问题仅在于此,那末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又是为的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注意这个老问题已经许多年了,但是这同小资产阶级在党团里、尤其在

党里占多数还是离得很远。当真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谁也不会去等待这些忠实的埃卡尔特来发出警号。但是到今天为止，无产阶级反对非常法的活泼快乐的斗争¹²⁶以及迅速的经济发展是在愈来愈使这个小资产阶级因素失掉土壤、空气和阳光，而无产阶级因素则在日益强大。

最后，我还可以告诉恩斯特先生一点：对党来说，小资产阶级党团并不危险，因为在下次选举时可以把它当做破烂废物扔掉，而更危险得更多的是傲慢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集团，这特别是因为他们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在观察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况时不能毫无偏见地衡量现实事实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着的力量的实际影响；因此他们想强迫党接受那种极其轻率的策略，就像布鲁诺·维勒先生和太斯特勒尔先生公开表示，而恩斯特先生也以较温和的方式表示的那样。如果这个集团结合成一个互助保险会之类的东西，并且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刊物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十二年前反社会党人法使我们避免了这样一场在当时就已经临近了的危险。现在，当这个法律破产了的时候，这种危险又重新出现了。但愿这一点也能帮助保尔·恩斯特先生了解，为什么我竭力反对把我同属于这类集团的分子混在一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10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10月5日
“柏林人民报”第2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报”

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

当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 ,有这么多真挚的关怀 ,这么多意想不到的荣誉落到我的身上 ,我很遗憾不可能对这些祝贺一一亲自作答。电报、信件、礼物、党的报刊上专门为我写的文章真是如雪片飞来——所有这些祝贺来自各个国家 ,尤其是来自德国各地。为此请允许我在这里对 11 月 28 日如此关怀地想念到我的老朋友们和新朋友们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地知道 ,这些荣誉大部分我不应该归于自己 ,归于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 ,我只有庄严地许约 ,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 ,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荣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 年 12 月 2 日于伦敦

载于 1890 年 12 月 5 日
“柏林人民报”第 28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报”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¹²⁷

公民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在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对我的祝贺。

请你们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将献始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让我在我不能进行斗争的时候再死去吧。

但是，你们，以及我们在德国、英国、奥匈帝国、俄国——总之，在一切地方的弟兄们所打的胜仗，构成一系列如此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足以使比我更老朽衰弱的人也变得年轻起来。而最使我高兴的是法国无产者和德国无产者不顾我们的腐化的资产者的沙文主义嚎叫而建立起来的（我希望是永久地建立起来的）真诚的兄弟般的团结。

你们的伟大的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预见到，三个强大的西方国家——法国、英国、德国——的同盟是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解放的第一个国际条件。¹²⁸我希望还能看到，这一同盟——将永远结束政府之间和王朝之间的战争的未来自欧洲同盟的核心——将为

三个国家的无产者所实现。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12月2日于伦敦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载于1890年12月25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14号

致“工人纪事周报”和
“人民言论”编辑部¹²⁹
(布达佩斯)

1890年12月3日于伦敦

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感谢你们在11月26日的来信里对我七十岁生日的祝贺。

我深知:你们和其他许多人在这一天给予我的荣誉的绝大部分,只是由于我是马克思的代表,比马克思活得更久,才落到我的身上,因此,请允许我把它作为荣誉的花环奉献在马克思的墓前。我为了今后无愧于他而能做的一切,我都将做到——这点你们可以相信。

衷心感谢你们盛情地邀请我参加匈牙利党代表大会¹³⁰。我不可能亲身赴邀,但在12月7日和8日我的心将同你们在一起。

匈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再一次证明,现代大工业要在任何国家确立,都不能不使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革命化,不能不在产生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并且产生它们之间的阶

级斗争和力图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工人政党。在匈牙利,如我从你们盛情寄给我的“工人纪事周报”上看到的,这个工人政党也在日益发展壮大,而且它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从一开始它就是国际主义的政党,在它的队伍里联合着马扎尔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我请你们向这个年轻的党转达我对它的代表大会的最良好的祝愿。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万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 1890 年 12 月 14 日“工人纪事周报”第 50 号,并用匈牙利文载于 1890 年 12 月 14 日“人民言论”第 5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纪事周报”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¹³¹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曾于 1875 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¹³²召开以前不久送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¹³³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上了党的议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政治学原则和策略的态度。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

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道地的拉萨尔主义者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

虽然如此，凡是在对内容没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针对别人的尖锐的句词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作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口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我们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国际海牙代表大会¹³⁴闭幕才两年，——他们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因而我们不得不预料，他们也会诬指我们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创作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因而一些有关的地方也就随之失去必要性了。

由于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话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
杂志第1卷第18期

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

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¹³⁵

写于 1890 年 12 月—1891 年 2 月

载于 1891 年在汉堡出版的小册子：
弗·恩格斯“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
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
经过和文件”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 1891 年版本译的

卡·马克思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¹³⁶里,我曾经认为有必要回溯一场反对马克思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一个匿名作者于1872年在柏林“协和”杂志¹³⁷上首先发动的,后来剑桥的塞德莱·泰勒先生又于1883年在“泰晤士报”上将它重新挑起。这位匿名作者——泰勒先生已经揭露,这位匿名作者就是路约·布伦坦诺先生——当时控告马克思捏造引文。我在这篇序言(已收入本书所附的文件中,编号第12号)里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简短说明,根本不打算取悦布伦坦诺先生,他要答复我是十分自然的。他果然在一本小册子——路约·布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书店,1890年¹³⁸——中这样做了。

这本小册子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既太多,又太少。说它提供得太多,是因为它“兼”而详细地叙述了布伦坦诺先生对“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的看法。这些看法和争论的目标根本没有关系。我只须指出一点:布伦坦诺先生经常反复谈论的所谓工人劳动保护法以及工会组织有助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发明。马克思和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哲

学的贫困”起 ,到“资本论”和我最近的著作止 ,对此曾谈过几百遍 ,不过 ,我们在谈到这一点时作了很多的保留。¹³⁹第一 ,工会的抵抗只有在市场处于中等和繁荣状态时才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停滞和危机时期 ,它们通常就失去作用 ;布伦坦诺先生断言“它们能克服后备军的致命的影响” ,这是使人好笑的夸张。第二 ,——其他次要的限制更不必说了——无论劳动保护法 ,无论工会的抵抗 ,都无法消除应该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 ,即资本主义关系 ,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 ,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 ,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 ,越来越宽。但是 ,由于布伦坦诺先生想把雇佣奴隶变成心满意足的雇佣奴隶 ,他不得不大大地夸大劳动保护、工会的抵抗、舍本逐末的社会立法等等的良好作用 ;而由于我们用简单的事实就能驳斥这些夸大 ,所以他就大发雷霆。

说这本小册子提供的东西太少 ,是因为在这次论战的文件中它只提到了那些直接来源于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的文件 ,而根本没有谈到后来出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为了使读者自己能对这一切作出总的判断 ,我在附录中收入了 : (1)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和“资本论”中被指控的地方 ; (2)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之间的论战 ; (3)塞德莱·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之间的论战 ; (4)我为“资本论”第四版写的序言和布伦坦诺先生对此所作的反驳 ; (5)与格莱斯顿给布伦坦诺先生的信有关材料。自然 ,我同时也从布伦坦诺的议论中删去了那些与捏造引文问题无关 ,而只是“论进步问题”等等的地方。

在 1872 年 3 月 7 日柏林“协和”杂志第 10 期上,出现了一篇匿名文章,对 1864 年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¹⁴⁰的作者马克思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据说,在这篇宣言中马克思伪造了从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的 1863 年 4 月 16 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一句话。

成立宣言中的有关地方载于附录,文件第 1 号。“协和”杂志的文章也载于附录,文件第 3 号。在后面这个文件中,控告是这样提出的: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 150 英镑和 150 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限定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给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匿名作者(现在已经知道这位作者名叫路约·布伦坦诺)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应该说是唯一的控告。

马克思于 1872 年 5 月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协和”杂志第 10 期。在我目前还保存的一份上写有这样几个字:“德国工厂主联盟

见本卷第 155—156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160—161 页。——编者注

的机关刊物”。马克思过去对这个刊物毫无所知,所以把作者当成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工厂主,并对他采取了相应的态度。

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所作的答辩¹⁴¹(文件第4号)中指出,这句话不仅在1870年被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上引用¹⁴²,而且还在成立宣言出现之前就被引用在1864年伦敦出版的“兑换论”¹⁴³一书中,最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也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像他所引用的那样包含着这句话:“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¹⁴⁴如果说“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¹⁴⁵(此话出自英国财政大臣之口无疑会使他声誉扫地),这是因为格莱斯顿非常明智地按照英国议会的传统惯例把它删掉了。

无论如何,这里证明了,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关于格莱斯顿在前一天晚上发表的演说的报道中,一字不差地有这所谓增添的话。而“泰晤士报”当时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机关报。

像紫罗兰那样在背荫处开花的布伦坦诺先生又怎样回答呢?(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文件第5号)

他以用他自己的本名发言时永远不会有的勇气,重复他的控告,说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他补充说,这一控告

“是严重的,而且有无法驳倒的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这个证据……是真正毁灭性的”。

这个确凿的证据无非就是“汉萨德”中那个没有这句话的地

见本卷第162—166页。——编者注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见本卷第166—171页。——编者注

方。因此,它充其量只对这句在“泰晤士报”上有、在“汉萨德”上没有的倒霉的话本身说来可能是“毁灭性的”。

但是这种得胜的公鸡的啼叫,只不过是要掩盖这样一个极不愉快的事实,即“增添”的话,如“泰晤士报”的报道所表明的,是符合真实情况的。而我们的匿名作者(后来发现是一位教授)感觉到,对控告说来,这一确凿的证据已经几乎是“无法驳倒的”,而且日后可能成为“真正毁灭性的”,所以他拚命地向比斯利和“兑换论”所引的引文进攻,千方百计地把问题弄模糊,断言似乎比斯利引用时所根据的是成立宣言,而马克思所根据的是“兑换论”,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即使这些都是真的,它们也丝毫不能说明这句话是格莱斯顿讲的还是马克思臆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它们的性质而论,布伦坦诺先生那时不能下定论,我现在也不能下定论。这些东西不过是要用来转移对主要的东西,即对“泰晤士报”那段倒霉的报道的注意力。

匿名作者在谈论这个报道之前,使用了一些骂人的字眼来支持自己,什么“近乎犯罪的轻率”,“这个假引文”,等等,接着,他声色俱厉、咄咄逼人地说道: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从第 7 版第 5 版 应为栏 第 17 行起,是这样叙述这一演说的。”

接着就是“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说道:

“我所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所以,对于马克思的“无耻地撒谎”真要感到惊奇了,他竟然还

敢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包含有这样一句话：财富等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成立宣言中说：“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泰晤士报”中说：“The augmentation there described〔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关于这一点，甚至布伦坦诺先生到现在也没有匿名地或不匿名地否认：这里所谈的就是上文所说的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 and which is founded, 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

于是，布伦坦诺先生在他指出“泰晤士报”报道中那句所谓马克思增添的话（因为“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从而证明了他自己正是像他给马克思栽诬的那样无耻地撒谎以后，得意地说，

“两个报道“泰晤士报”的和“汉萨德”的 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前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所一字不差地记载的话。但是，虽然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也包含有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的东西，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Si duo faciunt idem, non est idem . 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

就不是同一件事。

马克思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是“增添”，这是“完全是捏造的”“声名狼藉的地方”。而“泰晤士报”的报道引证格莱斯顿的话：我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即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就不过是比没有这句话的“汉萨德”的报道“在形式上比较扼要”，并且“同成立宣言中的这个 也就是同一个 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而当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个地方来作证明时，布伦坦诺先生说：

“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

做这种事确实需要一种特殊的“厚颜无耻”。而马克思的额头无论如何是长在脸上，而不是长在别的地方。

匿名作者，即路约·布伦坦诺，以一种确实与马克思的迥然不同的“厚颜无耻”的态度，硬要格莱斯顿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而事实上，无论根据“泰晤士报”或“汉萨德”，格莱斯顿都说，他会怀着悲痛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这种“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接着他说，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有产阶级”。

最后，高尚的匿名作者愤怒地指出：“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 257 页）：简直‘无耻’。”

谁的行为，路约·布伦坦诺先生？

二

马克思在他的答辨(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文件第6号)中过于忠厚了,他认真地仔细分析了布伦坦诺先生关于比斯利教授、“兑换论”等等的一大堆废话;我们撇开这些次要问题不谈。但是在结尾的地方,马克思还引用了两件对主要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除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外,另外两家伦敦的晨报在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中也有这个“增添”的地方。根据“晨星报”¹⁴⁶,格莱斯顿说:

“这种增长”,——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根据“晨报”¹⁴⁷:

“上面所说的”——刚刚被说成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

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对手说来,这个证据都会是“真正毁灭性的”。但是对于匿名的布伦坦诺说来却不然。表明了同样程度的厚颜无耻的布伦坦诺的答复(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文件第7号),马克思从未见过,因为在7月11日以后他就没有再收到“协和”杂志。我自己只是在布伦坦诺的翻印本(“我和……的论战”1890年版)中才读到这一答复¹⁴⁸,因此在这里不能不谈谈它。

见本卷第172—181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

“他 马克思 坚持……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推翻现存制度计划的人也会吃惊。”

引文仍然是“假的”，“泰晤士报”的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但是布伦坦诺先生下此断语时的武断，较之他突然向我们讲下面一段话时的“厚颜无耻”，还是真正微不足道的小事：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的德译文中干脆删掉了这一附句，从这个附句中得出的结论是，格莱斯顿只是说，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判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因此根据所得税的材料丝毫不能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

所以，纵然“泰晤士报”上说，一再提到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那也和包含同样内容的那句“增添”的话相反。至于“干脆删掉了的附句”，只要布伦坦诺先生肯稍微表现一点耐心，它一定会让他得到报答的。在他顺利地做了第一个勇敢的跳跃之后，他就能够比较容易地颠倒黑白了。既然他已经把“泰晤士报”对付过去，他就不要太担心“晨星报”和“晨报”了。

“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 马克思的 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 众所周知，是布伦坦诺这样断言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意到’一语的意义和运用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是指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说法 原话如此！”

发明 *si duo faciunt idem, non est idem* [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这一规则的耶稣会教徒，与匿名的布伦坦

诺相比不过是小学生。当“泰晤士报”、“晨星报”和“晨报”一致声明,布伦坦诺断言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实际上格莱斯顿说过的话,这三家报纸是一致“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当马克思,一字不差地引用同一句话的时候,它却是“假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捏造的”、“谎言”,等等。而当马克思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位名叫路约·布伦坦诺的匿名作者对此无法理解,认为这“简直无耻”。

但是,只要把 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各晨报关于这个地方的报道都列举出来,就可以彻底驳倒“增添”的说法。

“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我们已经援引过了。

“每日电讯”¹⁴⁹：

“我从自己方面可以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财富问题的这一方面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

“先驱晨报”¹⁵⁰：

“我可以这样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巨大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完全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

“晨邮报”¹⁵¹：

“我可以这样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如果我想,它的益处只及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完全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福利的增进。”

“每日新闻”¹⁵²：

“我可以这样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如果我想，它的益处只及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并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福利的增进。”

“旗帜报”¹⁵³：

“我可以这样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并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

这里列举的八家报纸，就我所知，已经包括了伦敦当时出版的所有晨报。它们的证词是“无法驳倒的”。其中四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转述的这句话和马克思所“增添”的这句话完全相同。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这种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另外四家报纸——“先驱晨报”、“晨邮报”、“每日新闻”、“旗帜报”——“只是在形式上比较扼要”的说法转述了这句话，使得它的语气更强了：这种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

上述八家报纸各自都有自己专门的一批派驻议会的记者。因此，它们是一些彼此完全独立的证人。其次，总起来说，它们是无党派的，因为它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党派。为这句根本无法隐瞒的话的两种说法作保的，既有托利党人，也有辉格党人和激进派。根据四家报纸，格莱斯顿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根据另外四家报纸，他说：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可见，八个难以驳倒的证人都证明，格莱斯顿确实讲过这句话。问题只是，他讲这句话时用的是马克思所援引的较委婉的说法呢，还是四家报纸报道中的加

强语气的说法。

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汉萨德”高傲地同所有这些报纸相对立。但是“汉萨德”是不像这些晨报那样难以驳倒的。“汉萨德”的报道要受检查,受发言人本人的检查。正因为如此,按一般惯例是根据“汉萨德”进行引证。

八个受到信任的证人对一个受到怀疑的证人!但是这和我们这位对胜利抱有信心的匿名作者有什么相干呢?正因为所有八家晨报的报道都把“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强加在格莱斯顿身上,正因为如此,它们是在“为”匿名作者说话,它们恰恰正是以此证明马克思“增添”了这个地方!

的确没有什么能超过匿名的布伦坦诺的“厚颜无耻”了。

三

但是，实际上，布伦坦诺先生那种使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厚颜无耻，不过是一个策略上的手段。他发现，对“增添”的话进行的攻击遭到了失败，因此他不得不为自己寻找防御阵地。他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阵地；现在只是需要向这个新阵地实行退却了。

布伦坦诺先生在他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5号）中，就已经暗示了他的这一意图，虽然还是羞答答的。迫使他这样做的是“泰晤士报”那篇不幸的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包含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增添”的地方，但是这实际上是次要的问题。因为方正好相反”，尽管它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个地方。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声名狼藉的地方”的本文，而是它的意思。现在要做的已经不在于否定这个地方本身，而在于肯定它的意思和它所说的正好相反。

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自己的匿名对手的愉快来往，此后，这位匿名对手就更加武断地在这个不太纯洁的题目上做起文章来。他是在他的第二篇反驳中这样做的，这篇文章作为文件第7号转载在这里。

见本卷第166—171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

他断言，马克思力图用三种办法来模糊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的“泰晤士报”的报道。第一，用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富裕阶级] 一语的不正确的译文。这一点，作为十分次要的东西，我撇开不谈，——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英语的掌握，是和布伦坦诺先生完全不同的。但是格莱斯顿先生当时用这句话时究竟想的是什么，——或者说，他是否真的想到什么，——这一点，在已经过了二十七年之后的今天，大概连他自己也讲不出了。

第二点是，马克思“干脆删掉了”“泰晤士报”报道中的一个“附句”。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援引在前面第2章第7页上。马克思删掉附句，似乎是想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事实：从所得税的材料可以看到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是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从这些材料中丝毫不能看出工人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由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

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翻译的“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句话是：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那些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马克思别有用心地“删掉”的附句，是由以下这些词构成的：“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

马克思两次——因而也就是顽固地——删掉这些非常重要的词，似乎是想向自己的读者隐瞒：这种增长仅仅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的增长，换句话说，就是“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

马克思关于这个译名的意见，见本卷第164页和第176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17页。——编者注

布伦坦诺先生是不是由于胡乱地指责别人“撒谎”而义愤填膺,从而弄得双目失明了?还是他以为,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因为反正马克思不会再作答复了?事实是,这段被指控的引文,无论在成立宣言或“资本论”中,马克思都是以这些话开始的:“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the taxable income)增加了 6%……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内,如……则增加了……”

除了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之外,布伦坦诺先生是否知道在英国还有别的什么“应该课税的收入”?是不是这个极端重要的“附句”给这个清楚的解释,即这里谈的正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增添了什么东西?也许(看来确是这样)布伦坦诺持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引证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人不像布伦坦诺那样大作一通关于英国所得税的讲演,并在所得税方面进行“捏造”,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文件第 6 号),也就像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所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文件第 7 号),那末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就是“被捏造了”,就是给它“增添”了某种东西,或者从它里面“删掉”了某种东西。如果在“增添”的话中只是说,格莱斯顿刚刚讲的这种增长限于有产阶级,那末,难道那里在实质上不是谈的同样的东西?——要知道只有有产阶级才缴所得税。可是,布伦坦诺先生当然是一面在前面,在正面为这句话大吵大闹,说什么这是马克思的捏造,是无耻地撒谎,而同时他自己却从后门悄悄地把这句话放进来。

布伦坦诺十分清楚,马克思援引的格莱斯顿的话,所谈的是

见本卷第 156 页和第 157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175—176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185 页。——编者注

“应该课税的收入”，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他在他的第一篇控告(文件第3号)中就引了成立宣言中的这个地方，甚至还将 taxable 一词译为“应该课税的”。如果布伦坦诺现在在自己的第二篇反驳中“删掉”这个地方，如果他从这一天起直到他1890年出版小册子，一直反复地断言，马克思故意地别有用心地掩盖这一事实，即格莱斯顿在这里谈的只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那末，我们岂不是应该把“撒谎”、“捏造”、“无耻地撒谎”、“简直无耻”等等这些他自己的用语奉还给他吗？

我们还是回到本文上来。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这一点，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

马克思在他给匿名的布伦坦诺的第二篇答辩中证明，他没有“增添”“声名狼藉的”话，接着他驳斥了匿名者的这样一个蛮横的论断，即在作为唯一的争论目标的这一点上，“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虽然前者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一有争论的句子，而后者则将它完全删掉了。格莱斯顿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还讲了些什么，这和这个唯一的争论点是毫不相干的。

相反，在成立宣言中，——要知道这正是布伦坦诺据以提出捏造引文的控告的那个文件，——在第4页上，就在“声名狼藉的”话上面几行，直接谈到，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

见本卷第160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62—166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¹⁵⁶页。——编者注

国时期在下院宣称：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这就是据布伦坦诺说马克思别有用心地掩盖起来的话。

在整个论战中，从 1872 年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 5 号）起，至 1890 年“我和……的论战”这本小册子的序言和附录止，布伦坦诺先生——以一种我们当然绝对不敢称之为“无耻地撒谎”的巧妙手法——闭口不谈这一事实，即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确切地引用了格莱斯顿关于工人状况的这种没有先例的改善的郑重声明。而在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反驳中，——如上所述，这篇反驳，马克思直到去世时还不知道，而我也直到 1890 年“我和……的论战”小册子出版之后才知道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只是作为一种幌子被保留着，而实际上已被搥掉了；其中不仅羞羞答答地承认，增添的句子确实属于格莱斯顿，而且断言，它是“为我们说话的”，即为布伦坦诺说话的，——就在这第二篇反驳中，布伦坦诺向新的防线退却了，说什么马克思阉割了和歪曲了格莱斯顿的演说；说什么马克思强迫格莱斯顿说，富人的财富大大地增长了，而穷人，工人居民，至多不过是变得不那么穷了，而格莱斯顿却明确地说道，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

由于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即在被指控的文件——成立宣言中，恰恰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格莱斯顿的这些话，这第二道防线又被突破了。而布伦坦诺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读者“协和”杂志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至于格莱斯顿实际上说的究竟是什么,后面我们还要多少谈一谈。

最后,觉得自己很安全的布伦坦诺——第一,因为他是匿名的,第二,因为马克思声明不想再和他周旋——使自己得到了小小的愉快:

“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末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种包含着承认自己软弱无能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究竟怎样“破口大骂”吧。至于布伦坦诺先生,那末我们已经展览过他那文雅之词的花束了。慷慨地加在马克思头上的诸如“谎言”、“无耻地撒谎”、“假引文”、“简直无耻”等等,无论如何是一种有教益的“承认软弱无能”,是布伦坦诺先生已经“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正确无误的标志。

四

我们的堂皇演出的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神秘的(如果说还不是枢密官的)布伦坦诺,做到了他几乎不敢希望做到的事。诚然,他在所谓“增添”的话上面没有得手;这个最初的控告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但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防御阵地,并且在这个阵地上保有最后一言,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教授们总是爱说,阵地还在他手里。于是,他就可以吹嘘,——至少在同他一类的人的面前,——他胜利地打退了马克思的进攻,并且已经在文字方面将马克思本人置于死地。但是不幸的马克思对于他已在“协和”杂志上被打死的事,却一个字也不知道;相反,他还“厚颜无耻地”继续活了十一年,而且这十一年是他的成就愈来愈大的十一年,他在各国的追随者的数目不断增长的十一年,他的功绩愈来愈得到普遍承认的十一年。

布伦坦诺及其同伙,聪明地不让被蒙蔽的马克思看到这一自欺欺人的行为,或者向他说明他早已死去。但是当1883年他真的去世时,他们就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手已经痒得不耐烦了。于是,塞德莱·泰勒带着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文件第8号)登场了。

如果说泰勒或者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事先并没有和艾米尔·德

·拉弗勒商量好(看来的确如此),那末泰勒的登场实在太冒失了。他用一种说明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的事情毫无希望的装腔作势的语调说,使他“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终于在八年之后揭露了马克思的这种 mala fides [恶意]”。接着,他就开始吹嘘神一般的布伦坦诺的巧妙攻击,吹嘘有渎神之罪的马克思接着所作的垂死挣扎等等。实际上情况如何,我们的读者已经看到了。处于垂死挣扎中的只是布伦坦诺关于增添句子的断语。

最后,我们再引用下面一段话:

“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拉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所谓“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云云,实在是令人好笑。匿名的布伦坦诺引证的只是“汉萨德”。马克思向他提供了“泰晤士报”的报道,这个报道一字不差地包含着“汉萨德”中所没有的那个争论的句子。在这以后,布伦坦诺先生才也引证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并且比马克思多引证了三行。这三行是要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证明似乎马克思所“增添”的话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没有登载,虽然在那里一字不差地登载着这句话;或者,至少也要证明,即使那里登载着这句话,它的意思也和它直接说的相反。泰勒先生就把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叫做“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

其次,说什么在这之后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避免继续进行争论,这完全不是事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知道这一点,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我们看到,马克思还向匿名的、神一般的布伦坦诺提出了证据,证明“晨星报”和“晨报”也确实实同样地载有那

句“增添”的话。只是在这之后他才声明,他不能再把时间花费在匿名作者的身上了。

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后来的论战(文件第 9、10 和 11 号)首先证明,塞德莱·泰勒先生片刻也没有坚持过原来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他竟说,这“起着完全次要的作用”。这又是对他所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事实的直接否认。

不管怎样,我们得悉他已经承认这一控告无法再坚持下去,为此我们对他的朋友布伦坦诺表示祝贺。

现在还控告什么呢?现在是布伦坦诺先生在第二道防线上提出的控告,说什么马克思企图歪曲格莱斯顿演说的意思,——这是一个新的控告,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从来不知道这一控告。无论如何,这一控告把我们引入完全不同的领域。起初问题是关于一个事实:马克思是否增添了这句话?现在谁都不否认,这一控告已为马克思胜利地驳倒。但是关于歪曲地进行引证这一新的控告,却把我们引入主观意见的领域,而主观意见必然是各不相同的。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好尚各异]。某人认为不重要的,——就其本身说来或者就摘录引文的目的说来,——别人可能认为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保守党人永远不会使自由党人满意自己的引证,自由党人也不会使保守党人满意,社会党人则永远既不会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满意,也不会使两个全都满意。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当他自己同党的话被反对者援引来反对他的时候,他照例会觉得,在引文中删去了决定讲话的真正意思的最重要的地方。这是很常见的,它带有过多的个人的观点,以致谁也不会认为

这类控告具有任何意义。如果布伦坦诺先生利用匿名的办法仅仅是为了对马克思提出这一控告,那末马克思也许会认为连一个字也不需要回答他。

塞德莱·泰勒先生为了用他特有的精致手法完成这样一个新的转折,他不得不三次背弃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布伦坦诺。他背弃布伦坦诺的第一点是,他抛弃了他的原来的唯一的关于“增添”的控告,甚至否认这一原来的和唯一的控告的存在。他背弃布伦坦诺的其次一点是,他毫不客气地把永无谬误的“汉萨德”弃置一旁,——引证时以“汉萨德”作为唯一的根据,乃是高尚的布伦坦诺的“惯例”,——而利用了“泰晤士报”的那种用同一位布伦坦诺的话来说是“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他第三次背弃布伦坦诺,同时也背弃他本人写给“泰晤士报”的信的是,他不是到成立宣言中,而是到“资本论”中去寻找“所提到的引文”。而这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他竟有“勇气”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加以引证的成立宣言!他和爱琳娜·马克思争论之后,立即到英国博物馆去寻找这篇宣言,但是没有找到,他在那里被介绍给自己的对手,他问她能否给他一本?当时我从自己的文件中找出了一本,爱琳娜将它寄给了他。这样一来他就能“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而看来这种对比已经使他相信:沉默是最好的答复。

所以,实在说,对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11号)哪怕添一个字,都是完全多余的。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见本卷第192—196页。——编者注

五

第三幕。文件第 12 号 ,即从我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所作的一段必要的摘录 ,说明为什么我在那里必须回溯同布伦坦诺先生和塞德莱·泰勒很久以前进行的论战。这篇序言迫使布伦坦诺作了答复。答复载于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 ,路约·布伦坦诺著 ,柏林 ,1890 年。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转载了“协和”杂志上匿名发表的文章 ,他终于公开宣布这些文章就是他写的) ,也转载了“人民国家报”上的马克思的答辩 ,同时还加了一篇序言和两个附录 ,对这些我们不能不谈谈。

首先我们查明 ,这里也不再谈“增添”句子的问题了。在第一页上援引了成立宣言上的句子 ,接着声明 ,格莱斯顿“和卡尔·马克思的断言正好相反 ,他说” ,这些数字只和缴纳所得税的人有关(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提到了 ,因为他明确地把这些数字限制为应该课税的收入) ,但是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引用了 ,就在所争论的引文上面九行) 。我建议读者自己将成立宣言(文件第 1 号)和布伦坦诺先生的论断(文件第 13 号) 做一比较 ,看看布伦坦诺先生怎样在根本没有矛盾的地方或者“增添”矛盾 ,或者用其他方法制造矛盾。但是 ,因为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可耻地失败了 ,布伦坦诺先生不得不

见本卷第 197—203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155—156 页和第 203—206 页。——编者注

违背事实,力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马克思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格莱斯顿在这里只是谈的“应该课税的收入”,亦即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在这样做时,布伦坦诺先生甚至没有发觉,这样一来,他的第一个控告就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这第二个控告与第一个控告直接相反。

在他顺利地安排好这一“捏造”之后,他认为必须请“协和”杂志注意所谓马克思所作的“捏造”;当时,“协和”杂志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来反驳马克思。接下去的话非常精彩,必须逐字逐句地转抄如下:

“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根据编辑部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在马克思先前挑起的论战之后,他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原来,是“协和”编辑部希望布伦坦诺先生“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隐瞒自己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在自己的同党中享有怎样的声望啊!我们愿意相信,他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拿这件事到处宣扬,这倒是这位先生真正伟大的地方。不过,这是他的事情和“协和”编辑部的事情。

因为“马克思很可能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所以当然“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不知道一个人是谁,如何能对他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这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秘密。人身攻击只有在知道这个人的某些情况时才有可能。但是为了报纸的声誉而匿名的布伦坦诺先生给他的对手免除了这个麻烦。他自己动手放肆地“攻击”起来,开始是用黑体字刊登关于“增添”的控告,后来是控告“无耻地撒谎”,“简直无耻”,等等。布伦

坦诺先生——没有匿名的——看来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笔误。不是要让众所周知的马克思能够对不知其名的布伦坦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而是要让隐藏起来的布伦坦诺能够对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正是为了这个，布伦坦诺先生“另一方面……尤其不能反对”要他匿名的指示。

而这应该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实也的确是，不过并不是按照布伦坦诺先生的愿望。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他的女儿和现在的我，我们大家都竭力使这一论战具有使人感到愉快的一面。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无论这些成就是大是小——是靠牺牲布伦坦诺先生才取得的。他的文章无论说是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算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文章中也还有点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只是由于马克思对当时“不知为何许人”的布伦坦诺的阴暗面进行了打击，而被打击者现在事后想回避这些打击，把这些打击说成是“他那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伏尔泰、博马舍、保尔·路易·古利耶的辛辣的论战著作，都曾被他们的对手——容克地主、神甫、法官以及其他等级集团的代表叫做“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这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粗鲁话”成为现在公认的卓越的典范著作。而我们从“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的这些样品和其他样品中得到了这样多的享受，以致整整一百个布伦坦诺也不能把我们吸引到那种充满由虚弱的嫉妒心所产生的无力的怨恨和极端绝望的苦闷的德国大学式的论战中去。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以为，他已经重新说服了自己的读者，以致现在可以放肆地请他们大吸鼻烟了：

“当证明了……‘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

格莱斯顿的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 马克思 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向水中放出黑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吹毛求疵,竭力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

如果说一字不差地包含着“增添”的句子的“泰晤士报”的报道和“速记”记录,即完全删掉这句话的“汉萨德”,意思彼此一致,如果说布伦坦诺先生又吹嘘他证明了这一点,那末这除了说明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被完全——虽然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声不响地——抛弃,说明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守的布伦坦诺先生向自己的第二道防线退却,还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只肯定一点:我们认为,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连这第二道防线,我们也已经从中央把它突破,并从两翼对它进行了打击。

但是,在这里,真正的大学的论战家出场了。既然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的布伦坦诺把自己的对手追得这样走投无路,所以对手就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把水弄浑,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大做文章,从而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

耶稣会教徒常说:Si fecisti,nega 如果你做了某件事,你就否认。德国大学的论战家走得更远,他说:如果你像恶讼师那样做了一件坏事,你就把它推到你的对手身上。马克思刚一引证“兑换论”和比斯利教授的话,——只因为其中也像他一样地引证了这个争论的地方,——墨鱼布伦坦诺就以它十只脚上的全部吸盘把它们“吸住”,在自己周围放出大量的“黑色液体”,以致必须聚精会神地细看和采取有力的措施,才能使真正的“争论的目标”,即所谓的增添的句子,不致消失。他在自己的第二篇答复中仍旧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就《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富裕阶级”]一语的意义和马克思展开新的争论,这一争论最多只能以布伦坦诺

先生迫切希望的“模糊起来”告终,而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结果。随后他又就出名的附句放出了黑色液体,这个附句据说是马克思有意地删掉的,而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它是完全可以删去的,因为它间接指出的事实,已经在马克思前面引证的格莱斯顿演说的话中直接而明确地谈过了。第三,我们的墨鱼还备有足够的黑色液体,以使用下面这样的论断再次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说什么马克思又在引自“泰晤士报”的引文中删掉了一些句子,——一些和那时的唯一的争论点,和所谓的增添的句子,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句子。

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自我辩护中,我们看见同样地喷射出一股墨水。自然,首先出现的又是“兑换论”。接着,又突然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喷射出来,虽然谁都知道,马克思和它的关系就像布伦坦诺先生和发明火药的关系一样,虽然布伦坦诺先生应当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坚决地拒绝了对拉萨尔的任何推论担负任何责任¹⁵⁴,而且,马克思就在这卷书中把工资规律描写为各种可变量的函数,描写为具有极大弹性的规律,因而远不是铁的。既然放出了这样的墨水,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什么全都抓来了:哈雷代表大会¹⁵⁵,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格莱斯顿 1843 年的预算演说,英国工会,——把这一切都抓来,为的是依靠布伦坦诺先生的自我辩护和他的那些受到凶恶的社会党人嘲弄的高尚的人道原则来抵抗转入进攻的敌人。可以认为,有整整一大批墨鱼在帮助把问题“模糊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知道,他关于“增添”句子的论断是一种绝望的胡言乱语,而他又没有勇气诚实地公开地放弃这一论断。布伦坦诺“如果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即“汉萨德”引入了歧途……那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把它们当做了绝对可信的东西,“不过错误至少会纠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声不响”。相反,为了把问题模糊起来,他放出大量的墨水,而如果说在这里我不得不这样多费唇舌,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先除去所有这些牵强附会的胡扯,清除所有使事情模糊起来的墨水,好让真正的争论目标显露出来。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还为我们备有一个真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的通知。事实上,人们和他开了这样一个令人伤心的玩笑,以致他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还没有使他的心灵从各种悲伤中得到解脱。起初“协和”杂志为了自己报纸的声誉隐瞒了他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品德十分高尚,甘愿为了事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接着马克思以自己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对他进行了猛攻。这他也忍受了。对所有这些,他只想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但是,唉!

“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专门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这种争论没有普遍意义。”

这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们在这个罪恶世界里的命运:他们的善良愿望常常由于人们的堕落和冷淡而遭到挫折。为了补偿这位未获公认的正人君子的不应遭到的挫折,我们在这里为他“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因为他要找到一个不是“经常有自己的看法”的编辑部,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六

布伦坦诺先生的小册子,除了自我辩护的序言之外,还包含有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中有“兑换论”的摘录,这些摘录是要证明,这本书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我不准备谈论这一新的喷射墨水的行为。我要谈的只是刊登在“协和”杂志上的旧的控告。马克思在自己整个一生中并没有能够迎合布伦坦诺先生,而且也没有想要迎合他。所以布伦坦诺先生自然对马克思怀有无穷无尽的怨恨,如果我来一一议论它们,我就成了傻瓜。这就等于是为了满足布伦坦诺先生的要求而做无聊的事。

在那里,在引文的末尾,要求马克思“复述预算演说的原文”,那只能说是太天真了。而布伦坦诺先生正是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引证。自然,如果任何时候都必须复述演说的全部原文,那末引证任何一篇演说都永远只能是“捏造”了。

在第二个附录中布伦坦诺先生向我进攻。据说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中给所谓不正确的引文又增添了“晨星报”这样一个引文出处。这一点也被布伦坦诺先生利用上了,他又用喷射墨水的办法把原来的争论目标,即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完全模糊起来;他改用了塞·泰勒先生所援引的“资本论”的一个地方作为目标以代替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为了证明我指出的出处不正确和马克思只可能从“兑换论”中借用“假引文”,布伦坦诺先生以几栏并列的形式刊载了“泰晤士报”、“晨星报”的报道和“资本论”中的引文。

这第二个附录也转载在本书中，——文件第 14 号^b。

布伦坦诺先生用“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I must say for one etc.)这句话来开始“晨星报”的报道。这就是说，他是以此断言，前面关于 1842 年到 1852 年和 1853 年到 1861 年应该课税的收入的增长的那几句话，在“晨星报”上没有，由此自然应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引用的不是“晨星报”，而是“兑换论”。

“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他的小册子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但别人是有办法监督他的，这样，他们会看到，在“晨星报”上还是有这个地方的。我们把它转载在这里，而把“资本论”中的那个地方也并列在旁边，并且把英文和译文都写出来，以便对布伦坦诺和他的读者有所教益：

1863 年 4 月 17 日“晨星报”

In ten years,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as nearly as I can make out—a very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en years. But in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by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第 639 页；第 2 版第 678 页；第 3 版第 671 页；第 4 版第 617 页
注 103¹⁵⁶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8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翻译出来就是：

在从 1842 年到 1852 年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就我所能查明的,增加了 6%,——这在十年内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但是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自“晨星报”的引文中没有这句话,这是他用以证明他下面这样一个论断的主要王牌:马克思引证的是“兑换论”,而不是“晨星报”。他以并列的各栏中这一揭露性的空白来反驳引文是引自“晨星报”的说法。可是“晨星报”上有这句话,并且正和马克思引的词句完全一样,而那个揭露性的空白原来是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捏造的。如果说这不是“删掉”,不是“歪曲”,那末这些词就毫无意义了。

但是,如果说在引文的开头布伦坦诺先生作了“歪曲”,如果说现在他已经避免断言在这同一引文的中间马克思“增添”了一句话,那末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依旧断言马克思在引文的末尾隐藏了它的一部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引文是到下面这个地方为止:

“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但是在“泰晤士报”和“晨星报”的报道中,句子到此还没有结束。在点了一个逗点之后,接着还有一句话:

“可是我们幸运地获悉,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是异乎寻常的“泰晤士报”登载的是:“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

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 ,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 ,它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由此可见 ,马克思在这里从中间截断了这句话 ,“迫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 ,“因此这句话失去了任何意义” 。布伦坦诺先生在第二篇答复(文件第 7 号)中已经把它称为“毫无意义的话”。

格莱斯顿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话 ,是一句完全明确的完整的话。如果说它有意义 ,那是它自己单独地有意义。而如果说它没有意义 ,那末不管用什么样的“可是”给它添上无论多么长的结尾 ,这一结尾也不会赋予它意义。如果说这句话在马克思的引文中没有“任何意义” ,那末这不应该怪引用这句话的马克思 ,而应该怪说这句话的格莱斯顿。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重要的情况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根据布伦坦诺先生的“惯例”一般唯一应当加以引证的材料来源 ,即永无谬误的“汉萨德” 。按照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 ,那里说 :

“我不敢断定 ,划分富极和贫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

句点。而正是在这个句点之后才开始一个新的句子 :“可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 所以 ,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也点了一个句点 ,那末他正和毫无瑕疵的“汉萨德”做的一样 ,而如果布伦坦诺先生根据这个句点给马克思造出一个新的罪名 ,硬说什么马克思是从句子中间截断了格莱斯顿的话 ,那末他正好是相信了“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 ,因而他自己应该对后果

负责。这也推翻了所谓马克思用这个句点把句子弄得毫无意义的论断；句点不是他的，而是格莱斯顿的，让布伦坦诺去和格莱斯顿讨论这句话有无意义吧，这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布伦坦诺先生本来就在和格莱斯顿先生通信。诚然，我们不知道他向格莱斯顿先生写了些什么，也很少知道格莱斯顿先生向他写了些什么。归根到底，布伦坦诺先生只公布了格莱斯顿信中的两句空空洞洞、语焉不详的话（文件第 16 号），关于这两句话我在自己的答复（文件第 17 号）中指出，“这种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他采取不公布整个通信而发表片断句子的手法，这一事实正好作了完全不利于他的说明。

但是我们暂且假定，对这两句空空洞洞、语焉不详的话只能作最有利于布伦坦诺先生的解释。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前大臣的话，据说——因为，就我所知，格莱斯顿先生没有用德文写信的习惯——是这样讲的。

这是否等于说：我没有讲过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和马克思“增添”了那句话呢？当然不等于。1863 年 4 月 17 日伦敦的八家晨报会一致揭发这种论断是撒谎。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这句话曾经讲过。可见，即使格莱斯顿先生未曾在“汉萨德”的报道中作过任何修改，——我虽然比他年轻十二岁，对于二十七年前发生的这种小事情，我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相信自己的记忆，——那末，“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这也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反而作了很不

见本卷第 211—212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212—213 页。——编者注

利于“汉萨德”的说明。

如果把“增添”句子这唯一的一点放在一边,那末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在这里就根本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一点放在一边,我们就将陷入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的意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十分清楚,当自己的话被人们引证时,格莱斯顿先生宁愿赞同自己的热烈支持者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证方法,而不赞同对他进行尖锐批评的敌人马克思的引证方法,而这的确是他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至于对我们说来,以及对解决马克思是恶意地还是非恶意地进行引证这个问题说来,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甚至还没有随便碰到的任何一个与事无关的第三者的意见重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已经不是证人,而是当事的一方。

七

最后,我们还要简单地谈一谈,格莱斯顿先生在他 1863 年预算演说中的那个由于布伦坦诺先生而真正变得“声名狼藉的”地方说了些什么,从他所说的话中马克思究竟引用了什么,以及“增添”或“删掉”了什么。为了尽可能地迁就布伦坦诺先生,我们将以毫无瑕疵的“汉萨德”为根据,并且用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1852 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 6%;但是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内,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 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致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对马克思引证的这一句话,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提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对,而只是说什么引文是从“兑换论”来的。但是关于布伦坦诺先生的引文,在这里应该指出,他也根本没有引证“预算演说的原文”。他删掉了格莱斯顿先生接下去讲的一段关于这种惊人增长的原因的题外话,甚至没有用删节号来表明被删去的地方。接下去的引文是: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说,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

下面接着就是据布伦坦诺先生说是被马克思“增添”的、但 4 月 17 日所有八家晨报都证明是格莱斯顿先生确实讲过的那句话：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它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先驱晨报”、“旗帜报”、“每日新闻”、“晨邮报”）。

“汉萨德”则在“收入的增长”之后紧接着写道：

“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

尽管“汉萨德”删去了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它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还是和其他报纸说的完全一样：如果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仅限于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富裕阶级]，这对演讲人说来是很不愉快的。但是，虽然他对此很感遗憾，他所描述的增长还是仅限于不属于工人阶级的、有钱纳所得税的人，是啊，这的确是“资本的简单增长”！

在这里，终于泄露了布伦坦诺先生发怒的秘密。他在成立宣言中读到了一句话，在那里发现了不幸的自白，他拿来“汉萨德”的文本，在那里没有发现那句倒霉的话，于是就赶忙向全世界宣布：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拿出“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上的这句话给他看。这时，布伦坦诺先生终于不得不——哪怕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结果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遗憾的是，他忽略了：这样一来，“增添”的句子也应该在实质上和“汉萨德”完全一致，而最后还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汉萨德”在实质上和成立宣言一致。

而整个这场争论，正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忽视了仔细地对比

不同的文本(虽然塞德莱·泰勒先生硬说他这样做了)引起的,而且他实质上甚至不了解根据“汉萨德”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究竟讲的是什么。的确,要了解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尽管布伦坦诺先生断言,这篇演说“特别是由于……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扬”,读者可以看到,根据“汉萨德”,这篇演说用的是极其夸张和混乱的语言,附带许多保留条件,演讲人自己也被自己那些重复的词句弄得糊里糊涂。尤其是下面这句话是纯粹的胡说: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如果说某种商品和劳动竞争而这种商品(例如,机器)变得便宜的话,那末由此产生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资降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说法,这也会“对工人阶级有极大的好处”!有几家伦敦的报纸,例如“晨星报”,在自己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中,用格莱斯顿先生大概想讲的东西暗中代替了上面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认为他想讲的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利,因为主要消费品会减价,这些报纸这样做实在是太讲仁爱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确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不是指除了他刚刚谈到的增长之外的另一种增长,即他所谓的全国状况的大大改善;他是不是立刻忘记了,他所谈的是缴纳所得税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而不是任何别的增长,——这我们不得而知。马克思被控告进行捏造,因而问题在于本文和它的语法含义,在于格莱斯顿先生讲过什么,而不在于他可能想讲什么。他想讲什么,布伦坦诺先生也不知道,就连格莱斯顿先生本人,过了二十七年之后在这方面也已经不是什么权

威。不管怎样,这丝毫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所以,这些话的十分清楚的意思是:应该课税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如果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我将感到非常遗憾,但是这种增长的确限于他们,因为工人们没有应该课税的收入;所以,这是资本的简单增长,但是它对工人也有好处,因为它……

现在我们引证马克思的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引起整个这场激烈争论的话,在成立宣言中就是这样转述的。但是自从布伦坦诺先生不敢再断言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以来,已经不再提成立宣言,而把全部攻击指向“资本论”中对这个地方的引证了。在那里,马克思还加引了下面一句话:

“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可见,马克思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实质上”“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正好转述了毫无瑕疵的“汉萨德”所刊载的、格莱斯顿先生讲过的话。唯一可以指责马克思的地方是,他利用了“晨星报”,而没有用“汉萨德”,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末尾一句话有了意义,而格莱斯顿先生原来讲的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汉萨德”,往下是:

“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获得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这样一种意识给人难以估价的极大的安慰: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划分富极和贫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

马克思的引文是：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马克思只是扼要地转述了两句干瘪的正面的论断，这两句话在“汉萨德”中是浸泡在一长串毫无内容的、令人肉麻的辞藻中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两句话没有因马克思的转述而失去任何东西，相反，它们显得更好了。

最后，“汉萨德”在结束的时候说：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最近二十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这句话在成立宣言中被引用在上面引述的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前面几行。那里说：“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 1864 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可见，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引证了。可是布伦坦诺先生顽固地不让自己的读者（当然，他们是无法监督他的）知道：成立宣言上有这个地方，就在第一版第四页上。我们也不可能向他的读者每人赠送一册，就像赠送给塞德莱·泰勒先生那样。

Nota bene（注意二：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 6 号）中只是为成立宣言辩护，因为到那时为止，布伦坦诺先生还没有把

“资本论”中的这个地方列入他的挑剔的范围。而在布伦坦诺先生此后的第二篇反驳(文件第7号)中,攻击也还是针对成立宣言和马克思为它做的辩护。

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事情才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同时,这个转折不是布伦坦诺先生,而是他的一位剑桥的卫士完成的。直到这时才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掩盖了格莱斯顿先生关于英国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的响亮论断,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话具有了相反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放过了一个运用出色的修辞手段的机会。在引言中引用了格莱斯顿的演说的那整个一节,目的是要证明,正是在财富获得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处于困苦和被凌辱的状况。如果把格莱斯顿先生所谓英国工人阶级处于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时代没有先例的幸福状况的那些夸张之词,和从议会自己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摘引下来的这些关于群众的贫困状况的材料放在一起,会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但是,既然马克思并不想利用这种修辞效果,他当时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引用格莱斯顿的这些话。第一,这些话不过是英国的每一个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有义务在良好的、甚至中常的时期加以重复的礼仪性的惯用语,因此它们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格莱斯顿一年之后就否定了这些话,当时,他在工业更加繁荣的时期,在1864年4月7日发表的下一篇演说中,谈到了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和“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根据“汉萨德”,他还说:

“而且,人的生活在大多数场合,不是为生存而挣扎又是什么呢?”(1)

但是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篇预算演说,马克思紧接在 1863 年演说之后就引证了它,而如果格莱斯顿先生自己已经在 1864 年 4 月 7 日宣布,他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有“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存在的那种没有先例的幸福状况已经不存在了,那末马克思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引证这些兴高采烈的、但可惜对格莱斯顿先生说来也是过于短暂的论断。马克思可以以演讲人下面这样的自白为满足:虽然 150 英镑和 150 英镑以上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可是极贫和极富之间的鸿沟未必缩小。

我们不打算谈论德国官方经济学家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的话的手法。如果他每次看到这样的引文都要像布伦坦诺先生那样大喊大嚷,那末他的反驳就会永远不能完结了。

可是,让我们来稍微仔细地看一看英国工人——农民或矿工,有技术的工人或没有技术的工人——当时所享有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增长吧。

在英格兰以及在苏格兰的大部地区,“农民”只是指农业短工。在 1861 年共有农民 1 098 261 人,其中作为奴仆生活在农场的有

(1) 在这里,让我们根据“汉萨德”再从这篇演说中引证一些话。——赤贫者的人数下降到了 84 万人。“其中不包括获得慈善机关救济和私人慈善事业帮助的人……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该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以及有许许多多工人在勇敢地但是十分艰难地为维持高于赤贫状况的水平而挣扎。”在伦敦东部的一个教区里,在 13000 人中有 12000 人经常处于赤贫的边缘;一位十分著名的慈善家说,在伦敦东部有整个整个的街区,从来看不到公共马车和单马车,从来听不到街头音乐,甚至遇不到乞丐……自然,为生存而挣扎的手段较前略有改善(!)……在许多地方工资提高了,但是在别的许多地方工资没有提高……——而这首哀歌是出现在夸张地宣称状况获得“没有先例的”改善之后只过了一年的时候!

204 962 人(2)。从 1849 年到 1859 年,他们的货币工资一周增加了一先令,在有的情况下是两先令,但是归根到底这种增加大部分只是名义上的。1863 年他们的状况怎样,他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名副其实的狗窝里,汉特医生曾经做过描述(1864 年度“第七号公共卫生报告书”¹⁵⁸):

“农业工人的生活费用被固定在他仅能活命的最低水平上。”

根据同一个报告,供给一部分短工家庭的食物(尤其是在八个列举出郡名的郡里),少于为避免因饥饿而致病所绝对必需的最低数额。而格莱斯顿先生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撒罗耳德·罗杰斯教授,在 1866 年曾说(“农业史和价格史”¹⁵⁹),农业短工又变成了农奴,而且,如他详尽地证明的,他们吃得和住得都很差,生活得比他们在阿瑟·杨格时代(1770—1780 年)的先辈差得多,比十四至十五世纪的短工也差很多。——因此,在“农民”方面格莱斯顿是一点也不走运的。

“矿工”的情况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 1866 年的议会报告¹⁶⁰。1861 年联合王国有 565 875 名矿工,其中在煤矿中的有 246613 人。在后面这一部分人中,男工的工资略有提高,而且大多是八小时一班,未成年工则必须做工十四至十五小时。矿山视察制度纯粹是开玩笑:3217 个矿井共有十二名视察员。因此大批矿工死于本来大都可以避免的爆炸事件。矿主经常是先稍许提高工资,然后通过少给尺寸和少给分量的办法克扣工资,使自己得到补偿。根据 1864 年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金属矿的情况更糟。

而“有技术的”工人的情况又怎样呢?拿五金工人来说,他们

(2) 这里的数字部分根据 1861 年的调查统计,部分根据 1863—1867 年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¹⁵⁷。

共有 396 998 人。其中机械钳工有 7 万到 8 万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老的强大而富裕的工会具有抵抗力,处境确实很好。其他的五金工人,由于他们必须有体力和技能,其状况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在从 1859 年和 1860 年重新开始的工业复苏时期,这是很自然的。相反,从事这同一种生产的女工和童工(仅仅在北明翰及其郊区就有 1 万名女工和 3 万名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工)的状况却相当困苦,而制造钉子的铁匠(26130)和制造链条的铁匠的状况则极端困苦。

在纺织业中,456 646 名棉纺工和织工(另奇缺、美国内战正酣的时候,在(1862 年 10 月)百分之六十的纱锭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织机停工,其余的每周只开工 2—3 天,5 万多棉纺织业工人(单身的和有家眷的)向社会慈善机关或救济委员会领取补助,而(1863 年 3 月)136 625 人为不足糊口的一点钱从救济委员会那里获得公共工程或缝纫学校的工作的时候(瓦茨“棉荒实况”1866 年版第 211 页¹⁶¹),如果他们竟听说自己是无比地幸福,大概会大吃一惊!其余的纺织工人,尤其是毛纺和麻纺部门的工人,生活比较不错,——由于棉花缺乏,他们的活增多了。

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就一系列较小的行业的情况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说明。织袜业有 12 万工人,其中只有 4 000 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其余的(内中有很多年纪很小的儿童)则无限度地工作;在大部是家庭手工生产的编织花边和上浆的行业里,在 15 万工人中只有 1 万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有大量的童工和青年女工从事过重的劳动;编草帽辫和做草帽的有 4 万人,几乎全是被工厂主们无耻地用过重的劳动折磨得虚弱不堪的儿童;最后是成衣和制鞋业,在这个行业里有 370 218 个缝外衣的女技师和女时装工,380 716 个缝内衣的女裁缝——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73

380 个男工,其中有 273 223 个鞋匠和 146 042 个裁缝,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在这 125 万人中充其量有百分之三十为私人订货者干活的男工生活还多少可以过得去。其余的人,——和这里提到的所有行业中的人一样,——都遭到中间人、代理人、小业主这些在英国叫做 sweaters(吸血鬼)的人的剥削,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他们的状况: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至于谈到造纸业(10 万工人,其中一半是女工)、陶器制造业(290 00 工人)、制帽业(仅英格兰一地就有 15 000 工人)、玻璃制造业(15 000 工人)、印刷业(35 000 工人)、假花制造业(11 000 工人)等等行业中的工人的“没有先例的”幸福,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

总而言之,童工调查委员会要求,要让在工业中从事劳动的总数不下 140 万人的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都得到工厂法的保护,使他们免于过度的劳动对他们大多数人的致命的危害。

最后,依靠社会慈善事业的救济度日的赤贫者的数目在 1863 年为 1079 382 人。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 1863 年无疑生活很坏的工人的大略数字上:农业短工按整数计为 110 万人,棉纺织业工人为 469 000 人,女裁缝和女时装工为 751 000 人,裁缝和鞋匠——除去百分之三十——为 401 000 人,花边业工人为 15 万人,造纸业工人为 10 万人,织袜业工人为 12 万人,童工调查委员会调查的小行业的工人为 189 000 人,最后,赤贫者为 1079000 人。总共有工人 454 9000 人,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加上他们的家属。

要知道 1863 年还是工业情况良好的一年。工业已经完全从 1857 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需求迅速地增长,除棉纺织业外,几乎

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可是,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在哪里呢?

四十年代的工厂立法大大地改善了它所涉及的工人的状况。但是在 1863 年,它只涉及毛纺织、亚麻纺织、丝纺织工业中的工人,按整数计,他们共有 27 万人,棉纺织业的工人则在挨饿。在漂白和染色业中,对劳动的法律上的保护仅仅是一纸空文。此外,在需要整个的男劳力,而且往往还需要技能的工业部门,由于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的抵抗,工人在工业情况良好的时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利益,即较高的工资,因而可以说,在这些需要使用繁重的男工劳动的工业部门,工人的生活水平平均说来确实有所提高,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一提高说成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可笑的。但是,尽管大量的生产劳动已经转移到了由弱的男工、女工和未成年工看管的机器上,政治家们却仍然愿意只把强壮的从事重劳动的男工看做工人,根据他们的状况来判断整个工人阶级状况。

同上述 450 万处于困苦状况中的工人和赤贫者相对的,是 27 万报酬高的毛纺织、亚麻纺织和丝纺织工人。我们还可以假定,在 376 000 五金工人中,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另外三分之一还可以过得去,余下只有三分之一,即十八岁以下的工人以及制钉工人、制链条的铁匠和女工处境不好。566 000 矿工的状况可以认为多少过得去。建筑工人的状况,除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可以算做是好的。在细木工中最多有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大多数则为榨取血汗的小业主(sweaters)干活。铁路职工当时已经普遍地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是在最近二十年才引起了有组织的反抗。总而言之,把所有数字加起来,我们也难以凑满 100 万工人,对于这些工人我们能够说他们的状况随着工业和资本家利润的增长而获得

了改善 ;其余的人处于中等状况 ,他们从工业状况的普遍改善中整个说来只获得很少的利益 ,或者说 ,这类工人在性别和年龄上这样参差不齐 ,以致男工劳动状况的改善为女工和未成年工的过度劳动所抵销。

如果上面所说的还不够充分 ,那末还可以参看“公共卫生报告书” ,而“公共卫生报告书”之所以需要 ,正是因为到 1863 年为止的最近二十年中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 ,就表现在伤寒、霍乱以及其他种种同样美妙的传染病的流行上 ,这些疾病最后终于从工人住宅区也蔓延到城市的贵族住宅区。在这些报告书中调查了英国工人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增长” ,发现在无数情况下 ,他们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源地 ,饮食则只能勉强达到 ,或者甚至低于不至于因饥饿致病的水平。

总之 ,1863 年初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格莱斯顿先生所吹嘘的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责备马克思的话 ,那就是 :他放过了格莱斯顿先生上述那段吹嘘的话 ,给了格莱斯顿先生不应得到的帮助。

结论 :第一 ,马克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

第二 ,他没有“删掉”任何东西 ,足以使格莱斯顿先生有权报怨。

第三 ,布伦坦诺之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千上万条引文里只是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 ,这一情况证明 ,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也就是说 ,他引证的是正确的。

文 件

—

被指控的引文

第 1 号 成立宣言¹⁶²

第一版用的标题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 - 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定价一辨士。“蜂房”报社 ,弗利特街波耳特巷 10 号 ,1864 年。宣言以下面的话开始 :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 1848 年到 1864 年间没有减轻 ,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下面从“公共卫生报告书”中引用了城乡各类工人食物不足的事实作为证明。接着宣言继续写道 :

《Such are the official statements published by order of Parliament in 1864 ,during the millennium of free trade ,at a time when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told the House of Commons that

《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has improved in a degree we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or any age》

Upon these official congratulations jars the dry remark of

the official Public Health Report :

《The public health of a country means the health of its masses and the masses will scarcely be healthy unless ,to their very base ,they be at least moderately prosperous》 .

《Dazzled by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statistics dancing before his eyes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exclaims in wild ecstasy :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s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dds Mr Gladstone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

翻译出来就是 :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 1864 年间 ,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 ,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 ,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 ,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 ,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 ,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 ,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 ,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内 ,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 ,则增加了 20% !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

第 2 号“资本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3 版第 670—672 页¹⁶³

根据这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¹⁶⁴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101)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

格莱斯顿说:“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102)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

(101)“1861 年……人口调查”第 3 卷第 11 页¹⁶⁵。

(102) 格莱斯顿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的演说:《It is one of the most melancholy features in the social state of the country, that while there was a decrease in the consuming power of the people, and an increase in the privations and distress of the labouring class and operatives, there was at the same time a constant accumulation of wealth in the upper classes and a constant increase of capital》。

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103)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三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比1851—1853年三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三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104)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作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于敛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

(103)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8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s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 must be of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because it cheapens the commodities of general consumption - while the rich have been growing richer, the poor have been growing less poor! at any rate, whether the extremes of poverty are less, I do not presume to say》格莱斯顿 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104) 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Miscellaneous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Kingdom》, Part VI, London, 1866, p. 260—273, passim.¹⁶⁶

第二版附注。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婚嫁用度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

生存而挣扎”(105)。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the rich grow rapidly richer)，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106)

(105) 《Think of those, who are on the border of that region (pauperism)》，《wages... in others not increased... human life is but, in nine cases out of ten,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格莱斯顿 1864 年 4 月 7 日在下院的演说。)英国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 1863 年和 1864 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¹⁶⁷：

Voilà l'homme en effet Il va du blanc au noir .
Il condamne au matin ses sentiments du soir .
Importun à tout autre , à soi même incommode ,
Il change à tous moments d'esprit comme de mode) .

(《The Theory of the Exchanges etc 》London ,1864 ,p .135¹⁶⁸) .

(106) H Fawcett l. c .,p 67,82¹⁶⁹ 至于说工人愈来愈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愈来愈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二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第 3 号 控 告

1872 年 3 月 7 日“协和”杂志第 10 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在卡尔·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中有下面一段话：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 6%，在从 1853 年至 1861 年的八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马克思的这段引文获得了很大的名声。我们在很多文章中都遇见了它。自然，作者们很少指出，这段话他们是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摘引来的。他们暗示，他们自己读过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实际情况，可以从下面对照格莱斯顿的演说来判断（参看“汉萨德议会议事录”第 3 辑第 170 卷第 243 页及以下各页）：

“1842—1843 年的每英镑七辨士的所得税（只是在大不列颠实行，并且在那里只是从 150 英镑以上的收入征收），在我提到的表册中是由总数为 15 600 万英镑的收入征收的。在同样的基础上和以同样的限制条件计算的 1860—1861 年的收入为 22 100 万英镑。而我并没有听说，税务方面有什么改变或者在征税的方式上有什么改进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差距。相反，立法方面常常做出让步或减轻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毋宁说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但是，年收入的差距竟达 6 500 万英镑，也就

是按上述条件课税的国内总收入的²/₇。这是非常好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的一个特点，认真考察起来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是后一段时间内的加速增长。我再次请求委员会多少抽点时间来研究这一问题。我比较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1853年以前，另一时期是从1853年开始（这时作为起点的数字发生了变化）。从1842年到1852年（1852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6%；但是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致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说，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获得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这样一种意识给人难以估价的极大的安慰，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划分贫极和富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最近二十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第 4 号 马克思的答辩¹⁷⁰

1872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人民国家报”第 44 号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 3 月 7 日出版的“工人问题杂志”“协和”第 10 期给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中是没有的。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率逻辑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因此它幸灾乐祸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的德语写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当着格莱斯顿的面出版的成立宣言中有一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句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行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于被柏林的德国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p 6 Inaugural Address etc.) (逐字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在“双周评论”(1870 年 11 月)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

被伦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 518 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An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as Mr .Gladstone observed,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 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那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兑换论。1844 年银行法”，1864 年伦敦，T .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 30 号。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 134 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s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of 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

我们顺便指出，作风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转载了格莱斯顿嘟嘟囔囔地说出的另一句话，他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二十年来获得了“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说来都是异乎寻常的和没有先例的”改善。黑体字是要证明，我隐瞒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在成立宣言中我恰恰强调指出了这句无耻的话和英国官方关于这个时期的报告中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统计”(《appalling sta- tis-

tics》)——比克利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之间的尖锐的对比(1)。

“兑换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摘录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预算演说。我曾努力想从自己1863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不过这与事无损。虽然伦敦各报上登载的议会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相信,没有哪一家报纸能够完全忽略格莱斯顿的这个极其耸人听闻的声明。于是我翻开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它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格莱斯顿的机关报——并在第七版第五栏关于预算演说的报道中找到了下面这段话:

《That is the state of the case as regards the wealth of this country! 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classed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e augmentation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I think, upon accurate returns,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d of property》。

译成德文是: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2)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

- (1) 这篇演说中的其他胡诌的辩护词我在“资本论”一书(第638—639页)¹⁷¹中曾予以批驳。
- (2) 《easy classed》,《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一语最初是威克菲尔德用来表示有产阶级中的确实有钱的部分的¹⁷²。

况。我所描述的增长 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部分,他就有点惊恐。

《Italiam, Italiam 》(“意大利!意大利!)最后,我们来谈谈“汉萨德”。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 contra [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¹⁷³把“泰晤士报”上登载的格莱斯顿实际发表的演说和格莱斯顿本人事后删改过的演说全文仔细地核对一下,会得到不少笑料,来品评这位巧言令色的、迂腐的、笃信宗教的、畏畏缩缩地把自己的虔诚和自由主义的《attitudes of mind》(“情绪”)展示出来的资产阶级英雄。

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们也迭有所闻。但是他们想: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册。——编者注
席勒“信仰的话”。——编者注

说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们感到怀疑的引文,他们便向伦敦的同事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那段话抄下来,赶忙送到拉芒什海峡对岸去。现在他们知道我的生产秘密了。我不仅制造了原文,而且也伪造了它的引语。他们陶醉于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请看“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一下子永远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办法正是工厂主们应该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没有花费一文钱来对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卡尔·马克思

1872年5月23日于伦敦

第5号 匿名作者的反驳

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

—

我们的读者或许会记得今年3月7日本刊第10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一文。我们在那里研究了马克思写的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名声,它经常被用来,特别是被社会民主党用来作为明显的证据,证明在保持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条件

下，工人阶级的状况必然恶化。马克思在这里引证了格莱斯顿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发表的预算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有了“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他并且以所得税的增长作为证明。但是他为此而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它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收入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问题是，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格莱斯顿说的刚好相反：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因此，马克思这样歪曲地进行引证的无耻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声明：“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一控告是严重的，而且有无无法驳倒的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这个证据对于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信念，即相信伦敦先知的无人能够超过的渊博学识、诚实和绝对正确来说，是真正毁灭性的。因此，对于这种控告不能不反驳，或至少采取类似反驳的行动。在 6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第 44 号上 马克思曾试图反驳。但是我们的对手根本没有能够驳倒关于：mala fides（恶意）引证的指责。他的辩解方式如果说能证明什么的话，毋宁说是正好证明了这种 mala fides。他又利用了“人民国家报”的读者无法核对他的材料的准确性这一情况。这种做法的无耻，更超过了他的引证方式的卑鄙。

自然，马克思没有走得这样远，以致对我们从议会速记记录中摘录的引

这就是说，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后将近三个月之久。但是“人民国家报”在刊登了马克思的答辩两个星期以后就无耻地指责我们，说我们对这个答辩“英勇地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这家报纸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迫切地希望它的主人和导师发表第二篇更尖锐的反驳文章。而我们的答复之所以延迟，一部分原因是，在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要从英国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正是为了阐明这些引文需要从这些材料中作比较长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于篇幅不够，我们不得不数次推迟它的发表。（“协和”编辑部注）

文的确切性提出异议。对他说来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引证时的 *bona fides* (善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以别人的引证和他相同这件事来作证。他写道:

“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号)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被伦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 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518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 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不过, 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

完全正确。不过这里忘记了还要加上一个“不过”。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 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布的, 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材料写成的。不仅如此! 在那个地方比斯利根本没有引证格莱斯顿的话, 而只是指出, 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有这句引文。比斯利写道,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而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 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20%; ‘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 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 完全限于……”——这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证明方式! 人们把一些捏造的材料悄悄地塞给没有听说我们不诚实的人, 后者轻信地进一步加以传播, 然后人们就利用这种情况, 并且利用转述者的诚实, 来证明这些材料是确实的, 而且自己本人是诚实的! ——马克思继续辩护说:

“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 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 ‘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 1864年伦敦, T. 考特莱·纽比出版社, 威尔柏克街30号。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 在该书第134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 ‘……这样令人陶醉的……’, 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 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我的’产品, 就是‘在形式上撒了谎’!……”马克思继续说道, “‘兑换论’的作者和我一样, 不是根据‘汉萨德’, 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摘录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确实, 这本书(顺便说一下, 它是一本常见的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 和马克思一样, 也不是根据“汉萨德”摘录的。不过, 如我们下面就要指出的, 马克思甚至也不是根据伦敦的报纸摘录的。但是, 我们首先应当在这里指出,

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编造了它。这只有在马克思本人是这本迄今还非常神秘的书的作者的情况下才会是这样，而根据该书的那种可怕的风格来判断，看来倒是可以这样设想的。马克思所引的这句话的出处正是这本书，正因为如此，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曾努力想从自己 1863 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把马克思“资本论”一书中提到格莱斯顿演说的那个地方和“兑换论”加以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引文的来源了。在“资本论”第 639 页，尤其是在注 103 中，这一演说被引述得毫无意义，就像在“兑换论”第 134 页上一字不差地引用的那样。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 640 页注 05 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同样，在这本书的第 135 页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本来的出处（见“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4）。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他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知道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那也是撒谎？我们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其次，马克思重述包含在“兑换论”中的谎言，他这样做时难道不是明明知道真相，或者说他至少不是应该知道真相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很简单的。马克思先生无疑十分了解的、作任何解释的第一个原则是，要把那些初看起来含有矛盾因而没有意义的地方解释得没有矛盾，如果对一段话这样做办不到，那最好是批评这段话，而不是相信矛盾的存在。对于一篇特别是由于熟悉对象和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赏的演说，尤其需要这样做。最后，如果作者想断章取义地抽出构成这段话中的矛盾之半的一个地方，把它抛给全世界的无产者作为对有产者的告密，那末离开这种确切性就是一种近乎犯罪的轻率。所以，如果说根据普通教育、科学性和责任心的要求，卡尔·马克思就已经应该放弃采用上述的手段，那末他竟然引用这个假引文这一犯罪的轻率行为，就他来说就更加不能宽恕，因为他是完全可以知道格莱斯顿演说的原文的。第一，英国的报纸在演说发表后的第二天就援引了这篇演说，即使不是逐字逐句地援引，至少也是忠实于原意的。其次，在演说发表之后，格莱斯顿立即一字不差地将它载入了他的一本受到很大注意的著作：“关于财政问题的演说”1863 年伦敦版，在该书第

403 页上，演说正是像我们援引的那样叙述的。最后，马克思可以在“汉萨德议会记事录”中找到这篇演说的速记记录。而且按照惯例，应该根据速记记录引证议会演说，即使这些演说在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中并不包含矛盾。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 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从第 7 版第 5 版第 17 行起，是这样叙述这一演说的：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从我自己方面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听啊！听啊！）然而，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并且我应当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获悉，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听众表示赞同）”

将“泰晤士报”的这个报道和 3 月 7 日“协和”杂志刊载的“汉萨德”的报道加以比较就会看出，两个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所一字不差地记

这就是说，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后将近三个月之久。但是“人民国家报”在刊登了马克思的答辩两个星期以后就无耻地指责我们，说我们对这个答辩“英勇地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这家报纸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迫切地希望它的主人和导师发表第二篇更尖锐的反驳文章。而我们的答复之所以延迟，一部分原因是，在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要从英国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正是为了阐明这些引文需要从这些材料中作比较长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于篇幅不够，我们不得不数次推迟它的发表。（“协和”编辑部注）

载的话。但是，虽然“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

“可见，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甚至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已经根据“汉萨德”向公众报道了演说的确切原文，而这段原文根本排除了任何歪曲的可能性，所以他力图用下面的话来消除这一十分不幸的状况，说“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在‘汉萨德’中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他只是还没有指出：格莱斯顿先生或许是有鉴于1864年才问世的诽谤性小册子“兑换论”才这样做的。

对于这样的手法还有什么可说呢！首先是根据无知的诽谤性小册子向我们提出完全是捏造的引文，甚至无需和原文核对，它的内容的自相矛盾就证明了这种捏造。然后，在被迫作答时，马克思声明说，别人也是像他那样引证的，并且援引早先被他本人灌输以这种谎言的人的话作为证明。接着，他企图利用这本小册子的不清楚的来源和他一致这一点，作为替自己辩护和证明自己的引文确切的论据，似乎两者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无可非议的第三个来源引来的；而其实不过是这一个照抄那一个。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257页）：简直“无耻”。

马克思在结束他的辩护时说：“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我们请读者冷静地判断一下，进行伪造和会得到不愉快的结局的究竟是哪一方。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向马克思先生说明，我们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

第二篇文章发表在1872年7月11日“协和”杂志第28期上，它与本题毫无关系，所以这里没有收录。

第 6 号 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¹⁷⁴

1872 年 8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第 63 号

在 7 月 4 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我证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伪造商品方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莱斯顿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那个地方，工厂主们的机关刊物（第 10 期）声明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说，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是我的产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如何编造这句话的。

“协和”说“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断言过……，以便把……强加于格莱斯顿。”我从在成立宣言以前出版的“兑换论”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谎。在此以后，如它自己所说的，它从伦敦函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见过的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现在用什么谎言来自圆其说呢？请听：

“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编造了它。”

显然，这里发生了工厂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淆的情形。例如，有一个奸诈的工厂主同他的同行们谈妥，向他们推销一批绦带，声称每盘绦带有三十埃勒，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埃勒，

埃勒（Elle）是德国旧长度单位。——译者注

这样一来，他事实上增添了十埃勒，而这正是因为他“没有编造了它”。增添的绦带是这样，那末增添的句子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呢？亚当·斯密说：“绝大多数人的智能，必然会以他们的日常事务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¹⁷⁵，工厂主的智能自然也是这样。

通过“人民国家报”我不仅用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引文，而且也用我的“资本论”一书中涉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那些篇幅丰富了工厂主机关刊物的科学知识。现在这家机关刊物企图依靠我向它提供的材料来证明：有争论的那个地方我不是从“伦敦报纸”上，而是从“兑换论”中摘录下来的。这种证明手法是工厂主逻辑的新范例。

我告诉工厂主的杂志说，“兑换论”第134页上引证的话和我引证的话完全一样。而该杂志却发现，我引证的话和“兑换论”第134页上引证的话完全一样。

往下竟说！

“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

这纯粹是撒谎。在“资本论”第639页上我是把我的评论同格莱斯顿演说中的一句话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关于这一点我曾指出：“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¹⁷⁶……这些“评论”在“兑

换论”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

“……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5 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

这样一来,“而且”我也引证了莫里哀,并给“协和”的“博学之士”提供了一个机会,好让他们查明来源并向公众宣布说,这段引文是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实际上在“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5 中我直截了当地说,“兑换论”的作者“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最后它说:

“同样,在这本书的第 135 页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的出处(见“资本论”第 640 页注 104)。”

“协和”非常聪明地忘记告诉自己的读者,“这本书”没有提供任何出处。这家杂志想证明什么呢?它想证明,我从“这本书”中抄袭了格莱斯顿的演说中的一个地方,而不知道这篇演说的出处;它是怎样来证明的呢?这样来证明的:说我确实从这本书中摘了一段引文,可是抛开这本书而根据原来的出处加以核对!

关于我从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1870 年 11 月)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搞下来的引文,“协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布的,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材料写成的。”

比斯利教授说道:

“对协会的成就,谁的贡献也没有像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贡献那样大。我认为,就熟悉欧洲各国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而言,是没有人能同他相比的。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利用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要归功于他的帮

助。”¹⁷⁷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上面引述的他的意见在这方面很少引起什么怀疑,以致“星期六评论”在批评他的那篇文章¹⁷⁸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说,他本人就是成立宣言的作者(1)。

“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不是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用那个可疑的地方,而只是指出“成立宣言中有这个引文”。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比斯利教授说:

“宣言大概是保卫工人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篇最有力和最辉煌的文件。还从来没有人能用短短十二页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阐述。我愿意在文章中大量摘引宣言中的话。”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过的“蓝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统计”之后继续说: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过来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 20%;‘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比斯利教授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外面,当做自己说的话,这一点恰好成了“协和”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莱斯顿的演说的!只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一个伦敦同行才知道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正如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 150 英镑以下的人,

(1) 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给我,提醒我注意这种 *quid pro quo* [偷梁换柱的手法]。

在英国免缴所得税”(见“协和”第 10 和 27 期)一样。但是英国税务人员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是,只有收入低于 100 英镑的人才免征所得税。

关于成立宣言中那个有争论的地方,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我从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报道中引了一段话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话,因为格莱斯顿断言他“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这样的断语需要加以评论。我援引威克菲尔德的话指出,《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这个语句在德文中没有确切的词来表达——意味着“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威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阶级叫做《the uneasy class》,德文与此近似的说法是,“不太富裕的阶级 [die ungemächliche Klasse]”(2)。

工厂主的作风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释只字不提。它给我引用的那段话加上“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这几个字,想让它的读者了解,它引的话是我的译文,而事实上它和我的译文不同,它不是把《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译成“富裕的阶级”,而是译成“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它还使它的读者充分了解到,虽然占有财产始终被看成是有产阶级的所有组成部分的“优良条件”,但是它们并不全都是“富裕的”。然而就是按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那段话的翻译,格莱斯顿先生也

(2) 《The middle or uneasy class》[“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英国和美国”1833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185 页¹⁷⁹)。

把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形容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并指出，这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在结尾时他说道，这种“增长完全限于那些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报道中强加给格莱斯顿先生的那句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好就是我在成立宣言中强加给他的那句话，在这之后，他就自己捶着自己高贵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还要厚颜无耻地在 6 月 1 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 年 4 月 17 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 1863 年 4 月 16 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什么呈献给广大的读者！

我已经在 6 月 1 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好像我在成立宣言中没有引用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话，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别强调指出这种讲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在其 7 月 4 日的回答中又重施了这个故技。它说道：“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为了反驳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争论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们且来看看“往下”是什么吧。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

使工厂主机关刊物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顶点的一件事,就是它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速记纪录中确切引用的话”。(3)我们把这两个报道对照一下吧:

(3) 看来工厂主的报纸真的以为,伦敦的各家大报在它们关于议会的报道中没有利用速记材料。

—

摘自 1863 年 4 月 17 日
“泰晤士报”所载的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演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我让读者自己去把“汉萨德”中的这种夸张的、混乱的、带有一大堆保留条件的、Circumlocution Office〔繁文缛礼局〕的文体和“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比较一下。

二

摘自“汉萨德”1863 年 3 月 27 日至 5 月 28 日议会议事录第 170 卷所载的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的演说

“从积累普遍增长的观点来看,状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有些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富裕的人(the class of persons who may be described as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

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或者(!)他们的收入的增长。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等等。”

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在“汉萨德”中一部分被歪曲了,一部分被删掉了。这些被强调的“含义确切的话”,凡是听过这次演说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漏过去的。例如: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The augmentation is an augmentation),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但是这种增长(But that augmentation)对工人居民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1863年4月17日“晨报”(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惊恐(alarm)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The augmentation stated)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的增长。这种增长(This augmentation)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由此可见,格莱斯顿事后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中隐瞒了他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下面这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的增长。”因此“协和”在它的伦敦同行送来的摘要中找不到这句话，于是就嚷叫道：

“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如果“协和”现在教导我说，照批评的“惯例”，引用议会演说时应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说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说为根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惯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林“文明”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狭隘的普鲁士忠顺臣民的见识。由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在告别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请教一下。什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敌人——按其地位说来至少和“协和”相等——说过下面这句有份量的话：《A sinus manebis in secula seculorum》(4)？

卡尔·马克思

1872年7月28日于伦敦

第7号 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驳

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第34期

再论卡尔·马克思的特点

马克思先生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对“协和”第27期上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一文作了答辩。他坚持从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推翻现存制度计划的人也会吃惊。实际上这种顽固的撒谎

(4) 你永远是一头驴子。

癖性只能说明,作者害怕如果承认这个引文,即成立宣言中这个曾经获得轰动一时的效果的地方是假的,在成立宣言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会给它的作者带来不愉快的后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辩护文章中同意:在载于“汉萨德”的格莱斯顿演说的速记记录中,没有这个引文。不过,原因是格莱斯顿先生删掉了这个会使他声誉扫地的地方!第一个证据是,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的文章中引证这篇演说和成立宣言引证的一样。

这可能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除国际以外,比斯利教授还在某一篇论述其他历史题目的文章中引证了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篇演说。所以我们指出,首先,这篇文章谈的是国际的历史,并且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作者的材料写成的。对此,甚至马克思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他断言,他提供的材料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比斯利教授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这样说,甚至也没有暗示这一点。我们也完全相信马克思先生的话。如果他向比斯利教授提出“兑换论”作为自己引文的证据,那末比斯利大概就不会转载它了。其次,我们回答说(这也是最主要的答复):比斯利没有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证那个地方,而只是在分析成立宣言时提到了它。我们从比斯利的文章中逐字逐句地引述了那句话,这从“协和”第27期上可以看到。马克思现在利用比斯利在自己的分析中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句话放在引号外面,这一情况来使读者相信,似乎比斯利突然中断了自己的分析,以自己本人的名义说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下面这一事实中寻找证明格莱斯顿事后从自己的演说中删掉了那句话的第二个证据:比成立宣言更早出版的“兑换论”一书引证的格莱斯顿的演说,和宣言引证的一字不差。我们看了这本书,发现这一点是确实的,并且一切都说明马克思自己最初是从这本书中借用他的引文的。首先这由以下情况得到证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639页,尤其是在注103中,演说被一字不差地引述得毫无意义,就像在“兑换论”第134页上引用的那样。马克思先生在自己的著作“资本论”的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在他像“兑换论”第

再版时补加的注:比斯利教授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他引自成立宣言的话,就像它在成立宣言中所刊载的那样。而在成立宣言中这个插入句自然也没有加引号。(布伦坦诺注)

134 页上那样引证格莱斯頓演说的地方,还援引了这本书的同一个地方的另一段引文,并给它们附上了同样的评论,这也证明“兑换论”是马克思引文的来源的论断。马克思先生对此又怎样反驳呢?第一,他还加上了“兑换论”中所没有的评论。但我们也并没有否定这一点。其次,他已经明确指出“兑换论”的作者就是引用莫里哀的文句的作者。但我们并没有说与此相反的话。最后,至于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第 640 页上引证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兑换论”第 135 页上所引证的一模一样,那末马克思自己承认,他是从这本书中一字不差地援引来的,而且后来根据原出处核对过它们的确切性。因而马克思自己证明了:他给格莱斯頓演说的引文所加的一部分评论,是取自“兑换论”。这样他自己证明:我们用来支持我们关于格莱斯頓演说的引文他也是从这本书中借用来的这一主要论据的各点是正确的。可是对于这一主要论据,也就是对于认为他像“兑换论”一样把格莱斯頓演说引述得同样毫无意义这一点,他没有进行任何反驳。

最后,第三,马克思力图根据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刊载的关于格莱斯頓预算演说的报道,证明自己的这个论断:格莱斯頓事后在“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对他自己的演说做了捏造。可是这个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为了使读者看不清这一点,马克思采用了各种手段。第一个手段是咬文嚼字的题外话,这个手段同时也会使“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为他们的先知的渊博学识而受到新的鼓舞。即使根据马克思引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頓也是肯定地说,他认为所说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局限于《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即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马克思援引“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一书的作者威克菲尔德的话,断言根据格莱斯頓的话来看,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只限于“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而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所有这些议论,所以他现在指责我们隐瞒。但是,如果说我们对这一新的编造谎言的企图保持缄默,那只是由于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太明显了。因为不管威克菲尔德把中等阶级叫做 the uneasy class 是什么用意,格莱斯頓演说的总的意思,即使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也仍然表明:格莱斯頓所谓的《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在这个地方指的是那些不属于工人居民的阶级,因为他是拿它们和工人居民相对而言的。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自己的这个报道的德

文译文中干脆删掉了一个附句,从这个附句中得出的结论是,格莱斯顿只是说,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因此,根据所得税的材料丝毫不能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马克思,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曾经毫无道理地指责“协和”隐瞒,而他现在却又心安理得地删掉了上述的附句,虽然我们向他指出了他的歪曲。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们根据真实情况,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确切引证的话,他否认这一点,并且还敢于将“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并列地刊登出来,——自然,他又把这一附句删去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人民国家报”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这一点,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全部引证了“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争论的地方。虽然如此,马克思仍然欺骗自己的读者,断言似乎我们想让人们了解,我们引的“泰晤士报”的话是他的译文!!另一方面,他自然把我们指出(在第28期)的这样一点掩盖起来,即马克思所谓的、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获得改善的论断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相反,他又重复了这一指责。

此外,马克思在8月7日“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辩中还提出了两个新的证据,证明他对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理解是正确的,这就是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不过我们根本用不着去检查,马克思引证这两家报纸时是否做了新的歪曲。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意到”一语的意义和运用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

再版时补加的注:马克思在这里也同样删掉了他在转述“泰晤士报”报道时所删掉的那些话。请看两个报道的开头。(布伦坦诺注)

是指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说法。

但是引证这两个所谓的证据不过是要炫耀自己的博学,依靠它来维持“人民国家报”的读者对他们的先知的信仰。马克思发表在8月7日“人民国家报”上的文章,就是这种自我吹嘘的标本,值得我们的读者亲自见识一下。我们还应当举一个这类自我吹嘘的例子,以免马克思先生责备我们,说我们想向我们的读者隐瞒他在一个次要的问题上修正了我们的话。我们说年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先生嘲笑我们无知,说只有当收入在100英镑以下时才不征收这种税。实际上根据1842年的法律,所有150英镑以下的收入都不课税,而在1853年所有100英镑以上的收入才都课了税,但是新课税的收入得到了优待,税率较150英镑以上的税率为低。后来在1863年享受优待的人扩大到了收入为200英镑的人,并且下面这样的方式保持减税,即所有在这个数字以下直到100英镑为止(包括100英镑在内)的收入,始终应扣除60英镑作为不纳税的收入。

马克思先生在结束他的文章时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我们的愉快来往。我们懂得,马克思先生是很愿意利用机会尽可能地远离那些会指出他的捏造的人的。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末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种包含着承认他被揭露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三

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第 8 号 塞·泰勒的攻击

1883 年 11 月 29 日“泰晤士报”

致“泰晤士报”主编

请允许我在“泰晤士报”上指出,摘自 1863 年 4 月 16 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演说的一段使人发生误解的引文,即甚至像艾米尔·德·拉弗勒教授这样卓越的政论家,也根据德文加以重复引用并且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对它作解释的那段引文,早在 1864 年就涉及到了,它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中。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在八年之后,在一个德国杂志上揭露了在国际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 *mala fides* [恶意]。

卡尔·马克思先生,作为宣言的公认的作者,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报纸的合订本中抽出来用英文重印,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在写作方面的正直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

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塞德莱·泰勒

(1883年)11月26日于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这篇文章刊登在1883年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上。11月30日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给“泰晤士报”寄去了她的答辩。答辩没有被刊登。写给主编的第二封信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爱·马克思又写信给“每日新闻”,结果仍然是徒劳。于是她把塞德莱·泰勒的控告以及自己的答辩一并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今日”1884年2月号上。我们把她的答辩收录在这里。¹⁸⁰

第9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

1884年2月“今日”月刊

致“泰晤士报”主编

塞德莱·泰勒在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上提起了一段引自格莱斯顿演说的话,说这段话

“早在1864年就涉及到了,它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中”。

往下他继续说道(这里我摘引了泰勒的信,从“使人特别惊异的是”起,到“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止)。

事情的实际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被提到的那段引文引的是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演说中的几句话。在格莱斯顿先生描述了1853年和1861年之间国内财富的异乎寻常的增

长之后 ,据说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匿名作者(现在已知道是布伦坦诺教授)在 1872 年 3 月 7 日的德国“协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答复 ,内中说道 :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我父亲和匿名的对手之间的唯一的争论点。

马克思在他刊登在 1872 年 6 月 1 日和 8 月 7 日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辩中 ,引证了以下一些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报道。

4 月 17 日“泰晤士报” :

“我刚刚描述的增长 ,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4 月 17 日“晨星报” :

“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 ,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4 月 17 日“晨报” :

“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他的“巧妙的攻击”“很快地打垮”的匿名的布伦坦诺 ,在“垂死的挣扎中”还力图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说法来辩护 ,说即使引文不是捏造的 ,它也是“使人发生误解的” ,是“怀着 mala fides[恶意]” ,是“狡猾的断章取义” ,等等。我担心 ,您不会给我篇幅来对布伦坦诺先生的这一过了十一年 ,现在又被泰勒先生重新提出的控告作答辩。而且 ,这或许也不需要了 ,因为泰勒先生说 :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 ,很值得从报纸的合订本中抽出来用英文重印。”

我很欢迎这样做。这对于纪念我的父亲只有好处。至于报纸

上关于这个演说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有出入的问题,我让最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去解决。

在我父亲的著作里的成千上万条引文中,只有这一条,它的确切性引起了争辩。经济学教授们一再地用这一孤立的、并不怎么恰当的例子大做文章,这个事实是足以说明问题的。用泰勒先生的话来说,

“它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 马克思 在写作方面的正直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爱琳娜·马克思

1883年11月30日于伦敦

第10号 塞·泰勒的反驳

1884年3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马克思女士被拒绝发表她的答辩,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感到遗憾了,她显然有权利这样做。不过,她认为马克思博士和布伦坦诺教授之间的“唯一的争论点”,就在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句话,对于这个看法,我却完全不能同意。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自然,要在这封信中讨论布伦坦诺和马克思之间这场牵涉很广的辩论的内容,而不占用贵报过多的篇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因为马克思女士在贵报上公开说我的看法是“诽谤”和“诬蔑”(1),所以我不能不请求贵报用两栏并列的形式刊登下面的两种引文,根据这些引文,贵报读者自己就能判断,马克思博士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引证1863年预算演说时是诚实的还是不诚

(1) 在未刊登在这里的致“今日”月刊编辑部的附函中。(恩格斯注)

实的。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先生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了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1863年4月17日

“泰晤士报”

“在从1842年到1852年(1852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就我们所能确切查明的,增加了6%;但是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这个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认为,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然而,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并且我应当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走穷的极端程度已经比过去缩小,但是我们幸运地获悉,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

“资本论”第2版

第678页注103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走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我请您特别注意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我加了着重号的两个地方的意思。“我从自己方面……富裕阶级的话”这句话向我们表明了演讲人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刚刚描述的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的确,和“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什么而言,这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所援引的以所得税的材料为根据的数字,只包括要缴纳所得税的收入。所以这些数字根本没有说明,工人居民的收入总额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增长了多少。最后一句话,即从“但是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到结束,十分明确地说明,格莱斯顿先生根据和所得税材料无关的其他证据,认为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无疑是异乎寻常的、几乎是没有先例的改善。

把这些重要的地方几乎全部删掉,从而把报纸的报道弄成这样一种奇怪的样子,就像在马克思博士的书中那样,这是什么目的呢?我认为,其目的显然是:使以格莱斯顿先生那些被删节之后剩余下来的辞句任意拚凑起来的话可以理解为,似乎他断言,工人居民的工资只是稍有增长,而有产阶级的收入却大量地增加。但是,那些被删去的地方显然驳斥了这个观点,而证明了完全不同的论断。

我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资本论”中,在这个被歪曲的引文的德译文后面,马克思紧跟着就把所引格莱斯顿语句中最后一句话同他前面对于有产阶级财富增长的描述加以对比,从而发出了关于“拙劣的诡辩”的轻蔑的惊叹。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塞德莱·泰勒

1884年2月8日于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在1842—1853年150英镑以下的收入免缴所得税,而1853年以后是100英镑以下免缴所得税。(“今日”月刊编辑部注)

第 11 号 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¹⁸¹

1884 年 3 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 我断言当匿名的诽谤者攻击马克思博士的时候 ,唯一的争论点在于 ,格莱斯顿先生是否曾经使用某些词 ,塞德莱·泰勒先生对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 ,问题实际上在于 ,

“引用所提到的引文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 ,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协和”杂志(1872 年 3 月 7 日第 10 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现在就在我手头。在这篇文章里 ,匿名作者先引证了国际的成立宣言 ,接着引证了格莱斯顿先生演说中的一个地方 ,即“汉萨德”所刊载的有关的全文 ,然后他根据自己的看法 ,按照自己的心意把这些话做了归纳 ;最后 ,他在结尾说 :

“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 ,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 ,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 ,而且是唯一的控告。实际上这是控告他由于“增添了”整整一句话而歪曲了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在控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引文“使人发生误解”或“狡猾的断章取义”。问题仅仅在于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句话”。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读过布伦坦诺先生的攻击文章

和我父亲的答辩,如果是这样,他的说法就直接违反他不能不知道的实际情况。要么他没有读过。如果是这样,那将如何呢?如果是这样,投寄注明寄自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信的这个人,就没有任何理由要费这么大的力气,用这样一种办法来非难我已故的父亲在写作方面的正直,如果他不能证明所提出的指责,这种办法就不能不成为“诽谤”。他根据匿名作者(据泰勒说就是布伦坦诺教授)和我父亲在1872年进行的笔战提出自己的控告,他以奋激的言词描写圣乔治——布伦坦诺的“巧妙的攻击”,以及他怎样很快就使恶龙马克思陷于“垂死的挣扎”,他能十分详细地向我们描述这位圣乔治“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所取得的毁灭性的成绩,——这一切使我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境地,以致我出于仁爱之心不得不作这样的推测:对于他所说的东西,他根本一行也没有读过。

泰勒先生如果读过他的匿名朋友的“巧妙的”文章,他就会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下面的话: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他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知道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那也是撒谎。”

这就是“巧妙的”、匿名而又十分高尚的布伦坦诺在他反驳我父亲的第一篇答辩时说的话(1872年7月4日“协和”第27期第210页)。在同一页上他还在全世界的面前断言,

“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

所以,如果说连布伦坦诺好像都根本不知道争论的真正目标在哪里,那末难道塞德莱·泰勒先生对这一点倒还更清楚吗?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上谈的是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条引文。在他给“今日”月刊的信上谈的是“资本论”中的引文。在这里,问题转移到

了另外一个方面,不过我对此并不抱怨。泰勒先生现在引证格莱斯顿演说中的地方,是照“资本论”第 678 和 679 页上那样引证的,和“泰晤士报”的、而不是“汉萨德”的报道中的同一个地方并列。

“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理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泰勒先生不属于这种“读者”之列。如果相信他自己的论据,那末,为什么他这样做,这一点别人能够理解,但是他本人却未必能够理解。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从绝对正确的“汉萨德”转向这样一个报道,为了采用这个报道的事,匿名的布伦坦诺(就在“协和”同一页即第 210 页上)曾指责我父亲,说他采用了“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泰勒先生的“为什么”,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一定是“理解”的。

对我说来,这个“为什么”实际上是很容易理解的。控告我父亲增添的那句话(“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不仅“泰晤士报”上有,其他日报上也都有,而在“汉萨德”中这句话不仅被“匆忙地修改”了,而且根本被“删掉”了。这件事已被马克思所查明。泰勒先生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中还对这种不可容忍的“粗暴行为”大发雷霆,可是现在他自己不得不放弃永无谬误的“汉萨德”,而到布伦坦诺所谓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寻找辩护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引文本身。泰勒先生要我们特别注意他加了着重号的两个地方。在第一个地方他承认:

“的确,和‘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什么而言,这是清清楚楚的”等等。

在这里,我们显然进入神学的领域。这是众所周知的正统的解释圣经的方法。这个地方实际上包含着矛盾,但是,如果根据基督徒的真正的信仰来解释它,那末就可能相信它的意思和真正的信仰不矛盾。如果泰勒先生像格莱斯顿解释圣经那样来解释格莱斯顿的话,那末他就不能指望得到除正统派以外的任何支持者。

但是,不管怎样,格莱斯顿先生在这个特定的场合要么是讲英语,要么不是。如果不是,那末任何引证和任何解释也帮助不了我们。如果是,那末他在这个场合是这样说的:如果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他会非常惋惜;而增长确实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也正是马克思引证的话。

第二个地方是一句惯用语,除了不景气的时期外,在每一次的英国预算演说中都要重复这句话,尽管每次词句略有不同。下面摘自马克思给匿名诽谤者的第二篇答辩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他对这句话以及整篇演说的看法: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话:‘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

为了使泰勒先生满意,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这里提到的格莱斯顿演说中的这个地方,在成立宣言第5页上是完全引证了的,——就在有争论的引文前面。可是泰勒先生最初指责的不就是这个宣言吗?难道从他那里也得不到关于真正来源的提示,就像从道勃雷那里听不到任何合理的话一样吗?

“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是泰勒先生叫我们参看的“资本论”那一页(第679页)上注105的对象。的确,看来很像是马克思由于他的 *mala fides*(恶意)竭力想要消除一个这样的矛盾似的,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爱琳娜·马克思

四

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第 12 号 摘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¹⁸²

最近出版英文本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不辞劳苦,把所有引文的原文都找出来了,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笔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 1843—1845 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的小错误和小疏忽也都这样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 4 版第 562 页注 47);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¹⁸³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

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个人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

1872年3月7日,柏林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的话(这句话引用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1页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 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位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

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 *contra*(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

这个匿名作者愈来愈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材料,纯贞地坚持说,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尽量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像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mala fides*》[“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这个假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捏造的引文”,“这种捏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设法暗地里使争论的问题转向新的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真诚的”匿名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很大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的地方。

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entirely confined to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可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经过演说人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者争辩。而匿名者好像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些同剑桥大学有关的人曾传来一些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著作上的大错,但在这方面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信末的署名是塞德莱·泰勒。这个研究最温和的合作制度的人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 mala fides(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deadly shifts)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

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原来如此!”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说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的谎言”,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craftily isolated quotation)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归结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莱·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这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中福斯泰夫的话的改写。——编者注

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不怀好意”,但我们这位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不然怎么办呢?“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根本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控告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像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琳娜·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

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像得到,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像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笔战获胜的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第13号 布伦坦诺的答复

“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

1890年柏林版,第3—5页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了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出席的公开大会。卡尔·马克思向大会提出了即将成立的国际工人组织的临时章程,以及他起草的这个组织的成立宣言。这两个文件被一致通过,成立宣言传遍了全世界。宣言中有一段引自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这段引文比宣言中的所有其他材料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1871年冬天,我在写作“现代工人公会”¹⁸⁴第2卷的时候,不得不研究(参看该书第2卷第241页)一下,增加工资就要进一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这个经常不断地被重复的论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事实相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每当英国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时候,人们总是提出这个论点来反对它们。那时我想起了引自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像别的许多人那样引用国际宣言上的话和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

639 页上的相应的地方。我找来了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发现它虽然也指出,1842—1861 年期间工资的增长丝毫没有阻止有产者收入的增长,也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劳动的需求,可是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断正好相反,格莱斯顿说:“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在最近二十年中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那几乎没有先例的。”

由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断——在现存的国家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富人必然愈富,贫者必然愈贫——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我请在柏林出版的“工人问题杂志”“协和”的编辑部注意在这里所作的捏造。“协和”编辑部建议我就这件事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 1872 年 3 月 7 日出版的“协和”上。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根据编辑部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在马克思先前挑起的笔战之后,这一次他很可能又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过了三个月,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作了答辩。从论战后来的情况看出,不是马克思本人捏造了谎言,而是他从一本诽谤性的小册子借用了一句捏造的引文;这本书是在 1864 年匿名出版的,书名是“兑换论。1844 年银行法。滥用金属货币原则导致通货贬值。从议事录看议会;交易所和 J 贝尔纳德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附录”,伦敦,T 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 30 号,1864 年。这本顽固的瑟息替斯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引自各种政治经济学著作及各种演说的被歪曲的引文,其中还夹杂着拉丁文、英文、法文的诗歌以及嘲讽的评论。这样的书,自然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如果现在马克思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引入了歧途,并且在此之后开始引用正确的引文,那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不过错误至少会纠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声不响。此外,在成立宣言已经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由于订正引文而取消这个卓越的论点,可能会给宣传鼓动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主要宣传手段是,它的代表人物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掌握着真正的科学,如哈雷代表大会所表明的,他们宁愿责

备自己明知铁的工资规律是错误的,却还是利用它作为唯一的宣传手段,而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马克思不放弃他的引文,力图证明格莱斯顿事后删改了自己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他现在用自己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来攻击那位在英国同行的协助下想抓住他的话柄挖苦他一下的想像中的工厂主,而当证明了在格莱斯顿发表演说后的第二天早晨出版的“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向水中放出黑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吹毛求疵,竭力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而最后,他就逃之夭夭,声言由于‘没有时间’他不能继续进行这一论战”。当时他没有对我刊登在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上的反驳他第二篇答辩的文章再作答辩。

我是发表在1872年3月7日、7月4日和11日以及8月22日“协和”上的文章的作者,这一事实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马克思还在世时出版的梅林的社会民主党史185第二版中也公开指明了我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塞德莱·泰勒,研究了这一争论,并就这件事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由于当时马克思已经去世,这就迫使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出面作答,爱琳娜在社会主义的“今日”月刊1884年3月号上不仅为她的父亲的忠实辩护,而且最后指出,她的父亲把据说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当时我已考虑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这种顽固地坚持错误引文的做法。但是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专门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这种争论没有普遍意义。恩格斯显然有不同的意见。他在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中,回顾了这一论战,但是他在叙述这一论战时,自然没有揭露马克思在论战中所表现的不诚实。此外,他还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中强加给格莱斯顿的一句和他实际讲的相反的话;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第一版中给自己的引文注明的出处只是:“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说”,而第四版在这个出处之外又加上了“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好像这个报纸的报道中包含着和马克思所转述的一样的引文似的!可是就是在“晨星报”的报道中,也包含着所有被“兑换论”这本小册子删

去、而且后来也被马克思删去的话；这些话表明，格莱斯顿在他预算演说中谈到所得税材料的地方，谈的只是缴纳所得税的人的收入，他是拿这些人和收入较少的、免缴所得税的人相对而言的；这些话也表明，他根据所得税的表册肯定财富和实力有了令人陶醉的增长，同时他也指出，根据这些表册肯定的收入的增长只涉及富裕的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其余的人的收入没有载入这些表册中；可是他并不认为，这种增长只限于这些阶级，因为从其他材料可以看出，英国工人的状况也同时获得了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没有得到过的改善……

（以下的话和控告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问题的附录”等等。——弗·恩格斯）

第 14 号 布伦坦诺答复的附录的摘录

（a）摘自“兑换论”，1864 年伦敦版，第 134 页。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 6%……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八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 20% 我的一位可尊敬的朋友说，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黄金造成的。我很遗憾，他深深地受了黄金问题的无稽之谈的蒙蔽。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Voilà l'homme en effet Il va du blanc au noir .
Il condamne au matin ses sentiments du soir .
Importun à tout autre , à lui même incommode ,
Il change à tous moments d'esprit comme de mode》.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我们认为是异乎寻常的、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没有先例的改善，这是一件极其令人满意的事情，因为……工资几乎不能使人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

诗的译文，见注 167。——编者注

为了确定“兑换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版第639页)所作的结论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下面的一点。马克思把这里引自“兑换论”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格莱斯顿说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话对立起来,借以反驳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的预算演说;“兑换论”有一个附录,在附录中也评论了1864年的预算,作为对刚才转载的几页的补充。那里也是前面早已熟悉了的那种风格。在这些题外话中我们发现了下面的话(第234页):

“可是大臣雄辩地讲到了‘贫穷’……‘请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工资……在其他部门确实没有提高……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现在我们把马克思的话(第1卷第1版第640页;第4版第618页)和这句话比较一下。这里仍然不是逐字逐句地复述预算演说的原文,而是同“兑换论”的完全一样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拚凑起来的混合物。在这里他也仍然没有注明它是引文的出处,而是直接注明1864年4月7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说。下面更进一步说:“英国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以下是前面引用过的莫里哀的四行诗)

显然,马克思不仅从这本书中借用了莫里哀的文句,而且还借用了“兑换论”的作者所臆想出来的“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b)如在说明这次转载的序言中已经指出的,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上,又给照旧错误地引用的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加上了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这样一个引文出处。这篇演说的有争论的地方已经根据“汉萨德”的速记记录转载在前面第8—9页上。虽然在第13页上已经同意思完全一致的“汉萨德”和只是为了便于报纸刊载而变得比较扼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作了对比,我们在这里还是把“泰晤士报”的报道、恩格斯提到的“晨星报”的报道和一字不差地录自马克思著作的引文再作一次对比:

‘泰晤士报’和“资本论”的引文的译文,见本卷第190—191页和第157—158页。“晨星报”的引文和“泰晤士报”引文大致相同。——编者注

1863年4月17日
“泰晤士报”

《In ten years, from 1842 to 1852 inclusive,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s nearly as we can make out,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but in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th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gain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by 20 per cent. That is a fact so strange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1863年4月17日
“晨星报”

《I must say, for one, I should look with apprehension and with pain up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资本论”第1版
第639页注103

《From 1842 to 1852 the taxable income of the country

increased by 6 per cent. In the eight years from 1853 to 1861, it had increased from the basis taken in 1853, 20 per cent! The fact is so astonishing as to be almost incredible...

...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the condition of the
 The augmenta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
 I have described , and The augmentation is an
 which is founded , I augmentation entirely
 think upon accurate re- confined to classes of
 turns ,is an aug-menta- property .But that aug-
 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mentation must be of
 classes of property . indirect bene-fit to the
 Now ,the augmentation of labouring population ,
 a capitalis of indirect bene- must be of indirect ben-
 fit to the labourer ,because efit to the labouring
 it cheapens the population , because it
 commodity which in the cheapens the com-modi-
 business of production tities of general con-
 comes into direct com- sumption .So that we
 petition with labour . have this pro-found ,
 (Hear , hear .) But we and I almost say ,ines-
 have this profound , timable consolation
 and ,I must say ,inesti- richer , the poor have
 mable consolation , that been growing less poor !
 while the rich have At any rate , whether
 been growing richer the the ex tremes of pover-
 poor have been growing ty are less , I do
 less poor . Whether the not presume to
 extremes of poverty are say) .
 less extreme than they
 were I do not presume
 to say ,but the averag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 we
 have the happiness to know ,

如上面那段转载的话所表明的,“兑换论”在这里,从句子的中间把引文截断,而加入了莫里哀的文句;马克思,如前面的对比所表明的,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从“晨星报”引的引文,而是用一些圆点表明了

<p>has improved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a degree which we know to be extraordinary ,and which we may almost pronounce to be unexampled in the history of any country and of any age (Cheers .)》</p>	<p>被他删去的一个地方之后 ,一字不差地从“兑换论”引来了这句引文 ,迫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p>
---	--

从上面的对比中清楚地看出 ,马克思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作为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混合物 ,无论在“晨星报”上、“泰晤士报”上、或“汉萨德”中都没有 ,而只有在“兑换论”里才可能找到它。上面引述的加了着重号的句子 ,正是亨利·罗伊 ,特别是卡尔·马克思——请比较最后一句话——删去的句子 ,其目的是把同格莱斯顿实际上所说的话相反的东西强加给他。

第15号 1863年4月17日伦敦报纸上的 议会报道摘录

“先驱晨报”。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at this intoxicating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were of opinion that it i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poorer classes .

“晨邮报”。I may say , I for one ,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when I consider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believed that its benefit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 This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augmentation of wealth of the poorer classes .

“每日电讯”。I may say for one ,that I should look almost with apprehension and alarm on this intoxicating augment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f it were my belief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m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 . This question to wealth takes no cognizance at all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 The augmentation stated is an augmentation 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possessed of property .

“每日新闻”。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when I consider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believed that its benefit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 This augmentation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and which is founded upon accurate returns ,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augmentation of wealth of the poorer classes .

“旗帜报”。I may say that I for one would look with fear and apprehension at this intoxicating increase of wealth if I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lasses in easy circumstances . This great increase of wealth which I have described , and which is founded on the accurate returns is confined entirely to the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poorer classes .

第16号 格莱斯顿——布伦坦诺

1890年12月4日“德国周报”186第49期

简 讯

路约·布伦坦诺在“德国周报”第45期上发表了“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一文，这篇文章同时被用来作为转载这次论战材料的小册子的序言。这次论战的主要题目是格莱斯顿在1863年发表的一篇议会演说，这篇演说被马克思在他的建立国际工人组织时发表的成立宣言中歪曲地引用。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伦坦诺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11月22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11月28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因此,这一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的论证方法的特点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最终解决了,而这个解决对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不利的。

揭露骗局是布伦坦诺的功劳,而这时重新提起这一争论是特别合乎时宜的。

O A .

第17号 恩格斯对第16号的答复

1891年“新时代”第13期第425页

关于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问题¹⁸⁷

我在给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不能不谈到路约·布伦坦诺先生曾经对马克思发动的一场匿名的攻击——他控告马克思似乎从格莱斯顿的一篇演说中捏造了引文。

对此,布伦坦诺在他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路约·布伦坦诺著,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书店,1890年——中作了答复。我即将对他的答复作出答复。

可是在1890年12月4日出版的“德国周报”第49期上又刊登了一篇有关此事的短评,其中说道: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伦坦诺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11月22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11月28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

这应该是指什么呢？什么地方“您完全正确”？什么地方“马克思绝对错误”？对什么东西“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呢？如果像这里所写的那样，这可以说是什么都指，也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指。为什么布伦坦诺先生只提到这样短短的两句话呢？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不准他把整封信刊登出来。那末这就充分证明，这两句话什么也没有证明。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一开始写这两封信时就准备发表，并且允许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斟酌如何加以利用。那末只发表这两句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的摘出来的话就恰巧证明，格莱斯顿的话整个说来对布伦坦诺先生没有好处，因而他把它“炮制”成了上面那样。

为了了解上面摘引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不仅应该看到格莱斯顿先生的两封信，而且还应该看到布伦坦诺先生的相应的信。在用原文发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通信以前，上面的摘录对于解决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价值还抵不上刊登它们的纸张。

弗·恩格斯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 法国工人的贺信

3月17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们：

正好二十年以前，巴黎工人像一个人一样起来反击受梯也尔领导的资产者和地主们的罪恶侵犯。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看到巴黎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武装和组织起来，就吓得浑身发抖。梯也尔企图夺取巴黎工人曾经如此光荣地用来抵御了外敌侵犯，后来还要更加光荣地用来迎击凡尔赛雇佣军进攻的武器。为了摧毁起义的巴黎，地主和资产者们向普鲁士人乞求援助，并且得到了这种援助。巴黎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被敌人的优势压垮和解除了武装。

巴黎工人已经二十年没有掌握武器了，到处的情况都是如此；在一切文明的大国中，无产阶级都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工人阶级的敌人和剥削者到处都握有全部武装力量。

但是，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在每一个健康的男子都在经历军队生活的今天，这种军队开始愈来愈多地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思想；作为主要的压迫工具的这种军队，日益变得不可靠了。各强国的首脑已经胆战心惊地预见到，终有一天掌握武器的士兵会拒绝杀害自己的父老兄弟。当

东京佬 敢于觊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位的时候 ,我们在巴黎看到了这种情况 ;现在我们在柏林看到这种情况 :在那里 ,俾斯麦的继承人 要求帝国国会拨发经费 ,以便借助用金钱收买了的军士来巩固军队中的服从精神 ,而且为此提出的理由是 ,在军士中出现的社会主义者太多了 !188

既然发生了这类情况 ,既然军队中也出现了曙光 ,那就意味着旧世界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让必不可免的事情发生吧 !让走向没落的资产阶级离开政权或者死亡吧 !无产阶级万岁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

弗·恩格斯

载于1891年3月25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27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一书导言¹⁸⁹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对于我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就最重要的几点简略地谈一下。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就普法战争发表的两篇较短的宣言。第一，因为“内战”引证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若不同第一篇宣言参照，又不是完全能明白的。其次，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卓越地表明作者已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¹⁹⁰。里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不得不忍受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的后果。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¹⁹¹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二十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¹⁹²，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

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即“种族战争，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¹⁹³，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二十年内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斯”跟前匍匐跪拜时所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间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1500万或2000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躏；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连军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光辉地证明了1870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预见性而大半已为人们所忘却的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众寡不敌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由于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巴黎在最近五十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每次都依巴黎工人的发展程度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含意不明，甚至混乱不清；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很不明确，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属于议会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可能使他们的政党获得统治的选举改革。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让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可是，在这些阶层后面站有革命的工人，他们从1830年起已经得到了比资产者以至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开始了巷战；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共和国，而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股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件事也就发生了，他们以直接违背诺

言、公开嘲弄和企图把失业工人流放到边远省份去而迫使工人举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政府预先为自己保证了压倒的优势力量。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了。接着就开始了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其残忍程度是从那招致了罗马共和国复灭的内战以来所未曾见过的。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是当时不能，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命脉，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等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炸毁了。这样就开始了第二帝国，即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又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先前路易·菲力浦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下，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但他的统治同时又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为，它们以皇帝宫廷作为中心，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又是号召崇尚法兰西沙文主义，即要求归还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或者至少归还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时君主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1815年更被削小了的疆界内的状态，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由此就需要不时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但是，无论向什么地方扩张疆土，都不如靠占领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那样厉害地激起法国沙文主义者的幻想。莱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更贵重得多。只要第二帝国还存在，要求归还——一下子归还或是分次归还——莱茵河左岸地区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这个时间也就随着1866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期待“领土报酬”时既然受了俾斯麦的欺骗以及他自己的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欺骗，也就除战争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而这个战争就在1870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推上了威廉堡。¹⁹⁴

必然的后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了。但是敌人已站立在门前；帝国的军队有的被围困于麦茨，没有解围的希望，有的在德国当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因为此时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防御目的编入了国民自卫军和武装起来，以致工人此时在国民自卫军中占有绝大多数，人们就更欣然地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过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月31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叛变，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得到了释放；同时，为了避免在

受敌军围困的城里爆发内战，原有的政府仍被允许继续执政。

最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它是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大炮卸下了，基干团和流动自卫军交出了武器，被宣布为战俘。但是，国民自卫军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订立了停战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处于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时期，巴黎工人只是要求坚决继续进行斗争。可是现在，在巴黎投降后已经缔结了和约¹⁹⁵的时候，新政府的首脑梯也尔不得不确信，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境地。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基干部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时期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以前执行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颁布法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之后，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

和常备军，宣布由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取消了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4月的一切房租，规定把已经付出的房金转作以后的预付房金，并且制止拍卖城市当铺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¹⁹⁶。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4800马克）。次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¹⁹⁷，这道命令随即逐步实行起来。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毙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拘禁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一三七营拖出了断头机，并在全民欢呼下把它当众烧毁了。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5月16日，这项决议执行了。4月16日，公社命令登记工厂主停工的工厂，拟定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开工生产的计划，并拟定把这一切合作社结成一个联盟的计划。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取消了工作介绍所，因为这些工作介绍所从第二帝国时起已由警察局指派的头等劳工剥削者们独占了；这些工作介绍所都交由巴黎二十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这些当铺是专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并与工人获取劳动工具和信用借款的权利相抵触的。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对凡尔赛政府的数量日益增多的军队进行斗争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去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的进攻被埃德将军所击退，并且蒙受了极大的损失。那些曾经斥责普军炮击巴黎是亵渎神圣的人们，现在自己不断地炮击巴黎。这些人现在已在乞求普鲁士政府尽速遣返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法国士兵，以便为他们夺取巴黎。由于这些军队逐渐开到，凡尔赛的兵力在5月初获得了决定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梯也尔在这一天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这个谈判的内容是以扣留在巴黎的人质巴黎大主教及其他许多神甫交换当时囚禁在克勒伏的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布朗基一人。这种情况在梯也尔改变说话口气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很慎重和很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粗暴和带有威胁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在5月3日

占据了木兰-萨克多面堡，9日占据了伊西堡垒，它被炮火完全轰平，14日占据了旺夫堡垒。在西线，他们占据了一直延伸到城墙跟前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逐步推进到了要塞主墙近旁；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变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闯进了城内。控制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人，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去的地区，从而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这条战线是巴黎人根据停战协定应该认为有保证不受侵犯，因而防御得很弱的。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最繁华的市区的抵抗比较弱；侵入的敌军的斗争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伯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的高地上阵亡，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的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是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干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贝尔-拉雪兹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批的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毙，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围困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令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造感比对上司命令更加听从时，往往装作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二十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必须做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在本质上无益而且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工人的自由,又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它的缺

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制则是有益的经济力量。工人的联合只适用于特殊场合，而据蒲鲁东说，这种特殊场合就是大工业和大企业，例如铁路（参看“革命的总观念”第3篇¹⁹⁸）。

但是，在1871年，大工业甚至在手工艺品生产中心的巴黎，也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所以公社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要组织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这种组织不但应该在每一个工厂内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这一切联合体结成一个大的联盟；简言之，这种组织，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这里在“可能派”中间也像在“马克思主义派”中间一样，完全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统治着。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他们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大多数正是由这些布朗基主义者构成的公社，在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它在向法国各省人民发表的一切宣言中，号召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做

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权力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

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

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

二十周年纪念日子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法兰西内战”

* 关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一书的西班牙文版
(给霍赛·梅萨的信)¹⁹⁹

1891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梅萨：

从您3月2日的来信中得知您翻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译本即将出版,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不用说,我们是热烈赞同这一版本出版的,因为它对社会主义在西班牙的发展无疑会产生极其有利的影响。

被马克思的书彻底打垮了的蒲鲁东理论,毫无疑问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但它仍然是西欧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冒牌社会主义者从中取得麻痹工人的空洞词句的一个巨大宝库。而既然西欧各国的工人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同样的一套蒲鲁东的空洞词句,那末,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那里激进派的那套娓娓动听的空话就还能引起反响。法国的情形就是如此,那里残存的唯一的蒲鲁东派,就是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或共和派。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在你们那里,在你们的议会里和你们的报刊上也有这类共和派,他们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只是因为他们看到蒲鲁东的思想是一种十分合适的手段,以使用资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来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意志的正确

而扼要的表现。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译成西班牙文载于1891年在
马德里出版的卡·马克思“哲
学的贫困”一书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
版，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 劳动权利国际群众 大会的委员会²⁰⁰

亲爱的公民们：

万分遗憾，我不能够应你们这样盛情的、对我说来这样荣幸的邀请来参加你们在4月12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二十年以前，我曾经担任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的职务²⁰¹，我觉得同你们的国家有特别亲切的关系，因此，我就更感到遗憾。这个国际从那时以来在正式的形式上是不再存在了；但是在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感情上，它是始终存在着的；现在，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生命力，更加强大了；它现在是这样强大，以致1864—1875年的旧的正式形式，对于团结在战斗的无产阶级红旗下的千百万欧美工人说来，已显得太狭窄了。我同你们一道，希望你们4月12日的群众大会将把新的战士队伍引导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军中来；希望群众大会将对巩固意大利工人同他们的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兄弟们——法国人、德国人和斯拉夫人的团结关系作强有力的推动；最后，希望群众大会将在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开创一个新的阶段。

二十年来，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要做许多工

作,才能指望取得迅速的和牢靠的胜利。Dunque ,avanti ,sempre avanti !〔因此,要前进,永远前进!〕

弗·恩·

1891年4月9日于伦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1891年单行本导言²⁰²

这部著作最初问世是在1849年,从4月4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它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²⁰³做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在报纸上没有载完;虽然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个诺言并未执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勒斯顿、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巴登等地发生起义²⁰⁴——使报纸本身被查封了(1849年5月19日)。这部著作的续稿,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始终没有发现。²⁰⁵

“雇佣劳动与资本”印成小册子已出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于1884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印书馆”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准确地按最初的原文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销数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在我面前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呢?

在四十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

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当然,在供一般读者阅读和普通版本中,作者的这种比较早期的,即代表着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并且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在刊印这种版本时,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

但是,当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作用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较晚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做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那样。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再版以前,这已经够了。

我所做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于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上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结论也很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于

工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十分明显的谬误和混乱。

政治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被它称作“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它们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极端复杂的情况的影响,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自己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变动及其时涨时落的摇摆中,它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摇摆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结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样的解释,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认为满足了。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使该商品具有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数量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简单地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末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²⁰⁶。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所做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末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末我们就绝对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他们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遗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费用。而这种生产费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条件下,在这里,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工作以挣得工资,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保持和繁殖起来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现在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是

平均每天三马克。

这样,我们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天三马克的工资。资本家就借此迫使他一天工作——譬如说——十二小时。在这当中,资本家大致是这样打算盘的:

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是一个钳工,他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铁和铜——值二十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旋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损耗,按一天时间和按一个工人计算,值一马克。一天的工资,照我们的假定是三马克。总共算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费二十四马克。但是资本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二十七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消耗的生产费用多三马克。

资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三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二十七马克——就一定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二十七马克当中,有二十一马克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二十马克包含在原料中,一马克包含在工作期间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被相应地减少了工作效能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六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些经济学家自己的假定,这六马克只能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十二小时的劳动创造了六马克的新价值。因此,他的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六马克,这样我们就会终于发现什么是“劳动

的价值”了。

“等一等！”——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说，——“六马克吗？但是我
只拿到三马克呀！我的资本家向天发誓说，我的十二小时劳动的
价值只等于三马克，假使我向他要六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前面在谈到劳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在一个
圈子里走不出去，那末现在我们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
之中。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
对于工人说来，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是三马克；对于资本家说来
却是六马克，资本家从这六马克中拿出三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
人，而其余三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
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假使我们把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那末这个矛
盾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在十二小时劳动时间内创造了六马克的新
价值。这就是说，在六小时内创造的是三马克，即工人劳动十二小
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十二小时，而他当作等价物得到
的却是六小时劳动的产品。总之：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
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十二等于六！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谬
的。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
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
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
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经济学家所看作“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

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能被工人出卖了。”²⁰⁷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计日工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一致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²⁰⁸。

那末，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后，就是说为了获得预先讲定的工资——计日或计件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资本家把这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场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经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辅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的日工资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三马克，——至于他是计日还是计件获得这笔工资，那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原料上增加了六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资本家在出卖成品的时候实现的。从这六马克中，他付给工人三马克，剩下的三马克

则留给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里生产六马克的价值,那末在六小时里他所创造的就是三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资本家工作了六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三马克等量价值偿还给资本家了。在六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钱。

“等一等!”——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十二小时。六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六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六小时的劳动产品,应该去工作整整十二小时。

计件工资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在十二小时内制成了十二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共计二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两个半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设的同样条件下,资本家只付给工人每件商品二十五分尼。十二件就是三马克;要得到这三马克,工人必须工作十二小时。资本家从十二件商品上得到三十马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损耗共二十四马克外,还剩下六马克,从这六马克中,他拿出三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把其余三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为自己工作六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资而工作六小时(在十二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资本家工作六小时。

那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用“劳动力”价值来作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问题是,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一种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

——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一种能产生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一部分时间却在延长。

这就是全部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现，是我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那些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预付资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那些所有者。所以，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资本家阶级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只须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随着每一项新的发明和发现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计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缩减。

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每天空前大量增长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终于造成一种定会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

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愈加荒谬和愈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的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至于工人们正日益充满决心地争取这个新的社会制度,那在大洋两岸都将由明天的5月1日和5月3日的星期日²⁰⁹来证明。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于伦敦

载于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雇佣劳动与资本”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第四版序言²¹⁰

我曾经预料,这一著作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一万册,而且这是在已经升天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统治下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证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4年日内瓦版;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一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6年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年海牙版。²¹¹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中关于圣西门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门过去谈得

在原文中这一书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的确太少 ;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的地方关于当时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²¹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载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 (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书德文第四版序言²¹³

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出版者早就请我准备新版。更紧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作这件事。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加之这次增订本的排印预定要铸成铅版,这将使我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作进一步的修改。

因此,我仔细地把全文重新校阅了一遍,并作了许多补充,我希望在这些补充中充分地估计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其次,在这篇序言里,我将把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简短的评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原始历史学派,仍然竭力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但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

约·狄茨。——编者注

在“新时代”刊载的文本里,这一句的末尾在“加之”后面是:“新版将大量印行,这在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现在已是常见的事,不过对于德国出版社来说仍然还是极其罕见的”。——编者注

掠为己有。而在其他国家,也间或有人非常热衷于仿效英国的这一榜样。

我的这本书已被译成了各种外文。最先译成意大利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阅,1885年贝内万托版。后来译成罗马尼亚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昂·纳杰日杰译,载于1885年9月至1886年5月在雅西出版的“现代人”杂志。以后又译成丹麦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格尔桑·特利尔1888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利·腊韦从德文本版译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²¹⁴

* * *

在六十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得更为详尽的这种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似乎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诚然,除个体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并不能按历史的顺序排列起来,它们彼此并立而没有任何相互的联系。至于说在古代的个别民族中间,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干蒙昧人中间,世系不是依父亲而是依母亲来算,因此,女系被认为唯一有效;在今天的许多民族中间,在相当大的集团(那时还没有被详细的研究过)内部禁止通婚,而且这种习俗,在世界各大洲都可见到,——这种种事实诚然已经是众所周知,而且这样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一天更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们,甚至在爱·伯·泰罗所著的“人类原始历

史的研究”(1865年)一书²¹⁵中,也还是把这些事实简单地看做“奇怪习俗”,而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宗教上的可笑琐事相提并论。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²¹⁶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1)最初在人们之间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词“杂婚”来表示;(2)这种关系排除了确切认知父亲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世系只能依女系——母权制——来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3)因此,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霍芬的意见,这种尊敬和威望竟达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Gynaikokratie)的程度;(4)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实际上就是侵犯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在一定时期内献身于他人来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巴霍芬认为他非常认真地从古代经典著作中搜集来的许多段落,可以作为这些论点的证据。由“杂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据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希腊人中间——是由于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侵入体现旧观念的传统神;因此,旧神就越来越被新神排挤到后边去了。所以,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点,巴霍芬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克丽达妮斯

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维护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为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曾通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裁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列斯特，雅典娜听取了双方的申诉。整个争论点集中地表现在奥列斯特与依理逆司神的辩论中。奥列斯特的理由是：克丽达妮斯特拉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他的父亲，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多的她呢？回答是令人吃惊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²¹⁷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男人，即使他是杀死他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也是可以赎罪的，此事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的；她们的职务只是追究血缘亲属中间的杀害案件，在这里，按照母权制，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但是，阿波罗却出来做奥列斯特的辩护人；于是雅典娜就把问题提交阿雷奥帕格的法官们——雅典娜的陪审员们——投票表决；主张宣告无罪与主张有罪的票数相等；这时，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幼辈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战胜了依理逆司神，后者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秩序服务了。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全书中最精彩最好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像

当年的埃斯库罗斯一样地相信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奇迹：推翻了母权制，代之以父权制。显然，这种认为宗教具有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作用的观点，归根结蒂会成为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细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远非始终有益的事情。不过，这并不贬低他作为一个开辟新途径的研究者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状态的空谈，而提出古代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洲的许多民族中间，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要获得个体婚的权利，必须以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别的男子作为代价；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确定，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亲的身分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那时以来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这本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现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湮没无闻。1865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

反。在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幻想,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字斟句酌的辩词。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末这种“抢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足够地找到妻子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些集团(在1865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做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做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尖锐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实,即这种对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以至一切场合,那末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像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说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从别的部落娶妻,而这在与蒙昧时期相适应的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的状态下,只有用抢劫的办法才能做到。

麦克伦南接着问道:这种外婚制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血缘亲属关系的观念和血亲婚配的观念与这毫不相干,因为这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广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后立即杀死的习俗,则可能有关系。这种习俗使各个部落内发生男子

过剩,其直接后果便必然是几个男子共有—个妻子——即—妻多夫制。由此又造成: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因此,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来算,这就是母权制。部落内部妇女缺少——这缺少虽然由—妻多夫制所缓和,但并未消除——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抢劫别的部落里的妇女。

“外婚制与—妻多夫制既是起于同一原因——两性数目的不等,那末我们就应当认为,一切外婚制的种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因此,我们应当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外婚制的种族中间,最初的亲属制度乃是仅由母亲方面来认知血缘关系的制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年版。“原始婚姻”,第124页)²¹⁸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不了解这种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他们都是麦克伦南材料的来源)的更早的个别记载,累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嘉人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年版)²¹⁹,并指出,这种制度曾普遍流行,在世界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还在1847年在他的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上)中,以及1851年在“易洛魁联盟”一书中²²⁰也证明了在这个部落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点上,像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

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到“只依女系算的亲属关系”(kinship through females only),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来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按女系来算,但亲属关系也从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的一种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术语,就继续一成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麦克伦南的理论,虽然好像合理,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看来,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据。至少他本人注意到

“这样一件显著的事实,即假装的抢劫妇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亲属关系即依男系算的世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明显”(见“古代史研究”,第140页)。

而且,他又说:

“奇怪的是,据我们所知,在外婚制与最古的亲属关系形式并存的地方,从来没有杀婴的习俗。”(同上第146页)

这两件事是和他的说明方法显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更加混乱的假说来对抗它们。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广泛的响应:在英国大家都认为麦克伦南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方面的第一个权威。他那把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对立起来的理论,虽然人们也认为有个别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成了眼罩,使得这一方面的任何不抱成见的观察、从而任何坚决的前进步骤都成为不可能了。鉴于在英国,而且别国也仿效英国普遍对麦克伦南的功绩估价过高,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他那纯粹出于误解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

立理论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

而不久便开始出现愈来愈多的,无法装进他的理论的纤巧框框中去的事实。麦克伦南只知道三种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个体婚制。但是一当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了愈来愈多的证据,证明在不发达的各民族中间,存在过几个男子共同占有几个女子的婚姻形式;并且拉伯克(“文明的起源”1870年版²²¹)认定这种群婚(Communal marriage)是历史的事实。

紧接着,在1871年,摩尔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说来都是决定性的材料。他确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特殊的亲属制度,乃是美国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于整个大陆,虽然它是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实际产生的亲属等级直接矛盾的。他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他自己所拟定的问题和表格,搜集了有关其他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材料,他从答案中发现:(1)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也流行于亚洲的许多部落,并且以略加改变的形式,流行于非洲及澳洲的许多部落。(2)这种制度,在夏威夷及其他澳洲岛屿上正处于消亡阶段的群婚形式中,找到了完全的说明。(3)但是,除了这种婚姻形式,在这些岛屿上还还存在一种只有用更古老而如今业已消灭的群婚形式才能说明的亲属制度。他把所搜得的材料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同发表在他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版)一书²²²中,因而把争论转移到更无比广大的领域里来了。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它相应的家庭形式,于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窥探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如果这个方法得到胜利,麦克伦南的精心设计的理论就要烟消云散了。

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的新版(“古代史研究”1876年版)中起

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他自己只根据假说来完全人为地编造出一套家庭史,却要求拉伯克和摩尔根不仅要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提出证据,而且要提出只有在苏格兰法庭上才会要求的那种不可争辩的证据。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同一个人,却根据德意志人中一个人的舅父和他的外甥之间有密切关系(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0章),根据凯撒关于不列吞人每十个或十二个男子有共同的妻子的记述,根据古代著作家关于野蛮人共妻的其他一切记述,毫不犹豫地作出结论说,所有这些民族都盛行过一妻多夫制,这就好像在听这样一位检察官讲话,他在起诉时可以信口开河,但是却要求辩护人每句话都要有最严格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他断言群婚是纯粹的虚构,这样,他便比巴霍芬落后了许多。根据他的意见,摩尔根所说的亲属制度,乃是纯粹的社交礼仪的规则,并拿印第安人把异族人、白种人也称呼为父亲或兄弟这一事实作为证明。这正如某人因为人们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长也称为父亲和母亲,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济会会员和英国同业公会会员在庄严的集会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称,就硬说父母、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根本毫无意义的称呼一样。总之,麦克伦南的辩护是极端软弱无力的。

不过他还有一点没有遭到反驳。他的全部体系所依据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不仅没有被动摇,而且甚至被公认为全部家庭史的基石。人们承认,麦克伦南试图给这个对立所做的解释是不够有力的,而且跟他自己所举出的一些事实是相矛盾的。不过这一对立本身,即存在着两种相互排斥的独立自主的部落,其中一种是在本部落以内娶妻,而另一种则绝对禁止这样做,却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请参看例如吉罗·特龙的“家庭的起

源”(1874年版),甚至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1882年第4版)²²³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²²⁴(本书即以这部著作作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康尔根在1871年仅仅模糊地猜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加以发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极可能一度到处盛行过,——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末包括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以此为限。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使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最初形式。希腊的及罗马的氏族,以前一向是所有历史学家之谜,如今可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这个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给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

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所承认，或者更确切些说，所剽窃了。但是我们在他们之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肯公开承认这一观点上的革命正应归功于康尔根。在英国，人们尽可能地对他的这一著作完全保持沉默，而对他本人则只是以宽大地称赞他以前的著作来敷衍了事；对于他的记述中的个别细节尽力吹毛求疵，而对于他的真正伟大的发现却闭口不提。“古代社会”的第一版已经脱销，在美国，这类书没有应有的销路；在英国，这本书显然受到千方百计的抵制，这本划时代的著作的唯一还在出售的版本，就是德文译本。

这种冷漠态度很难不令人想到是一种共同蓄意采取的沉默抵制行为，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那些公认的原始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充满了仅仅是出于客气而作的许多引证，以及其他对同行表示尊敬的证据，就更要使人这样想，——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因为摩尔根是个美国人，而对于英国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极其难堪的是，他们尽管在热心地搜集材料方面值得高度赞扬，但是在整理与分析这种材料所必要的一般观点方面，一句话，在他们的思想方面，却不得求助于两个天才的外国人——巴霍芬和摩尔根呢？要是德国人的知，他们还可以容忍，但是对一个美国人怎能容忍呢？在美国人面前，每个英国人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我在美国看到了许多可笑的例子。²²⁵何况麦克伦南可以说是官方任命的英国原始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在原始历史学

领域内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只能以莫大的敬意谈论他那从杀婴经过一妻多夫制、抢劫婚姻到母权制家庭的人工编造的历史理论;对于绝对相互排斥的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落”的存在稍有怀疑,便被视为放肆的邪说;这样,把所有这些神圣教条打得粉碎的摩尔根,就是犯了某种渎圣罪。加之,摩尔根用以打破这些教条的,又是这样一些一经说出来便立即为人人所明白的论据;因此,一直无法摆脱外婚制与内婚制之间的矛盾麦克伦南的崇拜者,现在简直要敲着自己的脑门大叫起来:我们为什么竟这样愚蠢,自己没有老早把它发现出来呢!

如果说即使这些罪过还不足以使官方学派冷淡地把摩尔根撇在一边,那末他还有一个太过分的地方,就是他不仅像傅立叶那样地对文明,对商品生产社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批评,而且还用了只有卡尔·马克思才能用的字眼来谈论这一社会的未来的改造。所以,摩尔根得到了应得的惩罚,麦克伦南忿然地责难他“根本仇视历史方法”²²⁶,而且日内瓦的教授吉罗·特龙先生在1884年也重申了这一点。可是要知道,这位吉罗·特龙先生在1874年(“家庭的起源”)还是束手无策地徘徊于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宮中,全仗摩尔根才被救了出来!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间,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历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

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愈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愈将获得大家的公认。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6月16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41期和189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根据“新时代”杂志校对过

我于1888年9月从纽约返欧途中,遇到一位前罗彻斯特选区的国会议员,他认识摩尔根,可惜,关于摩尔根的事他能给我述说的并不多。摩尔根以个人的身分住在罗彻斯特,仅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兄弟是个上校,在华盛顿陆军部供职;靠这位兄弟的帮助,摩尔根得以使政府对他的研究感到兴趣,并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几种著作;据我的交谈者自己说,他在任国会议员的期间,也曾多次帮过摩尔根的忙。

给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的贺信²²⁷

1891年6月26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最真诚的感谢；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前来参加；我谨在此表示我最好的祝愿，祝代表大会工作顺利。

自从奥地利的工人政党在加因斐²²⁸重新站稳脚跟以来，你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你们这次代表大会将成为取得新的更大胜利的起点的最好保证。

我们党具有多么不可摧毁的内在力量，它用来证明这点的，不仅是它迅速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不仅是它今年在奥地利就像去年在德国那样彻底结束了非常状态²²⁹。它用来证明它的这种力量的，尤其还有这样一点，即它在所有国家内都在克服所有从有产阶级中补充自己队伍的其他政党所无法应付的困难，完成它们所无能为力的事业。当法国和德国的有产阶级彼此怀恨在心，相互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敌意时，法国和德国的无产者却手携手地一致行动。而在你们奥地利，当各个省的有产阶级由于盲目的民族仇恨而丧失最后一点点统治能力时，你们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将向它

们显示出一个没有任何民族纠纷的奥地利的面貌,一个工人的奥地利的面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91年7月3日“工人报”第27号和
1891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册子“1891年6
月28、29和3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
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根
据小册子校对过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 草案批判²³⁰

写于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1901—1902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没有附件);并用俄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一 绪论部分(十段)

现在这个草案²³¹大大优于以前的纲领²³²。陈腐传统(无论是道地拉萨尔派的还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的浓厚残渣,基本上已被清除;草案在理论方面整个说来是立足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因而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讨论。

草案分为三个部分:一、绪论部分,二、政治要求,三、保护工人权利的要求。

一 绪论部分(十段)

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企图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罗里罗嗦、拖泥带水。在我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也是无妨的。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这样,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不要为了通俗而做太多的牺牲,不要把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计过低。比最简洁最扼要的纲领还难得多的东西,他们也理解了;而且,如果说非常法时期使得给新

参加进来的群众以充分的教育这一工作难于进行,而且在有些地方甚至不可能进行,那末现在,当我们的宣传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阅读的时候,这在老的骨干的指导下是会很快得到弥补的。

我想尝试把整个这一部分写得扼要一些,如果能做到的话,我预备随函附上,或者以后另寄。现在我把第一段到第十段依次谈一下。

第一段。……“矿山、矿井、矿场”……“的分离”——这里的三个词都是说一回事;其中两个应该删掉。我以为可以保留矿山[Bergwerke],用这个最惯用的词来表达一切,因为在我国,即使它们是在最平坦的平原地区,也是这样称呼的。但我认为还要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手段”。

第二段。我认为在这里要插进:“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下面同样要插进:“……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或占据者)的依附”等等。

关于这些老爷们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个人财产”据为己有这一点,在第一段中已经说过了,只是因为一定要把“垄断者”这个词用进来,才在这里又重复一遍。不管用哪一个词,都不会使意思有任何增加。而在纲领中是多余的东西,会削弱纲领。

“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资料”

——这总是指那些恰好存在的劳动资料。在蒸汽机出现以前,没有蒸汽机也行,但现在没有它就不行了。在今天,一切劳动资料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或者根据它们的构造,或者通过社会分工——是社会的劳动资料,因此这几个字就充分表达了目前存在的东西,而且表达得很正确,不致引起任何误解。

弗·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手稿的开头部分

如果这段末尾是仿照国际章程的结论部分写的,那我认为不如完全照着它写,即:“社会贫困(这是第一)、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²³³体质衰退已包含在社会贫困中,政治依附是一个事实,而政治的无权利不过是具有相对正确性的演说词句,这类东西是不应写进纲领中去的。

第三段。我认为头一句必须修改。

“在个人所有者的统治下。”

第一,下面接着谈的是一个经济事实,也就应当从经济上去加以说明。但“个人所有者的统治”这个说法则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所说的情况是由这一伙强盗的政治统治造成的。第二,属于这种个人所有者之列的,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写在这后面的“资产者”是指什么呢?它是第三类个人所有者吗?大土地占有者也是“资产者”吗?既然谈到了大土地占有者,那给我们德国整个肮脏腐败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特有的反动印记的强大的封建制度残余却可以不提吗?)。农民和小资产者也是“个人所有者”,至少今天还是;但是在整个纲领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因此在表述中应该使他们根本不包括在这里所说的个人所有者的范畴之内。

“劳动资料和被剥削者创造的财富的积累。”

“财富”是由(1)劳动资料、(2)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先讲财富的一个部分,接着不讲另一部分,却讲总的财富,并且用一个“和”字把两者连结起来,这是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的。

“……在资本家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

然而,上面所说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到哪里去了呢?如果这里只要举出资本家就够了,那末上面也只要提到资本家就

够了。如果要详细谈,单单举出资本家是完全不够的。

“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

这样绝对地说是错误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我以为要将这一点写进去。

第四段。

“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

这种演说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悲哀,要是我,就不会这样说,而只会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

结尾两句把同一件事说了两遍。我在第一部分附件中提了一个修改方案。

第五段。“原因”应该是“其原因”，这大概纯粹是笔误。

第六段。“矿山、矿井、矿场”，见上面关于第一段所谈的。“私人生产”，见上面所谈的。我认为应当这样说：“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创造出来，并且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我认为要像第一部分附件中所建设的 那样写。

第八段。“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简略说法，但是我认为，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不如用“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第九段。最后一句：“……放在……并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第十段。在“阶级统治”后面，少了“和阶级本身”几个字。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提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

最后一句：“在它的斗争中……能够”，我看不如删去。“能够改善一般人民（究竟是谁？）的状况……”，这句话不明确，可以包括一切：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行会和工商业经营自由，农业贷款，交换银行，强制种痘和禁止种痘，嗜酒和禁酒，等等。这句

话所要说的,前面的句子已经说过了,完全没有必要特别说明,我们在要求整体时,也就是指它的各个部分;我认为这样会把印象冲淡。如果是想用这个句子来转到个别的要求上面去,那末大致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主党力争一切足以使党接近于这个目标的要求”(“办法和设施”,因为重复,应该删掉)。或者,更好是直截了当地谈这里所牵涉的问题,即必须补上资产阶级所耽误了的工作;我就是按这个精神拟定了第一部分附件中的最后一句。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为下一部分所作的评论,以及论证我在那里所作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二 政治要求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得到更多的为达到主要政治目标的种种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却决不能达到。德意志帝国宪法,以交给人民及其代议机关的权利来衡量,不过是1850年普鲁士宪法的抄本,而1850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东西,根据这个宪法,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权利也没有,正如在宪制冲突时期所证明的,政府可以对它为所欲为。²³⁴帝国国会的权利同普鲁士议院的权力完全一样,所以,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帝国国会称作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鲁士和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²³⁵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

见本卷第280页。——编者注

平方寸的邦与邦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

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难道应该重演曾经在保护关税问题上发生的事情吗?当时有人把保护关税宣布为只与资产阶级有关而与工人毫不相干的问题,因此各人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投票,而现在有许多人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转而热中于保护关税主义的资产者相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诡辩,并且把最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²³⁶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可是这些微妙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知道,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都可以办到,而在意大利甚至到今天也可以办到。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

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国家制度的改造。一方面，小邦分立状态必须结束。——只要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保留权利²³⁷依然存在，而例如绍林吉亚的地图仍然呈现出目前这样一副可怜景象，你就试试看去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吧！另一方面，普鲁士必须停止存在，必须分解为几个自治省，以使道地的普鲁士主义不再压在德国头上。小邦分立状态和道地的普鲁士主义就是德国现在正受其钳制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中的一方始终必然是另一方的托辞和存在的理由。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前一点我们已经顺利克服，而且不会幼稚到又去采用它，第二点在我们这里就是联邦会议，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它，而且，一般说来，我们的“联邦制国家”已经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给予它以必要

的补充和改进。

因此,需要单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²³⁸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市镇的自治是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联邦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

以上所说的一切,只有不多的东西是应当写进纲领中去的。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许公开谈论这类东西的,——从而同时强调指出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费司法(这两项我们归根到底不是非要不可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事先进行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写进纲领中去,并且至少间接地可以作为对不能正面说出的事情的暗示的:

“省、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权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

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关于上面所谈到的几点,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纲领要求,我在这里比你们在当地较难于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还不太迟的时候能在党内加以讨论。

(1)“选举权和投票权”,以及“选举和投票”之间的区别,我是不清楚的。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那末无论如何也要说得更加明白些,或者在附于草案之后的说明中予以解释。

(2)“人民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这是针对什么而言呢?是针对所有的法律还是针对人民议机关的决议呢?这是应当加以补充的。

(5)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补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创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们的胡说。)

(6)关于“学校的世俗性”一条因此就失去意义了,它是属于前一段的。

(8)和(9)这里我希望你们注意这样一点:这两条要求对1 律师,2 医师,3 药剂师、牙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家化,后面还要求对工人的保险事业实行完全国家化。是否能把这一切都付托给卡普里维先生呢?而这又是否和前面所宣称的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一点相一致呢?

(10)这里,我认为要这样说:“为了支付国家、专区和市镇的一切靠征税支付的开支,征收累进的……税。取消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间接税、关税等。”其他都是多余的、使印象冲淡的解释或论证。

三 经济要求

关于第二点。结社权还需要防范国家的侵犯而予以保护,这在德国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厉害。

最后一句“为了调整”等等,应作为第四点加进去,并赋予相应的形式。关于这点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业主在劳动委员会里各占一半,那我们就受了大骗。这样,在许多年里,多数总是会在企业主方面,为此只要工人中有一个是害群之马就够了。如果没有谈妥在争论的时候两半分开来表示意见,那末,有一个企业主委员会和一个与它平行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会要好得多。

最后,我请你们再用法国的纲领²³⁹来对照一下。在那个纲领里,正好是在第三部分,有些东西似乎谈得更好些。西班牙的纲领²⁴⁰可惜因时间仓卒没有找到,它也有许多方面是很好的。

第一部分 附件

(1)删去“矿井、矿场”,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手段”。

(2)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政治依附的基础。

(3)在这种剥削制度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的积累在剥削者——资本家、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及其生活的无保障越来越增长,等等。

(4)把“私人”(生产)删去。……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所有者阶级已经丧失担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

(5)“其”原因。

(6)……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7)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扔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8).....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等等。

(9).....放在.....并从而把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10).....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不分出身等等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末句删去)。但是,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妨碍着它为人类的.....斗争。首先它必须为运动争得自由的场所,必须扫清大量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残余,一句话,就是必须完成德国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过于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应该把其他文明国家里已经由资产阶级亲手实现了的各种要求也写进自己的纲领中。

最后半句原来是:“不是依附于大剥削者,就是掉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就是说,不是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附属品”。后来被划掉,用铅笔改成:“除了站到.....别无其他选择”。——编者注
“和阶级本身”这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

(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²⁴¹

1891年9月2日于伦敦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我们有充分理由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表示满意。

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开除无政府主义者,是很好的:旧的国际以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以此开始。这简直是海牙代表大会²⁴²的决议在过了十九年之后又得到了认可。

向英国工联敞开大门这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一步骤证明:对局势的了解是何等的正确。而使工联受到“阶级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约束的表决结果表明,我们这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让步。

多梅拉·纽文胡斯事件表明,欧洲工人已经把高调盛行的时期完全抛在后面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是一个组成为“战斗”的政党、考虑“事实”的政党的阶级。而事实说明,形势越来越革命了。

欧洲局势

俄国已经发生饥荒,德国将在几个月后发生饥荒;其他国家的

受害程度要轻些,这是因为:1891年小麦歉收估计为1150万百升,黑麦歉收为8700万或1亿百升,而这后一种歉收主要涉及两个消费黑麦的国家——俄国和德国。

这种情况可以保证我们在1892年春季以前有一个和平的局面。俄国在那个时候以前不会有所行动;因此,只要巴黎或柏林不干出难以置信的蠢事,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沙皇政府是否经受得住这种危机,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彼得堡,叛逆分子太多了,他们会设法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来推翻醉鬼亚历山大三世,或者至少把他置于一个国民议会的监督之下;很可能,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将被迫采取主动来召集这样一个议会。俄国——即政府和年轻的资产阶级——曾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创建大规模的民族工业(见“新时代”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章²⁴³)。这种工业的发展立即就会中断,因为饥荒将夺去它的唯一销售市场——国内市场。沙皇将会看到,把俄国变为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自给自足的国家是意味着什么:他将面临因工业危机而加深的农业危机。

在德国,政府将下决心废除或暂时取消谷物税(照例将下得太迟)。这将引起帝国国会中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的分裂。大土地占有者、《ruraux》[“地主议员”、“乡下佬”]将不愿意再支持征收工业品税,他们将希望买到尽可能便宜的工业品。这样一来,在表决反社会党人法时所发生过的情景有可能再度重演: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本身将因在新条件下产生的利益对立而发生分

对1871年法国反动的国民议会中多数的轻蔑叫法,恩格斯用来称呼德国容克。——编者注

裂,对保护关税制的个别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任何建议都只会得到少数票的赞同;将来必定是或者退回到自由贸易制,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解散帝国国会,这将使旧的政党和旧的多数失去自己的阵地而形成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目前政府的新多数。这将意味着俾斯麦时期和国内政治停滞状态的真正的和彻底的结束——我这里不是指我们的党,而是指各种握有统治权的党;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将要开始,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人以及一部分主张自由贸易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将开始;政府和国内政治的稳定将遭到破坏;最后,运动、斗争、生活都将开始,一切成果将由我党获得;如果事态会这样发展的话,那末,在1898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

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谈到其他国家,因为这次农业危机对它们的影响没有这样厉害。而如果这次农业危机引起了我们已期待二十五年之久的英国的工业危机……那末等着瞧吧!

弗·恩格斯

载于1891年9月12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5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德国的社会主义

德国的社会主义²⁴⁴

主要部分写于1891年10月,德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写于1892年1月

载于1892年在利尔出版的“1892年工人党年鉴”(没有前言和结束语),并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9期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俄译文的主要部分译自“1892年工人党年鉴”,并根据“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校对过,俄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译自“新时代”杂志

下面是我应我们的巴黎朋友的请求用法文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一篇文章的译文。我认为，不论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还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我都有责任也用德文来发表这篇文章。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应该让德国的人们知道，可以多么坦率地同法国社会主义者讨论那种会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必然不得不参加战争，甚至是反对法国的战争的情况，这些法国人是多么没有一切资产阶级党派——从保皇派到激进派——所大加炫耀的沙文主义和复仇热。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有权直接从我这里知道，我对法国人说了他们些什么。

不言而喻，——而我再一次明确地声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而决不是以德国党的名义说话。这样的权利只属于这个党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代表和受托人。况且我由于自己五十年的活动而在国际运动中所取得的地位，不允许我作为这一或那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发表与其他党相对立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记住我是一个德国人，也不妨碍我为我们德国工人比所有其他工人先争得的那个地位而感到自豪。

—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险。

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1848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国民报”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²⁴⁵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

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的德译文中不是“同样地冒了生命的危险”，而是“都光荣地表现了他们的英雄气概”。——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纯粹的共和派的机关报”。——编者注

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 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联系。

实际上，纯粹的拉萨尔主义本身能不能满足那个创作了“宣言”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要求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主要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1848年“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²⁴⁶。接着，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衰落。“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愈来愈成为德国全体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派也不例外——的共同财富。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 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到拉萨尔派和他们的对手公开敌视的地步；而最尖锐的斗争——甚至使用棍棒——正好发生在斗争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争论点，双方在一切实质问题上的原则、论据、甚至斗争的手段都一致的时候。

而这又正好是在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在资产阶级议员 面前，这种沿袭下来的相互敌视显得非常可笑。情况已经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于是在1875年进行了合并²⁴⁷。从那时起，以前相互敌视的兄弟就永

在德译文中不是“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而是“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编者注

远构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家庭。如果说当时还有把他们拆散的一点儿可能，那末承蒙俾斯麦在1878年颁布了把德国社会主义置于非法地位的声名狼藉的非常法，使得这种可能被防止了。迫害像锤击一样袭击着他们所有的人，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彻底锤炼成了一个统一而一致的整体。现在，社会民主党用一只手出版拉萨尔全集的正式版本²⁴⁸，同时用另一只手在过去的拉萨尔派的帮助下把自己纲领中的道地的拉萨尔主义的最后痕迹根除掉。

是否需要详细地阐述那些标志着德国党的道路的一切变故、厮杀、失败和胜利呢？当1866年普选权向党敞开了帝国国会的大门时，党有两个议员和数十万选民；现在它有35个议员和150万选民，即比任何一个党在1890年选举中拥有的选民都多，经过十一年的非法处境和戒严状态，它的队伍扩大了三倍，而变成了德国最强大的党。1867年时，资产阶级议员还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党人同仁看做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异物；而现在，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也不得不把这些同仁看做是那代表未来的力量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击溃了俾斯麦，并在十一年的斗争后粉碎了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党如同滚滚洪流，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坝，淹没城市和乡村，直到最反动的万第，这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投给社会党人的票数：

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的议员”。——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万第”，而是“农村地区”。——编者注

1871年.....	101 927	1884年.....	549 990
1874年.....	351 670	1887年.....	763 128
1877年.....	493 447	1890年.....	1427 298

自从上次选举以来,政府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来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主义:它迫害工会,镇压罢工,它甚至在目前物价昂贵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使穷人吃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上涨的关税。所以,我们能够预期在1895年选举中至少得到250万张选票;而到1900年这个数字能增加到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中的350万至400万。好一个我们资产者的愉快的“世纪末”啊!

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立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1890年保守党人(两派合在一起)得了1377417张选票;民族自由党人得了177807张选票;进步党人(激进派)得了1159915张选票;天主教徒得了1342113张选票。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250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

但是,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在我们这里二十五岁才能成为选民,而二十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

在德译文中“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中”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进步党人(激进派)”,而是“德国自由思想派”。——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中央党”。——编者注

们这边 ,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 ,而到1900年 ,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 ,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 ,特别是现在 ,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 遗憾的是 ,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 ,虽然的确 ,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²⁴⁹的地位。相反 ,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来破坏合法性 ,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 ,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 ,以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哪 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 :“资产者老爷们 ,你们先开枪吧 !”²⁵⁰

毫无疑问 ,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 ,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 ;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 ,诉诸暴力行动。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暴力能够扼杀一个在有限的地区进行活动的小宗派 ;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遍布巨大帝国各地的、拥有200万 人的党。暴力的反革命 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 ,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

在德译文中不是“200万” ,而是“200万至300万”。——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暴力的反革命” ,而是“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编者注

二

上面所说的一切只适用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在和平环境中继续进行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明天就可能爆发。

战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意味着：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和奥地利，也许还有意大利为另一方。所有这些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器的、吹毛求疵的、同这个伟大民族的政府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德国政府由于强行吞并阿尔萨斯—洛林，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何和解，并且对自己没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裁人。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国际总委员会在色当战役²⁵¹后的第二天就能预见到今天的欧洲局势。在国际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的宣言中说：“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军事上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其结果会怎样呢？”——编者注

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²⁵²

毫无疑问,和这个德意志帝国相比,连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也代表革命,——诚然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总归是革命。但是一旦这个共和国屈从于沙皇俄国,情况就会改变。沙皇俄国是西方各民族的敌人,甚至是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如果沙俄匪帮侵入德国,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发展而是毁灭,不是进步而是野蛮。法国同沙皇携手合作,不可能给德国带来任何自由思想,如果有哪个法国将军侈谈德意志共和国,他就会被整个欧洲和美洲嗤笑。法国会不得不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而允许俾斯麦帝国把自己装扮成同东方野蛮对立的西方进步的代表。

但是,现在在官方德国的背后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最近的未来是属于这个党的。一旦这个党取得了政权,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它一定要准备恢复现在被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它一定要让北什列斯维希和亚尔萨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只要德国能自己当家作主,所有这些问题就不难解决,

在德译文中不是“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而是“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编者注

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就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不可能在亚尔萨斯—洛林方面产生任何问题，这个问题将在瞬息之间得到解决。只是还要等待十来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整个无产阶级还在等待自己的解放；难道亚尔萨斯—洛林的爱国志士就不能也等一等吗？难道整个大陆应当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遭到洗劫，并且归根到底去挨沙皇的鞭子吗？这样做合算吗？

如果发生战争，那末，首先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将成为主要的战场，这两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先感到军费开支的重担，先遭到破坏。况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许多甚至在尔虞我诈的外交史册上也不曾有过的盟国之间相互背叛的行为；而这些背叛行为的主要牺牲品又将是法国或德国，或者同时两个国家。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由于前景是如此危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挑起公开的冲突。俄国则相反，它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而避免了多次失败的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它在朝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赌，只要维斯拉河上打响第一炮，法国军队就会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语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末它就只得把旧普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给俄国，把整个什列斯维希割让给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

远敌视的根源。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执行的使命。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间它将是沙皇的顺从工具,沙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呢?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不论是沙皇、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是德国政府本身,都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对它们三者来说都是敌人的政党。我们曾看到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握手言欢,我们也许将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坦和卡普里维(或者他们的某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三十年来的不断努力,以及它在这段时期内作出的牺牲,它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权转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岗位,不受任何侵犯。

但是,如果说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那末在这样的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们应当消极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们毁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吗?应当不加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在“无力”后面是:“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努力”,而是“战斗”。——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直到最后一个人”。——编者注

抵抗就放弃已经争得的、他们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岗位吗？

决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们必须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及其所有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末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遗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法兰西共和国也许能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对那个孔斯坦、鲁维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来说，特别是对那个为俄国沙皇效劳的共和国来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1793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²⁵³。1793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末，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1893年能够同1793年媲美。如果孔斯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人们将用“马赛曲”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间不能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取得胜利就等于欧洲被奴役。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 * *

我发表在法国工人年鉴上的这篇文章就到此结束。这篇文章是在夏末写的,那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槟酒灌得晕头转向²⁵⁴,而在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间的1814年战场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使爱国主义的激情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那个以大报刊和议会多数作为喉舌的法国——实际上也准备好为讨好俄国而去干十足冒险的蠢事,因而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了在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致于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在紧要关头发生误会,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向法国社会主义者说明,在我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战争

应当抱什么态度。

但是,从那时起俄国的战争热大大地冷却下来了。先是人们知道了俄国的歉收,在歉收之后必然会发生饥荒。接着俄国又在巴黎公债²⁵⁵上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意味着俄国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据报道,4亿马克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几倍;但是当巴黎银行家企图强使人们接受债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认购的先生们不得不按降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足值证券,以便偿付这些不足值证券,而且抛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于欧洲其他大交易所的价格也下跌了,新的“俄国”证券比票面价额降低了百分之几,——一句话,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以致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16 000万马克的债券,这样,公债就只推销了24 000万马克,而不是4亿马克。其结果是俄国另一次已得意洋洋向世界宣扬出去的想发行公债的企图,——这次计达8亿马克,——也遭到了惨败。其结果还暴露出,法国资本没有一点儿“爱国主义”,有的却是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尽管它在报刊上耀武扬威。

当时歉收的确引起了饥荒,而且规模之大,是我们在西欧好久都没有听到过的了,甚至在发生这类灾难的典型国家印度也不常见;就连神圣的罗斯,在过去还没有修筑铁路的时候,恐怕饥荒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当作何解释呢?

非常简单。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木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这场社会革命的慢性病由于这次歉收而转变成急性病。

自从沙皇尼古拉由于对自己和旧俄国感到绝望而服毒自杀的那一天起,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

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

那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存在。这部分地是银行家和进口商，其中主要是德国人和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部分地是那些靠国内贸易发了财的俄国人自己，其中主要是靠损害国家和人民而发了财的酒税承包人和军需供应商；也已经有一些工厂主。后来，开始通过国家的慷慨帮助、津贴、奖励金和逐渐提高到极限的保护关税，来真正地培育这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必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的、能完全不要或几乎完全不要外国进口的生产国家。于是，为了不仅使国内市场不断地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也能生产较热带地的产品，就产生了不断想侵略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欲望，而侵略巴尔干半岛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则是想征服英属印度。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如此强烈的扩张欲望的秘密所在和经济基础，当这种扩张欲望是指向西南方的时候，人们就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

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同这样的工业计划决不相容的。这种关系在1861年垮台了。但是是通过什么方式垮台的啊！被作为榜样的是普鲁士从1810年到1851年慢慢地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的方法²⁵⁶，然而在俄国，一切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因此，为了击败大土地占有者和“魂灵”占有者的反抗，必须向他们做出比普鲁士国家及其贪官污吏当时向地主老爷所做的让步还要更大的让步。至于说到贪污行贿，那普鲁士的官僚比起俄国的官吏来只是天真无邪的幼童。因此，在分土地时贵族得到了大半部分，并且照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例是农民世代代用劳动改造过的肥沃土地 ;而农民分到的则是最低限度的份地 ,而且大部分是贫瘠的荒芜土地。公社的森林和公社的牧场归地主所有 ;如果农民想使用它们 ,—— 而农民没有它们就活不了 ,—— 他必须付钱给地主。

为了使土地贵族和农民双方都尽快地破产 ,贵族以国家债券的方式从政府那里一下子领到了全部资本化了的赎金 ,而农民则必须在许多年内分期偿付这笔赎金。正如预料中的那样 ,贵族不久就把所得到的钱财大部分挥霍掉了 ,而农民则由于自己的处境应付不了过分增加了的货币支付 ,一下子就被从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抛到了货币经济的条件下。

俄国农民从前除了交纳不多的税以外 ,几乎用不着进行现金支付 ,而现在他不仅必须靠划给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坏的份地生活 ,必须在废除了自由使用公社森林和牧场以后 ,在整个冬季里饲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 ,而且他还必须交纳比以前更重的税 ,以及年度赎金 ,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现金支付。这样他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此外 ,还加上不久前兴起的大工业的竞争 ,大工业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家庭手工业的市场 ,而家庭手工业却是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的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 ;另一方面 ,在情况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地方 ,这些家庭手工业则完全受商人 ,即中间人、萨克森式的 *Verleger* 或英国式的 *Sweater* 摆布 ,农民手工业者也就因而变成了资本的直接奴隶。一句话 ,谁要是想知道最近三十年来俄国农民的遭遇 ,那他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第24章,第5节)²⁵⁷就够了。

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为例 ,出色

地描述了由于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这个为工业资本建立国内市场的主要手段而引起的农民的破产。²⁵⁸但是,比起今天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来,当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儿戏。首先,规模本身就要比当时大两三倍,其次,迫使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的生产条件的变革也要无比深刻。法国农民是逐渐地被引入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涡,如果说工场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末大工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

这就是当1891年的歉收把早已悄悄地发生、但还没有被欧洲庸人觉察到的那个变革及其全部后果一下子暴露出来时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是如此:第一次歉收就必然要引起全国性的危机。而这次危机是许多年也克服不了的。在这样的饥荒面前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更不用说使自己的官吏特别惯于盗窃的俄国政府了。俄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1861年后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旧的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至少正在解体,但是,正当个体农民要立定脚跟的时候,却有人把他脚下的土地挖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秋天只有很少县份种上秋播作物,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在那些种上了秋播作物的地方,大部分作物都被恶劣的天气毁了。农民的主要工具——耕畜,起初是自己感到饲料不够吃,后来则由于同样确定不移的原因而被农民自己吃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离乡背井跑到城市,在那里找工作是徒劳,带去斑疹伤寒却是实在的,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一句话,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经济革命多年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锐形式的深刻的

危机。但是这次尖锐的危机又会成为慢性的,并且有拖延若干年的危险。在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正在加速旧的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解体,促进农村高利贷者(kulaki)发财致富,使他们迅速变成大土地占有者,使贵族和农民的地产一起加速转到新资产阶级手中。

对欧洲来说,这次危机暂时意味着和平。俄国的战争热将瘫痪若干年。我在不是几百万士兵死于战场,而是几百万俄国农民死于饥荒。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等着瞧吧。

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²⁵⁹

1891年11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同志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人民之友报”十周年庆祝大会的最真诚的感谢。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来参加大会，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使我不能抽身，这一卷终究要出版才行。因此让这封信来代替我吧。

不过我想趁此机会衷心地向你们光荣的纪念日表示祝贺。我知道，在奥地利的出版法和其他治安法的限制下，使“人民之友报”这样的战斗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能够维持十年，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且我至少大体上也能够想像出在这十年当中为此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你们能够不顾一切把报纸保存下来，这更加增添你们的光彩；要知道，奥地利的出版法以有产阶级的机关报一般说来没有危险性作为出发点，它的目的看来正是想通过对工人报纸的经费施加压力，来使它们不是沦于破产，就是变得驯服听话。如果说布隆的工人不顾这种财政上的压力，仍然能够在整整十年内一直出版自己的报纸，丝毫也不放弃自己的旗帜，那末，这就是现在只有在工人中间才能看到的那种坚毅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又一证明。

当我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不能不对这样的现象再一次表示

最大的喜悦 :正当青年捷克的²⁶⁰和古老德国的资产者到处相互仇视的时候 ,捷克工人和德国工人却团结一致肩并肩地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

再一次衷心地感谢和祝贺你们。

你们的老头 弗·恩格斯

载于1891年11月25日
“人民之友报”第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之友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 声明的附函

阁下：

兹对一项前所未有的无耻谰言²⁶¹做一答复，随信寄上，请予刊登，以明历史真相。

曾对英国工人阶级有过这样大贡献的“每日纪事报”，竟允许其外国通讯员对大陆上的工人运动及其领袖散布诽谤谰言，对此我感到遗憾。

谨致崇高的敬意

写于1891年11月17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28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

阁下：

贵报巴黎通讯员在本日贵报晨刊上，除对我的亡友卡尔·马克思的家庭做了其他一些事属捏造的报道外，还讲到，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司法部长曾下令逮捕刚刚在利尔当选为议员的保尔·拉法格先生。这位通讯员接着继续写道：

“据说当时马克思夫人，以不抓走其女婿为条件，对当局讲出了一个武器库的所在地点。在此以后，拉法格先生就越过国境逃往西班牙。”

由于马克思夫人的女儿艾威林夫人此刻不在伦敦，我就有义务来驳斥上述加于她母亲的诬蔑性的指责。事实是这样的：当拉法格先生同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两个姐妹在巴涅尔-德-吕雄的时候，一位同情他的共和国警察官员曾事先向他透露即将逮捕他的消息。当日，拉法格就骑马越过比利牛斯山逃入西班牙。²⁶²那时马克思夫人在伦敦，因此，她即使有援救拉法格的意图，当时也不可能插手并为此向法国政府透露任何事情。这虚构出来的所谓武器库云云，纯属无稽之谈，其用意是要在这位品德高尚、不畏牺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牲因而根本做不出卑鄙之事的妇女去世之后破坏她的声誉。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1月17日于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载于1891年11月26日
“母日纪事报”第926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纪事报”,并
根据草稿校对过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²⁵³歌詠团
(托登楠街)

1891年11月28日于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同志们：

考茨基夫人刚刚告诉我，我的朋友列斯纳通知她，说你们打算在今天晚上为我七十一岁生日举行音乐庆祝会。但我已先同一位朋友约好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去，而且因为他还邀请了另外一些人，现在要取消这个约会已经绝对不可能。因此，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在家。

亲爱的同志们，这样我只好书面地为你们的深情厚谊向你们表示我真诚的感谢，同时也对于我未能及早得悉你们的意图表示遗憾。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因此，如果我对准备为我举行这种庆祝会的事稍有所闻，我就会赶快预先提出最恭顺然而最坚决的请求，要求歌手同志们放弃这个意图。遗憾的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既然我出于不得已而只好阻止你们这个对我如此深情厚谊的意愿，我只有尽可能用如下的保证作为补救：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

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
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

忠实于你们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28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年英国版序言²⁶⁴

本书是再版的英译本。原书最初于1845年在德国出版。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著作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现在都并不使他感到有什么羞愧。这本书于1886年由美国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成英文,次年在纽约出版。由于美国版已销售殆尽,而且从未在大西洋此岸广泛流传,现经有关各方一致同意,将英译本再版印行。

作者曾用英文为美国版写过一篇新的序言²⁶⁵和一篇附录。那篇序言同本书正文关系不大,其中谈的是现代美国工人运动,因此在这里作为与主题无关的部分略去;而附录——原来的序言——则大部分被采用在本序言中。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

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人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²⁶⁶的废除及由此而引起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最主要的一点是:美国——从商业观点看来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虽然是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殖民地市场的最大的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此外,前一时期未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最初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是原始的和微不足道的了。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

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住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保持竞争还有用处。这样,实物工资制 [truck-system] 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²⁶⁷,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贸易和无限竞争的精神,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欺压现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内容,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

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²⁶⁸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²⁶⁹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

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²⁷⁰，“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12000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²⁷¹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或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认真地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有英译本²⁷²——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东西。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

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波动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

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以“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为题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²⁷³上的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这四十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现在照录如下: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²⁷⁴;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

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²⁷⁵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²⁷⁶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尔兰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器量较小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重新出现的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

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差不多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当中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认为是穷凶极恶的罢工,现在也逐渐被认为很有用处了,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使工人地位低于雇主或不利于工人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曾经誓死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我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²⁷⁷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²⁷⁸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不得不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

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人口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为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尽管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和他们的帮手就是这样。从1848年

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 and 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的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

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赤贫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主要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个人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¹²⁷⁹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

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国家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状况至多也只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的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大规模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

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了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征兆本身,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实际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所谓“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先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也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 fin de siè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弗·恩格斯

1892年1月11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²⁸⁰

不无名气的卓万尼·博维奥在今年2月2日“论坛报”刊载的一篇文章里指责最近一个时期转到保皇党营垒里去的意大利共和党议员,说他们太轻视政体问题。这点我倒不怎么在意,然而使我耿耿于怀的是,他竟利用我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载于1892年1月16日的“社会评论”),把同样的指责加在全体德国社会党人和我个人身上。下面就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

“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说社会党人将在最近将来取得政权,但不明确说取得什么样的政权的社会党人,是怎样错的和为什么错的。恩格斯竟然用数字(而我总是觉得数字在历史上是很好的证明)来算出社会党将在德国议会中取得多数的那个不远的年份。好极了,然后呢?

——它将取得政权。

——妙极了,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1848年1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想去呢?

见本卷第287—292页。——编者注

——形式对我们无所谓。

——真是这样吗？……然而，只有当政权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时才能谈论它。可以认为，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产生形式，但是不能撇开形式。”

为了答复这点，我声明，我完全否认可尊敬的博维奥的解释。

首先，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让我们往下看。

“它将取得政权——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1848年1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定想去呢？”

这里我要用可尊敬的博维奥本人的一个说法。的确只有成为“与世隔绝的隐士”才会对这一政权的性质抱有丝毫怀疑。

整个政府的、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德国都责难我们在帝国国会里的朋友们，说他们是共和党和革命党。

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当然，可尊敬的博维奥不会天真到这种程度，竟去设想某个德国皇帝会从社会党的圈子里任命他的大臣，去设想他会接受以他退位为前提的条件（因为没有这种条件，这些大臣就别想得到自己政党的支持），即使他愿意这样做。不过，老实说，博维奥担心我们会“回到魏特林的空想去”，这却使我认为，同我交谈的这个人确实是天真到极点了。

也许可尊敬的博维奥提到魏特林是想说,照他看来,德国社会党人赋予社会形式的意义没有他们赋予政治形式的意义大。这一次他又错了。他对德国的社会主义本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要求。这一经济革命将怎样实现呢?这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正如博维奥自己说的,“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产生形式”。譬如说,如果明天由于某种料想不到的事变,我们党担负起执掌政权的职责,那末我非常清楚应该提出什么东西来作为行动纲领。

“形式对我们无所谓”?

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个德国社会党人,都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也从来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只是可尊敬的博维奥说的。我想知道,他有什么权利把诸如此类的《sciocchezza》[“蠢话”]记在我们账上。

不过,如果可尊敬的博维奥等到我的文章的后一部分(载于2月1日的“社会评论”)出来,并且读完它的话,也许他就不会费神去把德国的革命社会党人同意大利的保皇派共和党人混为一谈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2月6日

载于1892年2月16日
“社会评论”杂志第4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社会评论”杂志校对过

“共产党宣言”1892年 波兰文版序言²⁸¹

从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愈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愈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愈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愈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销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的刊行,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十年前刊印上一版以来确实已有这种进步,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波兰王国,即会议桌上的波兰²⁸²,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阿速夫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由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从事竞争的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因为他们虽然拼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抵制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都感受到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

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的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的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波兰工业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无穷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的工作,然而这次革命毕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做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当波兰无产阶级把它争到手的时候,它就会完全有保障了。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和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校对过

在波兰文版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 法国工人的贺信

1892年3月17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们：

自从巴黎人民举起了红旗，同时向飘扬在凡尔赛的法国三色旗和飘扬在普鲁士人占领的炮台上的德国三色旗发出挑战以来，到今天已经过去21年了。

这面红旗象征着巴黎无产阶级已站得这样高，在它眼里，战胜者与战败者都同样消失了。

使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是它高度的国际性。这是它向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表现的勇敢挑战。各国无产阶级都正确地了解这一点。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7月14日或9月22日吧²⁸³。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3月18日。

正因为如此，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才给公社的坟墓堆上大量无耻的诬蔑。正因为如此，只有国际工人协会才敢于从公社存在的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把自己看做是巴黎的武装起义者，然后又把自己看做是战败了的无产者。的确，当公社失败时，国际也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它在“捉拿公社社员！”的叫嚣下，在欧洲各地被摧毁了。

自从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再度被夺回的那一天起 ,到今天已经过去21年了。1871年出生的孩子 ,现在已经达到成年 ,由于统治阶级的愚蠢 ,他们当了士兵 ,他们在学习使用武器的本领 ,学习组织起来和持枪自卫的艺术。被认为业已扼杀了的公社 ,被认为永远消灭了的国际 ,仍然存在于我们当中 ,仍然活着 ,而且比1871年要更加强大20倍。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 ;响应我们号召的 ,现在已不是几千人 ,而是几百万人了。第一国际只能预见并为之做准备的国际无产阶级联盟 ,今天已成为现实。不仅如此 ,1871年在公社的巴黎近郊占领过炮台的那些普鲁士士兵的千百万子弟 ,目前正在巴黎公社社员的子弟肩并肩地站在最前列 ,为争取完全和彻底解放工人阶级而共同战斗。

公社万岁 !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

弗·恩格斯

载于1892年3月26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79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并
根据草稿校对过

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²⁸⁴

对于这第二版,我只想说几句话:在法文原文中霍吉斯金这个名字误作霍普金斯(第45页),现已改正;又威廉·汤普逊的著作的出版年份也已改为1824年²⁸⁵。希望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的图书学的良心将因此获得安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3月29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哲学的贫困”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英文版导言²⁸⁶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副教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他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自然，他与他的前辈发生了冲突；首先，他将满腹怒气发泄在马克思身上。

这件事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实现了合并²⁸⁷，因而不仅大大地加强了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能力运用这全部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虽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显然也是够麻烦的。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具有一种极其笨拙的 *Grü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不管你叫它什么都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便首先一定要设法把它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BY
FREDERICK ENGELS

TRANSLATED BY EDWARD AVELING
D.Sc., Fellow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ITH A SPECIAL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LONDON:
SWAN SONNENSCHN & CO.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的扉页

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从来都只是为了最后导致这个新发现的卓绝的理论。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整的全套“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²⁸⁸——三部八开本的巨著,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份量的、被动员起来向一切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攻、特别是向马克思进攻的三路论证大军——事实上,这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这些就是我所要对付的。我不得不涉及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²⁸⁹,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的争论中阐明(而且是用比以前更连贯的形式)马克思和我对这许多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使我把这个从其他方面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担负起来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是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莱比锡的“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²⁹⁰,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现在法国众议院中利尔市的议员保尔·拉法格的请求,我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了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并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²⁹¹。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²⁹²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²⁹³。这样,连同

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册子已经用十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任何其他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若干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基本知识而写的。当这个党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已经有完成的希望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需要着手进行的时候,这就显得尤其必要了。这个附录之所以收入英译本中,是因为考虑到一切日耳曼部落所共有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更不为人所知。这篇附录仍旧保持了原状,我没有涉及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曾经有包括几代人的庞大的宗法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这些土地;后来,当公社范围扩大,太不便于共同经营的时候,便出现了分割公社土地的现象。²⁹⁴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 *sub judice* (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²⁹⁵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经济发展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即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出资雇用那些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作者并把产品的卖价超出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

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作者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企业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发动的机器来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动作。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相当大的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到英国“体面人物”的偏见，那末事情将会比现在更坏。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十七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英国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宣扬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²⁹⁶。唯名论，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和他的同素体²⁹⁷，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在他看来，感觉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识的泉源。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于用理性的研究

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这篇导言从开头到“调整机器的动作”为止的几段被删去。——编者注

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补充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

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痛苦”〕。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它的诗的绚丽色彩,它变成了数学家的抽象的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憎恨起人类来了。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禁锢自己的肉体而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智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 *qualitas* [质] 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字;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恩格斯在英文版上加的注,在德文版上未加。——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在〔“痛苦”〕一词后面,又从“神圣家族”中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又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编者注

霍布斯,作为培根的继承者,这样推论道:如果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末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丧失了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词,除了通过我们的感官而为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一样,都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到的,那末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既有开始也有结束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就是我们称为善的东西。人和自然都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²⁹⁸中提供了这种论证。

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里斯特利同样地打破了还包围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的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²⁹⁹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01—204页。³⁰⁰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英国人现在对马克思给予他们祖先的赞扬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那真是遗憾得很。可是不容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尽管十八世纪时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一切战争中都被德国人和英国人所战胜,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是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这甚至发生在卓绝的法国革命之前;而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都还在试图移植于我们自己的环境。

无可否认,大约在本世纪中叶,每个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都感到惊奇的,是那种他在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在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像巴克兰德和曼特耳那样的地质学家也歪曲自己科学中的事实,以避免同创世纪的神话有太多的冲突;而为了要找到在宗教问题上敢于运用自己的智力的人,就必须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去,到当时所谓的“肮脏人群”中去,到工人中去,特别是到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中去。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³⁰¹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经逐渐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总之,随着橄榄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和传播,大陆在宗教问题上的怀疑论也致命地传播开了,而且事情达到这样的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没有像英国国教教会那样被当做“头等货色”,但是在体面这一点上,却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

定要比“救世军”³⁰²的地位高。我不禁想道：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对不信教思想的进展感到十分痛心并加以诅咒的人，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 made in Germany（德国造）的商标，而肯定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货，如果知道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两百年前所走的比今天后代子孙所敢于走的要远得多，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它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补充道，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这种说法也许在拿破仑那个时代有点价值，那时拉普拉斯对拿破仑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天体力学”³⁰³一书中对造物主连提也没有提到，——曾经骄傲地这样回答：《Je n'avais pas besoin de cette hypothèse》（“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在今天，在我们关于宇宙发展的概念中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立足的余地；如果人们说，有一个被排斥于整个现存世界之外的最高存在物，那末这样说本身就有矛盾，而且在我看来，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补充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我们通过感官去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

在德译文中“（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一语被删掉。——编者注

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关于这些,他是一点也不能确实知道的),而只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看起来,这种论点确实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In Anfang war die Tat》[“起初是行动”]。在人类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末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一语被删掉。——编者注

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我们可能正确地知觉到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任何感觉的或思维的过程来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是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很早以前就已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那末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而当你的感官使你知道了这一事实的时候,你就完全掌握了这一事物,即康德的著名的不可认识的《Dign an sich》[“自在之物”]。对此,可以补充的是: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们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已经被科学的巨大进步逐一地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而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学会了不依靠有机过程的帮助,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逐一地把有机物构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声称:无论什么物体,只要知道它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构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远地不知道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我们在几个世纪以后还不能达到这种认识,并以这种认识制造出人造蛋白。如果我们达到了这点,我们同时就制造出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都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生存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在做了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保留之后,就立刻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那样说话和行动,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用现在的说

法,能,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可是,如果你试图在某个特定的场合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那末他立刻就会要你闭口。如果说他 in abstracto〔抽象地〕承认唯灵论的可能性,那末他 in concreto〔具体地〕一点也不愿意知道这种可能性。他会对你说:就我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来说,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是不存在的;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在我们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职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物质世界是受不变的规律支配的,如此等等。所以,就他是一个讲科学的人来说,就他知道一些事情来说,他是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自己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显然我也不能把这本小册子中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论”。信教的人将会取笑我,不可知论者将会气愤地质问我是否在嘲弄他们。因此,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像在其他许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那末,即使英国的体面人物也不致于感到太震惊吧。

如果我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也是有利的,那末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谅解一些。我提到过这样的事实:约

在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补充有:“用德文来说叫做庸人”。——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庸人的体面”。——编者注

在四五十年前,住在英国的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外国人都为他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而感到惊奇。现在我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等阶级,并不像有知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它在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内已经赢得了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地复兴了;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新进行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而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

在德译文中,从这里开始,直至以“新的出发点是……的妥协”一句起首的那一段(本卷第350页),恩格斯的用语《middle class》(“中等阶级”)、《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市民阶级”(《Bürgerthum》);以后,这些用语又被恩格斯译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编者注

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现在科学起来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这一反叛。

上面所说的,虽然只就新兴的中等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发生冲突这方面提到了两点,但已经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大学和城市商人领先发出了呼声,那末一定会在而且确实已经在农村人民群众即农民中得到强有力的响应,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和尘世的封建主进行斗争。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³⁰⁴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能阐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地方诸侯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建立了新的信条,即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一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人变成了农奴。

但是,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

在德译文中不是“长期”,而是“伟大”。——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中央政权”,而是“皇室中央政权”。——编者注

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在经济革命时期,当一切旧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中心被新的所代替的时候,当印度和美洲已经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最神圣的经济信条——金银的价值——也已经开始动摇和崩溃的时候,这种情形就特别真实了。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而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必然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克伦威尔之后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差不多完全绝迹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

在德译文中不是“诸侯”,而是“德国小诸侯”。——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自耕农”,而是“中农(yeomanry)”。——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起义”,而是“革命”。——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 yeomanry 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而查理一世才被推上断头台”。——译者注

的,正如1793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新的出发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称为“大叛乱”的辉煌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斗争,是以自由党历史家称为“光荣革命”³⁰⁵的一件比较不足道的事件而告结束的。

新的出发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虽然被称为贵族(就像现在这样),其实早已向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的方向发展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³⁰⁶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而且立即着手增加地租,办法是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慷慨地胡乱处理教会土地,造成了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十七世纪继续不断地发生的大量没收大采邑分赠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情形,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取得利益;而且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由于经济的或

在德译文中不是“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而是“自己的目的”。——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这里以及后面几个地方,《middle class》[“中等阶级”]这个用语,也同《bourgeoisie》一样,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

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在细节问题上或许发生过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从这个时候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微末的但却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是有共同利益的。商人或工厂主本人,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直到不久以前还说的那样,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自己是信教的,他的宗教曾经是他用来战胜国王和贵族的旗帜;不久他就发现这同一个宗教可以用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已经参加镇压“下层等级”、从事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而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学说,不仅震动了中等阶级的宗教情感,而且还宣布自己是仅仅适合于世界上的学者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而跟适合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群

在德译文中不是“俸禄和官职”,而是:“官职、闲差、厚禄”。——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在“新的”的后面补充有:“无神论的”。——编者注

众的宗教大大不同。它同霍布斯一起,作为至高无上的王权的保卫者登上了舞台,并且号召君主专制制度镇压这个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³⁰⁷。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可见,唯物主义之所以被中等阶级仇视,既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于是,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主要骨干。

这时候,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了法国,它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学派³⁰⁸的一个支脉,并且和这个学派汇合了。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呈现出来了。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把批评扩大到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设施,而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道路:在他们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出来的学说,竟给了法国共和党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³⁰⁹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

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 Code civil³¹⁰ 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差不多完满地表现了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英国的法律仍然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之符合于它所表达的事物,正像英文的拼法符合于英文的读音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 vous écrivez Londres et vous prononcez Constantionpole(你们写下伦敦,而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也只有这个英国法律把大陆上那些在君主专制时期已经丧失而到现在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完全恢复起来的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即古代日耳曼自由中的精华部分,保存了几个世纪,并且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

还是回过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 他向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的胃口。这不仅仅是由于这次革命的“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这次革命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走向极端。英国资产者如果没有本国的贵族教他像贵族一样待人接物,替他开创新

风气,给他提供陆军军官去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去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场,那他怎么能行呢?诚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从妥协中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同情这次革命³¹¹,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这样,如果说唯物主义成了法国革命的信条,那末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加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宗教。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没有证明,群众的宗教本能一旦失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愈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的国家,愈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愈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愈是固执地坚守它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尽可以彼此不同,但是它们全都是明显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以及其他等人,开始了产业革命,这一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快得多。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愈来愈被工厂主推到后台去了。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经过一些逐步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修改以后,也不再适合这个妥协的参与者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改变了;1830年的资产阶级,同前一世纪的资产阶级是大不相同的。仍然留在贵族手中并且被贵族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的政治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于是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首先,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通过了改革法案³¹²。这使资产阶级在议会里获得了

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是谷物法的废除,这永远确定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这也是它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它后来取得的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但是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这个阶级,随着产业革命对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的占领,在人数上不断地增加;而随着人数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这一力量早在1824年就表现了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³¹³。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并且为了同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³¹⁴相对抗,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工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被镇压;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要求的吓人声势,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制下去了,可是用了多少代价啊!如果说,英国资产者先前已经确信有必要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那末,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一定会如何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必要性呢?他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

续把成千上万的金钱花在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方面,他不满足于他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琼生大哥”,从美国输入了基督复活派³¹⁵,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还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宣传,把穷人当做上帝的选民看待,用宗教方式反对资本主义,从而使早期基督教的阶级对抗的因素得到滋长,这对于目前在这上面花现钱的富翁来说,总有一天会带来麻烦的。

看来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长时期地——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自掌握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了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也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完全掌握了政权。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1830—1848年,是极小一部分资产阶级统治着王国,而大得多的一部分,则被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1848—1851年,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了国家,但只有三年之久;资产阶级的无能,带来了第二帝国。只是在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掌握了政权达二十年以上;而它已经显露出衰落的鲜明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美国那样一个从来没有过封建制度而且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即使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富裕的中等阶级对此表示的温顺态度,在自由党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次公开演说以前,我是一直不能理解的。福斯特先生在那次演说中劝告布莱得弗德的青年学习法语,以此作为出人头地的

手段,并且援引自己的经验说,当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而必须出入于那种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他是感到多么难堪。的确,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他们没有办法不把政府的那些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是其他一些条件,而不是加上了商业干练气味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心。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等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国中等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取得了胜利的人物,科布顿们、布莱特们、福斯特们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二十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³¹⁶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直到今天,英国的资产阶级还深深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用自己的和人民的金钱去豢养一个供装饰用的有闲等级,要它在一切庄严的场合体面地代表民族;而且当他们自己中间有人被认为有资格进入这个归根到

即使在商业上,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的自大态度也是足以坏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说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体面的,而且当他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到英国,使他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便颇为自傲了。他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些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这样一来就控制了英国对外贸易(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英国人的直接对外贸易则变得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也没有觉察到,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四十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的时候,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十年前,英国的工厂主才大吃一惊,去问英国的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顾客。一致的答复是:(1)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设法去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与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的英国式的需要、习惯和爱好。

底是他们自己造就的高等特权集团里去的时候,他们便认为是无上的光荣。

这样,工商业中等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从政权中完全赶走,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便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以为这只是由于自由贸易,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重新迫使工人阶级处于依附自由党的地位,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一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对于选举权的要求逐渐成为不可遏制的了;在辉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人抓紧有利的时机,在城市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并且重新划分了选区。随着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并且又重新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³¹⁷这一切措施大大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使工人阶级至少在150个到200个选区中现在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等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那末,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去看待当时所谓的“优越者”即中等阶级。的确,大约在十五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的恭敬,以及他们在为自己要求权利时所表现的克己的谦逊,大可排解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³¹⁸的经济学家们由于他们本国工人的不可救药的共产主义倾向和革命倾向而产生的烦恼。

在德国文中在“户主的选举权”的后面补充有:“(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房的人)”。——编者注

但是英国的中等阶级——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们看得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了政权。他们在宪章运动的年代里领教过人民这个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 的作为。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了联合王国的法律之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学校董事会中就让牧师占据优势;于是,资产阶级日益增加自我捐税,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从崇礼派³¹⁹直到“救世军”。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对待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根据相当充分的理由,他们在选择取得统治的手段时,丝毫不在乎这种手段是否合法。这个 *puer robustus* [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 *malitiosus* [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丢掉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年轻人感到晕船晕得厉害的时候把他在船上装模作样抽着玩的雪茄烟悄悄地丢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条和仪式,甚至在实在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行起这些仪式来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进 *maigre* [素食],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就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耐心地听完新教的冗长的布道。他们已经吃了唯物主义的苦头。《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在德译文中不是“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而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宗教蛊惑方式”。——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的体面庸人”。——编者注

werden》——“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拯救社会于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手段。对他们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才！这个我早在两百年前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愚钝，或是大陆资产者的 *post festum*（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不能阻止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 *vis inertiae*（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物。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开始重新动起来了。毫无疑问，他们还被各种传统束缚着。有资产阶级的传统，例如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和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们最初摸索着从事独立行动的努力中继承下来的传统，例如，把一切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排斥于许多旧工联之外；这就等于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在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³²⁰。如同英国的一切事情一样，工人阶级用缓慢而适度的步伐前进着，前进中有时踌躇不定，有时做一些没有效果的尝试；它在前进中有时对“社会主义”这

个名称表示过分的不信任,同时却逐渐地吸收着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并且一批接着一批地把工人吸引进来。现在它已经把伦敦东头的没有技术的工人从沉睡中唤醒了,我们全都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了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末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英国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一个进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不会失去。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末,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大大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的工人运动在最近二十五年所获得的进展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前进着。如果说,德国的中等阶级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坚韧和毅力,那末,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四百年前,德国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同样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由作者译成德文摘要发表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英文本1958年版译出,并参考了德译文和俄译文

致奥地利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1892年5月31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曾两度被禁止的党代表大会，我希望代表大会这次能够开成³²¹。我虽然不可能作为客人去参加你们的会议，但是我高兴地借此机会向参加大会的奥地利同志们表示敬意和我的最恳切的关心。我们在这里享有大陆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进行运动的自由，我们对于奥地利工人尽管遇到给他们的运动造成困难的无数障碍，还是争取到了他们现在所处的光荣地位，自然能够给以应有的评价。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这里、在大工业的故乡，工人的事业也正在向前推进；而且总的说来，当前最美好和最令人高兴的现象就是，无论我们往哪里看，工人运动到处都在不可遏止地发展着。

你们的老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92年6月10日
“工人报”第2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
根据手稿校对过

卡尔·肖莱马³²²

在曼彻斯特南面市公墓里今天垒起的一座新坟前哀悼的,不仅有各国科学界,而且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安息的大化学家,早在拉萨尔在德国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是个共产主义者了;他毫不隐瞒自己的信念,直到逝世之前始终是德国社会党的积极的一员,并且按时缴纳党费。

卡尔·肖莱马于1834年9月30日生于达姆斯塔德;他在故乡念中学,然后在吉森和海得尔堡学化学。大学毕业之后,他于1858年移居英国,当时在那里,对出于李比希门下的有才能的化学家广开着飞黄腾达之门。但是,尽管他的年轻同行大部分都热中于搞工业,他却仍然忠实于科学;起初他给私人化学家安格斯·斯密斯当助手,后来给罗斯科当助手,罗斯科在这之前不久被聘为新成立的欧文斯学院³²³的化学教授。1861年,充当罗斯科私人助手的肖莱马,得到了欧文斯学院实验室的正式助手职位。

在六十年代,他完成了在化学领域内的一些划时代的发现。有机化学大大发展,终于从一堆零星的、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关于有机物成分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肖莱马挑选了这些有机物中最单纯的作为研究对象,坚信正是应该在这里奠定这门新科学的基础;这些最单纯的有机物原来仅由碳和氢构成,但是若用其他单纯的或复杂的物质置换其中一部分氢,它们就会变成具有各种不同性能的完全另外一种物质;这就是脂肪烃,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几种含在石油里,从脂肪烃可以制取醇、脂肪酸、酯等等。我们现在关于脂肪烃所知道的一切,主要应该归功于肖莱马。他研究了已知的属于脂肪烃类的物质,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离,其中的许多种是由他第一次提纯的;另一些从理论上说应当存在而实际上还未为人所知的脂肪烃,也是他发现和制得的。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现代的科学的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以外,他还花很多时间研究了所谓的理论化学,即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研究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门科学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也许,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轻视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那时候许多人鄙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这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应该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一直到现在,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最容易学会这一点。

我是在六十年代初和肖莱马认识的(马克思和我很快就跟他成了亲密的朋友),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跟脂肪烃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物

质,总是在他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只是因为戴着眼镜,他才没有为此丧失视力。

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他需要从我们方面接受的只是对他早已理解的信念的经济学上的论证。后来,由于通过我们了解了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他就经常怀着很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一运动,特别是克服了起初的纯粹拉萨尔主义的阶段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我在1870年年底移居伦敦之后,我们之间频繁的通信照旧大部分谈的是自然科学和党的事务。

在这以前,尽管肖莱马已经有了公认的世界声誉,他仍留在曼彻斯特,地位很低微。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同了。1871年他被提名为皇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会员的候选人;而他——很难得地——马上就当选了;1874年欧文斯学院终于专门为他设立了有机化学的新教授职位,接着格拉斯哥大学选他为名誉博士。但是这些身外之荣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为人。这是一个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他的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上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这些承认他的表现当作某种自然而然的東西接受下来,因此也就心地坦然。

他的假期,除了在德国度过以外,总是到伦敦马克思家里和我家里来度过。四年以前他还陪我去美洲进行过一次“远足”。³²⁴然而那时他的健康已有亏损。1890年我们还能到挪威和北角去,但是在1891年,我们一起旅行刚刚开始³²⁵,他的健康就显得不行了,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伦敦。从1892年2月起,他几乎已经不能迈出家门,从5月起便卧病在床;6月27日他因肺癌逝世。

这位科学家也曾身受过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六七年前,他由瑞士去达姆斯塔德。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只装有苏黎世出版

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箱子落到警察手里。除了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教授以外还有谁能偷运这种违禁品呢？要知道，按照警察的理解，化学家一定就是受过科学训练的走私贩。一句话，在他母亲和他兄弟家里进行了搜查；但教授当时在赫希斯特。马上去了电报；在那里也进行了搜查，但是却搜出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这就是一张英国护照。肖莱马在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之后，就入了英国国籍。警察在这张英国护照面前发软了：同英国发生外交纠纷毕竟得小心为上。整个案件就以在达姆斯塔德闹了一场大丑剧而告终，这使我们在最近的选举中至少又多得了500票。

我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忠实的朋友和党的同志的坟前献了花圈，花圈上系着红带，写着《From the Executive of the Social-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敬挽”）。

1892年7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7月3日“前进报”
第153号附刊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³²⁶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二十四岁。现在我的年纪比那时大了两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使我脸红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年由斯万·容涅先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是根据美国版序言³²⁷写成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成的。现代大工业已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

见本卷第311—325页。——编者注

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对一个生意人来说被看做智慧的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拉得尔菲亚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战役³²⁸以后,连那条规规矩矩的德国老原则也声誉扫地了,那条原则就是: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的废除及由它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

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固然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料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未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只对那些为了免于在竞争中毁灭而必须抓住每一文钱的急需钱财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这样,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其精神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直接矛盾,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

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

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对于这少数人来说,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规模的事业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欺压现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条件,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现在已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本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

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

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房屋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即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这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话。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

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第6期上。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

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

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以前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

年的议会改革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

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通常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些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 and 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

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

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持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只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

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我在1885年是这样写的。在1892年1月11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藪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

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先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 *fin de siè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存在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个别

分子还须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者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致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并且公开宣布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反对他们,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外的极大多数当选了。在密德尔斯布罗,一个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以前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可耻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协商,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在英国工人中间统治了几乎四十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

詹·凯·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

约·哈·威尔逊。——编者注

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管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大大鼓舞英国人的竞赛精神。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现，有格莱斯顿先生执政，新议会就不能开始工作，有新议会在，格莱斯顿先生就不能做任何事情；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 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³²⁹

像英国的这种渐进的、和平的政治发展，由于无尽无休的妥协，建成一个充满矛盾的形势。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种形势由于有相当多的好处，实际上为人所容忍，可是它的逻辑上的荒谬现象却使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受到真正的折磨。所以一切“掌握国政的”政党就必须在理论上进行伪装，甚至辩解；当然，办法只能是诡辩，歪曲，以至纯粹用空话来支吾搪塞。于是，在政治领域里就大量出现重复神学护教论的所有拙劣的伪善辞句和欺人之谈、把神学的精神毒素也移植到世俗的土壤上去的书刊。于是，保守党就自己给道道地地的自由党伪善园地施肥，播种，松土。于是，神学护教论也就得到这样一种它在别国所没有的、从普通人的意识中汲取的论据：福音书里讲的事情同新约里宣扬的教义正相矛盾，那有什么不得了？难道这就意味着那些东西不是真实的吗？英国宪法里的矛盾还要更多，它到处自相矛盾，可是它毕竟存在着，因此就是真实的！

1868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从而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通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

所。因此,在铁路、银行等等方面,在纯属美国的投资场所,在印度贸易方面的过分兴旺的投机活动,就使得危机没有可能发生,而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³³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特大的危机在酝酿中。

写于1892年9月12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全国委员会³³¹

亲爱的同志们：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在9月8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对这项决议是难以保持沉默的。

根据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受托筹备在1893年召开国际下一届代表大会的苏黎世委员会，向工联代表大会发出了邀请信。尽管煤气工人工会书记威廉·梭恩同志一再要求，这封信在代表大会的三天会期内仍未被宣读，因此，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对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表示意见。

最后，马特金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委托工联代表大会议委员会³³²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并通过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协商一致的决议。

帕涅尔同志（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奎尔奇同志回答说：已经准备在1893年召开两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个在苏黎世召开，另一个在芝加哥召开³³³。苏黎世临时委员会邀请工联代表大会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应当接受邀请去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而不是召开第三个代表大会。

保守的旧工联的代表表示反对，其借口是苏黎世和芝加哥代

表大会都不是英国工联召开的 ;同英国工人比起来 ,大陆上的工人组织得差 ,软弱无力 ;英国人不应当对大陆社会主义的任何荒谬理论(wild theories)承担责任 ,等等。只是在这一切之后 ,才宣读了我们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信。

最后 ,以189票对97票拒绝了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 ,并且通过了一项提案 :“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并通过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协商一致的决议。

这两个决议都是对全欧洲大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侮辱。我们希望 ,英国无产阶级中比较先进的分子(这些人在感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者 ,但目前对这个字眼还感到恐惧 ,因而让老的保守主义者牵着自己走) ,这些比较觉悟和比较坚定的分子能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改正所犯的错误。

与此同时 ,有必要使大陆上的工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上述决议的侮辱。我已经把格拉斯哥事件告诉了我们的法国和德国朋友 ,希望他们对应当遵循的行动路线达成协议 ,因为法国的同志们过几天就要在马赛举行代表大会³³⁴ ,他们可以在那里对工联进行第一次反击。

作为光荣的国际总委员会的前西班牙书记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个涉及西班牙同志不亚于其他国家同志的事件告诉西班牙全国委员会。

敬礼和社会革命 !

写于1892年9月16日

原文是西班牙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美国的总统选举³³⁵

古代世界的主宰是劫数,heimarmene,即难以逃脱的神秘命运。这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说法。他们指的是使人的意志和愿望终成泡影,使人的一切行动结果大与愿违的那种不可知的万能力量,是从那个时代起就被人们称做天意、定数等等的那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神秘的力量逐渐采取了比较可以理解的形式,而这一点我们应归功于资产阶级和资本的统治,即归功于第一次出现的这样一种阶级统治:它力图弄清自己本身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而也就为认识自己本身的必将灭亡打开了大门。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命运、天意,这就是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

美国总统选举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世界市场说来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事件。

四年以前,在波士顿用英文,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发表了我的一篇关于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的文章。我在那里曾经指出:英国在工业上的垄断同其他文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相容的;美国在内战后所实行的保护关税制证明美国人力图摆脱这种垄断的束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1888年7月“新时代”³³⁶。

缚,依靠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智慧和精神,这个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因而在美国,保护关税已成了工业的桎梏,其程度并不下于德国。接着我又说,如果美国实行了贸易自由,那末再过十年它就会在世界市场上击败英国。

果然,1892年11月8日的总统选举为贸易自由开辟了道路。麦金利的那种保护关税已经成了无法忍受的桎梏;胡乱抬高一切进口原料和进口粮食的价格反过来也影响了许多本地商品的价格,这样也就堵塞了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大部分销路,而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则已经苦于美国工业产品过剩。事实上,近年来,保护关税制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小生产者被结成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大生产者所挤垮,让后者,即有组织的垄断势力支配市场,从而剥削国内的消费者。美国要克服这个由保护关税制产生的经常的内在工业危机,只有为自己打开世界市场之门,为此它就必须摆脱保护关税,至少要摆脱像现在这样荒唐的保护关税。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舆论上的大转变,证明美国已决定这样做。一旦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它就会——和英国一样,而且是借助于英国——在自由贸易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地走下去。

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斗争。在所有的市场上,英国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的产品,将被迫投入一场同美国工业产品的斗争,而且最终要遭到失败。美国的棉麻织品现在就已经在排挤英国货。读者想知道,什么样的奇迹使得郎卡郡的棉纺织厂工人对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一事,经过一年光景就从激烈的反对者转变为热烈的拥护者吗?那就请翻开今年10月的“新时代”第2期第56页,从那篇文章里你们会看出,美国的棉麻织品正一步一步地把英国货挤出中国市场;英

国货的进口在1881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赶上美国货,而在1891年只等于后者的三分之一左右。³³⁷而中国,和印度一样,是棉麻织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这再一次证明,随着新的世纪的临近,一切条件都在变化。如果把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的重心从英国移到美国的话,英国要么就得变成第二个荷兰,也就是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靠昔日强盛的残余过日子,而无产阶级则饿肚皮的,国家,要么就得按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改组。前一条出路不可想像,因为这是英国无产阶级所不能容许的,英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发展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与此相容的水平。因此就只剩下第二条出路。保护关税制在美国的结束归根到底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英国的胜利。

而德国呢?1878年已经在世界市场上争得了自己的地位的德国,现在正由于它胡乱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而逐渐丧失这种地位,它现在是否会仍旧顽固地通过对原料和粮食征收关税来给自己关上——而且是在面临着将比英国竞争更厉害得多的美国竞争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之门呢?德国资产阶级是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步美国的后尘,还是仍旧消极地等着,让已经强大起来的美国工业把容克和大工厂主结成的保护关税主义的卡特尔³³⁸压垮呢?最后,目前情况正需要投入一场工业斗争,对手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年轻最强盛的国家,它在几年的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偿还了巨额战争债务,它的政府正不知如何支配收来的税款;而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给德国的经济力量以新的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它们会不会懂得这是多么荒谬绝伦的做法呢?

德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终于干成一

件大事的机会。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 ,由于它太狭隘 ,太怯懦 ,它只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明 :它的戏已经演完了。

写于1892年11月9日和15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2年11月16日“前进报”

俄文译自“前进报”

第269号

署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亨利希·卡尔³³⁹

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的一个律师(后为司法参事)亨利希·马克思的家里。根据亨利希·马克思的儿子的洗礼证书可以看出,亨利希·马克思于1824年同全家一道弃犹太教而改信基督教。卡尔·马克思在特利尔的中学毕业后,从1835年起先后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以后又研究哲学;1841年,他在柏林提出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³⁴⁰,结果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他迁居波恩,打算在大学里任教,但是,政府对他在波恩的大学里讲授神学的友人布鲁诺·鲍威尔百般刁难,最后鲍威尔终于被大学解聘,这个事实使马克思很快就清楚地看出:在普鲁士的高等学校里是没有他的立足之地的。大约就在这同一时期,莱茵激进资产阶级年轻一代的一些持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代表,在同自由派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商妥之后,决定在科伦创办一家大型的反对派报纸;马克思和鲍威尔也被聘为该报的主要的经常撰稿人。当时办报所必不可少的许可证,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悄悄地领到了,于是,“莱茵报”就从1842年1月1日起开始出版。马克思写了一些长篇文章,从波恩寄给这家新创办的报纸;其中最重要的有: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批评,关于摩塞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的文章,以及另一篇关于盗窃林木和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文章。³⁴¹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的领导,并移居科伦。从这时起,该报开始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质。

而同时,对报纸的领导又是如此巧妙,尽管该报先后受到双重的、以至三重的检查(先由普通检查官检查,然后呈交行政区长官复查,最后还要由 ad hoc[专门]从柏林派来的冯·圣保罗先生检查一次),政府对这样一种报纸还是无可奈何,所以它决定从1843年1月1日起禁止该报纸继续出版。在这一天马克思退出了编辑部,报纸以此为代价获准缓期三个月,但是后来报纸终于还是被完全查禁了。

于是马克思决定到巴黎去,这时阿尔诺德·卢格在“德国年鉴”³⁴²大约与此同时被查禁之后,也准备到巴黎去。动身以前,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燕妮是马克思童年时代的女友,马克思早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就同她订了婚。1843年秋,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到巴黎,在这里马克思开始同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³⁴³,但是该杂志仅出版了一期;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的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在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卢格仍然保持黑格尔哲学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路线,马克思则热心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结果马克思转向了社会主义。1844年9月,弗·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克思,停留了几天;他们是从在“德法年鉴”共同工作时开始通信的,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合作,直到马克思逝世。这个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部驳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性著作(他们在黑格尔学派分裂的过程中同布鲁诺·鲍威尔之间也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即“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³⁴⁴(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马克思参加了在巴黎以“前进报”这个名称出版的一份篇幅不大的德国周报³⁴⁵的编辑工作,该报辛辣地嘲笑了当时德国专制制

度和冒牌立宪制度的空虚拙劣。普鲁士政府就以此为借口要求基佐内阁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这个要求被满足了;1845年初,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恩格斯随他之后也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³⁴⁶。此外,马克思有时还给“德意志-布鲁塞尔报”³⁴⁷写些文章。1848年1月,他同恩格斯一起受秘密的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春加入了这个团体)³⁴⁸。从那时起,“宣言”出版了许许多多经作者同意的和未经作者同意的德文版本,并被译成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

当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并且在布鲁塞尔也激起了人民的风潮时,马克思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比利时;这时,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邀请马克思重新到巴黎去,于是马克思又迁居巴黎。

在巴黎,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一起首先反对了组织军团的儿戏,因为这给新政府的多数派提供了一个摆脱“已经成为累赘”的外国工人的方便手段。很清楚,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组织起来的比利时军团、德国军团等等,只能在一出国境之后就堕入预先设置好的陷阱,而后来发生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为四百名失业的德国人争取到了和发给参加军团的人同样的路费,使他们也得以返回德国。

4月间,马克思迁往科伦;在他的领导下,从6月1日起在科伦开始出版“新莱茵报”,该报在次年5月19日出版了最后一号;威胁着编辑们的是:或者根据法庭命令被逮捕,或者作为非普鲁士国民被驱逐出境。马克思遭到的是后一种命运,因为他在居留布

Thomson's works

- 1/ Selections from the Speeches of Mr. Thos. Paine
- 2/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or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in
Human Society 1794.
- 3/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in a State of Nature 1794.
- 4/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5/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6/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7/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8/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9/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10/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11/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12/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13/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14/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15/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16/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17/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18/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19/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20/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21/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22/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 23/ On the Rights of Man 1794.

弗·恩格斯开列的卡·马克思著作的书单³⁴⁹

鲁塞尔期间脱离了普鲁士国籍。在该报存在期间,马克思曾经两次被陪审法庭传讯:1849年2月7日被控违反出版法,2月8日又被控煽动对政府的武装反抗(在1848年11月拒绝纳税期间);两次他都被宣判无罪。³⁵⁰

在“新莱茵报”被查禁后,马克思又回到了巴黎,但是在6月13日示威³⁵¹以后他被迫作以下的选择:或者是留在布列塔尼被拘禁起来,或者是再次离开法国。不言而喻,马克思选择了后者,于是他移居伦敦,并且从此以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在伦敦,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³⁵²(1850年在汉堡出版),总共出版了六期。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主要著作“从1848到1849年”阐明了这几年的事件,特别是在法国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和内部联系;此外,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写了许多书评和政治述评。在前一著作发表后不久,作为该著作的继续,出版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³⁵³(1852年在纽约出版,1869年和1885年在汉堡重版)。由于发生了科伦共产党人的大案件,他出版了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³⁵⁴(1853年在波士顿出版,最近一版于1885年在苏黎世出版)。从1852年起马克思担任“纽约论坛报”³⁵⁵的驻伦敦通讯员,并且在许多年当中可以说是该报欧洲栏的编辑。他的文章一部分署了他的名字,一部分则以社论的形式发表;这不是一些普通的通讯,它们是根据认真的研究写出的,而且往往是包含一系列对于欧洲某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详尽评论的文章。其中军事性质的文章——论克里木战争、印度起义等——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的关于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³⁵⁶有几篇曾经在伦敦以单行本重印出版。直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他才停止为“论坛报”撰稿。

1859年,马克思一方面同卡尔·福格特展开了由于意大利战争而引起的论战,这场论战是以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³⁵⁷(1860年在伦敦出版)作为结束的。另一方面,在这同一年,出版了他在英国博物馆进行了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³⁵⁸(1859年在柏林出版)。可是,第一分册刚出版,马克思就发现他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以后几个分册的基本思想发展中的一切细节,迄今保存下来的手稿³⁵⁹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于是他立刻重新开始工作,这样,他没有继续出版那几个分册,而是直到1867年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³⁶⁰(1867年在汉堡出版)。

马克思在写作全部三卷“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至少是初稿——的过程中,终于又得到机会同时在工人当中进行实际工作。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都曾经自命为该协会的创始人。不言而喻,像这样的组织不可能由一个人创立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

在建立国际时,朱泽培·马志尼也企图笼络那些团结在国际中的人,使他们接受他所宣扬的神秘的、充满密谋精神、以《Dio e popolo》[“上帝和人民”]作为口号的民主,让他们为这种民主效劳。但是以他的名义提出的章程和成立宣言草案被否决了,相反,得到通过的是马克思所拟定的草案³⁶¹;从此以后马克思就稳固地取得了对国际的领导。总委员会的宣言都是马克思写的,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版并翻译成大多数欧洲文字的宣言“法兰西内战”³⁶²。

在这里不可能叙述国际的历史。这里只须指出一点:马克思这样起草了章程以及它的原则性的绪论部分,以致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能在这个范围内一致地合作共事;这种联合的内部一致直到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出现时起就企图瓦解任何工人运动——出现以前,从未受到破坏。当然,协会的力量是以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渴望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事实为基础的;总委员会除了道义手段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手段,它甚至连经费也没有:总委员会并没有所谓的“国际的百万财产”,它所有的大都只是债务。用这样少量的钱做这样多的事情,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已不可能在欧洲存在下去。如果继续用旧的形式同政府以及在所有国家都同样狂怒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就会付出巨大的牺牲。此外还要在协会内部进行反对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同他们同流合污的蒲鲁东分子的斗争。Le jeu ne valait pas la chandelle〔得不偿失〕。因此,当在海牙代表大会³⁶³上在形式上也取得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胜利之后,马克思提议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这样就保证了协会继续存在下去,准备迎接由于局势的变化而必须在欧洲恢复协会的时刻到来。但是当这样的局势实际到来时,旧的形式已经过时了,运动大大超过了旧的国际。

从那时起马克思不再进行公开的鼓动,但同时他仍然和过去一样积极地参加欧洲和美洲的工人运动。他几乎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通信,他们在紧要关头,只要有可能,总是亲自向马克思本人请教。他愈来愈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公认的和有求必应的顾问。但是,除此之外,这时马克思却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科

学研究工作上来,同时研究的范围也已经大大扩大了。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主要是为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写出关于地租的章节,而在他以前没有人试图这样做过。马克思除了能以所有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自由阅读以外,还学习了古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但是很可惜,日益严重的疾病妨碍了他去利用这样收集起来的材料。1881年12月2日他的夫人去世,1883年1月11日他的大女儿去世,就在同一年的3月14日,他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中静静地与世长辞了。

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多数都是错误满篇。唯一可靠的传记是发表于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的1878年“人民历书”中的那篇传记(作者恩格斯)。³⁶⁴

现在把马克思的已经发表的著作尽可能详尽地开列如下:

1842年在科伦“莱茵报”上发表的有:关于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摩塞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关于盗窃林木的文章;该报1842年10月至12月的社论。在“德法年鉴”(阿·卢格和卡·马克思合编,1844年在巴黎出版)上发表的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4年在巴黎报纸“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未署名)。——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1848年在布鲁塞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燕妮·龙格。——编者注

弗·恩格斯开列的他本人的著作的书单365的第一页

弗·恩格斯开列的他本人的著作的书单的第二页

尔出版)上发表的一些署名和未署名的文章。——“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德文版: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的第二版。西班牙文版:1891年在马德里出版。——“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英文版:1888年在波士顿出版。德文版: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最新德文版:1890年在伦敦出版;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都已有译本。——在“新莱茵报”(1848—1849年在科伦出版)上发表的文章及社论等。其中“雇佣劳动与资本”曾多次出版单行本,最新版:1891年在柏林出版;已有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法文译本。——“两个政治审判案”,1849年在科伦出版(包括马克思的两篇辩护词)。——“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在汉堡出版,共出6期。其中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从1848到1849年”。同恩格斯合写的书评和每月述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在纽约出版。第三版:1885年在汉堡出版。已有法文译本。——“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在巴塞尔出版(全部被没收);1853年在波士顿出版。最新版:1885年在苏黎世出版。——1852年至1861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于1856年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增订本)。1856年6月至1857年4月以前先后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辉格党大臣们对俄国的经常的自私自利的依赖)³⁶⁶。——在“人民报”(1859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文章³⁶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在柏林出版。1890年出波兰文译本。——“福格特先生”,1860年在伦敦出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

言”，1864年在伦敦出版；其次还有总委员会的所有文件，其中包括1871年在伦敦出版的“法兰西内战”（最新德文版：1891年在柏林出版；已有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译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1867年在汉堡出版；最新第四版1890年出版。已有俄文、法文、英文、波兰文和丹麦文译本。——“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在汉堡出版；第二版在印刷中。已有俄文译本。第三卷将在1893年问世。

写于1892年11月9日和25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2年“社会政治科学手册”
第4卷

俄文译自“社会政治科学手册”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³⁶⁸

“人民论坛”发表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写一个简短的驳斥。

虽然作者似乎尽力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地阐述自己的主题，但实际上，他却把它叙述得像无政府主义者老爷们自己叙述的和他们所希望叙述的那样。譬如说，他对巴枯宁派的材料旁征博引，对巴枯宁派的日内瓦对手们所公布的材料则引用得很不够，至于伦敦总委员会的材料，那就根本不提了。

我只从一篇文章（11月12日第十篇）中举出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杜撰。

说总委员会1871年在伦敦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代表会议³⁶⁹，“只有瑞士无政府主义各支部没有接到通知；但是，它们得悉这一意图”云云，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代表会议的公开和秘密的程度，同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一样；不在报纸上宣扬，也不邀请记者到会。

汝拉各支部当时公开与总委员会对抗，同总委员会没有保持

任何正式联系。相反，在总委员会里却有两个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秘密团体的成员：罗班和巴斯特利卡，他们是根据“独裁者”马克思的建议选进来的。恰好是罗班保持了同汝拉各支部的联系；他早在1871年3月就以它们的名义建议召开那次后来又被它们否认的代表会议，而且还把召开代表会议的事通知了它们。其他的一切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鬼话。

代表会议

“本来准备在马克思家里召开……在马克思的住宅里举行了……”。

愚蠢的谎言；代表会议是在所谓的法兰西区的托登楠大院路附近一家“蓝柱”小酒馆里举行的。

代表会议的成员也说得不对；有争论的地方也不是章程中的一段，而是章程的绪论部分中的一段。这一段是这样写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第一个地方性的巴黎（蒲鲁东主义者的）委员会，在自己的法文译本里把它歪曲成这样：

“……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让位于它的伟大目标”。³⁷⁰

日内瓦代表大会³⁷¹的文件在通过法国国境时被波拿巴的警察没收了，只是由于英国外交部出面干预，这些文件最后才物归原主，就在文件被没收的那段时间里，巴黎的旧译文又在日内瓦被匆忙地重新印了出来，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能够据此断言，仿佛日内瓦代表大会就是那样决定的。总委员会受同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委托于1871年出版了英文、法文和德文标准本章程³⁷²，这样就最后戳穿了这种招摇撞骗的行为（当然，这是使无政府主义者大大扫兴的）。现在在我面前就放着马克思把日内瓦代表大会通

过的改动记在上面的那份章程,这些改动只限于章程的条文本身,完全没有涉及绪论部分。

其次,说伦敦代表会议决定把

“汝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置于日内瓦委员会的号令之下”,

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就在这里,我对作者的意图的正直性产生了一些怀疑。他究竟是会认字还是不会认字。如果说他会认字,那末他在代表会议的决议里只能够读到:(1)撤销汝拉委员会(擅自使用)的罗曼语区委员会这一名称,并把这一名称授给原先的日内瓦委员会;(2)号召汝拉方面妥善解决他们同日内瓦方面的争端;(3)如果这点不能做到,那末他们应当建立他们自己的联合会,定名为“汝拉联合会”。³⁷³因此,代表会议所作的,只不过是完全让日内瓦方面和汝拉方面都在他们自己自治范围内行事。

总而言之,这位作者不论真正是或者假装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在一切方面都听信可怜的被诽谤的无政府主义者羔羊的话。对于这些老爷们认为不必要谈的事情,我们这位如此权威的作者根本一无所知,所以他对构成整个争端的内幕方面的东西也一无所知。在巴枯宁创建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同盟,它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国际的领导权弄到无政府主义者手里。³⁷⁴这个秘密的同盟广泛地分布在汝拉,分布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总委员会最先是从小西班牙获得这件事的证据,后来又从小日内瓦得到了与这一反对欧洲工人运动的无辜的阴谋有关的章程和大批其他文件。就是根据这些文件,海牙代表大会在1872年才做出决定,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³⁷⁵为了驳斥目前又在冒头

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件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的始末的捏造，可以读一读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伦敦、汉堡版；科柯斯基的德文译本：“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1874年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³⁷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11月15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11月19日“柏林人民论坛”报第47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论坛”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³⁷⁷

最近有些唯理论的民族学家以否认群婚为时髦；因此，下面这篇我从1892年旧历10月14日的莫斯科“俄罗斯新闻”上译出的报道是值得一读的。它不仅明确地肯定了存在着极其盛行的群婚，即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相互间性交的权利，而且肯定了这种群婚具有跟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婚姻，即群婚的最发展最典型的阶段非常接近的形式。典型的普那路亚家庭是由一群兄弟(同胞的或较远的)跟一群同胞的或较远的姊妹结婚而组成的，而在库页岛上，我们看到，一个男子是跟自己兄弟的所有妻子和自己妻子的所有姊妹结成婚姻的，如果从女子方面来看，就是这个男子的妻子有权跟她的丈夫的兄弟和她的姊妹的丈夫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它跟典型的普那路亚婚姻形式的区别，只在于丈夫的兄弟和姊妹的丈夫不一定是同一些人。

其次应该看到，我在“家庭的起源”一书第4版第28—29页所讲的，在这里也被证实了。那里讲到，群婚绝不像我们的庸人的惯于妓院的幻想所描绘的那样；实行群婚的人们，并不是公开过着庸人暗中所过的那种淫荡生活；这种婚姻形式，至少就现在还可以遇见的例子来看，与不牢固的对偶婚制或跟一夫多妻制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只不过是许多在其他条件下要遭受严厉惩罚的性交情事，在这里却为习俗所许可而已。³⁷⁸至于这些权利的实际行使正

在逐渐消灭，那只不过证明这种婚姻形式本身正在消亡，它的极少流行，也可证实这一点。

此外，整个这篇描述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它再一次表明：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原始民族的社会制度，在其基本特征上，是多么相似，甚至相同。关于库页岛上这些蒙古种人的记载，大部分都适用于印度的德拉维达部落、太平洋各岛屿发现时的岛上的土人，以及美洲的红种人。这篇报道写道：

“尼·安·杨楚克10月10日 旧历；新历为10月22日 在莫斯科 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会议上提出了施特恩堡先生的关于库页岛吉里亚克人³⁷⁹的有趣的报告，吉里亚克人是一个很少被人研究并处在蒙昧人的文化阶段 上的部落。吉里亚克人不知有农田耕作和陶器术，主要靠渔猎为生，用投入炽热的石头将木槽里的水温热，等等。特别有趣的是他们的家庭和氏族制度。吉里亚克人不仅把自己的生父叫做父亲，而且把自己生父的一切兄弟也叫做父亲，把生父的兄弟的妻子和自己母亲的姊妹全都叫做母亲，把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的子女统统叫做自己的兄弟和姊妹。如众所周知的，北美的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以及印度的一些部落，都有这样的称呼法，不过在他们中间，这种称呼法早已跟现实不相符合了，而在吉里亚克人中间，这种称呼法却表明迄今仍然存在着的秩序。直到现在每一个吉里亚克男人对自己兄弟的妻子以及对自己妻子的姊妹都有丈夫的权利，至少行

“莫斯科”这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阶段”，而是“程度”。——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而是“所有这些亲属”。——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称呼法”，而是“术语”。——编者注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使这些权利并不认为是被禁止的事情。这些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群婚的残余，颇似本世纪上半叶还在散得维齿群岛存在着的有名的普那路亚家庭。家庭和氏族关系的这种形式是吉里亚克人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他们的氏族制度的基础。

吉里亚克人的氏族，是由他的父亲的一切兄弟（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由这些兄弟的父亲和母亲、由他的兄弟的子女及他自己的子女组成的。显然，这样构成的氏族，可能有大量的成员。氏族的生活是按下面的原则来进行的。氏族内部是绝对禁止通婚的。死者的妻子，根据氏族的决定，转嫁给死者的同胞的或名义的兄弟 其中的一个。氏族养活自己的一切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我们没有乞丐——一个吉里亚克人对报告人说，——谁穷，哈里 氏族 就来养活他。’氏族成员由共同的祭祀和节日、共同的坟地等联系起来。

氏族保障自己每一个成员的生命与安全，防止不属于本氏族的人对他的侵害。惩罚的手段是血族复仇，但是在俄罗斯人的影响下，这一制度的作用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妇女被完全排除在氏族复仇的行动以外。在有些场合（不过这种场合是极少见的），一氏族收养他氏族的人。通例是财产不得拿出死者的氏族以外。在这一方面，吉里亚克人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十二铜表法的一项有名的条文：《*si suos heredes non habet, gentiles familiam habent*》“如无继承人，应由同氏族人继承”。³⁸⁰吉里亚克人生活中任何一件非常的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不许可的”，而是“罪恶”。——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群婚”，而是“氏族婚姻”。——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家庭和氏族”，而是“家庭和亲属”。——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而是“（所有亲等的）”。——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同胞的或名义的兄弟”，而是“‘任何亲等的’兄弟”。——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氏族”，而是“哈里”；不是“不属于本氏族的人”，而是“另一哈里的人”。——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惩罚的手段”，而是“手段”；不是“血族复仇”，而是“氏族复仇”。——编者注

事件,都非有氏族的参与不可。氏族长者,在不久以前,大约一两代以前,还是社会的首领,即一族之‘长’。不过,现在,氏族长者的作用只是领导宗教仪式了。氏族往往散居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不过,同氏族人在分散以后,仍继续互相惦记着,互相来往作客,互相帮助和庇护等等。而且,吉里亚克人如无特别的需要,绝不舍弃自己的同族人和自己氏族的坟墓。氏族生活习惯,给吉里亚克人的全部精神,给他们的性格、习俗和制度,都打上了显著的烙印。共同讨论一切事情的习惯,经常维护同氏族利益的必要性,血族复仇方面的连环关系,和几十个同伴一起住在一个大帐篷里的必要性和习俗,总之,经常生活在人群当中,使吉里亚克人养成了一种非常合群非常健谈的性格。吉里亚克人是非常好客的,他们爱招待客人,自己也爱作客。好客的高尚习俗,在不幸的日子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困难的年月里,当吉里亚克人自己和狗都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并不伸手去乞求施舍,他可以有把握地去作客,而且在那里有时可以被养活很长一个时期。

在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中间,几乎完全遇不到贪图私利性质的犯罪。吉里亚克人把自己的贵重东西存放在仓库里,从不锁门。吉里亚克人极富于羞耻心,如果他揭露干了什么不名誉的事,他便会到大树林里去上吊。在吉里亚克人中间,谋杀事件是十分罕见的,大都是只有在激怒中才杀人;不管怎样,他们都没有贪图私利的目的。在和其他人的关系上,吉里亚克人表现得真诚、守信用和忠厚。

吉里亚克人虽然长期隶属于中国化的满族人,虽然受了阿穆尔边区移民的极端有害的影响,但是在道德方面仍保存着原始部落所固有的许多美德。不过他们的生活制度的命运已经不可扭转地被决定了。再过一两代,大陆上的吉里亚克人将完全俄罗斯化,他们在接受文化上好的东西的同时,也将承受文化上坏的东西。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距俄国人定居地的中心多少远一些,因此有可能保持纯洁稍微久一些。不过邻近的俄国居民对他们也已经开始有所影响了。各村的人都纷纷到尼古拉也夫斯克去购买东西和谋生,而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血族复仇”,而是“复仇”。——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是“内部关系”。——编者注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移民”,而是“无赖居民”。——编者注

每个挣了工钱返回故乡的吉里亚克人，便带回了像工人从城市带到俄罗斯乡村的那种气氛。此外，在城市里谋生及其变化不定的运气，愈来愈破坏那种原始的平等，这种平等构成吉里亚克人这样的民族的简单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

施特恩堡先生的论文还搜集了有关吉里亚克人的宗教观点、宗教仪式、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材料。该文将刊载在‘民族学评论’³⁸¹上面。”

写于1892年11月底—12月4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
第1卷第12期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法律习惯”。——编者注

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³⁸²

敬爱的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遗憾的是，我没有可能参加这次大会。

在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同时，我不能不对你们队伍中发生的纠纷表示深深的遗憾。我决不是要进行干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不仅没有负有使命，而且由于对情况不够了解也没有这种可能。我只能表示愿望，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上能顺利解决分歧和消除分裂的危险。

祝党代表大会获得最大的成功。

你们的 弗·恩·

写于1893年1月初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手稿中在这后面有一句话被划掉：“为匈牙利党保存保·恩格耳曼同志这样一个无疑是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编者注

关于巴黎警察当局 不久前的行径³⁸³

巴黎的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宣扬，说什么警察当局破获了一个极其卑鄙的阴谋。据说有几个“俄国虚无主义者”阴谋要把那个温和的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干掉；但是警察当局有所戒备，“谋杀案的主犯”被抓住了，俄罗斯祖国的慈父得救了。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弄明白，“俄国虚无主义者”之所以荣膺这样一个称号，只是因为同俄国的虚无主义 [nihil] 毫无共同之处。这仅仅是一些不幸在彼得堡的慈父沙皇统治下出生的波兰人；他们非常规矩而谦逊地居住在巴黎，决没有幼稚到要去搞谋杀阴谋，——有理智的人现在把这种事让给警察当局去干了。单是不得不宣布这些“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波兰姓氏这一点，就使警察当局也觉得谋杀和阴谋的说法很不妥当了。警察当局不得不通知它的哈瓦斯通讯社和路透通讯社说，这些人仅仅被驱逐出法国国境。

到处都掀起这种叫嚣，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很简单。

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者——部长、参议员、众议员——都无一例外地同巴拿马丑闻³⁸⁴有关：有的是受贿人，有的是同谋犯和包庇者。然而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社会舆论注意他们的卑鄙龌龊活动的这一方面已经太久了。他们想：全世

界说我们以骗人勾当破坏了共和国信誉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现在让他们看看，我们在政治方面也能使这个共和国威信扫地，我们让他们看看，在对沙皇卑躬屈节方面，我们能够大大地超过已故的俾斯麦。俄国大使馆希望了解波兰流亡者的档案，那我们就来证明我们强烈希望把它所想要的一切都敬献给它，不仅把档案，而且连波兰人也一道，要是有必要，则把整个法国都敬献给它！

如果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而自趋灭亡，那对我们只有好处。它的继承者已经等在门外——这决不是保皇派，保皇派虽然又十分积极地开始搞阴谋活动，但是他们并不危险；这些继承者将是社会主义者。然而这些法国现今的统治者的愚蠢也可能使我们受到损害。他们讨好官方的俄国，央求它的恩宠，他们舐它的长靴，他们在这帮俄国痞棍面前低三下四，他们把沙皇捧为法国的真正主宰和法国政治的领导者，而实际上沙皇自己却处于完全不能给法国以任何实际帮助的困难境地。今年冬季证明，俄国的饥荒将持续若干年；国内的资源已枯竭，并且长时期不能恢复，财政状况简直是糟透了。不是法国需要俄国，恰恰相反，正是俄国没有法国的道义支持就会完全失掉活动的能力。只要这些法国资产者稍微有点常识，他们无需用金钱和战争就能够迫使他们的俄国同盟者去做一切。他们不是这样，而是跪着向它哀求，并且让自己被利用来满足俄国的国家目的，这一点就连普鲁士在它的最受屈辱的时期也是没有做过的。可是他们还以为他们做得很巧妙，他们想都没有想到，彼得堡正在嘲笑他们这些蠢人！

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很值得为巴黎做一次弥撒，这是亨利四世在以改信天主教换得巴黎投降时说过的话。La France vaut bien une Marseillaise——很值得为法国奏一次“马赛曲”，这

是亚历山大三世在他政治上无能为力，毫无出路的最紧张时刻而
海军上将热尔韦却把法国奉献给他³⁸⁵时说过的话。

写于1893年1月1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3年1月13日

俄文译自“前进报”

“前进报”第11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³⁸⁶

—

“意大利呀，意大利呀，那里的坏蛋是多么厉害啊！”——德国的一支大学生歌曲中关于意大利的臭虫和跳蚤这样唱道。可是，那里除了六条腿的坏蛋外，还有两条腿的坏蛋，而且 la bella Italia（美丽的意大利）千方百计地想要表明，它在这方面既不亚于发生巴拿马案件的国度——la belle France（美丽的法国），也不亚于有信教习谷和韦耳夫基金³⁸⁷的国度——纯洁和畏神的德国。

在意大利，发行纸币的有六家银行：两家托斯卡纳的，一家那不勒斯的，一家西西里的和两家罗马的，即罗马银行和国民银行。这六家享有特权的银行的银行券根据一项法律作为足值的支付手段进行流通，而这项法律的有效期在几年以前就满了，但是后来一年又一年地延长，一直延到1892年12月31日，最后，又延长了三个月——到1893年3月31日。

还在克里斯比内阁时期，即在1889年，由于必须对这种银行特权重新加以确定，又鉴于当时传播着令人不安的流言，曾经下令调查这些银行的业务。对国民银行的调查是由参议员孔西利奥进行的，对罗马银行的调查则是由参议员阿耳维西进行的，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为了帮助他，还派了财政部的一位干练官员比亚

季尼去给他当鉴定家。孔西利奥发现了什么，至今一无所闻；而阿耳维西的报告及其所附的全部证明文件，在阿耳维西死后，人们得到了一份通常认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副本，由此也就产生了意大利人所谓的《panamino》，即小巴拿马。

当时克里斯比内阁一声不响地把阿耳维西的报告压下不管。阿耳维西在参议院中几次提到这件事，威胁要把事情闹出来，但是每一次都让别人堵住了嘴。当原来下令进行调查的大臣米切利由于又要使银行法的有效期延长一年而在议会委员会中做了一个替罗马银行大肆吹嘘的报告，并且坚决请求他的朋友阿耳维西不要以揭露来损害他和国内信贷机关的声誉时，阿耳维西也保持了沉默。不久，克里斯比垮台，鲁迪尼上台；后来鲁迪尼垮台，成立了现在执政的焦利蒂内阁。规定要改组银行并将其特权延长六年的确定的银行法，仍然没有着落。谁也不想去碰这个危险的诱饵。就像在儿童游戏“还没灭！”中阴燃着的松明一样，这个法律辗转相传，最后到12月21日，最后一点火星才用最违法的方式无情地踩灭掉。

还在1892年12月6日，根据焦利蒂的建议，提出了一个关于把银行特权延长六年的法案。但是由于暗中有关于在银行管理中有严重舞弊行为的令人不安的流言在传播，焦利蒂在12月21日就要求把该法律的有效期仅仅延长三个月，即延到3月31日。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议员科拉扬尼起来发言，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宣读了阿耳维西关于罗马银行的总报告和比亚季尼关于他对账本和原有现金进行审核的结果的专门报告中的个别段落。于是就暴露出来了惊人的事情：非法超额发行的银行券达900万法郎；银行的现金同黄金储备混在一起（这对银行行长和出纳员来说极其便利，但

银行章程是禁止这样做的) ;总存量全部是根本不能兑现的空头票据 ; 曾经从银行基金中拨出了7300万贷款发放给179个特权人物 , 其中3350万仅仅发给了19个人。在银行的债务人中间 , 有借款超过100万的银行行长汤隆古和借款400万的银行监事长朱利奥·托洛尼亚公爵 , 等等。此外 , 科拉扬尼一个名字也没有提到 , 但他暗示他知道的比说的还要多 , 并且要求议会对银行的业务进行调查。

接着另一位议员加瓦齐宣读了阿耳维西报告中的另外一段 , 其中谈到罗马银行给律师、新闻记者和政界人物发放了巨额贷款 , 这些特殊的顾客得到的钱将近1200万 , 而在已经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内却没有列入。

在克里斯比内阁期间下过调查命令的前大臣米切利这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与这件事有关的三个内阁首相焦利蒂、克里斯比和鲁迪尼也相继跳了起来 , 宣称所有这些揭露全是捏造。

他们在发言时是多么义愤填膺啊 ! 即使德国的商品推销员在被人揭露他拿好样品给人订货 , 却用最次品交货的时候 , 也不可能燃起如此高尚的怒火的。

同一天 , 议员们在议会出纳处换掉了5万法郎以上的罗马银行的银行券 , 而银行的股票 (票面价值为1000法郎) 下跌了100法郎。然而在大臣们的豪言壮语之后 , 到傍晚时 , 证券交易商们又重新振作起来了。人们以为这桩丑闻已经了结 , 事情已成过去。

二

可是科拉扬尼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情况 , 而且他所谈的恐怕还不及调查报告中的三分之一。银行行长汤隆古、总出纳员拉

扎罗尼和监事长托洛尼亚完全是按家庭式地发放了近900万的贷款。而且，按照汤隆古的说法，这个银行的管理一般都是“按家庭式的”——*patriarcalmente*；按家庭式到如此程度，竟然把作工商业优惠贷款用的基金凭不可靠的、实际上无担保的抵押发放出去或者发放给那些把工业仅仅理解为从事各种各样投机勾当的人，凭不断延期的票据或者甚至按公开的往来户进行发放。按家庭式到如此程度，竟然渐渐使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和不少于一百五十位本届众议院议员，即大部分明明是没有支付能力或甚至仅仅靠借债度日的人，成了银行账本上的债务人。阿耳维西的报告还附有这些顾客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除了唯一的一个右派议员阿尔比布外，都是几乎包括所有派别的左派议员，而且每人的借款数为50—60万法郎。在这些中间，还有一位其姓氏深受全世界尊敬的人，和本届政府的两位大臣——格里马耳迪和马尔提尼；格里马耳迪甚至还是银行的法律顾问之一，年薪25 000法郎。这已经非常可观了，但这些都是1889年的事情，还仅仅是开始，甚至还不是小巴拿马，而只不过是 *panaminetto*，即很小很小的巴拿马。

关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勾当的传说（其中当然也有夸大的），在科拉扬尼的发言推动下，就一个接一个地渐渐在人们中流传开来。人们开始从罗马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在几天之内就从存款总数1400万中提取了900万以上），并且怀着不信任的态度来接受它的银行券。政府感到，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么多年来一届政府推给另一届政府去办的事情（妥善地解决关于银行和纸币的问题），现在应当火速予以解决。在1月的头几天内，关于把两家罗

马银行和两家托斯卡纳银行合并为一家大的信贷机关的谈判就开始了，同时内阁发布了关于重新检查银行的命令。应当成为新机构核心的国民银行自然拒绝无条件地承担罗马银行的一切过失；因此它进行阻挠，顽固地讨价还价。所有这些被人们知道了；于是不信任变成了张惶失措。罗马全市从罗马银行中提取了100万以上的存款，储蓄银行也从那里取出了50万法郎以上的存款。罗马银行的股票在科拉扬尼的发言后跌到670法郎，1月15日的牌价只有504法郎，尽管票面价值是1000法郎。在意大利北部，已经开始拒绝接受这家银行的银行券了。

但是这时传出了关于对罗马银行进行重新检查的更加惊人的结果。诚然，朱利奥·托洛尼亚公爵偿还了债务：1月13日他还了400万法郎，1月14日又还了60万，15日还了余下的200万。诚然，行长汤隆古和出纳员拉扎罗尼为了偿债而把自己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银行。诚然，“一位显贵”（“那不勒斯信使报”³⁸⁸以此明显地暗指国王）偿还了大臣格里马耳迪及其家属的银行债款。诚然，激进立宪派议员福提斯声称，他是作为银行的法律顾问取得贷款的。但是，这些怎么能同下面这个消息相比，这个消息说，根据重新检查的材料，只有权发行7 000万银行券的罗马银行，共发行了银行券13 300万；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在银行账本上开列了一些虚构的债权人，在他们名下记了总数达4 900万的账；行长汤隆古凭一张注明1893年1月3日这样近的日期的普通收据领取了2500万（1月21—22日的“世纪报”³⁸⁹）。有人还说，黄金储备虽然没有发生问题，但只是因为：总出纳员的侄子米凯莱·拉扎罗尼男爵曾经专门为此

向他在瑞士的实业界朋友借了好几百万现款，挪用几天，答应在检查后立即 *in natura*（用原物）归还这笔钱；不过，这需要作一番相当的努力，因为政府当时把罗马银行的全部基金查封了。事情的揭露已经到处引起了满城风雨，150个议员的名字被人们多少准确和明确地提到，于是再也不能否认，至少最近三届内阁是知道这件事的，它们为了进行选举活动，经常把大笔银行现金交给自己的拥护者使用，它们常常在内阁会议上讨论这些盗用的公款，它们完全了解自己对盗用公款所应负的责任，而有意识地加以隐瞒，因而就助长了继续盗用公款。

在这一切之后，终于在1月19—20日的“那不勒斯信使报”上发表的比亚季尼的报告显得多么平淡啊！小巴拿马确有其事。

三

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了。在这些同银行一道干过欺骗勾当、挥霍浪费过银行基金（不言而喻是用诚实贷款的方法）的人中间，一部分人握有政权，另一部分人则没有掌握政权。很自然，把刀子一按到他们脖子上，前一部分人就把后一部分人牺牲了。一个共犯者采取了充当另一个共犯者的刽子手的崇高决定。同法国的情况完全一样。那里就是鲁维埃、弗洛凯和弗雷西讷之流把累塞普斯和丰唐这些人牺牲了，而累塞普斯和丰唐正是经常被他们及其共谋者“把刀子按到脖子上”（照沙尔·累塞普斯的说法），来从巴拿马骗局中榨取政治活动的经费的。同样焦利蒂和格里马耳迪也把自己的挚友汤隆古牺牲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前任先前曾向这个人勒索银行的钱财来从事选举活动，来办自己的报刊，一直勒索到只剩

下一条出路——破产。而当格里马耳迪的债款通过上述神秘方式偿还之后，他就比任何人都更高声地要求逮捕汤隆古了。

但是汤隆古是一个老江湖，一个饱经世故的老意大利人，在骗人行当中决不是年轻没有经验的新手，不像曾不得不为赖纳克之流安排巴拿马骗局的沙尔·累塞普斯及其他傀儡那样。汤隆古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每天清早4点钟都要去做弥撒，有些代理人 and 中间人是他不愿在自己银行的办公室里见到的，——“小乖乖，你不要使我难为情，”，——他就在做弥撒的时候同这些人打交道。汤隆古同梵蒂冈的关系很好，他就把一个文件匣子交给了意大利警察当局所望尘莫及的梵蒂冈保管，那里面所装的正是那种能保证使他不致遭受有势力的朋友和庇护人谋害的文件，这种文件他是不愿过于仓卒地托付给司法当局的。因为意大利在出现了小巴拿马案件时的情形也同法国出现了巴拿马案件时一样，人们非常怀疑司法当局到家里去进行搜查有时不是为了发现某些证明文件，而是为了使这些证明文件完全消失。于是汤隆古决定，这种能对他起保护作用 and 揭露事实真相的文据不应当保存在意大利预审推事手里，而只能够保存在梵蒂冈。

再接着上面的说吧。当内阁一同国民银行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后者承担罗马银行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且负责按每股450法郎（股票价值是1 000法郎）付款给股东；当内阁一觉得可用这个协议保证不公布那些欠银行钱的政界人物的名字，勇敢的汤隆古就不能不立即看到，在资产阶级政治里，对效劳所给予的报酬是忘恩负义。从1月16日傍晚起，他的家门口就布置了岗

哨；1月19日，他和总出纳员拉扎罗尼被捕了。

对他来说，这决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还在早些时候，他就对“议会报”³⁹⁰的一个编辑说过：

“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但是希望他们明白，这是自找麻烦……如果想要我为别人的过错承担责任，那末我就要把事情闹出来……他们不是想要使我破产吗？那时我要公开宣布那些曾经成百万成百万地向我勒索的人的名字。我曾屡次说这些钱不能给，但是回答总是一个：这些钱是必需的（occorrono）。而且我有证据……经常都是这样；我越是为他们效劳，他们越是往我脸上吐唾沫；但是如果我现在垮台，那末跟我作伴的就大有人在。”

而当这个起初被拘禁在自己的豪华宅第里的有病的老人，于1月25日被带往雷季纳·切利监狱去时，他对押送他的官员说道：“我去，但是我保留揭露的权利。”他对他的家属说道：“他们希望我死在监狱里，但是我还有足够的力量来为自己报仇。”

看来这个人在公开审讯时不会像巴黎的巴拿马案件中的经理们那样百依百顺的，不会像他们那样不以自己所掌握的更严重十倍的罪证来打击原告，而用沉默来为自己哀求宽大判决的。虽然汤隆古患有痛风病，但是报纸说他是一个高大而结实的人，是一个“真正七十高龄的胸甲骑兵”；他过去的一切说明，他懂得：只有最激烈的斗争和最顽强的反抗才能救得了他。因此，必有一天，著名的 *cassetta d'oro*（金匣子）会从梵蒂冈搬到法庭，它里面的东西将会摆到法官的桌子上。愿他一切顺利！

然而就在1月25日那一天，议会又重新开会，这件丑事在那里也闹开了。焦利蒂能够对他的150名议员高声叫喊的，只是鲁维埃对自己的104名议员高声叫喊过的东西：要是我们不拿这些钱，你们就不可能在这里开会。这也确实如此。克里斯比和鲁迪尼所能说

的也只是这些话。然而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接着必然会有进一步的揭露——不论是在议会中，还是在法庭上。小巴拿马案件也同巴拿马案件一样，目前还只是处在开始阶段。

整个这一事件的寓意是什么呢？——不论是巴拿马案件，小巴拿马案件，还是韦耳夫基金，都证明：目前资产阶级的全部政治——不论是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愉快争吵，还是它们对工人阶级的冲击的联合反抗——不花费大笔金钱是不能实行的；这大笔钱都是用于不能公开说明的目的；由于资产者先生们的吝啬，政府已越来越不得不为了这些隐讳的目的而用隐蔽的方式去谋取资金。这方面的行家俾斯麦曾经说过：“我们在哪里找到钱，就从那里取用。”至于“我们在哪里找到钱”，这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写于1893年1月26日和29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3年2月1、2和3日
前进报”第27、28和29号

俄文译自“前进报”

CARLO MARX e FEDERICO ENGELS

I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CON UN NUOVO PROEMIO AL LETTORE ITALIANO



FEDERICO ENGELS

Centesimi 25

MILANO
Uffici della CRITICA SOCIALE
Portici Galleria, N.º 23

—
1893

“共产党宣言” 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扉页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 1893年

意大利文版序言³⁹¹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了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在这一天米兰和柏林发生了革命，即发生了两个民族——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中心——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割据和内讧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曾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3—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末，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³⁹²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立，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智慧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

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也就不能不使直到当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获得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四十五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高涨，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集中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存在的政治条件下，能有什么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的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四十五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良好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

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的
意大利文版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欧洲能否裁军？

欧洲能否裁军？³⁹³

写于1893年2月

原文是德文

以一组文章的形式（没有序言）载于1893年3月1—5、7、9和10日“前进报”德51—56、58和59号，并于1893年3月底出版附有序言（3月28日写）的单行本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序 言

序 言

这里重印的几篇文章曾于1893年3月、即帝国国会就军事法草案进行辩论期间，在柏林的“前进报”上发表过。

我的这些文章是以下面这个日益获得普遍承认的前提为出发点的：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末，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

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在目前的各国政府和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因此，我从这种情况出发，暂且只提出那种每一个现政府都能接受而无损于其国家安全的措施。我只打算说明，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逐步废除常备军，是绝对没有任何障碍的，而如果这些军队保存下来，那末这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句话，军队的使命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

针对这一点，我认为通过国际协议来逐步缩短服现役的期限（这是我的论断的基本点），一般说来是普遍由常备军过渡到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装的最简捷的办法。这种协议的形式自然有可能随签订协定的政府的性质相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改变。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再好也没有了；所以，如果现在就能把最多两年的服现役期限作为起点，那末再过几年也许就可以规定短得多的期限了。

我提出对男性青年一代实施体育和军事的训练作为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从而清楚地说明了：绝对不应当把这里所建议的民兵制度和现存的任何民兵形式，例如和瑞士的民兵形式混为一谈。

弗·恩格斯

1893年3月28日于伦敦

—

整个欧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在竭尽全力要彼此超过。恰好在现在,德国政府又要求人民作出甚至现在这个温顺的帝国国会都感到可怕的特别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裁军不是愚蠢吗?

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几乎完全承担了提供兵员和缴纳大部分赋税的义务的广大居民阶层都在呼吁裁军。而各个地方的努力都已经达到了力量(有的地方是新兵,有的地方是金钱,也有的地方二者都是)开始耗竭的程度。难道除了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的毁灭性的战争以外,就没有摆脱这个绝境的其他出路了吗?

我肯定说: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它甚至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德国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国家更有力量和责任来实现它。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之后,最终证明了包括预备队和后备军³⁹⁴在内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甚至就是在当时的畸形的普鲁士形式下——优越于可以找人代役的征兵制。大陆各国都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采取了这种制度。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巨大的不幸。主要预备队由壮年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按其性质来说,比起根据征兵制组成、有大批代役兵即职业雇佣兵的路易—拿破仑的军队来,侵略性是较少的。但是又加上了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兼并的结果,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正如

提尔西特和约对普鲁士那样。³⁹⁵于是法国和德国就开始了狂热的军备竞赛，渐渐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也卷进来了。

开始是延长后备军的服役期限。在法国，地方部队获得了由年龄较大的人组成的预备队；在德国，恢复了第二类后备军，甚至恢复了民军。³⁹⁶这样一步一步地继续下去，直到自然的年龄极限为止，甚至还超过了这个极限。

然后是扩大应征人员的名额，并相应地造就了一批新的干部来训练新兵；但是就在这方面也几乎或者完全达到了年龄的极限，而在法国甚至已经超过了极限。最近几年来，在法国军队中应征入伍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一些还不能或者根本不能负起兵役重担的青年。曾经观看过1891年在香槟举行的大演习并完全承认、有时甚至是带着赞叹的口吻承认当前法国军队的战斗素质很高的英国军官，在这方面是公正的，他们一致指出，在行军和战术演习中掉队的青年士兵多得不相称。在德国，诚然还没有把适于服兵役的后备人员完全用光，但新的军事法草案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的。一句话，就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达到可能的极限了。

普鲁士军事制度的现代化的、革命的一面正是在于：要求每一个能够拿起武器的男子在他年龄适于服兵役的整个时期内都要为国防事业出力。而在1870年以来各国军队的全部发展中可以指出的唯一的革命的特征也正是在于，先前只是在沙文主义者的想像中实现的这个要求，各国政府已不得不（常常是违反意愿地）愈来愈多地实际地加以执行。无论是人们服预备役的长的年限，还是要所有适于服兵役的青年都服兵役，现在都已经是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而且这最不会遇到来自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反对，相反，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在德国把这个要求也在

实际上完全实现。

因此，可以借以满足裁军需要的就只剩下一点了，这就是现役期。这里也正是阿基米得的支点所在：由大陆各大国协商，对一切兵种的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开头可以规定为两年，但是要预先说明，这个期限在将来一旦认为可能缩短时就立刻缩短，并宣布以民兵制度作为最终目的。我肯定说，正是德国首先应当提出这个建议，而且正是德国首先会因为提出这个建议而得到好处，即使这个建议不被接受。

二

对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会在同等程度上涉及一切大国的军队。大家都承认，对于其士兵还没有嗅到过火药味的那种军队来说，现役期的长短在一定限度内是战局初期衡量它们在各种战争环境中的活动能力的最好尺度，特别在战略进攻或战术进攻的情况下是如此。1870年，我们的战士们充分领教了曾经长期服役的帝国步兵的刺刀冲锋的 *furia francese*（法兰西狂暴），以及在维尔特和色当城下的骑兵冲锋的威力；但同时，在施皮歇恩城下，他们在战争一开始就证明了，他们甚至用较少的兵力就能把那同样的步兵赶出设防坚固的阵地。³⁹⁷所以一般来说应当承认：在随着民族特点而变化的一定限度内，现役期决定着还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军队的一般战斗训练水平，特别是他们的进攻能力的水平。

如果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了最长现役期，那末各国军队的战斗能力的对比关系将大致和现在一样。一国军队在它的直接作战能力方面失去的东西，其他各国军队也会失去。正如一个国家现在不可能出其不意地进攻另一个国家一样，到那时，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现役期的差别，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的差别，到现在为止是这样微不足道，以致于没有什么意义；而在服役期缩短的情况下，正如同现在一样，一切都将取决于这两支军队中的每一支如何利用协议所规定的服役期。而且，两支军队的人数之比将与两个国家的

居民人数之比完全相适应；而当普遍义务兵役制最终真正实现的时候，在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决定着不适于服兵役的人的百分比）大致相同的国家中，居民的人数永远是军队人数的标尺。那时就不会有像1813年普鲁士所玩的那样的把戏了；这种便宜事已经没有了。

但是很多东西都取决于如何利用所规定的服役期。而几乎在所有的军队中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话可说的，如果允许他们这样做的话；因为经常缺钱这一情况到处都使得对一部分应征人员只“匆忙地”训练几个月。这样就不得限于最主要的东西，而把整堆的传统的废话抛在一边，那时人们就会惊奇地发觉，对于把一个个体格发达的青年人变成一个士兵来说，所需要的时间是多么的少。倍倍尔曾在帝国国会中谈到，训练德国补充兵的军官们对此多么惊异。³⁹⁸在奥地利军队中，许多军官直截了当地说，服役期几乎和德国的补充兵相同的后备军，在质量上优于常备军。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后备军中恰好没有常备军中浪费在传统的、因而也是神圣的蠢事上面的那些时间，正因为如此，那里也就不会白白浪费时间。

1888年德国的步兵操典把战斗的战术布势仅仅局限于最必要的方面。里面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奥地利人从1859年起就很善于在战斗队形的各种变化中保持战斗力；黑森—达姆斯塔德人几乎同时成立了由四个连纵队简单地合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营纵队，而在1866年后，他们在普鲁士的要求下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合理的编制。³⁹⁹在其他方面，新的操典废除了一大堆虽然为习惯所神圣化、但是毫无用处的陈腐仪式，而我对此是绝无任何理由进行挑剔的。在1870年的战争以后，我曾经不自量力地勾画了一个适于现代作

战方法的连和营的密集队形和运动的要图，而我很惊奇地发现，这个“未来国家”的成分在新操典的有关段落中几乎完全得到体现。

但是操典是一回事，操典的执行又是一回事。在所有和平时期盛行于普鲁士军队中的只重视步法的军事操练精神，使得已经明令废除了的无益的时间浪费又通过大检阅的后门恢复了。忽然发现，校场操练作为对抗削弱团结的散开战斗队形的方法、作为树立真正的纪律的唯一手段等等，等等，是完全必要的。似乎秩序和纪律只有通过迫使士兵从事完全无益的事情才能建立起来。仅仅是废除“阅兵步法”这一项就可以腾出许多个星期来作合理的操练，更不用说外国军官到那时再不用忍住笑来观看德国的阅兵了。

卫兵勤务是同样陈腐的制度，按照往昔的观念，这种勤务教士兵——只要他们在这以前还不会——整整站两个小时的岗而决不想任何事情的技能，似乎也能促进士兵的智力发展，特别是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在当前普遍采用的野外警戒勤务训练条例之下，在有各种各样执行保安勤务的警察的城市中，卫兵勤务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废除卫兵勤务，就至少可以赢得百分之二十的服役期来作军事训练，并且可以保证居民在城市大街上的安全。

此外，到处都有大量的在各种借口下尽可能免除勤务的士兵，这就是连队中非战斗的事务工作人员、军官的勤务兵等等。这方面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那末，骑兵的情形将怎样呢？骑兵不是需要较长的服役期吗？——如果遇到的是既不会骑马、又不会照料马匹的应征人员，长些的确最好。但是就在这方面也有许多事可做。假如马匹饲料标准不是定得这样少——要知道，现在在操演以前，不得不专门把马匹喂肥，以使它们达到标准！——假如在每一个骑兵连中都配备

有一定数量的定额以外的马匹，让士兵能够更多、更久地在马上操练，一句话，假如认真地设法用比较紧张地练习重要东西和去掉多余东西的办法来弥补服役期的缩短，那末很快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事情也可以进行得很顺利。至于说到预备军马的训练（现在人们经常以此作为借口，而我也乐于承认它的绝对必要性），那末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和途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必要时保持和推广骑兵中志愿入伍者以及超期服役军人服役三年或四年的制度，但是对他们在预备队和后备队服役时应作相应的补偿，否则这是不能实现的。

如果去听军事权威的意见，那末事情当然就不是这样了。照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不破坏整个制度，就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我已经看了五十年了，许多军事制度今天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明天就毫不客气地被当作破烂扔到垃圾堆里，而且是被原来那些权威扔掉的；我也常常看到，在一支军队里被捧上天的东西，在另一支军队里却被宣布为毫无用处；我曾在实际上屡次看到，最夙著声誉和最受赞扬的条例和队形，在敌人面前简直就是荒谬的东西；最后，我还经常看到，在每一支军队中都有其特殊的因袭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专供下级官员、士兵和群众遵守的，是由高级官员培养起来的，但是只能引起那些能独立思考的军官们的嘲笑，而且在第一次行军时就会完全化为乌有，——一句话，在这方面我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我要奉劝大家正是对军事“权威的意见”要抱最不信任的态度。

三

这是多么惊人的对照：我们的高级军事权威正好在自己的领域内大部分都保守得可怕，可是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在我当年在库弗尔格拉班⁴⁰⁰使用过的六磅或七磅的滑膛榴弹炮和现在的后装线膛炮之间，在当时的大口径滑膛枪和现在的后装五毫米速发枪之间似乎相隔有整整几百年之久；而这还远没有到头，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它现在甚至在消除富有浪漫色彩的硝烟，从而赋予战斗以事先绝不能预见到的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进程。而我们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考虑这种无法估计的因素。

四十年前步兵的火力的有效射程还超不过300步，在这个距离上一个战士可以没有任何危险地经受整整一个营的齐射，即使所有的射手都真正瞄准了他。野战炮兵的火力实际上在1500—1800步的距离上就已经无效了。在普法战争时步枪的有效射程是600—1000步，火炮的最大射程是3000—4000步。而新的、暂且还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小口径步枪在作用半径方面却接近于火炮的作用半径，这种步枪射出的枪弹的击穿力增加了三到五倍；因此，一个装备连发枪的排在火力方面等于以前的一个连；诚然，火炮的有效射程不能说有同样的提高，但是它用的爆炸弹现在却装有威力空前的全新的爆炸物；的确，暂时还不能肯定地说，谁应当经受

住这种威力，是射击手还是被射击的人。

就在整个军事这样不断地、愈来愈快地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军事权威，他们五年前还在强行给自己的军队灌输早已从战场上消失了的老弗里茨的线式战术的各种传统礼仪和惊险技艺，他们虔诚地抱住这样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教导说：只要部队在右翼展开而在左翼无展开余地时，就可能遭到失败。这些权威直到现在还不敢侵犯士兵制服上的发光的钮扣和金属的镶边这些吸引五毫米口径步枪子弹的磁石；这些权威把胸前挂着宽宽的红带子的枪骑兵和虽然没有胸甲——总算没有了！——但是穿着白色制服的胸甲骑兵送到炮火下面去，他们好不容易才作出决定：拿虽然极其无聊、但却受到虔诚的尊崇的带穗肩章去为祖国牺牲，毕竟比拿佩戴这些带穗肩章的人去牺牲要好些。

我认为，无论是对德国人民来说，或者甚至是对德国军队来说，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如果我断言在我们的最有能力的军官中缺乏有这种头脑的人，断言极力想摆脱二十年和平时期内又极为盛行的墨守陈规和只重视步法操练的人不够多，那我就是陷进了严重的谬误中。但是在这些人鼓足勇气并且找到合适的机会捍卫自己的信念以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应当干预这件事情，并且应当尽一切可能来证明我们在军事方面也学会了一些东西。

上面我是想证明，如果只教给士兵们在打仗时有用的东西，而

使他们不在任何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那末，现在就可以为一切兵种规定两年的现役服役期。但是我立刻事先做了附带的说明：不应当安于两年。而且问题在于，关于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两年服役期的提议只是进一步逐渐缩短服役期的第一步——比如说，最初是缩短到十八个月（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然后缩短到一年，然后……从这里开始未来的国家，真正的民兵制度，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事情真正开始的时候再来详细论述。

主要的问题在于开始这件事。只要睁眼看看事实，看到缩短服役期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欧洲和平的保持都是必要的，那末由此得出的最直接的结论就会是确信军事训练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对青年的教育上来。

当我被放逐了十年又重新回到莱茵的时候⁴⁰¹，我感到惊异而高兴的是，在各地农村学校的操场上都看到了双杠和单杠。这好极了，但遗憾的是，仅止于此。体操器械是按照规定以真正的普鲁士精神添置起来的，但是这些器械的利用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好的。这些器械没有派上应有的用场，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没有加以利用。要在这方面终于认真做起来，难道就那么困难吗？在各年级学生的四肢还很富于弹性和十分灵活的时候，经常而认真地教给他们自由体操和器械操，比起现在这样在二十岁的小伙子身上下功夫（他们出一头汗，自己也出一头汗），白费气力地企图使他们因工作而变硬了的骨骼、肌肉和韧带恢复以前的灵活性和柔韧性来，不是更好一些吗？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们，分工使一切受它影响的人变成残废，使一部分肌肉发达而其他部分萎缩，而且在每一个劳动部门中这种情况都有不同的表现，每一种劳动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人变成残废。先使人们变成残废，然后在服

兵役时又竭力使他们重新变得匀称而灵活，这难道不是发疯吗？只要在中小学中及时预防这种残废现象的发生，士兵的质量就会提高两倍，难道这个真理是军官的认识所不能达到的吗？

但是这只是开始。年轻人在学校里很容易学会军事密集队形的构成和运动的规则。中小學生天生就站得挺，走得直，特别是如果他们做体操的话；而我们的新兵在队伍里站成什么样子，教会在站和走时姿势端正是多么困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服兵役时都看到了的。以排和连的队形行进，这在每一个学校中都可以教会，而且容易得很，在军队中连想像都想像不到。有些事情在新兵看来极为可憎，而且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对中小學生来说却是一种游戏和娱乐。在以展开队形行进时和转弯时保持间隔和整齐，——这对成年的新兵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中小學生只要有系统地进行操练，就可以轻松地愉快地学会。如果把夏季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行军和地形练习，那末这无论对中小學生的身心发展，或是对军事财政（它将因此省下几个月服役时间的开支）都是有好处的。这种军事远足可以极好地利用来教会中小學生完成野战勤务方面的任务，这种远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小學生的智力发展，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受到专门的军事训练，——这是我的老朋友博伊斯特（他本人过去是普鲁士军官）在他的苏黎世的学校里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的。在现代军事很复杂的情况下，不预先对青年人进行军事训练，就根本不要想向民兵制度过渡，而博伊斯特的成功经验正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意义。

现在我要来触动一根道地普鲁士的琴弦。对普鲁士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服役期满的军士放到哪里去。到现在为止是用

他们去当宪兵、边防军、看门人、抄写员、各种文官；在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中没有哪个角落可怜得可以不安插那些有权任文职的军士。总之，你们曾千方百计地给军士们安插职位；你们曾固执地把他们放在他们不合适的岗位上，委托他们去做他们一窍不通的工作；难道还不该把他们用在那个他们多少通点窍并且能做出一些有益工作的领域吗？让他们去做教员，但是，不是让他们去教读、写、算，而是去教体操和队列训练，这对他们和学生都是有益的。而且，一旦把脱离了兵营的小圈子生活的军士放到众目睽睽的学校操场上，并且不是受军事法庭的管辖，而是受普通刑事法庭的管辖，那时，我敢打赌，我们那些富于反抗性的青年学生就会把过去最恶毒地折磨士兵的军士也教好。

四

下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谈能否指望用国际协议的办法使类似的关于普遍地、均衡地和逐步地缩短服役期限的建议被接受的问题。我们暂且假定这个建议已经被接受了。那末，这个建议能否由一纸空文变成现实呢？各方面是否会诚实地执行这个建议呢？

总的说来，肯定是会做到的。第一，任何规避协议的作法都需要费不小力气，因此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住的。第二，每个国家的居民自己也会监督协议的遵守情况。如果想要服役者超过法定的期限继续服役，那末谁都不会自愿地留在兵营里。

至于谈到个别的国家，那末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都会欢迎这个协议，把它当作一种解救的措施，而乐于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个协议。关于俄国，我们将在下一节里谈到。而法国的情况怎样呢？要知道法国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

如果法国在协议上签字并且批准它，那末总的说来，它无疑是会遵守这个协议的。但是这里假定，存在于有产阶级和还没有社会主义化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中的复仇意图暂时占了上风，并且可能直接地或以诡辩的理由作借口来破坏协议的条款。这样的破坏永远不会是巨大的，否则巴黎就宁可拒绝接受协议了。而德国处于这样一种幸运的地位，它可以对这样一些小小的诡计宽宏大量，装作没看见。尽管法国曾千方百计力求使1870年的失败不可能重演，

但是德国同它比起来，还是拥有比初看起来要更多得多的优越性。第一，德国在人口方面有逐年增多的优势，现在已经有1200多万。第二，在普鲁士，现在的军事制度已经存在七十多年，居民已经习惯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已经在许多次动员中经过仔细的检验，在这方面产生的各种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已经受到实践的考验并且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德意志其余各邦的军队也都具有这种优越性。相反，法国才刚刚要试行第一次总动员，而且是由一个要混乱得多的组织来试行。第三，在法国，实行像志愿入伍者服役一年这样一种不民主的制度，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服役期三年的士兵把享有特权的服役一年的人从军队中不客气地赶了出来。这说明德国的社会政治觉悟和它所能容许的政治制度的水平比法国低到什么程度。但是，从政治的观点看来是缺点的东西，现在军事方面却成了优点。毫无疑问，同人口对比，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那样使这么多的青年人受到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育，而志愿入伍者服役一年的制度，无论它多么不民主，从政治观点看来多么不可取，但是却给了军事指挥部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用来对大量的、已经受过充分的普通训练的青年人进行准备担任军官的军事训练。1866年的战局第一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那时起，特别是从1871年起，德国军事力量的这个方面受到了特殊的、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注意。虽然最近时期德国后备军官中有不少人竭力拿干自己这一行的人开玩笑，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拿这些军官同他们的法国同行作相应的比较，那末，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军官在军事方面还是胜过后者的；而最主要的是，在预备队和后备军的全体人员中，受过军官训练的人的百分比，在德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由于军官特别多，所以德国在动员时期就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地编出新的、在和平时期受过训练的军队。根据李希特尔的说法（见1892年11月26日“自由思想报”）402，——据我所知，无论是帝国国会或是军事委员会都没有否定这种说法，——每1个德国步兵团在战时可以提供1个机动的预备团、2个后备营和2个补充营。这样一来，每3个营就可以提供10个营，换句话说，和平时期组成173个团的519个营，在战时可以变成1730个营，猎兵和射击手还不算在内。而且这一切可以在这样短的期限内完成，是任何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的，甚至在接近这样短的期限内也是办不到的。

一位法国的后备军官向我证实，法国后备军官的数量要少得多；可是对于根据正式声明建立的新部队的干部配备来说，他们应当是够了。这位军官还承认，这些军官有一半是不中用的。这些新编成的部队也远远赶不上上面所说的德国所能提供的军队。而且，法国所能提供的军官将全部被用上，而在德国却还会有剩余。

在过去所有的战争中，在作战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感到缺少军官。在所有其他国家中现在也还会是这样。只有一个德国拥有无穷无尽的军官后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法国人有时会超过协议规定的期限而把士兵的训练延长两三个星期这样的事，难道不能装作看不见吗？

五

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国的情况。在这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不仅俄国将来是否遵守关于逐步地、均衡地缩短服役期限的协议完全无关紧要，就连它是否会参加这一协议也完全无关紧要。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看，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根本不注意俄国，其理由如下：

的确，俄罗斯帝国拥有1亿多人口，比德意志帝国多一倍以上，但是在军事进攻力量方面，它远不能同德意志帝国相比，即使是大致地相比。德国的5000万人口集中在5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而从军事上值得我们注意的俄国的9000万或者最多1亿人口，则散居（根据保守的统计）在3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德国人因为人口非常稠密而取得的这种优势，还由于他们有无比优越的铁路网而更加增大了。虽然如此，在长时期中1亿人能比5000万人提供更多的士兵，这毕竟是个事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士兵到达目的地需要很多时间；但是归根到底他们终究会到达的。那时怎么办呢？

军队不仅需要应征人员，而且还需要军官。而在这方面，俄国的情况非常糟。在俄国，军官只能从贵族和城市等级中间征集；但是贵族比较少，而城市又不多；十个居民中最多只有一个居住在城市，而且在这些城市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称得上是城市；中学和中学生的数目非常少；到哪里去征集全军所需要的军官呢？

对于一方好的东西，对另一方并不见得合适。普遍义务兵役制

是以经济和智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为前提的；在没有这种水平的地方，这种制度是弊多利少。显然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第一，要把一个中等才能的俄国新兵变成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般需要相当多的时间。俄国士兵无疑非常勇敢。当战术任务是由步兵以密集队形的进攻来解决的时候，俄国士兵是适得其所的。他们的全部生活经验教导他们要同自己的伙伴紧密结合。在乡村还是半共产主义的公社，在城市是劳动组合中的合作劳动，到处都是 *krugovaja poruka*，即伙伴们彼此互相负责；一句话，社会制度本身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只有团结才能得救，另一方面，单独的只靠自己的主动精神的个人注定是完全孤立无助的。俄国人的这个特点在军事上也保留下来了；结成为营的俄国人几乎是不可能拆散的；越是危险，他们就越加紧密地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但是，这种在拿破仑远征时代还是无价之宝并且足以补偿俄国士兵的许多欠缺方面的团结的本能，现在已成为直接的危险。现在密集的人群已从战场上消失；现在的问题在于保持各个分散的散兵线之间的联系，因为这时各种不同部队的队伍都掺混在一起，指挥又常常并且是迅速地转由多数士兵根本不了解的军官来担任；现在每个士兵都要善于独立地采取在当时情况下所要采取的行动，同时不丢掉同整个分队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能依靠俄国士兵原始的群居本能来建立，而只有在每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比较高的“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小口径后装连发枪和无烟火药把至今构成俄国军队的伟大力量的这种长处变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因此，在现在条件下，为了把一个俄国新兵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士兵，就需要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而

且他再也不能同西方的士兵相比了。

第二，从哪里去找军官来把所有这些人群组织成战时的新队伍呢？如果连法国都难于找到足够数量的军官，那末俄国又如何能作到呢？在俄国，有文化的居民（中用的军官只能从这部分居民中培养）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重非常低，而且在这里，士兵，甚至是受过训练的士兵，比在任何别国的军队中都需要更多的军官。

最后，第三，大家知道，普遍盗用公款和盗窃现象在俄国官吏中间、而且往往在军官中间也非常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怎样去进行动员呢？俄国过去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立刻暴露出，甚至和平时期的一部分军队和它的一部分装备都只是一纸空文。当号召转入预备役的退伍军人和民团（后备军）拿起武器以及需要保证供给他们服装、武器和弹药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如果在动员时不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是一切都在规定期限和规定地点办好，那就会是一团混乱。而既然一切都要通过惯于盗窃和贪污的俄国官吏之手，一切事情怎么能够顺利地进行呢？在俄国进行动员，这将是一场出色的演出。

换句话说：甚至从纯粹军事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允许俄国人随便征集多少士兵和让他们随便服多长时间的现役，只要沙皇认为需要的话。但是，他未必能征集到比现役军人更多的军队，而且也未必能及时作到这一点。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验会使俄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此外，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驻扎在从柯夫诺到卡麦涅茨的全部边境线上的俄国军队，将在自己的国境内处于敌人的领土上，陷

入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包围中，因为沙皇政府把犹太人也变成了自己的死敌。只要俄国打了一两次胜仗，战场就会从维斯拉河转向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在德军后方，在德军的保护下，就将建立起一支德军的波兰盟军；不过，如果普鲁士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去恢复强大的波兰，那它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考察了问题的纯军事方面，我们深信，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把俄国考虑进去。但是，只要我们看一下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特别是财政状况，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六

俄国现在的国内状况几乎是绝望的。1861年的农民解放以及与之有关的——部分是原因，部分是结果——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把这个一切国家中最停滞不前的国家，这个欧洲的中国推向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正在不可遏止地前进，而这个过程目前主要是破坏的过程。

贵族在农民解放时得到了以国家有价证券提供的补偿，这些有价证券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被他们挥霍净尽了。这个结束以后，新的铁路为他们自己林地上的林木开辟了销售市场；于是贵族就从事砍伐和出卖林木，在卖得的钱够用的时候，就又过起享乐的生活来。在已经形成的新条件下，由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耕种的地主庄园大部分仍然经营得很坏；无怪乎俄国的土地贵族即使还没有完全破产，也是负债累累；他们庄园的收入有减无增。

农民得到的土地比他们以前所有的土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的质量更差；他们被剥夺了利用公社牧场和森林的权利，这使他们失去了饲养牲畜的基地；捐税大大提高，而且农民现在到处都要用货币来交税；此外，他们还要——也是用货币——支付利息和偿还赎买土地时国家所垫付的赎金（wykup）；总而言之，除了农民一般经济状况的恶化外，又突然加上了强制的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仅仅这种过渡本身就足以使全国农民破产了。结果，农村财主、富裕农民和小酒馆老板，*mirojedy*（按字面上的意

思是吃公社的人)和 kulaki (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大为加强。而且所有这些都好像还不够似的,又出现了使农民的自然经济彻底破产的新的工业。大工业以自己的竞争不仅破坏了农民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而且还要么夺去他们的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要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使这种手工业依附于资本家“包买主”,或者更坏,依附于他的中间人。俄国农民及其原始的农业和旧的共产主义公社制度,忽然同不得不用强力为自己开辟国内市场的现代大工业的最发达的形式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注定要灭亡。但是在俄国,农民差不多占全部居民的十分之九,因而农民的破产也就是(至少暂时是)俄国的破产。

在这种社会变革延续了二十年之后,也出现了它的其他一些结果。无情地砍伐林木毁坏了土壤水分的贮藏所;雨水和雪水没有来得及渗进地里就很快顺着小溪和大河流走,造成了巨大的水灾;到夏天则河里水量很少,土地干旱。在俄国许多最肥沃的地区,地下水水位降低了,据说降低了整整一公尺,这样禾谷的根就由于接触不到水分而干枯。这样一来,不仅人们破产了,而且许多地区的土地也变贫瘠了,这种土地贫瘠的状况至少要延续整整一代之久。

1891年的饥荒使这个以前是慢性的破产过程具有了急性的形式,从而使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所以,从1891年起俄国始终未能摆脱饥荒。这个严酷的年头大量地毁掉了农民最后的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他们的牲畜,并使他们负债累累,以致必然要摧

关于这一切,一年以前我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9期上发表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本卷第298—303页。——编者注]中已经谈到了。

毁他们最后的生命力。

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由于绝望才会发动战争。但是，即使要这样做也缺乏资金。在俄国，贵族靠借债度日，现在农民也靠借债度日，但是，首先靠借债维持的是国家本身。俄国在国外借了多少钱是众所周知的：超过40亿马克。它的国内债务有多少谁也不知道；第一，因为既不知道发行的公债的数目，也不知道流通中的纸币的数目；第二，因为这些纸币的价值每天都在变化。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俄国在国外再也借不到钱。40亿马克的俄国国家债券已把西欧的金融市场塞得过于饱和了。英国早已抛出了自己所持有的大部分“俄国”证券，德国在不久前也这样做了。认购了这些证券的荷兰和法国，也弄得无法消化，最近一次在巴黎发行俄国公债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总数5亿法郎的公债只销掉3亿，其余两亿，俄国财政大臣只得从认购和超额认购了债券的银行家那里收回。⁴⁰³这证明，在最近时期内，任何新的俄国公债甚至在法国也没有取得成功的任何可能。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状况，这个国家似乎用战争直接威胁着我们，但是实际上它甚至在绝望的情况下也无力发动战争，只要我们自己不这么愚蠢，而把为此所需要的钱投到它嘴里去的话。

法国政府和支配着它的法国资产阶级舆论的愚昧无知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是法国需要俄国，相反地，倒是俄国需要法国。没有法国，沙皇及其政策就会在欧洲陷于孤立，他就会一筹莫展，只得容忍在西方和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一切。如果法国更聪明一点，它就能从俄国弄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可是官方法国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沙皇面前卑躬屈节。

由于美国廉价小麦的竞争，俄国的小麦输出已经遭到了破坏。

现在主要的输出项目只剩下黑麦了 ,而它差不多完全是输往德国。只要德国一开始吃白面包而不再吃黑面包 ,现在官方的沙皇和大资产阶级的俄国立刻就会破产。

七

我们对我们的邻邦、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敌人已经批评得够多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只有永远结束对士兵的虐待，逐步缩短服役期对于军队才是有益的，而近年来这种虐待现象在军队中已经根深蒂固，习以为常，远远超过了人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这种虐待士兵的现象是步法操练和校场操练的永恒伴侣；只要普鲁士军队在某个时期成为和平时期的军队，这两者就在普鲁士军队里广为流传起来，然后它又从普鲁士人那里传给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等等。对士兵的这种态度是真正的“旧普鲁士”时代的遗产，那时士兵不是招募来的流浪汉，就是农奴的儿子，所以他应当毫无怨言地忍受俨若容克地主的军官们的一切嘲弄和侮辱。正是那些破产了的、变穷了的和寄生的贵族（他们在易北河以东地区为数不少）现在还在提供对士兵的凶恶折磨者，在这方面只有喜欢硬充容克地主的傲慢的资产阶级子弟才能比得上他们。

这种对士兵吹毛求疵的态度在普鲁士军队中从来也没有消除。但是以前它比较少见，而且带有较温和的、有时是幽默的性质。但是，自从一方面需要教士兵愈来愈多的科目，同时另一方面又不考虑把过时的、失去任何意义的战术练习这全部无用的废物抛弃的时候起，军士就逐渐取得了愈来愈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采用只要他认为合适的任何训练方法；同时，规定军士要在短期内给自

己的班有效地灌输这种或那种军事规则，也间接地迫使他采取强制手段。加之士兵提出申诉的权利纯粹是一种嘲弄，中意的旧普鲁士方法在士兵顺从地容忍它的地方又大为盛行起来就不奇怪了。因为我确信，在德国西部建立的团队或者在夹杂有大量城市居民的团队中，对士兵的侮辱比在多半由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组成的团队中要少得多。

对此从前有过一种（至少是实际上的）解毒药。在使用从枪口装弹药的滑膛枪的时候，在演习时很容易把一块打火石放入枪管，使它落到空弹筒里，因此可恨的长官在演习时常常由于疏忽大意而被击毙。有时也出错；我知道有一个科伦青年，在1849年就是这样死于别人向他的长官射出的子弹。而现在，在使用小口径后装枪的情况下，这样做就不是那么容易和觉察不到了；然而军队中自杀事件的统计数字是虐待士兵现象的相当精确的指标。但是，当“严重的时刻”到来并使用实弹的时候，当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又会有人要采用旧的做法，据说在最近几次战争中有的地方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要知道，这是会大大促进胜利的。⁴⁰⁴英国军官在自己的报告中一致赞扬1891年在香槟演习时法国军队中官兵之间的非常良好的关系。在这支军队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像报刊上所经常披露的我们兵营中发生的那些现象。还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想在法国军队中效法普鲁士用鞭笞来惩罚的企图就遭到了彻底失败。在阿尔及利亚远征和第二帝国的最糟糕时期，也没有任何一个长官敢把我们当众侮辱德国士兵的那种作法的十分之一拿去对待法国士兵。而现在，当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哪一个法国军士敢命令士兵们互相打耳光或者互相往脸上吐唾沫。如果法国士兵听到或读到有关自己未来的敌人毫无怨言地让

人侮辱的种种情况，他们一定会多么鄙视这些敌人。而设法使每个法国兵营中的士兵都能读到和听到这种情况，——这是一定有人去干的。

现在在法国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以及军官、军士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正是1813—1815年在普鲁士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并且曾经两度使我们的士兵进入巴黎的那种精神和官兵关系。我俩现在却反而日益接近1806年的情况，当时几乎不把士兵当人看待，当时士兵常常遭到鞭笞和虐待，当时士兵和军官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切把普鲁士军队引到了耶拿⁴⁰⁵，后来就当法国的俘虏。

人们关于精神因素在战时的决定意义谈得多么多啊！可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所干的全部事情却是在差不多有系统地消灭这些因素！

八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关于逐步地均衡地缩短服役期并且最后过渡到民兵制度的建议已为各方所接受。但是问题首先在于,它是否会被接受。

我们假定,德国首先向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提出了这个建议。奥地利会乐意接受把最长服役期限制为两年,而实际上它自己也许还要缩减得更短。奥地利军队中似乎比德国军队中更坦率得多地谈论正在一部分军队中实行的短期服役的良好效果。许多奥地利军官直率地肯定说,服役只有两三个月的后备军部队的战斗素质比常备军高;不管怎样,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像人们所说的,一个后备军的营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可以作好战斗准备,而一个常备军的营则需要几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常备军中人们害怕触犯非常迂腐的奥地利古老的陈规旧套,而在后备军中一切组织都是重新建立的,有勇气不实行那些陈规旧套。无论如何,在奥地利,无论人民或政府都热切地盼望减轻军事负担,他们本身的经验向他们表明,要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缩短服役期限。

意大利也会双手接受这个建议。它正被军事预算的重担拖得筋疲力竭,已经到了必须尽快寻找出路的地步。而缩短最长服役期在这里也是最简捷的出路。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国同盟⁴⁰⁶要么将瓦解,要么将不得不采取多少相当于我们建议的措施。

但是,如果德国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同意的情况下向法国政府提出这个建议,那末法国政府将会陷于窘境。如果它接受这个建议,同其他国家相比,它丝毫不会使自己的军事状况恶化。相反,它将有可能相对地改善这种状况。普遍义务兵役制仅仅在二十年前才在法国实行这一情况,对法国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缺点。但是,在这个缺点中包含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一切还都是新的,只是不久以前才废除了从古老的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制度,可以很容易作进一步改善,而不会遇到根深蒂固的成见的顽强反抗。所有的军队在打了几场大败仗以后,都是非常善于学习的。所以,在法国,最好地利用协议中所规定的服役期限,比在任何地方都要来得容易,由于法国的学校也像军队一样处于革命改革状态,所以那里也能比任何地方都迅速得多和容易得多地安排青年的一般体育训练和专门军事训练。而这就会意味着法国的军事力量比起德国来有所加强。尽管如此,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沙文主义的潮流,——而法国的沙文主义完全像德国的沙文主义一样愚蠢,——会强大到足以推翻任何要接受这种建议的政府,尤其是当这种建议是由德国提出的时候。所以我们假定,法国将拒绝这个建议。那时将怎样呢?

那时德国将仅仅由于提出了这个建议而获得巨大的好处。我们不应忘记,俾斯麦的二十七年统治使德国受到——不是没有根据的——全世界的憎恨。吞并丹麦的北什列斯维希,不遵守以及最后用欺骗办法废除布拉格和约中有关丹麦人的条款⁴⁰⁷,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卑鄙地迫害普鲁士的波兰人——所有这些都和恢复“国家统一”毫无共同之处。俾斯麦使德国获得了贪于侵占别国领土的坏名声,那个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撵走,可是仍然把兄弟般地统一

“从艾契河到默麦尔河”的整个德国的愿望放在一切之上，同时很乐意把荷兰、弗兰德、瑞士和所谓“德国人的”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也并入德意志帝国的德国沙文主义资产者，诚心诚意地帮助了俾斯麦，而且成就是如此辉煌，以致现在在欧洲谁也不相信“正直的德国人”了。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你都会看到对法国的同情和对德国的不信任，人们把德国看做是现在战争危险的根源。如果德国敢于提出我们的建议，那末所有这一切都会结束。它会作为和平的捍卫者而出现，而且这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它会表明自己决心成为裁军的首创者，正如这理应由发出了进行武装的信号的国家来作的那样。不信任一定要变为信任，厌恶一定要变为同情。不只是三国同盟是和平的同盟这个套语终将成为现实，而且现在仅仅虚有其表的三国同盟本身也会成为现实。欧洲和美洲的整个社会舆论都会站在德国方面。这会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会大大压倒在我们的建议中还可能会发现（如果对它各方面进行挑剔的话）的军事方面的一切缺点。

相反，法国如果拒绝关于裁军的建议，它就会陷入德国现在所处的那种受到怀疑的不利地位。欧洲的庸人（而他们是一个最大的强国）就会说，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谁要和平，谁要战争。在这以后，如果一个真正好战的政府在法国执政，它就会遇到一种使它认为（只要它有一点聪明）进行战争绝对不可能的形势。不管法国装成什么样子，它在整个欧洲眼中都会是那发动战争、强迫进行战争的一方。这样它就不仅会挑起各个小国家，挑起英国来反对自己，而且它甚至不能满有把握地取得俄国方面的援助，取得俄国方面

这样一种传统的援助，即俄国先教唆自己的盟国去进行战争，然后让它们去听天由命。

我们不会忘记，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英国。三国同盟在同俄法作战的情况下，就同被敌国领土跟俄国隔开的法国一样，它们都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得到它们所必需的大量进口粮食。可是在海上，英国是绝对称霸的。只要英国把自己的船只提供交战的一方使用，另一方就会因粮食断绝而被简单地用围困法攻败，这将是规模大大扩大的巴黎饥馑⁴⁰⁸，挨饿的一方将不得不投降，这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毫无疑问。

我们再往下看：现在自由党的潮流在英国占上风，而英国自由党人是坚决同情法国的。况且老格莱斯顿又是俄国的朋友。如果爆发欧战，英国会尽可能久地保持中立，但是，由于上述各种情况，甚至它的“善意”中立对交战的一方也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援助。如果德国提出我们的建议，并遭到法国的拒绝，那末德国就不仅会克服英国对它的一切敌对情绪，保证自己取得英国的善意中立，而且还几乎可以排除英国政府在战时靠拢德国的敌人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我们得出下列结论：

或者是法国接受建议。那时由于军备的经常增长而引起的战争危险将会实际消除，各国人民将会获得安宁，而德国将得到这一建议的倡议者的荣誉。

或者是法国不接受建议。那时它将使自己在欧洲的处境大为恶化，而使德国的处境大为好转，这样德国就完全用不着再担心战争，而且它可以高枕无忧地同自己的盟国（只有那时它们才会成为它的真正的盟国）一起自己对自己负责地开始逐步缩短服役期限和准备实施民兵制度。

是有足够的勇气迈出这个能够求得解脱的一步呢？还是等法国最终弄清楚俄国的真实情况，让法国来走第一步并让它取得全部荣誉呢？

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今天如果我不对德国工人谈谈在英国这里即将举行的、正是在今年将具有特殊意义的五一节活动,那还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东西可谈呢?如果说德国现在已经不是亨利希·海涅笔下的那个“虔诚的育儿所”,那末现在的英国也已经不是柔顺的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那个模范国家,已经不是勇敢的工联和合法改良派不遗余力地要使“社会主义幻想”在那里无立足之地的国家。所有这一切现在都一去不复返了。英国工人阶级在经过宪章运动时代以失败告终的光荣战斗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才重新行动起来。而它现在无疑地已经行动起来了。谈到这里的社会主义组织,不久以前它们还只不过是些宗派集团,同它们相比,旧工联倒真能算得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了。所以德国大学的乖孩子们相信,英国工人所竭力

手稿中此句之前原有下面一段,报上没有登出(可能是在誊抄时略去,也可能是在发表时由于情况改变而删掉):“当我要给德国的五一节报纸寄出这样一篇东西的时候,在柏林将发生讨论军事法草案的危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草案被否决,接着帝国国会就会被解散,那时选举运动将会压倒和盖过五一节活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固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可以断定,人们所渴望的妥协还是会取得,帝国国会的寿命可以再延长两年。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就足以改变这一切。既然德国工人的五一节将在什么情况下来庆祝还不得而知,那末,关于他们的五一节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编者注

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

要做的不是把雇佣劳动制度消灭,而只是加以“改良”。而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工人群众越来越认清,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主作斗争以争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是在于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这在1892年大选中第一次显示出来。工人们在同两个老党的斗争中把自己的三名候选人送进了议会,而且还在二十多个选区里向这两个党有力地显示了他们至今还没有使用过的力量。⁴⁰⁹这就使工人人们的自信心空前地加强了。

在英国,即使在现行的有限制的选举制度下,工人也至少在一百五十个选区里占了选民的绝对多数。如果政府提出的选举改革草案⁴¹⁰被通过,他们就将在二百个选区里占多数。不仅如此,在大多数选区里,工人的选票现在就已经能决定选举的结果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工人只要有愿望,——英国就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志来治理。

阶级意识的这种觉醒也表现于今年五一节的准备活动。预备性商谈第一次顺利地进行,没有发生争吵和无谓的竞争,参加者齐心协力,积极热情。更重要的是:领导权属于社会主义者,这个节日活动将第一次具有无可争辩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3月13日

载于1893年5月1日“前进报”社
出版的专刊“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五一专刊译的,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在手稿中不是“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而是“争得议会,争得政权”。——编者注

詹·凯·哈第、约·白恩士和约·哈·威尔逊。——编者注

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 奥地利工人的贺信⁴¹¹

伦敦。奥地利的同志要我为他们的五一节报纸写几句话。我能向你们说些什么呢？应当怎样庆祝五一节，你们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你们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这一点。从1890年起，奥地利工人每年都向所有其他国家的兄弟们表明：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真正的五一节是意味着什么。任何地方都不能同你们相比，或者哪怕只是重复你们的例子。

的确，奥地利的五一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重大得多的意义。在德国，1890年可以举出刚刚结束的帝国国会选举，这是一次对德国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大检阅，在它面前，任何五一庆祝活动都要显得逊色。在法国，在普选权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给工人带来巨大胜利的市镇选举⁴¹²恰好发生在1892年5月1日；在5月1日这一天，人们当时得为无产阶级事业进行工作，而不是进行庆祝活动。可是在你们奥地利，工人还没有选举权，至于你们那里的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权利等情况，则从政府参事查普卡男爵先生在帝国议会回答质询时所做的说明⁴¹³就可以一目了然。因此，当奥地利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不渝地坚持进行五一庆祝活动，他们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是正确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来说，这一节日主要是国际的问题；因此也可能由于国内的特殊条件，这个节日

要退居次要地位。对于奥地利人来说,它不仅是国际的问题,而且也是,也许还主要是国内的问题;因此在他们那里,它无疑始终是居于首要地位。

但愿今年的五一节也像以往那样过得有声有色。

写于1893年3月—4月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工人报”社出版的专刊

俄文是按五一专刊译的

“庆祝1893年五一节”

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⁴¹⁴

1848年回忆片断

当时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⁴¹⁵会晤了布拉格书商鲍洛施,他是奥地利国民议会中德意志波希米亚党团的领袖。鲍洛施痛心地说,波希米亚的民族纠纷以及所谓捷克人对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的强烈仇恨。马克思问他,波希米亚的工人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鲍洛施答道:“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工人一加入运动,这种现象就告终,就不分什么捷克人或德意志人,大家就都在一起了。”

两个民族的波希米亚工人在当时只是感觉到的事情,现在他们理解到了;他们理解到:所有这些民族纠纷只是在大封建主和大资本家统治时期才有的,民族纠纷只是为永远保持这种统治服务的,捷克工人和德意志工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当工人阶级一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一切引起民族不和的借口就会消灭。因为工人阶级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它将在即将来临的五一节这一天再一次证实这一点。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4月8日于伦敦

载于在布拉格出版的专刊
“1893年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并根据捷克文的专刊校对过

尽管如此

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

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觉得,今年的五一节不会像过去三年那样,在国际无产阶级生活中起压倒一切的作用。

在欧洲几个大国中,看来只有奥地利想使五一示威游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奥地利工人确实没有其他的斗争手段了。

同普选比较起来,今年五一节的意义,在法国无疑是、在德国很可能是、在英国可能是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普选中,无产阶级将获得新的阵地,而且必然会获得新的阵地。

因此,如果五一节由于普选的临近而在某一方面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也不应为此感到不安。这决不意味着我们更弱了,而是恰恰相反。

示威游行是一桩非常好的事情,但只是在我们没有更好的斗争手段时才是这样。

请资产阶级不要得意的过早吧。

手稿中接着有如下一段被删掉:“在比利时,就在五一节的前夕,无能的政府和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正在玩火,他们似乎想引起一场能燃遍整个欧洲的大火。”⁴¹⁶——编者注

我们还要同他们在票箱旁见面,以后还要在波旁王宫⁴¹⁷
见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4月14日于伦敦

载于1893年4月23日“社会主义者
报”第134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并
根据草稿校对过

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⁴¹⁸

看来,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一切,甚至要推翻时间的顺序。至少在西班牙,同任何历法相反,5月1日是跟在5月2日后面⁴¹⁹。过去西班牙工人纪念5月2日,而现在他们庆祝这个月的1号。

从5月2日到5月1日,——我们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实际上,1808年5月2日发生过什么事呢?一方面是外国的入侵,另一方面是马德里的人民。从表面上看这很简单。实际上情况十分错综复杂。为了反对外国的入侵和拿破仑的暴政,西班牙人民必须同时反对法国的革命,为了重新争得本国的独立,同一个西班牙人民不得不恢复贵族和僧侣所支持的狂热的白痴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独裁。

意大利、德国、甚至法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意大利和德国只有把自己交给君主的、封建的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才能摆脱拿破仑的压迫。

就是这样,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使初看起来极其简单明了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了。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在外国军队后面的是拿破仑,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代表,实际上他在本国是暴君、对邻国是侵略者。在马德里人民后面的是愚痴的波旁王朝、封建贵族、僧侣。这是一种惊人的混杂!”——编者注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而法国革命的产物就是拿破仑”。——编者注

然而从5月2日到5月1日的进步是多么巨大啊！5月1日标志着
一个清楚而明显的形势——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和彼此对立的阵
营：一边是在普遍解放的红旗下去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阶级，而另一
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特权而联合起来的各国有产阶级和反动
阶级。斗争已经开始，红旗已经展开，胜利已有保障。前进！

写于1893年4月

原文是法文

手稿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 杂志编辑部⁴²⁰

1893年6月9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同志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给我寄来了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第2期；我想通过这封信的标题向你们说明，我至少已经开始懂得你们的语言。国际主义提出的要求逐年在增长。在1848年以前，人们可以认为，只要多少懂一些西欧和中欧的主要语言就够了，但是今天情况却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为了能跟上社会主义向东方和东南方的进展，我甚至在晚年还得去学习罗马尼亚文和保加利亚文。但是住在西方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我们在亚洲边境上的这些东南方前哨的喜悦，它们正在把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旗帜一直插到黑海和爱琴海岸——要是马克思能亲眼看到这些该多好啊！——，它们用俄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社会主义著作来对抗沙皇的声明，并且以此来回答俄国沙皇政府的利诱和威胁。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了保加利亚文，我非常高兴。⁴²¹

在恩格斯的信中，对编辑部的称呼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До редакцията на сборникъ 《Социалъ-демократъ》——编者注

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你们的 弗·恩格斯

载于1893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校对过

这句口号恩格斯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Да живь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ния социализъм!》——编者注

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⁴²²

记 录

男女公民们！

请允许我把我说过的话(演讲人刚才是用英语和法语讲的)译成我祖国的语言——德语。你们对我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盛大接待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接待,我只是作为那个肖像就挂在那上面的伟人(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它的。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些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末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872年举行了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⁴²³。在这次大会上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同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划清了界限。这个决定是否多余呢?巴黎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这次代表大会都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⁴²⁴第二,国际停止以旧形式进行活动。当时是喝饱了光荣的公社鲜血的反动势力猖獗到了极点的时候。旧的国际如果继续进行活动;就只会造成得不偿失的牺牲;国际把自己的会址迁到了美国,也就是退出了舞台。每一个国

家的无产阶级得到机会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我们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向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自由联合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联系——这就足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已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了。

这里有这样多的英国代表出席,这一点使我特别感到高兴,要知道英国人在组织工人方面是我们的老师;但是,尽管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也毕竟在这里看到了一些新的、他们可以学习的东西。

我路过德国时,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反社会党人法的垮台表示惋惜。据说,同警察作斗争要更有意思得多。像这样的战士,全世界任何警察、任何政府都是制服不了的。

我受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国际无产阶级万岁!
(全场暴风雨般的祝贺声、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与会者全体起立齐唱“马赛曲”)

以报道或记录的形式载于1893年8—9月的一些社会主义报纸和工人报纸上,并载于1894年在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
“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音乐厅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记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的 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⁴²⁵ 报纸上的报道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晚上我受到了当之无愧的接待，在我离开这个会场以前不能不对此表示深切的、衷心的感谢。我必须说，可惜现在只能由我来享受我的亡友马克思的荣誉了。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你们的热烈的欢迎的。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五十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一些事情，那末，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奖赏。我的最好的奖赏就是你们到处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么事，都得看看我们的神色。我们就是一个使人畏惧的强国，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起决定作用的强国。这使我感到骄傲。我们没有白活，我们能够自豪地、满意地回顾自己的事业。在德国，有人曾想用暴力来镇压运动，每一次，社会民主党都以资产阶级完全意料

这句话在发表于“新自由报”的报道中是：“现在你们正在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普选权是检验党的影响、计算党的力量的唯一手段。最近二十年的德国历史教导我们认识这一点。”——编者注

不到的方式作了回答。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总是不可遏止地增长,这使资产阶级战栗,使卡普里维战栗,使所有的执政者战栗(暴风雨般的掌声)。刚才一位讲演人提到,在国外,社会民主运动总是被人估计不足。亲爱的同志们,我走过维也纳的街道,看了资产阶级如此殷勤地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建造的非常漂亮的大厦(会场大为活跃),我还请人指给我看了你们曾经正大光明地占领过的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大厦。从你们占领市政厅大厦的那一天起,谁也不会再对你们估计不足了(掌声雷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那时候我正在伦敦,看到了英国报纸记者们的那种惶恐的样子,当时他们报道说,7月9日无产阶级占领了维也纳⁴²⁶,而且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巧妙地占领了它。(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一再高呼:“恩格斯万岁!”)

载于1893年9月15日“新自由报”第10440号和1893年9月22日“工人报”第3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根据“新自由报”校对过

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的 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⁴²⁷

报纸上的报道

同志们！

我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出色接待，这种接待我是当之无愧的。在这里我只能重复我在苏黎世和维也纳已经说过的话。我不把它看做是对我个人的接待，而看做是对一个伟人的同事和战友，对卡尔·马克思的斗争中的同志的接待，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给予我的东西。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演说家，也不是一个议会活动家，我是在另一个方面工作的，我主要是在自己的书房里从事笔头工作。不过，我还是想对你们说几句话。我上一次看到柏林，已经是将近五十一年前的事了。⁴²⁸同那时比起来，柏林完全变了样。那时候它是个小小的所谓“王都”，居民几乎不满三十五万人，靠为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服务来维持。现在它已是拥有差不多两百万居民的、靠工业来维持的巨大的首都；今天即使宫廷、贵族、驻军和官吏都搬到别的地方去，柏林也还是柏林。而且柏林的工业发展还引起了另一个变化。在那个时候，柏林还没

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那时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呢，几个月以前这里举行了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的检阅，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将近十六万张选票⁴²⁹；柏林选出的六个议员中有五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柏林走在欧洲所有大城市的前头，甚至远远超过了巴黎。

而且不仅是柏林，德国所有其他地方也都完成了同样的工业革命。我有十六年不在德国了。⁴³⁰你们都知道——因为你们都亲身体验过——从1878年起，这里由反社会党人法统治着，现在你们已幸运地把它废除了。当这项法律还生效的时候，我一直避免到德国来；我想使当局免除把我驱逐出境的麻烦，要知道，我一到德国来就得立刻把我驱逐出境。（全场欢动，有人喊道：“确实是这样！”）现在，在我这次的旅行中，我已经看到，德国的经济状况有了多大的转变。在上一代，德国是个农业国，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农村居民；现在它已是个头等的工业国，整个莱茵河两岸，从荷兰边境到瑞士边境，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突突冒烟的工厂烟囱。初看起来，仿佛这只是和资本家有关系的事。但是资本家在发展工业时不仅造出剩余价值，他们还造出无产者，他们使中等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破产，他们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达到极点；而谁造出无产者，他也就造出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在每一次新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的票数不可遏止地增长感到吃惊，他们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他们稍微聪明一点，他们本来应该知道，这是他们亲手造成的！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统一、最团结、最强有力的党，由于它在斗争中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它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民主党人同志们，我确信今后

你们也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最后让我高呼：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1893年9月26日“前进报”第
226号附刊和1893年10月6日“工
人报”第4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并
根据“工人报”校对过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1893年1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请您转达我对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理事会和会员们的最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我七十三岁生日的盛情祝贺。祝协会永久繁荣，愿它永远高举它在英国这里第一次举起的老的红旗！

致真挚的敬礼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 大学生代表大会⁴³¹

1893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因为我有一些重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只能祝你们的代表大会取得它应有的一切成就。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载于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
“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8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1871—1875)”序⁴³²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除了都是为“人民国家报”写的以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专门评论德国以外的国际问题的。

第一篇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结束了这个冒牌的自然科学家兼共和主义者而实际是庸俗自由主义的波拿巴分子兼书籍制造商同马克思在1859—1860年就意大利战争问题所进行的那场论战。这篇文章最终确定了上述的福格特先生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60年他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中自然只能提出间接的证明。⁴³³

第二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描述西班牙1873年七月起义期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它早先已经出过单行本。⁴³⁴无政府主义，这种对工人运动的可笑的模仿，虽然它的发展的顶峰早已过去，但是欧美各国政府还是这样殷切希望它继续存在并花费这样多金钱来扶持它，以致我们不能不注意无政府主义者的勋业。因此我们在这里把这篇文章重新刊印出来。

“波兰宣言”⁴³⁵涉及了德国对东欧关系中现在人们常常忽视的那一方面，但是，如果想要对这些关系有个正确的判断，这个方面却是不能忽视的。

对1874年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的批判⁴³⁶，正是在目前重又

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目前，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同时进入法国众议院的，还有以我们的朋友瓦扬为首的几个布朗基主义者。⁴³⁷从1880年布朗基主义者回到法国以来⁴³⁸，他们有一次曾对事件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在1887年，在格雷维退休后举行上次总统选举的那一天。国民议会的多数赞成选举茹尔·费里，这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⁴³⁹的坏透顶的代表之一。那时巴黎准备举行起义，根据同激进派议员的协议，起义应由巴黎市参议会领导；然而军事组织是掌握在布朗基主义者手里：军官是从他们当中招募来的，而他们的军事领导人公社将领埃德取得了指挥权，并在市政厅大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设立了她的总参谋部。面临着起义的威胁，机会主义派让步了，选了卡诺当总统。

后来，在不久以前，当俄国舰队的水兵在巴黎做客的时候，布朗基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⁴⁴⁰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勇敢行为，反击了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偏见。这种行动方式给我们一个保证：议会里瓦扬领导的布朗基派将竭尽全力，以保证在议会里有代表的所有社会主义团体的协同动作，并把这些团体联合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党团。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

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最后一篇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⁴⁴¹，在1875年也出过单行本，现在把它重印出来不能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跋。关于俄国农民公社的未来这一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所有考虑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俄国人的注意。我所引的马克思的一封信被俄国社会主义者做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解释。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住在俄国国内外的一些俄国人，再三请求我对这个问题发表我的看法。长时间来我都推辞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特点了解得很不够；难道我能在同一个时间里既整理付印“资本论”第三卷，又钻研旧俄国正在用以编造临死前的财产清单（这是马克思喜用的说法）的真正卷帙浩繁的文献吗？但是人们坚持要我重印“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这种情况使我不得不试图从对俄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某些结论，作为对这篇旧

见本卷第494—510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504—506页。——编者注

文章的补充。虽然这些结论没有无条件地给俄国公社许诺伟大的未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还是试图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的死亡，也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它现在已必然要经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

弗·恩格斯

1894年1月3日于伦敦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一文前言⁴⁴²

为了便于了解下面这篇札记，这里提供几段历史资料。

1873年2月9日，国王亚马多对他的西班牙王冠厌倦了；他——第一个罢工的国王——退位了。12日宣布共和，接着在巴斯克地区爆发又一次的卡洛斯派起义。

4月10日选出了制宪议会，它在6月初开会并在6月8日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11日组成以皮-伊-马尔加耳为首的新内阁。同时选出起草新宪法草案的委员会，但是极端的共和主义者即所谓的不妥协派没有参加这个委员会。就这样，当7月3日新宪法颁布的时候，不妥协派发现，新宪法在把西班牙分裂为“若干独立的自治州”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因此，不妥协派马上在各省举行起义，从7月5日至11日他们在塞维尔、哥多瓦、格拉纳达、马拉加、加迪斯、亚尔科、木尔西亚、卡塔黑纳、瓦伦西亚等地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在所有这些城市中成立了独立的自治州政府。7月18日，皮-伊-马尔加耳辞职，萨耳梅朗上台，他立即派军队对付武装起义者。武装起义者进行了软弱无力的抵抗，几天功夫就被打败了；7月26日，由于加迪斯的陷落，整个安达鲁西亚又恢复了政府的统治权；差不多同时，木尔西亚和瓦伦西亚也被制服了；只有瓦伦西亚在斗争中表现出一点坚毅精神。

只有卡塔黑纳坚持住了。这个连同舰队一起落入起义者手里的西班牙最大的军港，从陆路方面也设了防，除了要塞围墙以外，还有十三座独立的炮台，因此要攻下它是不容易的。因为政府避免破坏自己舰队的停泊处，所以“拥有主权的卡塔黑纳自治州”一直继续存在到1874年1月11日，最后，由于丝毫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而投降了。

在整个这次可耻的起义中，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只是更为可耻的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这里只是把这些所作所为比较详细地描绘出来作为对现代人的教训。

写于1894年1月初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⁴⁴³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如果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为“布朗基主义者”。这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特卡乔夫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惯例，宣称自己在西欧面前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也为受到我的批评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辩护得如此激烈，仿佛我的批评是针对他本人似的。⁴⁴⁴

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考察”⁴⁴⁵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研究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盛行于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之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被强行消灭，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发现公社能使他在腐

Lettres de Frédéric Engels sur la Russie.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Серія II. — Выпуск III.

ФРИДРИХЪ ЭНГЕЛЬСЪ О РОССИИ

1) Отвѣтъ П. Н. Ткачеву (1873 г.)

2) Послѣсловіе къ нему (1894 г.)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В. ЗАСУЛИЧЪ

ЖЕНЕВА

Типографія „СОЦІАЛЬ-ДЕМОКРАТА“, Route de Lancu, 6

1894

“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
(载有弗·恩格斯给“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写的跋)的扉页

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现成的。

“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信）⁴⁴⁶

因此，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对俄国来说则已经解决。

盲目模仿赫尔岑的特卡乔夫，也把事情看得像赫尔岑那样简单。虽然在1875年他已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决，但是他说，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可比拟地更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天之骄子，那末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宣扬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天之骄子；据说不是西欧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斗争给旧的经济世界带来新生，不，它的这一新生将来自俄国农民的最深处。我的批评也就是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的。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比赫尔岑和特卡乔夫之流无比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有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由于俄国的文化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出来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科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文化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在某些地方发现他有弱点，发现他的视野的局限性，那末我们只有对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得多而感到惊奇。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代社会形态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出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出于具有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而在西方，个人已经习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 and 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必要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我们看见，西方由于失去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带来了多么悲惨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例子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5卷第16—19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⁴⁴⁷

而在谈到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并在各户之间进行产品分配的乌拉尔哥萨克时，他说：

“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使用机器耕田的时候，那末乌拉尔人到那时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数百俄亩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131页)

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土地共耕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这种土地共耕是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要知道我们这里也存在着兵营式共产主义)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塞尔的农户公社[Gehöferschaften]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们现有的制度保存到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末，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本身，而是他们为之效劳的俄国军事国库。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身发展中的无法消除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作为公有财产掌握在农民公社手里。如果说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整个社会所有作为必要条件，那末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社所有制对于西方还只是行将建立的这种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不能作为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一下子把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改造成一切生产资料公有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起点吗？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里表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那样：“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

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凯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公社和其他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同时又是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控制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一些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末原因不在于公社本身，而只在于这样一个情况：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

比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始祖的南方斯拉夫家庭公社(扎德鲁加)中还存在着的那种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社所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自然地或由于特别的决定而终止，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整整5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的观点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制度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凯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

次，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

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1882年1月21日给普列汉诺夫译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写的序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⁴⁴⁸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入解体的俄国公社所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广泛地扩展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在给农民的份地比以前数量更少质量更坏的同时要农民担负支付赎金和更高捐税的负担，必然使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打开了大门，使那里生产的粮食能运到销售市场去；可是，沿着这些铁路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排挤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在此以前制造出类似的产品，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出售。历来的经济

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种关系在各地开始瓦解了，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于受富人奴役的地位。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不久曾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货币经济的浸入过程，在这里开始使得俄国公社解体了。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制实行革命的干预，来解放变为奴隶的债务人，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愈来愈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分用自己的签字来巩固俄国纸币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Vestnik Jevropy*）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在“祖国纪事”（*O tetschestvenyja Zapiski*）上出来反对他。⁴⁵⁰马对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编者，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V strik Narodnoj V oli*）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⁴⁵¹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强加给他的观点，仿佛他也同

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109—113页。⁴⁴⁹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社所有制和急速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第一版附注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这一点。这一评语是这样的：“如果在欧洲大陆，这种……损害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如迄今以前一样同全国规模的黩武竞赛、国债竞赛、赋税竞赛、以及以优雅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竞赛等等手拉手地发展的话，——那末，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要在皮鞭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的帮助下来返老还童，正如半俄罗斯人但又是道地的莫斯科人赫尔岑如此认真地预言的那样（我们顺便指出，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参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页）⁴⁵²马克思接着说⁴⁵³：“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 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尊敬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⁴⁵⁴这位学者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说话的口气是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在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

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接着马克思还揭穿他的批评者所犯的一些错误；涉及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那末，我的批评者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谈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 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这个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ispolnitel'nyj komitet）的政府⁴⁵⁵。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十七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目前，在1894年，情况怎样呢？

因为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去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借助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遥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一方面，甚至国内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能只建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而不同时建立整个体系；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农民从农奴依附地位下解放出来，产生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比同时也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根子的斧头。

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末这一过程也许要慢一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末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正是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正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冒失地投入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必然会产生一些什么东西。而且也产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

产生的东西；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情况那样，人们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新的时期，即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一运动在这里采取了坚决进攻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自由。对农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信念，认为从农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信念（我们已看到，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舞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战士虽然不过几百人，但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的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对于这些人，我们并不因为他们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天之骄子而去同他们争论。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义务去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天之骄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愈来愈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迫使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维持宫廷的豪华生活，维持官僚，首先是维持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为了维持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国库的全部赤字了；于是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销；一部分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

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来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流通的不是黄金，而只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几种只征收黄金的关税，顺便指出，这种征收办法使这几种关税的税额提高百分之五十。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外国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期票，俄国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用去换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去借新的外债，那末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样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这样就使政府拚命努力要在几年内把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到最高点。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基金或者下决心宣布国家破产。而这两种做法都将意味着俄国对外政策的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的意志。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吏们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不但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而且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即使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式的改变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这种情况下，进行改变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

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

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写于1894年1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⁴⁵⁶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现在正在排印中，可望不迟于今年9月问世。盼望已久的第三卷将完成整个著作的理论部分，到那时，就只剩下最后一卷即第四卷了，第四卷将对剩余价值理论作历史的批判性的概述。⁴⁵⁷第一卷表明，资本家怎样从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第二卷则表明，这个最初包含在商品里的剩余价值怎样实现为货币。可见前两卷所谈到的剩余价值，只是它在第一个占有者即工业资本家手里的情形；然而剩余价值只有一部分留在这个第一个占有者的手里；随后它就以商业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地租等形式在各个有关方面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第三卷所阐述的就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而讲完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就结束了剩余价值的整个生涯，此外对它就没有更多的东西好谈了。除了资本主义利润率的一般规律，第三卷还研究了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信贷和银行、地租和地产等问题，这些问题连同前两卷研究过的题目，已把标题中所答应要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括无遗了。

写于1894年1月9日左右

载于1894年1月12日“前进报”
第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正如“前进报”已经报道的那样，将在今年秋天问世。大家知道，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因此，生产和流通的单独过程在这里将不是各别地加以研究，而是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资本运动的统一的总过程的前提和普通环节来加以研究。既然前两卷的每一卷都只是研究了这一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的一个方面，所以从内容来说，它们还需要补充，从形式来说，它们是片面的和抽象的。下述情况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前两卷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只能以剩余价值留在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即工业资本家手里的时间为限；只能一般地指出，这个第一个占有者根本不一定是，或者哪怕在通常看来也不是它的最终的所有者。然而最明显的是，而且甚至从社会的表面就可以看到，资本的一般运动正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在各有关方面之间，在商人、货币债权人、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的分配。这样，在剩余价值走完前两卷所揭示的过程之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第三卷。对这一分配的各个规律分别进行了研究：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的关系；同一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一平均利润率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下降趋势；商业利润的划出；借贷资本的干预以及利润之分成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在借贷资本基础上产生的信用系统及其主要体现者银行和像交易所这样的投机中心，超额利润的产生以及这一超额利润在一定场合下转化为地租；带来这种地租的地产；作为结果——新创造出的价值在三种所得形态即工资、利润（包括利息）和地租之间的总分配；最后，这三种所得形态的所得者：工人、资本家、地主——现代社会的阶级。可惜，这最后一部分——阶级，马克思没有完成。

这个对全部内容的简要概述足以说明，同研究对象有关而在前两卷中必然得不到解决的全部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

写于1894年1月9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3—1894年“新时代”杂志
第1卷第16期和1894年1月26日“工人报”第8号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署名：弗·恩·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⁴⁵⁸

意大利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他们的胜利。他们既没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没有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子改组国民生产。他们没有能力让本国分享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利益，反而把这种制度的一切累赘、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这还不够，他们还由于卑鄙的财政舞弊行为而永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和信用。

因此，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就处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古老的压迫形式，它们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甚至还是古代遗留下来的（*mezzadria* [对分租佃制]；南方的大地产，那里人被牲口所排挤）；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曾发明的最贪婪的税收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话：“我们都像西欧大陆其他各国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够发展。除了各种近代的灾难，还有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们，这各种灾难，是由古旧腐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以及跟着起来的各种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引起。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抓住活者！”⁴⁵⁹

这种状况将导致危机。生产者群众到处都情绪激昂，他们在有些地方已经举行起义。这种危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去呢？

显而易见，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业很不发达，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即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中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多半是未来的无产者，然而目前还不是无产者。只有这个天天面临着经济破产的威胁并且现在已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

如果胜利是通过或多或少的和平方式取得的，那就只能是内阁的更换，卡瓦洛蒂这一帮“改宗的”共和主义者⁴⁶⁰将会掌握政权；如果发生了革命，那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应该起什么作用呢？

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主义者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主义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⁴⁶¹——因此他们积极参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

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阶段只不过是导致主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成就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成就，他们只是当做分期付款的债款来接受。因此他们把每一个革命的或者进步的运动看做是他们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者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运用于意大利吧。

因此，正在瓦解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改宗的”共和主义者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利显著扩大的活动自由（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 ammonizione [警察监视] 等等），这是不应该予以忽视的新的武器。

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尼主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自由和活动场所更加扩大，至少在其一时期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治形式。⁴⁶²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所以，在酝酿中的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 ambiente [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假如我们对各《affini》[“亲戚”]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评，那末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和他们积极合作的时

刻可能会到来，而谁知道，这个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不言而喻，直接去准备一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所代表的阶级的运动，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认为出动的时刻已经到来，那就让他们去发泄他们的激情吧。至于我们，我们受这些先生们的漂亮诺言欺骗的次数太多了，决不会再一次地落入陷阱。不论是他们的声明，还是他们的阴谋，都不应该打动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责任支持任何一种真正的人民运动，那末，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让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谓的牺牲，不让无产阶级在徒劳无益的地方性的起义中被灭绝。

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而且连一声号令也用不着，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主义者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突进的反对派。

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位置——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位置的错误⁴⁶³。作为政府中的少数派，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由纯粹的共和主义者组成的多数派对工人阶级作出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承担责任，同时，这些

先生们加入政府就完全瘫痪了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应你的要求才提出来，而且是颇为踌躇的。至于一般的策略，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确信到它的正确性；它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过。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是另一回事；这必须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

写于1894年1月26日

原文是法文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4年2月1日
“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意大利文译本校对过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1894年3月18日于伦敦

我同你们一起为国际的3月18日的既将来临而干杯，这个日子将带来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而消灭阶级对抗和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并在各文明国家中实现和平和幸福。

恩格斯

载于1894年3月25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18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致奥地利党第四次代表大会⁴⁶⁴

1894年3月22日于伦敦

衷心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奥地利党代表大会，可惜，我不能应邀参加。我谨向到会的代表们表示我最真挚和最热烈的祝愿，祝你们工作顺利。

今年，党代表大会要完成几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在奥地利，问题是要争得普选权，即争得那种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手里要比受过机械训练的士兵所掌握的小口径连发枪射得更远、打得更准的武器。统治阶级——不论是封建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千方百计地反对把这种武器交给工人。斗争将是长期的和激烈的。但是，如果工人们能显示出政治远见、能保有耐心和坚毅精神、能团结一致和遵守纪律、能发扬这一切已经使他们取得这样多辉煌成就的品质，那末，最后胜利保证是属于他们的。历史的必然性，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完全在他们一边起作用。虽然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不可能一下子就争到手，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为奥地利帝国议会中未来的无产阶级代表高呼“万岁！”了。

弗·恩格斯

载于1894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就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致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⁴⁶⁵

1894年5月15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你们要我参加党代表大会的盛情邀请，我是在5月8日接到的。很抱歉，由于临时有点不舒服，使我不能立即作复，因此只能在今天事后向你们表示感谢并祝你们的工作取得最好的成功。

我也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匈牙利最近一个时期的运动。在匈牙利，也像在其他各地一样，资本日益控制整个国民生产。它不仅创建新的工业，而且使农业也屈服于它，它推翻农业的古老方法，使独立的农民沦于破产，把农村居民分裂成为一方面是大地主占有者和资本主义掮客，另一方面是大批贫苦的农村无产者。资本在匈牙利实行的这种革命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们不久前在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看到了。⁴⁶⁶这种资本主义革命我们不定什么时候也得要经受的。它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痛苦，但是也只有它才能产生使新社会制度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个运动证明了，资本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到处控制国民生产，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而在东欧，农业是无比重要的部门”。——编者注

唯一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建设这种新的更好的社会的男女。

致真挚的敬礼

弗·恩格斯

载于1894年5月18日“工人新闻”第20号，并译成匈牙利文载于1894年5月18日“人民言论”第2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新闻”，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⁴⁶⁷

写于1894年6月19和7月16日
之间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
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教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竟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⁴⁶⁸，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

——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早期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瑞日卡所领导的捷克塔博尔派⁴⁷⁰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才逐渐消失,到1830年后又再现于共产主义者工人身上。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在厄内斯特·勒南说:“如果你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

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⁴⁶⁹止,情况一直都是这样。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都是这样或差不多这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终归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

支部”这句话之前很久，就求助于早期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出先例来的任意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⁴⁷¹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一位过去国际的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创伤，至少在某一方面的创伤，能不绽开来。这篇使徒书，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捐款不来！好多六十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可讲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特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持另外的看法。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平易的唯理论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一个生于赫勒斯滂的帕里城、自称为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一生的历史。这位佩雷格林年轻的时候是在阿尔明尼亚以通奸开始其冒险活动的，他在犯罪地点当场被拿获，将按当地习俗被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又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而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⁴⁷²：“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

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奇妙的教义。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以致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作基督徒，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捉了起来，投进监狱……当他因此而身被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顾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一些基督徒则买通禁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甚至有基督教的使者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事情关系到他们的教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在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以致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 and 灵魂不死，自以为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牺牲自己。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诡辩家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外在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手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给他以保护，保证他什么也不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教会。”⁴⁷³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

就是“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他大约从1840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⁴⁷⁴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一个魁梧健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糊涂蛋；不久他就死了。接着来的是他的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赴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贝克尔也被他诱了过去。这位库尔曼给他们做过讲演，这些讲演于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曾表达出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苦难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的时代深切感到不安的东西…… 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康尔曼博士。他发表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为现实的精神王国的学说。”⁴⁷⁵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味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平常的故做伤感的胡诌。这并没有妨碍天真老实的魏特林派像那些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当做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而对之存有不可克服的疑心；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善做动人表情的装腔做势能手给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id est〔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财富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财富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

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瓦得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在运动正在争夺新地盘的边远地方，像这样的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如果说，各国工人政党里都要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物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476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那末，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没有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会不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会找不到热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无论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或是最初的基督徒，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是无比的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二

德国的圣经批判——迄今我们在早期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曾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杜宾根学派⁴⁷⁷，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达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能做的最高限度。它承认，所有四篇福音书都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大部分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故事以外，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作历史上可资信考的资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杜宾根学派从新约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摈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经被最后清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⁴⁷⁸。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给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那种所谓基督教

是一下子便体态完备地从犹太教里产生出来，并凭自己一劳永逸地大体上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的奇谈，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葛派⁴⁷⁹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未详细地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它——至少就其成为世界宗教时的状况而言——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做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做得太过分了。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五十年，丢开罗马史学家的与此不符的记述，并且一般地以很随意的方式来叙述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只是到了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著作则只是在阿德里安、安敦尼和马可·奥里略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这里，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教会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所以，如果说杜宾根学派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高极限，那末，布鲁诺·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

历史和文献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间。凭现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发现，特别是罗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比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它的写作时间的判定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出的；所以它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基督徒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早期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是所谓的约翰启示录；而且因为本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这一篇，现在已由于德国的批判而变得最易懂、最清楚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连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激动不安。我们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164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⁴⁸⁰时的纪元250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十五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不计算在内（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即使在专家圈子之外也是为大家所熟悉的，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而尤甚得更多的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一堆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明白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⁴⁸¹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

东西占居着首要地位。早期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来顿城的纸草书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⁴⁸²曾在基督纪元二世纪时热心地从事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 mathematici〔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斯时伙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⁴⁸³——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一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蒙蔽读者是应该的。它们(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太等人的启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⁴⁸⁴)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大都比这些作品的假想作者晚得多——写的,而且它们所预言的也主要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164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证实自己预言的效验的办法,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假如约翰启示录果真是它那假想的作者所作,那它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的唯一的例外。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极其尊重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历史存在虽不完全可信但或然性仍很大的使徒约翰。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那末这只会加强我们的看法。这将最有力地证实,此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早期基督教。但

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绝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祭司长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⁴⁸⁵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不知道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赎了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早期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赎掉。这样一来，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

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奉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恢复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这一篇里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篇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把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称做别的什么，而只是称做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每拿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但一会的人。”

谈到别迦摩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固然他们的犹太教对先前的犹太教而言是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先是144 000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12 000人，随后才是无数前来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69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这一点，还很少意识到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它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

行一场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欢悦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它们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世界做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做斗争，这既是最早的基督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残酷至少不下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早期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有谨守1848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主义者，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并且起码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

集会。

最初的基督徒也是分裂成无数的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论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些宗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别迦摩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每拿和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属于撒但一会的人,别迦摩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不是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无所知,只是谈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说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1869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486一书中(第303—305、367—370页)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使徒书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而使徒行传和使徒书至少就其今本来说是比启示录起码要迟六十年才写成的著作,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资料不仅是极可怀疑的,而且是彼此完全互相矛盾的。而有决定意义的是这样一点: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别迦摩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也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

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谈到天上的144 000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

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属于早期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恶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做大淫妇,说地上的君王们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逸而发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所要赋予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约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缚也同所有其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同时,把多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也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也是这样。三十年代圣西门派的《*réhabilitation de la chair*》[“肉体复权”]——德文译作《*Wiedereinsetzung des Fleis-*

ches)——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所”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不论在柏林或在自己的庄园里，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阶级）如果这些正人君子再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还不止这样的话，不知道该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荡行为让位给较为理智的而且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从德国从海涅的“虔诚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置之一笑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做斗争，——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个有先知气概的热心家也可以把它们写得同样好。

三

+ 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给69年的经过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我们才进入早期基督教的圣所。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哪样一些人呢?在像作为革命因素所应该的那样,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南部蓄奴各州的 mean whites(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放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放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做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亲属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

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诉讼程序、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缴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同样,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则宁可把死后的永生看做是一种不幸。可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而事实上只是靠着对彼岸世界里的报偿的希望,斯多葛—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之一。

但这种天堂乐园绝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看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残酷斗争才获得与打开的。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是很快就要到来的。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我们以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出,至少是部分写出的以诺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那种虚假的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像中也没有像他描写的那样经历过。

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

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约翰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

“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的仇敌,要给恨你们的人祝福”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健康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杖来放牧他们,并要踹全能的神烈怒的酒,但又说有罪的人心里仍将顽固不化。这是这样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正在进行斗争,而 *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使吹号之后又出现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厌烦地重复已经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四十二个月,或

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的一半),将迫害信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关闭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之中,基督和死去复活的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一千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教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可怕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幸福快乐的。

就这一预言对当时事件的关系而给它做出解释,要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艾瓦德、吕克和斐迪南·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也为斐神学界所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

“那 兽的 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不会久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并出自那七位之中 ,并且归于沉沦。”

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 ,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 ,其中一个皇帝受了死伤 ,不再作王 ,但已经医好了 ,而且将要回来 ,以作为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争战 ,并且得胜 ,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 ,受兽的印记。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 666”(第13章第7—18节)。

我们只指出 ,由此看来 ,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 ,很明显 ,这是魔鬼搞出来的) ,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 :已经统治过一次 ,受了死伤 ,失了踪 ,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帝 ,究竟是谁呢 ?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作第一 ,那末第二该是提比利乌斯 ,第三是卡利古拉 ,第四是克劳狄乌斯 ,第五是尼禄 ,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还在。”那就是说 ,尼禄已经倾倒了 ,而加尔巴还在。加尔巴作王是从68年6月9日至69年1月15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 ,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暴动起来 ,而在其他行省 ,其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 ,禁卫兵也起而叛变 ,杀死了加尔巴 ,立奥托为帝。

由此可以推论 ,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他统治的末期 ,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69年

4月15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究竟是谁呢?666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三百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做数字来使用:a= 1;b= 2;g= 3;d= 4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说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做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来表示密语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做 gematriah——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做 mathematici(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666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罗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岛斯在二世纪末在666这个数字之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616,它至少出现在许多人还知道这个数字之谜的时候。⁴⁸⁷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

柏林的斐迪南·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禄。数字的根据是 (尼禄凯撒),即有犹太圣法经传和巴尔米拉铭文为证的希腊字 $\text{N} \epsilon \rho \omega \text{n} \text{K} \alpha \iota \sigma \alpha \rho$ (尼禄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 n (num) = 50; r (resch) = 200; w (waw) 代替 o = 6; n (nun) = 50; k (koph) = 100; s (samech) = 60; r (resch) = 200; 合计 = 666。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法 Nero Caesar 做根据,那末去掉第二个 nun = 50,我们就得出 $666 - 50 = 616$,即伊里奈岛斯的那

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都为突然的动乱所笼罩。加尔巴自己就曾带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到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叫一个被释放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僭望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之祸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转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尤其被这些消息所吓倒。而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众多的归附者盘踞在佩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特诺斯(现在的特尔米亚)岛上,直到他——还在奥托时代——被杀死。这样,在尼禄对之进行了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开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再来,认为他的回转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在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信其来临可使殉道者欣然就死的千年王国“很快”就要到来,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岛斯固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做很多其他活到三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要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做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勃莱希

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1836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可怕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可怕的审判没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虔诚的启示录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1836年,斐·贝纳里给666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 gematriah(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做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12 000斯塔第= 2 227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500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水的河从城中穿过,河两岸长着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根据勒南的看法,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者”⁴⁸⁸第542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68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華,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 *parcere subjectis ac debellare superbos* [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可怕的审判日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以赛亚书中的富有诗意的一处(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

成的“神的七灵”也同样是神产生出来的——虽然地位较低。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做了赎罪的牺牲，为此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他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作他的特殊功勋，而不是被当作其内在本质必然产生出的一种东西。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做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⁴⁸⁹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在流放⁴⁹⁰以后——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像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它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尔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九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⁴⁹¹第1册第227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和它的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教会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然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还完全不知道他是某种不同于犹太人的。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

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 000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并且用羔羊的血把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不知道。如果说在路德的译文中,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推搡搡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 *deipn êso*——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 *I shall sup with 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68年或69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

已经辨认不出 ;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 ,也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 ,或者是更晚的作品 ,或者最多也只是旧有无名作家的著述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 ,——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颇的历史学者才加以否认。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 ,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 ,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四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 ,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⁴⁹²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 ,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 ,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 ,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 ,都是西方 ,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 ,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 ,它也只有希腊罗马世界里 ,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 ,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 ,这句话是这样写的 :“就连杜宾根学派还承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 ,也都如布鲁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 ,不过是晚出的作品” ;以下与德文版同。——编者注

致英国各社会主义和 工人组织⁴⁹³

亲爱的同志们：

我受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通知英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将于8月29日和随后的几天在马德里举行，英国的朋友们如能按信末所附地址寄来几句贺词（用西班牙文或法文），则不胜感谢。

因为1893年在拜尔法斯特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⁴⁹⁴通过了要求一切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社会化的决议，从而加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它们的机关——议会委员会——也列入寄发本邀请信的名单之中。

本邀请信寄给：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

社会民主联盟，

独立工党，

费边社，

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不是“亲爱的同志们：”，而是“亲爱的先生”。——编者注

在手稿中，这一段放在方括弧内；在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中，这一段被删掉了。——编者注

工联代表大会委员会，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⁴⁹⁵。

尊敬你们的 弗·恩格斯

贺词请寄：马德里，艾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帕布洛·伊格列西
亚斯

写于1894年8月6日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并根据
寄给费边社书记的信校对过

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 第三次代表大会 (给卡·德拉瓦勒的信)⁴⁹⁶

9月6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公民：

……但是，既然我没有可能亲自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我就在此一并向你们致最良好的祝愿，祝你们为国际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工作取得成就。

意大利社会党人正在遭到前所未闻的非常法⁴⁹⁷的迫害，毫无疑问，非常法还将使他们受好几年的奇灾大难。这有什么！别人也曾不得不经受类似的考验。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曾饱喝无产者的鲜血，可是结果是：在法国议会中有了五十名社会党议员。

在德国，俾斯麦曾在整整十二年中把社会党人置于法律之外，但是社会党人粉碎了非常法，他们把俾斯麦赶下了台，现在他们是帝国中最强大的政党。

手稿中在称呼语之后有一段话在发表时略去了：“您8月30日的来信寄到伦敦时恰好我不在那里，信是给我转到这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迟迟未复的原因，我为此深感遗憾。我感谢您个人和您所代表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对我的盛情邀请。可是遗憾，我不能应邀参加。”——编者注

法国和德国工人所做到的事情 ,意大利工人也同样能做到。梯也尔、麦克马洪和俾斯麦所未能得到的东西 ,姓克里斯比的也是得不到的。胜利属于你们 !

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4年9月22—23
日“阶级斗争”周报第38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阶级斗争”周报 ,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⁴⁹⁸

向你们的报纸——西西里岛工人的机关报致敬,祝它长寿,向你们正在改组的党致敬。

大自然把西西里岛创造成为人间天堂。而这就足以使分为对立阶级的人类社会把它变成了地狱。

古希腊罗马时代为了经营大地产和大矿场而赏给了西西里岛一个奴隶制。

中世纪以农奴制和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

现在的时代宣称它已消灭这些桎梏,实际上它只是改变了这些桎梏的形式。它不仅保存了旧的赋役,而且还加上一种新的剥削形式,所有剥削形式中最残酷、最无情的剥削形式——资本主义的剥削。

西西里岛的古代诗人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赫曾经歌颂了他们同时代人——牧人奴隶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幻想。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现代诗人,敢于歌颂今天西西里岛“自由”劳动者的田园诗式的生活呢?如果这个岛的农民能够在哪怕是罗马对分租佃制的沉重条件下耕种自己的小块土

在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的:“向刚刚重新出版的西西里岛工人机关报致敬并祝它长寿!”——编者注

在手稿中不是“古代”,而是“古希腊”。——编者注

地,难道他们不会感到幸福吗?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自由人在怀念过去的奴隶制!

但愿他们不要丧失勇气。一个更好的新社会的曙光正在开始照亮各国被压迫阶级。而各地的被压迫群众都在团结自己的队伍,他们不顾边界的限制,不顾语言的差别,到处在相互达成协议。国际无产阶级大军正在形成,——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将使它获得胜利!

弗·恩格斯

(伦敦)

写于1894年9月26日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5年6月30日
“解放”周报和1895年8月16日“社会
评论”杂志第16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评论”杂志,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⁴⁹⁹

当年轻的意大利社会党遭到极其残酷的政府反动势力的打击时,我们的责任,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社会党人的责任,就是要设法给它援助。我们无法阻止各个支部和团体的解散,但是,面临着半官方的和卖身投靠的报刊所广为散布的下流无耻的诽谤,我们提供一点证据,也许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这些报刊责备意大利社会党人说,他们故意装成一副好像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样子,为的是用这种假面具来掩盖完全是另一种的政策,一种宣传“阶级斗争”(它“会使我们回到中世纪”)和旨在建立其目的是“夺取政权”的政党的政策;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党人,“则不过问政治,不攻击现存的政体”;总之,他们是一些可以嘲弄一番的、完全没有恶意的、善良的小伙子!

如果说这里是在嘲弄谁的话,那末正是嘲弄意大利的公众。要不是认为意大利公众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就不会敢于向它奉献这样的蠢话。如果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宣布“阶级斗争”是我们生活所在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如果他们组成为“以夺取

在手稿中此处补充有“效法德国社会党人”。——编者注

政权和领导全国事务为目的的政党” ,那末他们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他们严格遵循着马克思和我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线 ;他们的活动就和法国、比利时、瑞士、西班牙、而首先是德国的社会党一样。在这些党中 ,没有一个党是不想夺取政权的 ,这正像其他政党 ,如保守党、自由党、共和党等等也想夺取政权一样。

至于“阶级斗争” ,那末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 ,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 ,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而在那时以前 ,相互对立的阶级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 ,将照旧彼此进行斗争 ,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刊怎么说。

而且 ,意大利现在正在经受着德国 在十二年非常法期间所经受过的考验。德国战胜了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将制服克里斯比。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4年10月27日于伦敦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4年11月1

日“社会评论”杂志第21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评论”杂志 ,
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在手稿中“瑞士”一词没有。——编者注

在手稿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这几个词没有。——编者注

在手稿中不是“德国” ,而是“社会主义的德国”。——编者注

在手稿中 ,最后一句是这样的 :“德国人战胜了俾斯麦 ,意大利人将制服克里斯比。”——编者注

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

据党的报刊报道,福尔马尔同志10月25日在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中发言时,援引了在南特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⁵⁰⁰的决议,说它们“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直接赞同”。据“前进报”11月10日报道,我们敌人的报刊也在传播这种说法。⁵⁰¹因此我不得不声明,这里有错误,显然,福尔马尔所掌握的关于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

根据我的记忆,关于南特纲领我只往法国寄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在代表大会以前为了回答一位法国同志的询问而写的,它的内容归纳起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我们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干预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在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则上是丝毫不能反对的;但是如果再走远一些,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末,在我看来,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

在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二封信中,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看法,即在社会党人范围内,我们的法国朋友在想要不仅永远保存小农

大概是保·拉法格。——编者注

私有者 ,而且永远保存剥削别人劳动的小佃农方面将是孤立的。

因此 ,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的话 ,那末我所说的就恰好是同福尔马尔所听说的相反的东西。

但是 ,既然我已被牵连进来 ,那末 ,看来除了把我的观点说得更明确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因此我打算在“新时代”上登载一篇不长的文章 ,说明和论证我的观点 。

弗·恩格斯

1894年11月12日于伦敦

载于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第
268号和1894年11月22日“社会民主
党人”第43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法德农民问题⁵⁰²

写于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
第1卷第10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法德农民问题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提出了农民问题,感到非常惊奇。其实,他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鲁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靠自己经营为生的农民;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退居次要的地位。

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在农民的想像面前把社会主义工人描绘成 *partageux*, 即“均产分子”,描绘成侵犯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市民。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

德文原文是 *wird gelegte*。Bauernlegen (驱逐农民) 是德国历史上放逐、剥夺农民的叫法。(弗·伊·列宁在他译的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上加的注。)

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过安逸生活的农民，记起了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苦于这一勋业的后果。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东西都已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止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以廉价的粮食充塞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乡村居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进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他们是为自己利益奋斗的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已成长起来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了，更加广阔而深刻了，它们已变成了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社会党是以明确理解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而与其他政党不同，因此它早就揭露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掩盖在羊皮下边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不能心安理得地把注定灭亡的农民留在他们的伪保护者手中，一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呢？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

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正如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着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某些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家奴、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按地区而各不相同,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活家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使这种手工业有可能保持不然就会低得不能想像的低微工资,以保证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

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这一类型是最重要的，并且一般说来不仅对于西欧是如此。不，对于整个问题说来，重心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农民上面。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也如小手工业者一样，是在握有自己的劳动资料这点上不同于现代无产者的一种工人；所以，这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罕有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属于代役租和徭役租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是三方面不同的。第一，法国革命已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主担负的种种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他保证了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古老公社土地的权利。公社的土地一部分被他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用欺诈手段从他手中掠夺去了，从而现代的小农便丧失了不购买饲料而喂养耕畜的可能。而在经济方面，丧失公社土地使用权的意义，要比废除封建地租重大得多；无法喂养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地增长起来。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他们所获得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

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他的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所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作为交换物的产品或作为互助的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以货币经济和大工业把这种情况结束了。而如果说公社土地是农民生存的第一个基本条件，那末工业副业则是第二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农民一个又一个地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愈来愈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是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他为了保持他那一小块危机四伏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愈加艰苦，他便愈加顽固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便愈加倾向于把那些对他说应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与这种成见作斗争呢？在不改变自己原来立场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提出些什么建议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做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予以重视，因为它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1892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⁵⁰³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工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工资最低限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

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并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其款项用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佃农也在内）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5000法郎的土地，废除在土地转手时征的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 *Code civil* [民法典] 第二一 二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作押金的权利；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订早已过时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专门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佃农调解法庭正在明显地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农民合作社在莱茵河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特别损害就可实现的。我们说这一些，只是为了说明纲领的特征，决不是要责难它，——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

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越吃胃口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觉到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怎么可以帮助农民（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私有者农民来帮助）而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预防这种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财产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虽然作者们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绪论以及今年9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要求本身。

绪论是这样开始的：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确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如果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至于只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那末，——至少在现代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est fata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î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者分隔开来，就会使无产者化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现在游手好闲的私有者实行剥夺之后，占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大地产，那末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济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所有者方面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有时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

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的土地纲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个“绪论”。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一论点之后，应该添上一段，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愈来愈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所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个人占有本来就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纲领，那末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

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全然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牢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获得一天安逸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二一 二条删掉，即使依法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在现代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经指出过，说得如此笼统的后面这点，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错误想法，仿佛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私有者，把满身债务的私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私有者。自然，社会主义是要设法使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消失的，但不是用这种方法。

无论如何，事情已弄到在纲领的绪论部分竟率直地宣称，仿佛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宣布社会主义的职责是在于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曾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绪论委托社会主义“保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断言这一所有制“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国库、高利贷者、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简单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者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所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小农的所有权。与此同时，

“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有时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这里我们就站到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去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保护那些有时“剥削短工”——确实就是这样说的呀！——的法国佃农。这是因为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

既已踏上了斜坡路，那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地往下滚啊！如果德国的大农和中农来见法国社会党人，请求他们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张罗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他们剥削男女长工方面加以保护，借口是说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收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方面的“剥削”，——那末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

又能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输入事项转交国家管理的建议)也派到他们那里去,借口说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剥削”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并不像别人可能觉得的那样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的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农民必须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栽种甜菜:他们得向一定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得购买一定的种子,使用一定数量的严格规定的肥料,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无情的欺诈。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是很熟悉的。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率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一段以它现在这种极为笼统的提法,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词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被用来做出不合它的起草者们本意的解释,那末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歪曲的解释。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

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某些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同样没有人们可能想像的那种坏意思；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只是没有考虑到罢了；但是可惜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上了当；要是有人在字眼上挑他们的毛病，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新的补充。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词很草率。

关于市镇应当取得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交给小农支配。这个进一步的让步决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取消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代之以对3 000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的单一的累进税。”

许多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这一类的要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真正意义被理解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作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9 000万英镑。其中有1 350万至1 400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7 600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总合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

且假定说，所有这9 000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120英镑（3 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1865—1876年是24 000万英镑。假定现在每年是3亿英镑；9 000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场合便会吞没全部积累的将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作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大概自己也意识到，农民必得长久地等待这种税收改革，因此“暂且”（en attendant）向他们提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减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的农田；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有利的。

其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做的限制除外。”

这听起来是颇得人心的，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给每个农民一年之内用一天以上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

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末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的法律制裁的。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在特别需要贷款时难于获得贷款。

“公费治疗并按成本供给药品”——

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应召预备役士兵在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

“减低肥料、农业机器和产品的运费”——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话，在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绪论的后面，新土地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希望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的。

二

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觉得，他们在试图接近农民时，杠杆没有使对。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尽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他们只有凭借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寻找根据，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诊断。如果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维护一种自己宣布为注定要灭亡的事物）；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共同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最后，或者对于小农只有很小的意义；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本身便改正了错误的引言，并把绪论中那些表面上令人生畏的响亮词句化为事实上极其无伤大体的措施。

老实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的教育和隔绝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支持的偏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诺言，才能立即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

佃农变成自由的私有者，而对于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私有者即解除其债务。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们就没有解放农民，而只是把他们灭亡的时间延缓了一下。

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希望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应有的地位是在反犹太主义者那里。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经济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所奏的是些什么样的调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是完全从另一个方向寻找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末他们未必会犯南特的错误。

那末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权力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原理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

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二十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他们的国家里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得几乎完全是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就已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我们就会发现：在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可能性去从事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消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各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决定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受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钱，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工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

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末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何处为止算是诚实，从何处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

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

可见,如果我们所给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想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我们这样做,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而经济发展是会使农民的头了解我们的话的。

然而,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起草者在实质上是跟我抱有同样观点的。他们甚有见识,决不会不了解,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是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的。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法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理事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⁵⁰⁴南特纲领在措词上的矛盾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了解,他们的言论被

人滥用，——实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审查。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继承人分家，同时还由于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一系列过渡阶段。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在利益和观点上是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他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但是，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农业经营又到处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做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还存在真正的大农和中农，他们就非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支持小块土地农民想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的希望是荒谬的话，那末向大农和中农做这样的许诺就几乎是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希望把自己的地位永久保存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他们会看到就在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的。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则要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要准备在将来分享其他一切工人将有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更关心得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是决不能给的。要是这样，

他们就只有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我们确切地知道如下一个经济上的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和海外廉价的粮食生产，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这种衰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里我们也只能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去听天由命，而去同那些一定会对我们表示同情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也将拒绝实行强力的剥夺，不过我们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学到乖的。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阶级，因而我们的任务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

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在什么条件下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农场之转变为公有农场在这里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并且可以马上实行，比方说，就像在克虏伯先生或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一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使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看到合作的大规模农场的优越性，而且也许会使某些大农看到这些优越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題。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他们愈来愈欠债，愈来愈贫穷，靠国家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愈来愈拚命抓紧自己的统治不放，——正是他们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之作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就是说，几乎在整个帝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他们握有在这里提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握有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糖厂和酿酒

工厂握有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未握有整个的王国。他们都是散布在广阔的地域里，并且在争取经济和政治优势的斗争中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优越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经济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止地日益扩大；只是法律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半农奴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无限制地剥削农业工人的可能性，才把正要没顶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在这些工人当中，只要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那末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种野蛮劫掠成分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个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革命的变动。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把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比吸引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吸引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的场所，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展，那末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接近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⁵⁰⁵

“前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报道，其中写道，看来，第四卷即讲述理论历史的那一卷的出版工作将不得不放弃，因为

“除了一些简短的札记，找不到可以作为他的著作最后一卷的任何草稿”。

我们希望，“前进报”在这方面是犯了某种程度的错误。至少，弗·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有点希望的消息。根据这个消息可以知道，有一部在1861—1863年写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计有四开本1472页；这部手稿的第220—972页就是“剩余价值理论”部分，恩格斯关于这一部分写道：“这一部分手稿，包含政治经济学核心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性的历史……我为自己保留了下述权利：把这部手稿的批判部分当作‘资本论’第四卷来发表，而且将在这一卷里略去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交代清楚的许多东西。”⁵⁰⁶

写于1894年11月22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9期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1894年12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请您转达我对协会的真诚的谢意，感谢它对我的生日的友好祝贺。我希望，四年前已经纪念过成立五十周年的协会能像我这样活到七十四岁，并且到那时候它仍旧那样精神饱满，朝气蓬勃，能够再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

致真挚的敬礼

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 奥地利工人的贺信⁵⁰⁷

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这个阵地你们已经为自己占领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占领第二个阵地：选举权、议会。如果你们能以最近十五个月内所显示的那种才能来利用日益有利于你们的政治形势，如果你们善于及时地采取坚决行动，可是又同样及时地（这常常是必要的）等待时机，也就是使情况对你们有利，那末在这方面你们也能保证取得胜利。

祝每日出版的“工人报”顺利和成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4年12月27日于伦敦

载于1895年1月1日
“工人报”第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在给维·阿德勒的信中，这句话前面还有以下一句话：“请你向奥地利工人转达我对他们每日出版的报纸表示的祝贺。”在报上发表时这句话被删掉了。——编者注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⁵⁰⁸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确切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

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

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 and 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⁵⁰⁹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述文字当做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举行行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3版⁵¹⁰)。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

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⁵¹¹”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换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主义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归社会。这些先生未必能说明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森林⁵¹²及其他补贴在内的贫民救济吗?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手段正是我们所想要废除的。

* * *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统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

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 *in partibus*〔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我们却估计到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铲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顾，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胜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

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在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

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末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⁵¹³,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的内部安

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⁵¹⁴,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1866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

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编入人数达数百万之众的军队,以及效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残酷而结局完全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别种战争都成为不可能,因而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变革使得军费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它对于这两国的工人只是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环节。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⁵¹⁵,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

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 2000，1874年为352 000，1877年为493 000。接着就是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来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 000。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形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 000票，1887年为763 000票，1890年为1 427 000票。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 787 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但是，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⁵¹⁶，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

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 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⁵¹⁷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

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虽然甚至在防卫一个市区时——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时——也是必要的条件，但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是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

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设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斗争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指靠部下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告终。

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間和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各种命令的束缚。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

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暴动者、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末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没有增长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速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霰弹发射的大炮,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末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都需要有特种子弹,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门适合的作战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⁵¹⁸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响剑鸣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上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这样坚决恳求我们终于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他们也同样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向敌人要求，要敌人把军队排列成像在老弗里茨时代那样的阵式，或是排列成像在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⁵¹⁹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里拿着燧发枪。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在法国，虽然在一百多年以来地基已被好几次革命挖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干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情况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⁵²⁰,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一致认定再不能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即年轻的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贵族革命是于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告终的。⁵²¹革命权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搏战”印成“解决”。——编者注

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 *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⁵²²,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变革。又是一一切都颠倒过来了。难道今天的变革的疯狂敌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祖传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⁵²³而这些推翻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竟在那里埋怨变革 *Quis tulerit Gracchos de seditione querentes?*〔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变革呢?

可是让他们去通过他们的反对变革的法案吧,让他们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吧,让他们把全部刑法都变成橡胶式的东西吧,——他们所能达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要给社会民主党以严重打击,他们就还得采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办法。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鲍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可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驱入巷战的工人唯一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 *regis voluntas*

尤维纳利斯的第二首讽刺诗。——编者注

suprema lex !〔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 !〕大胆干吧 ,先生们 ,这里闲谈没有用 ,这里需要实际行动 !

但是请不要忘记 ,德意志帝国 ,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 ,乃是契约的产物 :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 ,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 ,契约就要全部作废 ,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 ,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 ,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 ,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 ,—— 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

在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 ,罗马帝国也曾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活动过。这个变革党曾经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 ,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 ,它是没有祖国的 ,它是国际性的 ;它蔓延于帝国各处 ,从高卢直到亚细亚 ,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工作 ,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已感觉到自己充分强大 ,能够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变革党 ,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 ;整个军团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占统治地位的异教教会的祭典而在那里行军礼时 ,属于变革党的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徽章—— 十字架 ,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迫害手段 ,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 ,他颁布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 ,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 编者注

了一道反对社会党人的(请原谅,我该说反对基督徒的)法律。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像在萨克森禁止了红手帕一样。基督徒被剥夺了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他们甚至不能充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克勒尔先生那个防止政变的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迪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报复了基督徒。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过了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伦敦

摘要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和28期,并载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1895年版条样,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理事会

1895年3月11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很遗憾，这次我不能参加你们的三月节日活动了。由于疾病又一次发作，虽说不严重，可是治疗要求绝对安静，所以我又要被困在家里好几个星期了。我希望，你们的节日活动不至于因我缺席而减色。

致最好的祝愿

您的 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致独立工党执行委员会⁵²⁴

我衷心感谢执行委员会的盛情邀请 ,然而我无法赴邀 ,因为给我治病的医生坚决反对我此刻接受任何邀请。鉴于入场券可能对别人还有用 ,因此我不揣冒昧 ,将它随信奉还。

写于1895年4月下半月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附 录

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

1892年4月1日弗·恩格斯对 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⁵²⁵

……最反对接见记者的恩格斯先生同意为我们破一次例，同我们谈一谈他的感想。

我们问恩格斯：“您对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前在巴黎的暴行有何看法？”

“我看这只是一些被收买的奸细干的事，这些奸细企图败坏他们在其中占有某种地位的那些政党的信誉。政府无疑愿意这些爆炸事件发生，因为这些事件既为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同时又特别为某些政治集团的阴谋效劳。的确，它们的目的是要使居民惶恐不安，制造恐怖，从而建立反动统治。

不久前在德国‘柏林风潮’⁵²⁶期间，也使用过同样的手法。在那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是警察局一手干的。的确，在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示威游行的头一天，我们有些被引入迷途的朋友参加了运动，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示威游行的真正性质，并且马上退了出来。

几家属于知名的社会主义者的小铺被抢劫，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对被捕的暴徒的审讯表明，主谋是反犹太主义者，他们竭力利用某些贫民的饥饿来迫使他们大叫：‘打倒犹太人！’

在意大利，对契普里昂尼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也是使用同样的手法。在那里，奸细们的行为也在陪审法庭面前被揭露出

来。

但是,这并不是总能做到的。在巴黎有两三个坏蛋愿意为警察局效力,可是,除了警察局本身,谁也不敢肯定说,他们是社会党里的人。”

俄 国 的 外 交

“您不担心,所有这些内部震荡将使各国政府到欧洲战争中去寻求出路吗?譬如说,你们的威廉皇帝……”

“不担心。我希望威廉皇帝为德国社会党人的最大利益多活一些时候,”恩格斯笑着说。“但是,我并不相信马上就会发生战争。”

“难道俄法同盟丝毫没有引起您对这点的担心吗?”

“丝毫没有。去年,可能俄国有过侵略意图。喀琅施塔得的场面⁵²⁷(帝制俄国对共和制法国过分明显的献殷勤)可以说是形迹可疑的。军队在边境集结,看来也应当引起某种担忧。但是,今天的一切却完全是另一个样。

事实上,即使俄国想打仗,它也打不起来。目前,它不得不同较之其他一切敌人都更为危险的敌人,即同饥荒作斗争。

这个祸患并不是某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偶然性歉收的结果。这是俄国新的社会制度的后果。

克里木战争之后,俄国的状况已大大改变,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整团整团的人马在雪地里覆没。这次战争标志着俄国历史的大转折的开始。在把俄国的孱弱暴露在全欧洲面前的彻底失败之后,因自己帝国的可怜状态而陷于绝望的尼古拉皇帝,除了服毒自尽,

别无出路。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二世 ,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改变他的国家的异常糟糕的处境。”

俄国饥荒的各种原因

“正是在这个时期 ,沙皇实行了农奴解放 ,这一解放成了在贵族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土地的借口。好地 ,以及林地和水塘都给了贵族。农民得到的则是坏地 ,而且数量非常不足 ;同时 ,农民还必须在四十九年之内为自己的份地逐年交付一定数额的款项。这引起了什么后果呢 ?

农民无力向国家交纳地租 ,不得不欠下许多债 ;他们的死路太多而活路太少。一帮 kulaki(高利贷者)扑向这些土地劳动者 ,于是 ,他们欠下的债就愈来愈多 ,以致使他们对有朝一日能够还清债款失去了任何希望。当高利贷者不愿意放债时 ,农民为了弄到钱就只好出卖自己的收成 ,他们不仅卖了自己的口粮 ,而且连播种必需的种籽也卖了 ,这样一来 ,下一年的收成也受到了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 ,头一个坏收成就必然引起真正的饥荒。而这一饥荒反过来又给俄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喂牲口 ,于是只好把它宰了或者卖了。然而 ,没有耕畜 ,既不能耕地 ,又不能往地里施肥。这样 ,农业生产就长年受到破坏。

农民解放只是在俄国发生的经济革命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人为地创造作为中间阶级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更快地达到这点 ,制定了一个真正的禁止性关税制度 ,这个制度保护了俄国工业并促使它异常迅速地发展 ;然而 ,因为这个工业不能生产出口商

品,所以它需要有国内市场。而俄国的农民却差不多什么都不买,习惯于自己制造一切:房子、工具、衣服等等;就在不久前,他还生产许多木制品、铁制品和皮革制品,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当林地转归地主,因而把森林从农民手里夺走的时候,农村家庭手工业就趋于衰落。工厂生产的发展最后结束了农村家庭手工业,于是农民一定得买工厂制品。可是,正当工厂工业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饥荒降临了,它给工厂工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因为农民不能再买任何的工厂制品;一些人的破产招致另一些人的破产。”

经济状况和军事状况

“这么说,在您看来,俄国的经济状况不容许它想到打仗,是不是?”

“是的。如果我说沃邦和布阿吉尔贝尔所描绘的十七世纪法国农民的生活情景⁵²⁸,也可以用在今天不得不用草充饥的俄国农民身上,这并不是过甚其辞。就是在法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也不是没有经过震荡的;而在俄国,这一过渡刚刚引起了危机,这一危机势将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根据这一切原因,俄国人当前考虑得多得多的,是吃饭问题,而不是打仗。”

“最近一次的俄国公债……”

“我正好想谈这批公债。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非常爱谈报复的法国资产阶级,它的爱国主义并没有强烈到解囊相助的地步,沙皇政府要的是2000万金镑,但它得到的只有1 200万……”

“据说,路特希尔德家族为了给他们的受到俄国政府排挤的同道者报仇,曾经促成这批公债失败,是吗?”

“我发表反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言论够多了,现在我不会替他们辩护,说他们这样愚蠢。路特希尔德家族只是从他们作为银行家的利益出发,这种利益就是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代售佣金和剥削尽量多的糊涂虫,如此而已。”

“这么说,您不相信俄国的强大?”

“俄国在防御方面是强的,但作为进攻的一方,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它都不强。我已向您说过,经济状况不容许它作这种危险而又代价高昂的冒险。如果我们看看俄国军队的组织,那我们会看到,俄国在这方面也是不可怕的。

一旦发生战争,它派不出比现役军数量更多的士兵。它的预备兵只是一纸空文,诚然,它能够得到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是,它没有后备军官来补充军官。的确,它能从哪里得到军官呢?从哪个方面得到呢?”

我们的交谈人说:“在我们德国,后备军官比我们所需要的多50%。难道法国在这方面不是处于相对的劣势吗?”

强有力的法国

我们回答:“绝不。我们法国虽然没有富余的军官,但干部是配备齐全的。”

恩格斯先生回答:“这绝不会使我不愉快。我并不想看到德国军队强大到能征服全欧洲。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为了欧洲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法国,同样也需要一个具有相同优点的德国。你们的伟大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宣

布必须有法、英、德的同盟作为欧洲安宁的首要条件。那是真正的‘三国同盟’⁵²⁹。”

“在结束谈话时,请允许我们说,您把俄国的状况描绘得有些阴暗了。”

“完全不是那样。您愿意我告诉您一件事情吗?您知道,为了帮助挨饿的俄罗斯农民,曾经决定从有余粮的高加索运来粮食。接着下了一道道有关的命令,把许许多多粮食运到一起,派车皮去装运。但是,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派去的空车皮集中得太多,造成了堵塞。粮食放在车皮旁边,而车皮却一动也不能动。沙皇得知这一消息,大发雷霆,派了一个将军到出事地点;这个军人大吹大擂,宣称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他能够弄走的只是几个列车;大部分粮食都在原地烂掉了!下了动员令又会怎样呢?我国的铁路本来就不那么多,而俄国的军官就连这么点铁路也不会利用。”

关于亚尔萨斯—洛林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亚尔萨斯—洛林这个一切纠纷的根源会怎么样?您相信能同时使法国和德国都满意地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吗?”

“我希望,经过十年左右,德国社会党将取得政权。它首先要办的事,就是让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这一问题将在没有任何法国士兵的参预下得到解决。相反,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是妨碍社会党人取得政

权的唯一手段 ,如果法国同俄国结成同盟进攻德国 ,德国将为保卫民族的生存而进行殊死的斗争 ,而对于民族的生存 ,德国社会党人远较资产者更为关心。因此社会党人将战到最后一人 ,并且将毫不犹豫地采取1793年法国采用过的革命手段。”

载于1892年4月6日“闪电报” ,并摘要载于1892年4月1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82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闪电报” ,并根据“社会主义者报”校对过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⁵³⁰

……恩格斯知道我的来意之后 ,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

“德国正进入自己历史的一个最严重的时期 ,但我应当马上补充一句 ,我们社会党人 ,对业已造成的局势没什么可担心的。相反 ,我们正在为自己的利益顺利地利用这一局势。军事拨款没有被批准 ,主要是由于我们宣传鼓动的结果。⁵³¹各议会党派都不能无视我们 ,政府更是这样 ,它十分清楚 ,对它来说我们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德国人民知道政府决定要取得新的军事拨款的时候 ,都非常愤慨 ,中央党和激进派⁵³²在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 ,无疑是受到了舆论压力的影响。”

恩格斯想要强调一下他的话 ,补充说 :“要知道 ,德国人民说 :‘我们出的兵已经够多了 应当到此为止了 !’”

“而下届帝国国会呢 ,恩格斯先生 ?”

“现在 ,当我同您谈话的时候 ,我认为下届帝国国会将比上届更不乐意投票赞成拨款。不过 ,我也不是闭眼不看这样的可能性 :今后将有五年立法活动的下届帝国国会议员们可能同政府相勾结 ,因为政府将借助于‘缓和的暴力’来力争妥协的解决。但是 ,非常可能 ,帝国国会将不批准拨款 ,在这种情况下 ,只好来个第二次

解散,不过,我相信,这样就会选出一个在接受政府草案方面更不听话的帝国国会。而这就将最终使冲突尖锐化,那时候还很难说谁将占上风,是帝国国会还是皇帝。1864年在俾斯麦和普鲁士议会之间发生的、后来由于对奥战争才告结束的冲突就会重演。⁵³³”

恩格斯的回答使我想起一个新的问题——他怎样看待在欧洲报刊上已经展开讨论的事态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威廉二世在国内进行政变还是发动对外战争。

我的交谈人作了生动的回答:“现在要搞政变并不像从前那么容易。在1864年俾斯麦同普鲁士议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鲁士是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而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是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要企图搞政变,它冒的风险就太大了。为了对政变的成功有把握,它必须得到联邦内所有政府的一致同意。哪怕只有一个邦政府不同意搞政变,它就会摆脱对帝国所承担的义务,而那就意味着联邦制国家的解体。但是还不止于此。联邦宪法是保障各小邦免受普鲁士统治的唯一的東西,它们破坏宪法,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交给中央政权去任意摆布。难道可以设想,巴伐利亚会这样放弃自己的权利吗?不会的,为了把我的意思说得更确切,我要对您说:皇帝要想在德国搞政变,他必须要么有人民要么有联邦的所有政府站到自己这一边,可是人民不会支持他,而所有的邦政府也永远不会一致赞成他。”

因为恩格斯的后一种说法没有说服我,我继续坚持国内政变的可能性。

他反驳说:“我并没有断言,我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那种东西不构成对未来的威胁。倍倍尔和我们的别的朋友们已经说过,他们预见会有人对普选权心怀叵测。”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用暴力来回答暴力吗？”

“我们并不那么愚蠢,以致自己投到政府为我们设下的圈套里去;要知道德国政府为了能镇压我们,它最希望的就是起义。对于目前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还不至于冒冒失失地决定走这一步。再说,威廉二世敢于完全废除普选权吗?我不认为会这样。顶多,他将提高选民的年龄资格限制,送给我们一种修改和订正过的普选权(恩格斯说这句话时笑了起来),这种普选权目前在比利时就会遇到。⁵³⁴”

“您不担心在反对派议员当中进行大规模逮捕吗？”

恩格斯提高声音说:“不,在德国谁也不会认为有这种可能。联邦的某些政府,例如巴伐利亚政府,永远也不肯认可这种明目张胆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别忘了,帝国宪法和帝国国会各小邦能够借以防止被普鲁士吞并的唯一武器。”

接着我们转到对外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远不是悲观的。

他对我说:“当然,战争可能发生。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里,谁会去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呢?也许只有俄国,因为它版图大,不会被征服?……即使这样,也有问题!……俄国当前的状况是,如果它从国外拿不到钱,连一个月的仗也打不下去。”

* * *

说到这里,我的交谈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勉强压住怒气继续说:

“实在说,我不理解法国政府。要知道不是法国需要俄国,而是俄国需要法国。俄国破产了,它的土地贫瘠了。如果法国政府了解事情的真相,它可以从俄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一切,一切……一

切……除了钱和有效的军事援助。没有法国，俄国就会孤立，彻底孤立…… 还是不要对我提起俄国的军事威力吧！请回想一下土耳其战争。要是没有罗马尼亚人的帮助，俄国人在普勒夫那是无能为力的……⁵³⁵ 不，我越是反复思索，就越不相信可能发生战争。在我们的时代，战争的结局是那样难于预料，军队被置于绝对无法估计的全新的条件下。出现了一分钟可以射击十次的步枪，它的射程接近于大炮的射程，它射出的子弹具有前所未闻的击穿力。出现了用黄色炸药、罗布里特炸药等等制成的炮弹。这些可怕的破坏手段的任何一种都还从来没有在战争过程中试用过。因此，我们完全无法想像，武器上的这一变革对战术和士气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威廉二世打算发动战争，他在自己的总参谋部里就会遭到反抗；人们将会使他感觉到战争的全部巨大危险性。在拿破仑第三的时代还可能有局部战争；在我们的时代，战争就会是全面的，而且欧洲就会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英国可以随意用饥饿来折磨交战的任何一方。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自己都不能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它们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而供应它们粮食的正是俄国。在同俄国作战的情况下，德国连一担粮食都别想得到。另一方面，法国从俄国运来粮食的线路，就会被在战争中反对法国的中欧切断。这样，就只有海路还是敞开的。但是，海路在战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英国人的控制。英国政府根据那些经营各种横渡大西洋业务的公司所承担的义务，可以支配在它监督下建造的这些公司的船只；因此，在宣战的情况下，英国除了它的强大舰队以外，还将拥有五六十艘巡洋舰，可以专门用来阻拦商船开往它所反对的那一个或那一些交战国。即使它保持中立，它也会成为局

势的主宰。当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弄得筋疲力竭的时候，它会在适当的时刻出来迫使接受它的媾和条件。话又说回来，别以为威廉二世可能发动战争。德国皇帝昔日的战争热已经大大冷却了。”

*

*

* 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问恩格斯先生，就是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

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深信，我们将比1890年多获得70万张选票，也可能多100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不是250万张，也将是225万张。但是我们得到的议席数目将不会同这个数字相适应。如果席位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在选举中得到150万张选票之后，就应在上届帝国国会里有80名议员，而不是36名。自从帝国成立时规定选区以来，选区居民的分布已经变得对我们不利了。选区本来是按下列原则规定的：10万居民产生1名议员。但是柏林直到现在仍然只选6名议员到帝国国会去，虽然现在柏林的居民已经超过150万。按照规定，柏林应当选出16名议员。另一个例子是：科伦现在已有25万居民，可是它仍然只选1名议员。”

“在所有的选区都将提出社会党的候选人吗？”

“是的，我们要在所有的400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阅。”

“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对我看了一下，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

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

恩格斯先生反驳说：“并不像您想像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

真的！请您看一看从我们开始议会斗争以来我们的拥护者的人数吧。它随着每一次选举不断增长。我个人深信，如果上届帝国国会存在到它的法定期限，换句话说，如果选举到1895年才举行，那末我们将会得到350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1 000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700万。如果在总数700万选民当中有350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还有，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在1000万选民当中我们已经有了150万，就是说大约全体居民的七分之一站在我们这边，并且可以认为，每6个士兵里就有1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350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

当我对于受社会党人影响的军队在发生革命时仍将忠于自己的原则表示怀疑时，恩格斯先生一字不差地对我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绝向人民开枪。是的，无论吓坏了的资产者怎样说，我们可以确定大部分居民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间，我们的思想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法学家和其他人当中到处传播。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

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人材在我们这里将会超过我们所能使用的数量。”

听了这些充满乐观精神的话以后，我就向弗·恩格斯先生告辞了。

载于1893年5月13日“费加罗报”和
1893年5月20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40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费加罗报”，并根据
“社会主义者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1893年6月底弗·恩格斯对英国 “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⁵³⁶

……我在瑞琴特公园路恩格斯先生的寓所访问了他，自然碰上他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而喜气洋洋。

他回答我的问题说：“我们争得了10个席位。第一次投票给了我们24席，在第二次投票时，我们的85位候选人有20位当选。我们得到了16个新的席位，失去了6个席位，这样，我们净得10个席位。柏林选出的6个人中有5个是我们的。”

“你们一共得到了多少选票？”

“这我们只有到帝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才能知道，那时候会知道准确的数字，不过现在也可以说，我们得到的选票在200万张以上。1890年，我们得到了1 427 000票。请不要忘记，这些选票纯粹是给社会党人的。除了人民党⁵³⁷——这是激进共和主义的政党——中的一小部分人以外，所有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同我们竞选。我们提出了391个候选人，并且拒绝同任何别的政党取得协议。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还可以再得二三十个席位，但是我们坚决拒绝无论什么样的妥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立场才这样有力。我们的任何一个议员，除了我们党的纲领以外，都没有义务要支持任何政党或任何措施。”

“可是，你们的这200万张选票不是本来应当给你们更多的席位吗？”

“是的，这里一切都归罪于不良的议席分配办法。在刚成立帝国国会的时候，原定各选区一样大小，每10万居民将选出议员1名；但是，划定选区时的缺点，以及居民的增长和迁徙，使得现在各选区的选民人数很不相同。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就以柏林的候选人李卜克内西为例吧。他在选区里得到51 000票，而这选区的居民却有50万左右。”

“为什么你们失掉了6个席位呢？”

“失掉这些席位，各有各的特殊情况。不来梅，我们在1890年就认为不过是侥幸。在卢卑克，我刚从倍倍尔那里知道，是因为许多工人离开了，如果选举是在冬天举行，我们会保住这个席位的。其次，不应忘记，商业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要比对你们的影响更厉害，我们不得不同企业主的激烈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虽然投票是秘密的，但有人将这种秘密化为乌有了。我们这里投票不像你们英国那样要在选票上划记号；而是每一个选民把他带来的选票投进票箱。此外，商业危机和1892年的霍乱流行，迫使许多工人接受了国家津贴，而这要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整整一年。”

恩格斯先生接着说：“但是，我对我们的失败比对我们的胜利更引为骄傲。在德勒斯顿（农村选区），我们得到的票数比所有其他党派都投票赞成的那个候选人一共只少100票，而参加投票的人数总共是32 000人。在奥滕曾，我们的候选人在总共27 000票中所得的票数只比他的对手少500票，而他的对手也是得到所有其他的党派支持的。在斯图加特，我们的候选人得到13 315票，比那个当选的候选人一共只少128票。在卢卑克，投票人数是19 000人，我们

所差的只有154票。而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这些选票都是拥护社会党人而反对所有其他党派同盟的。”

“请您谈谈，你们的政治纲领是怎样的？”

“我们的纲领差不多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⁵³⁸的纲领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的政策却完全不一样。”

“也许，你们的政策近似费边社的政策？”

“绝对不是，”恩格斯先生激烈地回答，“我认为费边社⁵³⁹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分支。它希望只用这个党所提出的那些手段来达到社会的革新。我们与所有现存的政党相对立并准备同它们作斗争。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只是一个小宗派，而且作为一个小宗派在行动着。这是一个闭塞的组织。它不懂应该怎样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正统教义。例如，它固执地要求约翰·白恩士在各码头罢工时举起红旗，然而，这一行动会毁掉整个运动，不但不会把码头工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反而会把他们重新推到资本家怀抱里去。我们不做这种事。但是，我们的纲领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诚然，我们接受任何政府给我们提供的一切，但只是把它作为分期付款的债款，我们对此并不感谢。我们永远投票反对预算、反对任何军事拨款或扩充兵员。在那些第二次投票时没有我们候选人的选区，我们的选民得到了指示，只支持那些答应一定投票反对关于军队的法案、反对任何增加捐税和任何限制人民权利的法案的候选人。”

“这次选举对德国的政治形势将发生什么影响呢？”

“关于军队的法案将被通过。⁵⁴⁰反对派已彻底瓦解。事实上，目

前唯一实在的和团结的反对派就是我们了。民族自由党归附了保守派。自由思想党分裂成两部分，而在选举之后，它差不多什么也没有剩下了。天主教党和一些小党派害怕再一次解散帝国国会，为了避免解散帝国国会，它们准备作任何让步。”

“照您看来，这次选举将怎样影响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呢？”

“如果关于军队的法案通过了，那末法国和俄国显然也将在这方面采取步骤。法国现在就已经把所有男性国民，甚至生理上不宜服役的人，都赶到军队里去了，不过它无疑将着手改善它那作为作战机器的军队。俄国将会碰到补充军官的困难。当然，奥地利和德国将一致行动。”

“那末，您认为欧洲的和平的可能性很小吗？”

“任何一桩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都可能导致武装冲突，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想要战争。新式速射武器的准确性和远射程以及无烟火药的运用，标志着军事上发生了这样的变革，以致谁也不能说，在这些新条件下，正确的战术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将冒灭顶的危险。而行将在战场上相遇的军队，也将是如此庞大，以致同未来的战争比较起来，过去的一切战争都形同儿戏。”

“照您看来，社会民主党将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毫无疑问，我们将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始终抗议兼并亚尔萨斯—洛林，在色当战役之后，马克思和我写了‘国际’的宣言，我们在宣言中指出，德国人民没有理由同法兰西共和国发生争端，我们要求光荣条件下的和平，并且预言了后来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就是：这一兼并会把法国抛进俄国的怀抱并对欧洲的和平造成经常的威胁。⁵⁴¹我们的党在帝国国会里向来要求，让亚尔萨斯—洛林的

居民有可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重新并入法国，或者留在德国，或者并入瑞士，或者成为独立的国家。”

“那末，您认为成立‘欧洲联邦’的时间不远了吗？”

“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全欧洲传播。你看（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我们的罗马尼亚的新杂志。在保加利亚我们也有这样的杂志。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地学习联合的艺术。”

“您可以给我一些说明德国社会主义增长的数字吗？”

恩格斯先生拿出一份精心编制的图表，上面标示出自从目前这样的帝国国会成立以后，在每次选举中每个党派所得的票数。

他说：“1877年，我们得到50万票；1881年，由于残酷的反社会党人法，我们只得到30万票；1884年，我们得到55万票；1890年，我们得到1 427 000票。在这一次选举中，我们得到200万票以上。”

“您怎样解释这一异常迅速的增长呢？”

“主要是经济原因。1860年以后，在我们德国，正如1760年和1810年之间在你们英国一样，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工业革命及与之俱来的一切不良现象。你们的工业家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其次，目前的商业危机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工业国家的影响，比对你们那个年老的工业国家的影响更糟。因此，在我们这里，对工人的压制也就更厉害。当我说‘工人’的时候，我是指所有各阶级的劳动者。受大商行排挤的小商人、营业所职员、手工业者、城市工人

“现代人”。——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编者注

和农业工人都开始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我们向他们提供同这种恶势力作斗争的科学方法,既然他们大家都会阅读和独立思考,他们就非常迅速地作出必要的结论并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组织是完美无瑕的,它使我们的敌人感到钦佩而又绝望。它之所以成为完美无瑕的,那是由于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反社会党人法很像你们的对付爱尔兰的惩治法。此外,我们的军事素养和纪律也有巨大的作用。在汉堡,我们的竞选宣言和文件在一刻钟内就送到所有24万选民的手里。去年,这个城市的当局甚至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散发防治霍乱的宣传品。”

“那末,您希望很快看到您那么想看见的执政的社会党政府吗?”

“为什么不想呢?如果我们的党今后也以正常的速度发展,我们在1900年和1910年之间将拥有多数。到那时,您就用不着怀疑,我们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能实现这些思想的人材方面,都不会有所欠缺。而你们到那个时候,恐怕将有那么一个政府,在那里悉尼·维伯先生直到头发花白还在打算感染自由党。我们不相信能感染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在感染人民。”

载于1893年7月1日
“每日纪事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纪事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释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0年2月20日帝国国会普选第一次投票中取得巨大胜利的直接影响下写的。第一次投票的结果,党得到了1 427 323张选票并在帝国国会里得到20个(根据最初的报道是21个)席位。3月1日举行了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也是成功的第二次投票(在那些没有一个候选人在第一次投票中得到绝对多数的选区进行重新投票),恩格斯在写完这篇文章以后才知道第二次投票的结果。两次投票的结果,社会民主党人总共得到1 427 298张选票,并且在帝国国会中得到35个席位。

这篇文章不署名发表在1890年3月3日“新堡每日纪事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栏,同时加有这样的编者按语:“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德国社会党一位最有威望的成员寄来的。作者由于自己同该党有多年的联系,由于同卡尔·马克思和所有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因而他有充分的权利来解释他们的观点,也许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有权利来解释。”

这篇文章在“新堡每日纪事报”上发表后,又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章”为题发表在1890年4月6日的“柏林人民报”上。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德译文时,编辑部把恩格斯的个别词句改得温和一些,并且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这样做是考虑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所造成的条件。

“新堡每日纪事报”(《Newcastle Daily Chronicle》)是一家英国日报,从1858年(从1862年起用这个名称)至1922年出版。

“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是于1884年创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日报。根据在哈雷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被任为主编。

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落入党的右翼手中。——第3页。

- 2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在德国于1878年10月21日颁布,直到1890年10月1日,在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压力之下被废除。——第3页。
- 3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从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在1879年至1880年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从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地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第3页。
- 4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

中央党 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78—

479页)和“今后怎样呢?”(见本卷第7—11页)两原文章中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

保守党是普鲁士容克地主、军阀、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它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在德国里面。但是从1866年起就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4页。

- 5 恩格斯指的是威廉二世在1890年2月4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前夕颁布的两道诏令,它们被作为政府的竞选纲领。

在第一道给帝国首相的诏令中,皇帝命令他向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有关制定统一的劳工保护法的问题。1890年3月在柏林的确召开了这样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德国外,还有英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政府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关于禁止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劳动的决议,关于缩短未成年工和女工工作日的决议等等。但是这些决议对于参加会议的国家并没有约束力。

在第二道给公共工程大臣和工商业大臣的诏令中,皇帝提出要修改现行的劳工保护法,说什么修改的目的是要改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工人的状况。

这两道诏令的颁布证明俾斯麦主要靠惩罚措施来对付工人运动的办法遭到了失败,并且说明德国统治阶级企图通过加强社会蛊惑宣传和更灵活地运用传统的“鞭子和糖饼”政策来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第4页。

- 6 “今后怎样呢?”一文和“德国1890年的选举”一文一样,都是恩格斯就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写的,选举的第一次投票是在1890年2月20日举行的(见注1)。这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紧接着又转载在1890年3月14日“工人报”第11号上。文章的最后一段以短评的形式加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目前形势”的标题转载在1890年3月13日“柏林人民报”第61号上。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从1889年至1893年在维也纳每周出版一次,1894年每周出版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每天出版。该报的编辑是维·阿德勒。在九十年代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发表在这家报纸上。为该报撰稿的有奥·倍倍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工人运动的其他活动家。——第7页。

- 7 卡特尔 是两个保守政党(“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在1887年1月俾斯麦解散帝国国会以后结成的联盟,它支持俾斯麦政府。卡特尔在1887年2月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帝国国会中占了优势(220个席位)。俾斯麦倚仗这个联盟,施行了一系列对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有利的反动法律(制定了保护关税税率,增加了许多种税收等等)。但是他没有能够在1890年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生效期限。加入卡特尔的各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在1890年选举中的失败(一共得到132个席位)导致了卡特尔的瓦解。——第7页。
- 8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1884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左翼合并成立的。它的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的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第8页。
- 9 韦耳夫派 是1866年汉诺威并入普鲁士以后形成的一个汉诺威派(其名称来自古代汉诺威大公韦耳夫家族)。这一派的目的是恢复汉诺威王室的权力和汉诺威在德意志帝国中的自治权。它追随中央党主要是出于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动机。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一些不大的民族党团,其中包括亚尔萨斯派和波兰派,代表德意志帝国中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不满意政府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帝国国会中它们支持大的反对党,有时同中央党结成联盟。——第9页。
- 10 恩格斯讽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俾斯麦政府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因此资产阶级自由派称之为“文化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一些措施的最终结果,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反对支持分立主义倾向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

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同天主教会冲突开始时,俾斯麦于1872年5月在帝国国会上宣称:“我们决不去卡诺萨”,然而在七十年代末,他为了首先同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益扩大的影响作斗争,需要天主教会中央党的支持,因此几乎废除了冲突时所颁布的全部反天主教的法令,并且迫使反天主教政策的主要拥护者辞职。俾斯麦在1878年到1887年间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的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是毫无结果。

“去卡诺萨”一词的来源是:1077年德皇亨利四世为了祈求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取消开除他的教籍的决定,到卡诺萨城堡(意大利北部)去做了一次不体面的朝圣。——第9页。

- 11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是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欧洲国际形势尖锐化和世界战争的危险增长的情况下写成的,这种局面是由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和法俄同盟——的形成引起的;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法俄同盟已处于最后形成的阶段。这是文章尖锐地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首要原因。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是他在报刊上和在给各国社会主义者的书信中揭露欧洲列强的军国主义、军备竞赛和掠夺政策的言论的继续。写作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维·查苏利奇(通过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以当时准备在伦敦出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为该杂志撰稿。恩格斯为回答这一请求,给编辑部寄去了自己的文章,以便用俄文发表(由德文译成俄文),同时决定将这篇文章刊登在其他社会主义报刊上。

本文的第一章最初刊登在1890年2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上(用“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的标题发表)。本文的其余两章载于1890年8月才出版的该杂志的第2册。在这一时期,前两章用原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4月号上,但是在发表时杂志编辑部未经恩格斯的同意对文章作了某些修改。这些修改缓和了恩格斯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统治集团、霍亨索伦王朝的代表等所作的评论。恩格斯在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大约在1890年4月1日),并将译文和德文本作了比较之后才得知“新时代”编辑部所作的这种修改。恩格斯在1890年4月1日给杂志

的编辑考茨基和出版人狄茨的信中,表示坚决抗议对他的文章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并且要求根据原稿再次刊登前两章。这两章不加修改地和第三章一起发表在杂志的5月号上,同时编辑部还加了如下的一个脚注:“‘新时代’4月号在刊载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由于理解不正确有一些脱离原文、严重影响文章性质的地方。如果我们按照原样再次发表全文,而不是列出修改的个别地方,想必我们的读者将会感谢我们。现在将它完整地发表在这一期上。”在文章的末尾加上了著作完成的日期——“1890年2月底于伦敦”。

文章用英文载于“时代”杂志1890年4月号 and 5月号。恩格斯在给这家英文杂志准备文章的译文的时候,对文章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给“时代”杂志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译文,从其中所作的某些修改的内容来判断,是恩格斯在1890年2月以后,可能是在当年3月翻译的。

在恩格斯生前,他的这一著作已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1893年用波兰文出版了它的单行本,它还发表于1890年的罗马尼亚杂志“现代人”第7期、1890年的法国杂志“新思想”(《Idée nouvelle》)(前两章)以及1891年2月21日—3月3日的保加利亚杂志“巴尔干曙光”(《Балканска зора》)。

文章最后阐述欧洲形势的部分,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发表在下面两家报纸上:1890年7月13日“北方守卫者”(《Nordwacht》)第28号和1890年7月1日“选民报”(《Wähler》)第113号。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劳动解放社”1890年在伦敦和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4期。维·伊·查苏利奇,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参加了编辑工作。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在斯图加特出版,1883年至1890年10月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在1885—1894年弗·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她的许多文章,并经常以自己的劝告帮助杂志的编辑部,时常对杂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提出批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

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时代”(《Time》)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79—1891年在伦敦出版。——第13页。

- 12 恩格斯指俄国1874年废除征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一事。根据自187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条例,俄国所有从二十一岁起至四十三岁止的男性居民,除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以及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和极北地区若干民族地区的人以外,都必须在正规军、后备部队或民团中服役。征召服役采用抽签的办法进行。这种制度旨在把俄国的军队变为一支资产阶级类型的居民普遍服役的军队。但是在沙皇俄国的专制贵族制度的条件下,等级特权、仅仅给予有产阶级的许多优待、各居民阶层的服役条件不平等以及其他等等,都妨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原则的实现。——第19页。
- 13 指反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各国第六次(1813—1814)和第七次(1815)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在1813—1814年的战争中俄国军队在联军(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其他国家)中占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在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德国,以及在歼灭法国领土上的拿破仑军队从而导致第一帝国的崩溃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第19页。
- 14 弗·恩格斯借用这个反映波拿巴第二帝国(1852—1870)统治集团对外政策的一个原则的名词来说明十八世纪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政策。各大国的统治阶级普遍地利用这个所谓的“民族原则”来从思想上掩盖它们的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民族原则”的揭露,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第21页。
- 15 指十三世纪初建立的封建国家立陶宛大公国。从十三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初,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领土沦于立陶宛诸王公的统治

下。立陶宛的封建主利用它们由于鞑靼蒙古人的入侵,由于封建割据和内讧而被削弱的机会,利用人民想联合起来抵御蒙古侵略者的愿望,占领了这些地方。

波兰和立陶宛合并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385年进行的,当时两国签订了所谓克列沃合并条约,其目的主要是共同抵御日益严重的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合并条约规定立陶宛大公国并入波兰,并在立陶宛强制推行天主教。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合并曾数度废除和恢复。合并逐渐从防御性的联合变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联合。1569年签订了卢布林合并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波兰和立陶宛组成为一个国家,名叫波兰贵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权。——第21页。

- 16 东方礼天主教徒 是对属于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合并成的所谓东方礼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徒的称呼。合并是按照波兰封建主和天主教僧侣(首先是耶稣会教徒)在1596年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而宣告的。根据布列斯特合并条约,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正教居民应承认罗马教皇为自己的首领和接受天主教的基本教条,虽然还保持正教教会的表面仪式。合并是波兰的大地主和贵族巩固他们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统治的一种手段。它得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高级僧侣和封建上层人物的支持,却遭到人民群众的抵制,为反对合并而斗争成了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的口号之一。——第21页。

- 17 *Liberum veto*(字面意思是:“禁止的自由”)是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封建贵族的波兰所实行的国会决定任何问题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会下院的任何一个议员都能阻止议案的通过,尽管所有其他的议员都赞成这一议案。这个原则同波兰国王的选举制一样,是旨在削弱国王权力以巩固波兰大地主和贵族的政治地位的波兰贵族“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指的是两个和约:一个是德国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鄂斯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国皇帝和法国在闵斯德签订的和约(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里亚境内)。由于战胜国(瑞典和法国)和德意志诸侯的

互相勾结,根据和约的条款,德国被割去一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在阿尔萨斯的过去的领地,以及对它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的确认。一些德意志诸侯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加强了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德意志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间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第22页。

- 18 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2卷第201—206页(G. G. Ulr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 Bd. 2, S. 201—206, Jena, 1830)。——第22页。
- 19 指西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用来进行反俄宣传的一个假文件。早在1797年,在西方就出现了有所谓“彼得大帝遗嘱”的传说;1812年,累居尔的“论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发展”(L. Esur. 《Des progrès de la puissance russ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au commencement du XIX-e siècle》Paris. 1812)一书叙述了这份假遗嘱的内容;1836,盖亚尔德的“勋章获得者德奥的回忆录”(Gail-lardet 《Mémoires du chevalier d'Eon》)一书,又使这份伪造的东西具有文件的形式。在十九世纪西欧普遍都相信,这份“遗嘱”或者真正是彼得一世的文件,或者是根据他的后裔的委托编写的。——第22页。
- 20 卡·考茨基“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年斯图加特版(K. Kautsky. 《Thomas More und seine Utopie. Mit einer historischen Einleitung》. Stuttgart. 1888)——第24页。
- 21 七年战争(1756—1763)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普奥俄法)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法英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除海战而外,各交战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在欧洲以及它们在美州和亚洲的殖民地进行。1756—1757年普

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1757—1760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白于1762年1月5日(1761年12月25日)去世,彼得三世即位并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结束了战争。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告终。根据巴黎条约,法国被迫将自己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在东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领地等)割让给英国,从而加强了英国的殖民势力和海上威力。胡贝尔茨堡和约恢复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前疆界。——第25页。

- 22 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的彼得堡条约是俄国和普鲁士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八年,代表俄国签字的是尼·伊·帕宁和副总理大臣亚·米·哥利岑,代表普鲁士签字的是普鲁士驻彼得堡大使索尔姆斯。缔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一方受到进攻时他方给予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及保障彼此的贸易利益。在条约的秘密条款中俄国和普鲁士承担了不得修改波兰和瑞典宪法的义务。一项专门的秘密条款规定,普鲁士有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的义务。条约反映了俄国和普鲁士企图阻止奥地利和法国在波兰的势力的增长。——第25页。
- 23 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是在1772年进行的。根据1772年8月5日(7月25日)在彼得堡签订的瓜分协定,奥地利和普鲁士攫取了一部分乌克兰西部的和波兰本土的领土:奥地利分得了加里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拉特加利亚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第25页。
- 24 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来自拉丁字《legitimus》,即“合法的”)是法国代表达朗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上提出来的。这个原则的内容,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第26页。
- 25 指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德意志各邦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选帝侯逝世后无直接继承人,都企图得到巴伐利亚的领土,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战争以

1779年5月奥地利同普鲁士、萨克森缔结帖欣和约而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获得了巴伐利亚的一些地区,萨克森得到了赔款。巴伐利亚王位给与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帖欣和约确认了以前德意志各邦所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起,至1763年的胡贝尔茨堡条约止)。俄国最初是以交战双方的调停人的姿态出现,后来在条约的一项专门的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预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第26页。

26 恩格斯指1768—1774年和1787—1792年俄国对土耳其进行的获得胜利的战斗。——第27页。

27 在叶卡特林娜二世1780年3月11日(2月28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中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利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这篇宣言的矛头针对英国,当时英国正在进行镇压北美洲的起义的殖民地的战争(1775—1783);宣言成了俄国和一系列国家签订的一项协定的基础。在1780—1783年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

武装中立的这些原则后来成了1856年4月16日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的代表所签订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的基础。宣言附于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参加国在1856年3月30日所签订的巴黎和约上。——第27页。

28 指1793年和1795年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这两次瓜分是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贵族共和国实行掠夺政策的结果,它们成了镇压波兰民族运动的手段。第二次瓜分波兰时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地方和德涅泊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划归了俄国;普鲁士攫取了格但斯克、托伦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奥地利未参加第二次瓜分。

第三次瓜分波兰时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划归了俄国。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的本土的大部分为普鲁士所攫取。

在第三次瓜分以后,波兰贵族共和国已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第28页。

- 29 指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反对革命的法国的同盟。贵族资产阶级的英国也积极参加了反革命同盟的建立。1792年2月,在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开始对法国进行干涉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缔结了军事同盟。在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共和和1793年1月处死路易十六之后,英国、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和德国与意大利的一系列小邦于1793年公开地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和这一次(第一次)同盟的参加国的战争一直进行到1797年。——第28页。
- 30 1783年夏天根据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提议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芬兰)举行了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会见。古斯塔夫到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去的目的,是要探明叶卡特林娜二世对土耳其和克里木的意图,以及她对瑞典兼并挪威的计划的的态度。叶卡特林娜二世由于俄国准备对土耳其作战,当时从自己方面也力图密切和瑞典的关系。——第28页。
- 31 吕内维尔和约是在欧洲各国第二次反法同盟失败之后奥地利与法国于1801年2月9日签订的。和约规定奥地利把在德国和意大利的一大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并且承认在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依附于法国的共和国。——第29页。
- 32 根据1803年2月25日的帝国代表会议决议(帝国代表会议是1801年10月经帝国议会选出的、由德意志帝国各邦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德国西部的许多小邦被取消。这些邦的领土合并于德国的较大的邦,作为对于根据吕内维尔条约割让给法国的莱茵河左岸领土的赔偿。结果有总人口为300万的112个德意志邦(几乎包括全部教会领地和帝国城市)被取消;它们的领地很大一部分划归完全依附拿破仑法国的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以及普鲁士。帝国代表会议决议只不过是正式确认了1801年10月法国和俄国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根据拿破仑法国的利益解决德国莱茵河沿岸的领土问题)的条款。——第30页。
- 33 1805年12月2日(11月20日)俄奥联军和法军进行的奥斯特利茨(莫拉维亚)战役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告终。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了第

三次同盟,和拿破仑签订了普勒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进行斗争,在1806年组织了反拿破仑法国的新的第四次同盟。

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莱茵联邦组成后,德意志民族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庸。这些邦的军队参加了拿破仑的侵略,包括1812年的入侵俄国。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在1813年瓦解。——第31页。

- 34 这里列举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第四次同盟(英国、俄国、于1806年7月同俄国签订了反对拿破仑的秘密同盟的普鲁士、以及瑞典)战争中1806—1807年的一系列战役:

耶拿(绍尔吉亚)战役是普鲁士军队和法国军队在1806年10月14日进行的,结果普军被击溃。

在1807年2月7—8日(1月26—27日)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进行的普略西什-埃劳(东普鲁士)战役中,拿破仑尽管牺牲大量的法军也未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1807年6月14日(2日)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进行的弗里德兰德(东普鲁士)战役,以拿破仑军队获胜而结束。

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任何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的别洛斯托克地区(后来,在1809年战争中拿破仑战胜奥地利以后,加里西亚东部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也并入了俄国)。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俄国和拿破仑法国缔结了针对英国的攻守同盟。作为报答,拿破仑答应俄国对土耳其和瑞典有行动自由。——第31页。

- 35 指1808—1809年俄国和瑞典战争期间巴克莱-德-托利率领俄军于1809年冬横越波的尼亚湾的进军。俄军踏上瑞典领土加速了瑞典贵族反对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阴谋的实现,这次阴谋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维护贵族寡头的利益。1809年3月古斯塔夫四世被推翻,不久,他的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立为瑞典国王,号查理十三。同年9月瑞典被迫和沙皇俄国签订了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约,将芬兰让给俄国。——第31页。
- 36 1812年8月亚历山大一世和瑞典王储卡尔-约翰(贝尔纳多特)在亚波(土尔库)举行了会见。会见的结果是,俄国和瑞典于1812年8月30日(18日)签署了一项协定,两国实际上结成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军事同盟。协定还规定在丹麦拒绝将挪威让与瑞典国王时,俄国有给予瑞典军事援助以反对丹麦的义务。瑞典方面保证支持沙皇政府的领土要求,其中包括对拿破仑统治下的华沙大公国的领土要求。——第31页。
- 37 指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于1808年9月27日(15日)—10月14日(2日)在爱尔福特的会见。拿破仑对他的各个属国的,特别是西班牙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感到不安,同时,害怕奥地利对他发动进攻,因此希望在同奥地利交战时取得亚历山大一世的援助,同时他也向亚历山大一世保证,支持俄国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领土要求。虽然谈判结果签署了秘密协定,形式上规定了恢复1807年在提尔西特缔结的法俄同盟,但是亚历山大在拿破仑和奥地利作战时并未积极支持拿破仑。在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俄国只限于占领了加里西亚,而没有对奥地利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第31页。
- 38 俄土战争从1806年开始,一直进行到1812年(1807—1809年曾中断),这次战争是由于拿破仑外交的阴谋诡计促使俄土关系尖锐化的结果。在战争中俄军在欧洲战场和高加索战场曾多次给土军以重创。战争以1812年5月28日(16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而告终。根据条约,俄国获得了直到普鲁特河的贝萨拉比亚和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权,以及南高加索的一些地区。条约肯定了俄土过去达成的关于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享有一系列自治权的协议。

俄国在战争中的胜利客观上帮助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各民族摆脱土

耳其的统治。俄军在巴尔干的著有成效的行动是对1804—1813年塞尔维亚人民起义的重大支援，这次起义是许多世纪以来塞尔维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封建主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塞尔维亚人在起义中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在1805—1811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根据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约，土耳其应允许塞尔维亚内政自治。但是，土耳其苏丹利用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的机会，破坏条约，于1813年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征讨，在那里一度恢复自己的统治。由于塞尔维亚人于1815年又胜利地举行了起义，加上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援，土耳其的枷锁被粉碎了，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后，土耳其不得不通过1830年的苏丹特别敕令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实际上的独立）。——第31页。

39 大陆体系 即1806年拿破仑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1807年的提尔西特条约决定了俄国加入大陆体系。——第32页。

40 1813年10月16—19日（4—7日）的莱比锡会战是参加欧洲各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联军同拿破仑法国军队的决战。联军在这次会战（史称“民族之战”）中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导致了莱茵联邦的瓦解和德国摆脱拿破仑的统治。——第33页。

41 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见注38。

根据欧洲各国君主及其大臣所举行的维也纳会议（这次会议在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后在1814—1815年断断续续地举行）的决定，为了复辟各正统王朝，欧洲地图被违反着各国人民的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利益加以重划。波兰再度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所瓜分。在瓜分时，拿破仑第一在1807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所建立的华沙大公国的一大部分划归俄国，称作波兰王国。——第33页。

42 会议桌上的波兰 是对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34页。

43 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

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35页。

- 44 恩格斯指的是1821年春天发生的、并且很快具有群众性的希腊起义。1822年1月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了希腊的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用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起义的希腊人,于是呼吁他的附庸、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给予援助;1825年穆罕默德-阿利的军队侵入了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到处野蛮地迫害希腊居民。在起义的初期,参加神圣同盟的几个大国,包括沙皇俄国在内,对起义都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鉴于希腊人的斗争到处引起巨大的同情,而更主要的是考虑到利用这一斗争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的可能性,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承认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给予它军事援助。俄国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的胜利对希腊获得独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俄国的胜利,土耳其被迫承认希腊为独立国。但是按照欧洲几个大国的统治集团的决定,希腊人民在1832年被强加以反动的君主专制制度。——第36页。
- 45 指在西班牙(1820—1823)、那不勒斯王国(1820—1821)和皮蒙特(1821)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由于神圣同盟的干涉(它派遣法国军队到西班牙,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都被镇压下去。——第36页。
- 46 这里列举的神圣同盟的几次会议系1818年在亚琛、1820年在特劳波(奥帕瓦)、1821年在莱巴赫(柳布梁纳)和1822年在维罗那召开。所有这些会议的决定都是旨在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第37页。
- 47 这段话看来恩格斯是引自“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第52—53页(《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 éa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Paris,1854, p. 52—53)。——第38页。

- 48 纳瓦林会战(纳瓦林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1827年10月20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下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后者是欧洲列强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而开进希腊领海的。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的迫害后而开始的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覆没,并加速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俄国在这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第39页。
- 49 毛奇“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第390页(Moltke.《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Berlin, 1845, S. 390)。——第39页。
- 50 指阿德里安堡和约;这个和约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缔结的。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不得不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赋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令在法律上把这种自治固定下来。——第39页。
- 51 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第40页。
- 52 指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这次起义是由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和警察压迫引起的。1830年11月29日(17日)在华沙以军事政变开始的这次起义,具有人民起义的性质,结果赶走了沙皇军队。但是波兰政府和军队中的贵族领导人实行投降政策,阻挠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表现了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的侵略野心。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未能废除农奴的依附关系,因而起义没有得到农民的应有支持。1831年2月开始的战事的最后结局是:波兰政府于1831年9月8日(8月26日)投降,把华沙交给沙皇军队。波兰起义虽然遭受了失败,但是在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第40页。

- 53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7月8日(6月26日)缔结的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登陆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伊布拉希姆-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儿子)的军队。1833年5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利缔结了和约,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利。尽管苏丹的直接危险已经过去,但沙皇外交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并且在使这个同盟固定下来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款:土耳其必须根据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另一项条款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其他的俄土协议。条约的有效期为八年。——第40页。
- 54 指由于新的土埃战争(1839—1841)和英法矛盾(法国暗中支持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加剧而引起的东方问题的尖锐化。英国唯恐站在苏丹方面的俄国片面地干预冲突,坚持西欧列强集体向土耳其政府提供军事援助。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背着法国在伦敦签订了援助土耳其苏丹的协定。当时出现了法国和欧洲几个大国同盟之间的战争的危险,但是法国没有下决心进行这场战争,停止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利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埃及境外的领地,并且服从苏丹的最高权力。——第40页。
- 55 《Règlement organique》“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为俄军占领)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内部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马克思对组织规程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 集”俄文集第2版第23卷第249—250页)。——第40页。
- 56 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1887年伦敦版),这个版本的章节的分法和德文版不同。——第40页。
- 57 “公文集”(《Portfolio》)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1835—1837年出版;新的丛刊是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在1843—1845年出版的。——第41页。
- 58 指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公国的人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掀起了争取彻底摆脱对土耳其帝国的依附,消灭农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的广大运动。革命遭到了国内反动势力、苏丹土耳其与沙皇俄国的武装干涉的联合镇压。——第41页。
- 59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为了调整两国的关系,曾在尼古拉一世的调停下于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谈判。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在1848—1849年的革命后尖锐化了。奥地利力图恢复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在革命中已实际瓦解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建立在自己庇护下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尼古拉一世皇帝不愿意普鲁士强大起来,企图保持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他在华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吵中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并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第42页。
- 60 恩格斯指的是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和丹麦的代表一起在1852年5月8日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条约。这个文件的基础是上述几个国家的代表于1850年7月4日在伦敦签订的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丹麦国王的领地包括什利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在内不得分割的原则,从而为这两个公国的德国居民想脱离丹麦,与德国合并的企图制造了障碍。1852年条约虽然承认了两公国有自治权,但是仍然保留了丹麦国王对它们的最高权力。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被指定为无嗣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后为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第42页。

- 61 指以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土耳其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的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结束时在1856年3月30日签订的巴黎和约。在战争中失败的俄国不得不割让多瑙河河口和贝萨拉比亚南部的一部分地方，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和土耳其的信基督教的臣民的保护，同意意味着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和禁止俄国、土耳其在黑海设置海军军需库和驻扎舰队的黑海中立化，俄国将卡尔斯归还土耳其，以交换联军在克里木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英国和奥地利在巴黎会议谈判期间未能完全实现它们对俄国的侵略意图。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保卫战，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战区的失败，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失利，以及俄国外交对英法矛盾的巧妙利用都对谈判的结果产生了影响。——第44页。
- 62 这是亚·米·哥尔查科夫1856年8月21日给俄国驻国外的外交代表的通告中的一句话。他在1856年就任外交大臣时在这个通告中规定了俄国外交政策的方针。——第45页。
- 63 恩格斯指附于巴黎和约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见注27）。
由于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在巴黎会议上的接近，两国在拿破仑第三的倡议下于1859年3月3日缔结了法俄秘密协定。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答应拿破仑第三在他准备从军事上粉碎奥地利方面给予外交上的援助，而一旦战争发生即将俄军开至奥地利边境，以便在东方牵制奥地利的一部分军队。同时拿破仑根据协定的精神，继续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第46页。
- 64 1859年，拿破仑第三在事先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法国和皮蒙特（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通过胜利的“局部”战争掠夺新的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朱·马志尼当时在他的宣言“战争”中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真正意图，马克思在他的“马志尼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一文中详细地摘引了这篇宣言。
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实现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的意大利统一。奥军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失败以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和不愿意促

进意大利的统一，于1859年7月11日同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战争结果，法国获得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皮蒙特。

但是违反着皮蒙特执政的上层人物的王朝政策和法国波拿巴分子的阴谋诡计，1860年在意大利掀起了争取国家统一的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由于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加里波第的志愿军的英勇战斗，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波旁王朝被推翻了，南意大利和皮蒙特合组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威尼斯省则直到1866年仍然处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下。意大利的最后统一到1870年意大利军队攻占了罗马和教皇国后才告完成。——第46页。

- 65 俾斯麦的普鲁士政府在1863—1864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期间，企图阻止起义扩展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领土，并且希望事先得到俄国的支持以便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因此向沙皇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1863年2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缔结了俄国和普鲁士的关于共同对付起义者的协定。——第46页。
- 66 1864年由于奥普同丹麦之间的战争（最后丹麦战败）的结果，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鲁士。——第46页。
- 67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47页。
- 68 由于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失败，根据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缔结的初步和约，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1871年1月18日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最后确认了这个条约的条款。——第48页。
- 69 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和土耳其于1878年3月3日（2月19日）在圣斯蒂凡诺（君士坦丁堡附近）签订的。这个条约意味着俄国对巴尔干影响的加强，它引起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在外交和军事威胁的压力下，俄国政府被迫把条约交给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审查。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大不列颠、意大

利和土耳其的代表，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根据柏林条约，圣斯蒂凡诺和约的条款被大大修改，变得不利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了。圣斯蒂凡诺和约规定的自治的保加利亚的领土被割掉二分之一以上，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各地区成立了“东鲁美利亚”自治省，仍受苏丹管辖；门的内哥罗的土地也被割去很大一部分。柏林条约承认圣斯蒂凡诺和约的规定，把1856年从俄国夺去的贝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归还俄国，同时也批准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在会议的前夕，英国侵占了塞浦路斯。柏林会议的决定在巴尔干造成了孕育着新战争的新的国际矛盾的策源地。——第48页。

- 70 恩格斯指保加利亚领土上的四边形的要塞区：锡利斯特里亚、鲁舒克、苏姆拉和瓦尔那。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初期土耳其军队的主力集中在这个地区。——第48页。
- 71 1857—1859年印度发生了反抗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起义在1857年春天在所谓孟加拉军西帕依部队（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组成）中爆发，并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几个最大的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和城市从事手工业的贫民。由当地封建主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差别，以及殖民者在军事技术上占优势而遭到了失败。——第50页。

- 72 奥连堡军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将军曾率领远征军，于1839年11月开始侵略希瓦汗国的进军。这支配有若干大炮和粮秣辘重的5000人的军队对于冬季通过荒原的困难条件没有准备。由于士兵大量患病，人员折损一半，彼罗夫斯基未能到达希瓦，被迫于1840年返回奥连堡。——第50页。
- 73 恩格斯指和布朗热将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886—1889年的法国沙文主义运动。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展开了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目的是准备政变，在法国实行君主复辟。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并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露布朗热及其支持者的蛊惑性的复仇主义的口号。——第51页。
- 74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联军于1877年12月10日（11月28日）经过与土耳其军队的激战后攻占了普勒夫那（现名普累文，保加利亚北部一城市）。——第51页。
- 75 1867年奥地利帝国变成了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莱达河被确定为该国两部分的分界线。一部分称息斯莱达尼亚，包括奥地利、捷克、莫拉维亚、西里西亚、施梯里亚、克伦地亚、提罗尔和其他地方，另一部分称特兰斯莱达尼亚，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第51页。
- 76 指美国记者乔治·谦楠的一组文章“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这些文章是他在1885—1886年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的，发表在1888—1890年在纽约出版的“现代插图月刊”（《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上。——第51页。
- 77 恩格斯指的是1864年俄国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建立地方自治机关一事。而从1866年起，沙皇政府已经又开始有计划地排挤地方自治机关，这种排挤在八十年代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时期特别加强起来。——第53页。
- 78 毛奇在1874年2月16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的演说（这里指的就是这篇演说）中，不得不承认，德国人从打胜仗以来“到处都获得了尊敬，可是爱戴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第54页。

79 这封信是恩格斯给奥地利一个银行职员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后者在1890年3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在他所在的维也纳银行和信用机关官员俱乐部的成员当中，以及在一部分维也纳居民当中，反犹太主义以宣传反对犹太人的资本的形式传播很广。恩格斯给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反犹太主义”为题发表在1890年5月9日“工人报”第19号上。发表时附有编辑部的注：“大概不需要指出，我们刊载这封信是征得作者和收信人双方同意的。”收信人的姓名在发表时没有指出。

恩格斯的信以同样的标题转载于1890年5月13日“柏林人民报”第109号和德国社会政治周刊“劳动权利”（《Das Recht auf Arbeit》）1890年5月28日第315号。——第58页。

80 恩格斯指伦敦犹太工人举行的下面几次罢工：1889年8—9月裁缝和毛皮制品工人的罢工，1889年11月面包师的罢工和1890年3—4月鞋匠的罢工。这几次罢工都以业主满足工人的要求而结束。裁缝、毛皮制品工人和面包师达到了规定以十小时工作日代替原先的十四至十六小时工作日的目的，鞋匠达到了以在作坊里劳动代替在家里劳动和业主同意实行劳动仲裁的目的。——第60页。

81 “凉亭”（《Die Gartenlaube》）是德国一家小资产阶级文学插图周刊，1853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第60页。

82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经作者同意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写的（“宣言”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德文第四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于1890年5月在伦敦出版，这一版中也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以及恩格斯为“宣言”1883年德文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2页）。1890年8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在题为“‘共产主义宣言’的新版”的社论中摘载了恩格斯的这篇新的序言，1890年11月28日“工人报”第48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论中也摘载了这篇序言。“共产党宣言”第四版是最后一个经作者同意的版本。“宣言”的以后各版通常是翻印这一版本。——第61页。

83 恩格斯指他写的“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2页)。——第61页。

84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跋里(见本卷第503页)曾说这个译本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宣言”1900年版本上也指明这个译本是他译出的。

恩格斯说已遗失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宣言”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里。本版发表的这篇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5—326页)就是以原稿为基础的。本卷中恩格斯以从俄文反译回德文的方式引用这篇序言的地方,都根据上述德文原稿校对过;恩格斯在根据俄文版翻译时所作的一些细小的改动,都在正文和脚注中反映出来;由于俄文版不确切而造成的异文,已根据手稿改正。——第61页。

85 “钟声”(《Колокол》)是一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办,1857年至1867年由赫尔岑创建的“自由俄国印刷所”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以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

这里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俄文译本由“自由俄国印刷所”于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第61页。

86 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后的情况,当时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革命的发动,害怕“民意党”的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加特契纳。——第62页。

87 K .Marx i Fr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yczny 1847 r 》.Genewa , 1883 .——第63页。

88 K Marx og F .Engels .《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K Ø-benhavn , 1885 .——第63页。

89 劳拉·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发表在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1886年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Mermeix .《La France socialiste》.Paris, 1886)把它作为附

录予以转载。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一家法国周报，是茹·盖得于1885年在巴黎创办的。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从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年代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63页。

- 90 “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1886年7月至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了单行本：《Manifi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por C. Marx y F. Engels, Madrid, Administración de 《El Socialista》, Hernán Cortés &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是一家周报，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885年起在马德里出版。——第63页。

- 91 《Manifi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By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Frederick Engels, 1888, London, William Reeves, 185 Fleet St. E. C.

恩格斯为这个版本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62—369页）在内容上有很多地方和“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相同。——第64页。

- 9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第64页。

- 93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以“共产党宣言”作为纲领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的十一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

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第64页。

- 9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页。——第64页。
- 95 这句话恩格斯引自斯温西市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于1887年在该市举行的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的报道,刊载于1887年9月17日“公益”报。——第67页。
- 96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这个原理;它以这种表述方式包含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页和第17卷第475页)。——第68页。
- 97 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3—8日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六十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23页)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读。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指示”共有九点,其中有六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关于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关于常备军)曾作为大会决议通过。日内瓦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在大会举行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可能派)以及他们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中的追随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机会主义者企图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其目的是夺取代表大会的领导地位,从而阻止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各个社会主

义和工人组织的新的国际联合。但是,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占优势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在1889年7月14日,即攻克巴士底狱一百周年那天开幕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名代表。可能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为了同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相对抗,他们也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了一个代表大会。只有少数外国代表出席了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的代表资格都纯粹是假造的。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关于他们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工人立法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的各项要求的途径。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必须为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而斗争;主张废除常备军并代之以人民的普遍武装。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议是规定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就讨论的一切问题通过了基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打击了那些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第68页。

- 98 “伦敦的5月4日”一文,是恩格斯在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为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写的。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组织根据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97)的决定举行了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活动。群众示威和大会——在奥地利最有组织——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进行。

伦敦的工人也有组织地举行了第一次五一节活动,他们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1890年5月4日——举行的,他们的行动使恩格斯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尽管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们和英国机会主义的社会党人海德门,企图对示威进行领导,把示威活动置于妥协性的口号之下,示威还是显示出,伦敦广大工人群众决心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斗争。追随改良主义者的只是一小部分属于所谓工人贵族的工人。绝大多数示威参加者——约有二十万人——都拥护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示威的骨干是煤气企业和伦敦码头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在八十年代带头开始为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工联和

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恩格斯出席了示威结束时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杰出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保·拉法格以及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等发表了演说。

“伦敦的5月4日”一文除载于“工人报”外，还在1890年5月29日“选民报”第85号刊登过。1890年5月31日“柏林人民报”第123号也发表过这篇文章，发表时删去了开头关于奥地利的五一节活动的那部分。——第69页。

- 99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

1889年8月12日至9月14日举行的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三万，其他行业的工人三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者的团结(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五万英镑)，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以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工联的总数即增加一倍多。——第70页。

- 100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却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71页。
- 101 指海德门在1887年11月13日英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特拉法加广场示威

当中的行径。大会以与会者同警察发生冲突而告终，有几百人受伤（3人致命），大会的一些组织者被逮捕。在这次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的事变当中，海德门怯懦地躲避了起来。——第71页。

- 102 银镇罢工（银镇是东头的一个地方）——1889年9—12月，制造水底电缆和橡胶制品的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约有三千人。他们要求提高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加班工资、节日工资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积极参加了罢工的组织工作。她在罢工的过程中创建了青年女工联合会。罢工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最后，因为其他工联的工人没有给予支持，银镇工人遭到失败。——第71页。
- 103 恩格斯指的是1889年12月至1890年2月伦敦南部煤气公司的工人举行的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公司老板不遵守前已达成的协议：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只录用煤气工人工会的会员等等。结果工人方面失败了，原因是其他的工联，特别是码头工人工会没有给予足够的积极支援，此外还由于1890年罢工运动开始进入低潮。此后，八小时工作日在该公司所属的企业中被取消。——第71页。
- 104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
- 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的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的原则是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第72页。

- 105 曼彻斯特主义,曼彻斯特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派别,反映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自由党的左翼。

谈到旧工联的曼彻斯特主义,恩格斯是指它们的活动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这些工联的领袖们力图使无产阶级的任务仅限于进行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要求在劳工保护法方面实行某些有利于工人的变更的经济斗争,借此诱使无产阶级离开工人运动的阶级目的。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宣传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阶级和平。——第74页。

- 106 指恩格斯参加过的1849年5月至7月间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关于这次起义,见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75页。

- 107 恩格斯写“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是因为由反对派“青年派”的代表组成的该报编辑部企图宣布恩格斯支持它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路线的言论。该报的言论使该报编辑部在1890年8月底被撤换,编辑部在告别文章中试图蛊惑地说明它的下台似乎是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加强的结果,并企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放肆地利用恩格斯的威信。被激怒了的恩格斯决定公开驳斥“青年派”。

这一篇答复“萨克森工人报”的文章恩格斯没有写完,它以草稿的形式保留下来。恩格斯写完的那篇答复文章(见本卷第80—82页)曾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柏林人民报”上;它在揭露“青年派”的立场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的这篇答复文章还发表在1890年9月19日“工人报”第38号上。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于1890年最后形成。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主要领导者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

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

“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r Arbeiter-Zeitung》)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日报,九十年代初是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从1890年至1908年在德勒斯顿出版。——第77页。

- 108 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党团就庆祝1890年五一节而写给德国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发表在1890年4月15日“柏林人民报”上。在呼吁书中党的领导答复了反对派“青年派”提出的关于在5月1日举行总罢工的要求。呼吁书指出,在反社会党人法还有效的条件下,以及在1890年2月20日选举后形成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要求是危险的,因为当时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统治集团已经准备利用任何借口来消灭社会民主党,它们很可能进行挑衅。呼吁书要求德国工人不要为这种挑衅提供借口,并且用和平的示威游行来庆祝5月1日。

1890年5—7月在汉堡发生了建筑工人的罢工,他们要求规定九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工人在不利的时机发动的罢工失败了,但是企业主也被迫放弃自己关于工人不得参加工会组织的要求。——第78页。

- 109 第一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是于1871年9月17—23日举行的。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的成员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召开的,与会者的范围比较狭窄:参加会议工作的有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则由通讯书记代表。马克思在代表会议上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会议总共开了九次会议,都具有秘密的工作会议性质。有关代表会议的报告不得公布,代表会议的决议于1871年11—12月公布。

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论述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

基本原则之一。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决定,这项决议的基本部分被收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在代表会议的一系列决议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打击了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同巴枯宁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它在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战胜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78页。

- 110 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筹备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虚伪借口下投票赞成航运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决议,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参加表决;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辩论的过程中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只一次企图把辩论归咎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并企图迫使该报停止对他们的立场进行批评。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政府对政府提案的态度,它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78页。

- 111 滤出蠅虫,吞下骆驼,是从圣经中借用来的一句英国谚语,意思是注意细枝末节,忽视了主要的东西。——第81页。
- 112 “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文是恩格斯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1890年9月9日来信的答复;恩格斯在该文中制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筹备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方面的策略路线。沙·博尼埃告诉恩格

斯,有一些事实证明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具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动摇,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优势有可能转到法国可能派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方面的危险。还在筹备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关于巴黎代表大会,见注97)期间立场就不坚定的比利时工人党代表,既接受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的委托(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委托他们与瑞士社会主义者共同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又接受同时举行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关于可能派代表大会,见注97)的委托来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可能派利用了这种情况,就通过比利时人进行活动,再一次企图攫取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动权。

恩格斯在1890年9月15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和1890年9月2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也都阐述了给博尼埃复信中的基本思想。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个复信是给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的,不准公开发表的。恩格斯的指示帮助法国和其他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粉碎了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争取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布鲁塞尔举行了1891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83页。

- 113 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于1890年9月1日至6日在利物浦举行。出席的代表约460人,代表着140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第83页。

- 114 指两篇抨击性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和“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前者于1889年3月在伦敦用英文出版单行本,同时用德文载于1880年3月30日和4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和第14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21—532页);后者于1889年6月在伦敦用英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38—555页),其摘录载于1889年6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在这两篇根据恩格斯的授意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斯坦执笔并

经恩格斯修改过的抨击性文章中，揭穿了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领袖在召开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方面的阴谋活动。——第83页。

- 115 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于1889年2月28日在海牙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召开的，其目的是拟订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条件。可能派虽然接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而且后来并未承认它的各项决议。代表会议确定了代表大会的权力、开会日期和议程（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的详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27—529页）。——第84页。
- 116 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1879年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1882年党分裂成马克思主义派（盖得派）和可能派（见注104）。马克思主义派保持了工人党的名称。——第85页。
- 117 丹麦“革命派”是团结在“工人报”（《Arbeideren》）周围的以特利尔和彼得逊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少数派。“革命派”反对党的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为把党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进行斗争。他们被改良主义的多数派开除出党，于是在1889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个组织没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第85页。
- 118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该报停刊而写的。恩格斯的这封信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后，接着又于1890年9月30日刊登在奥地利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月刊”（《Sozialdemokratische Monatsschrift》）第9期上。1890年10月这封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刊登在“正义报”（《Giustizia》）上。1890年10月3日该信刊登在“柏林人民

经恩格斯修改过的抨击性文章中，揭穿了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领袖在召开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方面的阴谋活动。——第83页。

- 115 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于1889年2月28日在海牙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召开的，其目的是拟订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条件。可能派虽然接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而且后来并未承认它的各项决议。代表会议确定了代表大会的权力、开会日期和议程（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的详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27—529页）。——第84页。
- 116 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1879年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1882年党分裂成马克思主义派（盖得派）和可能派（见注104）。马克思主义派保持了工人党的名称。——第85页。
- 117 丹麦“革命派”是团结在“工人报”（《Arbeideren》）周围的以特利尔和彼得逊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少数派。“革命派”反对党的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为把党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进行斗争。他们被改良主义的多数派开除出党，于是在1889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个组织没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第85页。
- 118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该报停刊而写的。恩格斯的这封信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后，接着又于1890年9月30日刊登在奥地利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月刊”（《Sozialdemokratische Monatsschrift》）第9期上。1890年10月这封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刊登在“正义报”（《Giustizia》）上。1890年10月3日该信刊登在“柏林人民

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用的“合法”这个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有成效的影响。——第89页。

- 121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由于党团的多数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之间在对待政府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见注110)的态度上持有不同意见而发表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85年4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4号上。在这个声明中党团不同意党的机关报有权在报纸上批评它的活动,认为对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在航运津贴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所做的原则性批评是无根据的攻击。但是,在这个声明公布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在德国的和流亡在外的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集会做出的决议,坚决抗议社会民主党党团多数的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该报的攻讦。党团的多数被迫让了步。1885年4月23日该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这样,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多数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声明。——第90页。
- 122 1888年9月瑞士联邦委员会根据德国当局的要求,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和编辑,如伯恩施坦、莫特勒等人驱逐出瑞士,于是报纸迁到伦敦,从1888年10月1日起在伦敦继续出版。——第90页。
- 123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家日报,从1890年至1933年在马格德堡出版。——第93页。
- 124 指海·巴尔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该文发表在1890年5月28日“自由论坛”杂志第17期上,旨在反对该杂志(1890年5月14日第15期)发表的保·恩斯特的文章“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

“自由论坛”（《Freie Bühne》）是一家文学杂志，从1890年至1893年用此名称在柏林出版，起初是每周出版一次，从1892年起每月出版一次。从1894年1月起该杂志用“新德意志评论”（《Neue Deutsche Rundschau》）的名称出版。——第94页。

- 125 恩格斯所批评的保·恩斯特的文章发表在1890年8月9日“柏林人民论坛”报上。

“柏林人民论坛”（《Berliner Volks-Tribün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政治周报，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从1887年至1892年出版。——第97页。

- 126 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套用“活泼快乐的战争”（《ein frischer fröhlicher Krieg》）一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反动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利奥首先使用这个词，后来在沙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中间流行起来。——第99页。

- 127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为祝贺他七十寿辰而寄给他的贺信的复信。该贺信由保·拉法格署名，发表在1890年12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号上，其中说：

“亲爱的公民：

我们祝您——同马克思一起作为很快就要达到目的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家的人，保持着火热的心和年轻人的热情的人健康长寿，祝您像新的摩西一样，能够看到无产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的乐土。”

恩格斯的信除载于“社会主义者报”外，还用德文载于1890年12月30日“柏林人民报”第303号。——第101页。

- 128 恩格斯指圣西门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写的两部著作：“关于欧洲社会的改组，或关于欧洲各民族联合成一个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的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De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 ou De la nécessité et des moyens de rassembler les peuples de l'Europe en un seul corps politique, en conservant à chacun son indépendance nationale》）和“关于反对1815年同盟所应采取的措施的意见”（《Opinion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contre la coalition de 1815》); 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 头一本在1814年10月问世, 后一本在1815年问世。——第101页。

- 129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1890年11月26日寄给他的贺信的复信, 编辑部的贺信祝贺恩格斯七十寿辰, 同时邀请他参加定于1890年12月7日和8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恩格斯的贺信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 除载于上述两家报纸外, 还载于小册子“1890年12月7日和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纪录”1891年布达佩斯版(《Protokoll des Parteitag der Sozialdemokratie Ungarns in Budapest vom 7. und 8. Dezember》. Budapest, 1891) 和1890年12月14日“柏林人民报”第292号。

“工人纪事周报”(《Arbeiter-Wochen-Chronik》)是一家社会主义周报; 1873年至1890年以此名称在布达佩斯出版, 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 从1891年1月起至1894年以前改名为“工人新闻”(《Arbeiter-epresse》)。

“人民言论”(《Népszava》)是一家社会主义周报, 1873年在布达佩斯创刊, 1890年起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第103页。

- 130 1890年12月7日和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匈牙利各工人组织代表大会, 它构成了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21人(布达佩斯87人, 外省组织34人)。代表大会讨论了匈牙利工人运动情况、工人的政治状况和权利、工人对社会改革的态度、农业工人的状况、工会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加因斐纲领(见注228)的主要论点为基础的原则宣言(党纲)。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 在匈牙利成立的工人政党被命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103页。
- 131 恩格斯为发表卡·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写了这篇序言。“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 同时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典范, 恩格斯发表它, 是为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里活跃起来的机会主义分子以打击, 这在党即将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新的纲

领来代替哥达纲领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不得不克服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方面的某种反对。他在发表时所做的一些小删节以及将某些尖锐的词句改成别的说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的立场所引起的。这一著作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编辑部对它不表欢迎。但是,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无论是在德国党内,还是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当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都受到了欢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这一著作看做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序言,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再版。根据路易莎·考茨基的手抄副本译出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全文,于1932年在苏联第一次发表。第19卷所载这篇著作,是第一次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搜集到的马克思亲笔手稿译出发表的。——第105页。

- 132 在1875年5月22—27日哥达代表大会上,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由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实行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叫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是克服了。但是,向哥达代表大会提出的合并起来的党的纲领草案(主要起草人是威·李卜克内西,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妥协的立场)有严重的错误,在原则上对拉萨尔派作了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件事表示赞许,但是反对在思想上同拉萨尔派妥协,他们尖锐地批评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论点,可是该草案只是略加修改就被代表大会通过了。——第105页。
- 133 1890年10月12—18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代表大会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将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届党代表大会,并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内把新纲领草案公布,以便在各地方党组织里和在报刊上讨论。——第105页。
- 134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是在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和过去历次

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106页。

- 135 恩格斯的“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这一著作是直接针对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路·布伦坦诺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的出版而写的。布伦坦诺在出版小册子的同时,还在一家资产阶级杂志“德国周报”上发表了它的序言部分,接着该杂志又发表了一篇短评,企图从格莱斯顿给布伦坦诺的关于所谓马克思捏造他的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的信中摘录一些话来证明布伦坦诺“正确”。

布伦坦诺发表这些东西,目的在于继续他早在1872年就以匿名的方式开始、后来又得到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支持的诽谤马克思的运动。恩格斯为了彻底揭露这些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者声誉和破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诽谤,决定再一次在报刊上驳斥布伦坦诺及其同伙,同时给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以打击。

在“德国周报”发表了包含摘自格莱斯顿致布伦坦诺的信里的话的短评(见本卷第211—212页)以后,恩格斯立即在1890年12月在“新时代”杂志上刊登了答复的文章(收入恩格斯的小册子的附录中,载于本卷第212—213页),后来在1891年4月发表了整个著作。

在“文件”部分,恩格斯发表了有关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论战,爱琳娜·马克思和泰勒的论战的全部材料,以及他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载于这一部分的一些文件,已经收入本版的有关各卷。本卷根据恩格斯的小册子的材料的编排重新发表了这些文件。

讲坛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大学中的教授——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re)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剥削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

人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寻找使劳动群众俯首听命的新的手段。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疾病和不幸事故的工人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07页。

- 136 恩格斯整理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于1890年问世,恩格斯为这一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5—40页。——第109页。
- 137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 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是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创办于1871年,在柏林一直出版到1876年。——第109页。
- 138 L. Brentano. 《Meine Polemik mit Karl Marx.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Frage des Fortschritts der Arbeiterklasse und seiner Ursachen》. Berlin, 1890. ——第109页。
- 139 见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恩格斯在1881年5月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的周刊“劳动旗帜报”(《Labour Standard》)写的文章“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工联”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73—286页)。——第110页。
- 140 成立宣言的本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第111页。
- 14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以及本卷第162—166页。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

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第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的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同“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的活动评价很高,同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批评它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的路线,该报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112页。

- 142 指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这篇文章载于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第47期。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65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此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122页。

- 143 书的全名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滥用金属货币原则导致通货贬值。从议事录看议会,‘交易所和J·贝尔纳德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附录”1864年伦敦版(《The Theory of Exchanges . 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 . The Abuse of the metallic Principle to Depreciation . Parliament mirrored in Debate , supplemental to 《The stock Exchange and the Repeal of sir J . Bar-nard’s Act》 . London , 1864)。书是匿名出版的,作者为亨利·罗伊。——第112页。

- 144 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预算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第24535号。——第112页。

- 145 见“汉萨德议会议事录”第3辑第170卷第244页(《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 Third Series . CLXX , p . 244)。——第112页。

- 146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116页。
- 147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第116页。
- 148 见布伦坦诺的这本书第21—23页。——第116页。
- 149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是英国自由派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118页。
- 150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0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118页。
- 151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72年至1937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聚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118页。
- 152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18页。
- 153 “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119页。
- 15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6页。——第135页。
- 155 见注133。——第135页。
- 15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页。——第138页。
- 157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委员会报告书（I—VI）”（《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Report (I—VI) of the Commissioners》）。——第150页。
- 158 指“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1864年度第七号报告书。附录”1865

- 年伦敦版 (《Public Health . Seven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 With Appendix . 1864》. London , 1865)。——第150页。
- 159 詹·爱·撒·罗杰斯 “从牛津议会的召集 (1259) 起至大陆战争开始 (1793) 止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 1866年牛津版第1卷 (J . E . Th . Rogers .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 (1259)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 (1793)》. Vol I . Oxford , 1866)。——第150页。
- 160 指“矿山特别委员会报告书 ; 委员会议事录 , 证据记录和附录。根据1866年7月23日下院的命令出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Mines ;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 Minutes of Evidence , and Appendix .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 to be printed , 23 July 1866》)。——第150页。
- 161 J . Watts . 《The Facts of Cotton Famine》. London 1866 , p . 211 . ——第151页。
- 16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 ; 恩格斯下面引用的引文见第5页和第7页。成立宣言第一次发表于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 , 后来在同月和章程一起载入小册子 :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 1864 ,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 Martin’s Hall , Long Acre , London》. Price one penny . Printed at the 《Bee-Hive》 Newspaper Office , 10 , Bolt Court , Fleet Street , 1864。——第155页。
- 163 这个片断的文字和“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文字是一致的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667页) , 只有几个注释恩格斯在第四版中作了一些不同于第三版的修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是1883年在汉堡出版的。——第157页。

- 164 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第157页。
- 165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11页（《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London，1863 . V . III , p . 11）。——第157页。
- 166 “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1866年伦敦版第6部分第260—273页。——第158页。
- 167 这里引用的和后面提到的引文（见本卷第169、174、183、206、209页）不是莫里哀的文句，而是他的同时代人尼·布瓦洛的文句（“讽刺诗集”第八首讽刺诗）。这段话的译文是：
“此人，朝三暮四，
昨夜深有所感，今晨全都忘记；
既厌恶自己，也难讨别人欢喜，
刚打定主意，又弃之若敝屣。”——第159页。
- 168 见注143。——第159页。
- 169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和伦敦版第67、82页（H . Fawcett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Cambridge and London，1865，p . 67，82）。——第159页。
- 170 马克思的这篇答辩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第162页。
- 171 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页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667页）。——第164页。
- 172 “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1833年伦敦版第1—2卷（《England and America .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 Vol . I — II , London，1833）。威克菲尔德的

这本书出版时未标明作者姓名。——第164页。

- 173 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的发明”时是指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来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来打死他们”已被改为“使他们服从”。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译名“小拉斯克尔”。——第165页。
- 174 马克思的这篇答辩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18—127页）。——第172页。
- 175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柏林版第3卷第136页（A . Smith . 《A n Inquiry into the N 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 ealth of N ations》. V . III , Dublin , 1776 , p . 136 ）。——第173页。
- 176 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页和第667页）。——第173页。
- 177 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比斯利发表在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第47期上的文章。——第175页。
- 178 指1870年11月12日“星期六评论”第785期上发表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
“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 Literature , Science , and Art》）的简称，1855年至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175页。
- 179 见注172。——第176页。

- 180 与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刊登在“国际劳工运动报道”栏内,标题是:“英国”)同时发表的还有下面的短文,其中她指出塞·泰勒重新挑起了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和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拒绝发表她给塞·泰勒的答辩:

“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这样多,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用这些篇幅来讨论私人的问题。但是,既然我没有别的办法来驳斥对我父亲提出的非常严重的控告,我希望‘今日’月刊的读者原谅我这样做。去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塞德莱·泰勒先生的信,信中重复了过去的诽谤,说什么我的父亲为了自己的目的有意地歪曲了他所摘引的格莱斯顿一篇演说中的话。

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像我父亲那样遭到这样多的诽谤,但是这些诽谤者通常都是十分卑鄙,不值得给以答复。可是这一次我父亲破例地给匿名控告者以答复,因为硬加在他身上的所谓歪曲是出现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

我读了泰勒先生的只不过是烫剩饭的那封信之后,立刻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我在英国报纸上经常读到关于英国报刊如何‘公正’的说法,所以我毫不怀疑,我的答辩也会像泰勒先生的控告一样得到发表。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信并没有刊登出来。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泰晤士报’也好,在私人问题上可能还是正直的,所以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编者。但还是没有结果。接着我又写信给我一直认为是非常公正的报纸‘每日新闻’。可是,显然,活的教授可以不受惩罚地去踢死的狮子,而自由主义的‘每日新闻’却不能把自己的自由主义普及到发表我的信的程度。因此我在这里公布了泰勒先生的信和我自己的答辩:——”(见1884年“今日”月刊第1卷第2期第150—153页)。

“今日”(《To-Day》)是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83年4月至1889年6月在伦敦出版,在1884年7月以前,在海德门任杂志编辑期间,爱琳娜·马克思主持该杂志的“国际劳工运动报道”栏。——第187页。

- 181 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和“塞·泰勒的反驳”,都刊载于“今日”杂志“通讯”栏内,标题是:“马克思博士和格莱斯顿先生的1863年预算演说”(见1884年“今日”月刊第1卷第3期第228—235页)。——第192页。

- 18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5—40页。——第197页。
- 183 指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哈特福版(R Jones 《Text-book of Lectur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Hertford, 185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引证了这本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611—612页)。引文和注明的引文出处都是确切的。——第197页。
- 184 路·布伦坦诺“现代工人公会”。第2卷。“英国工会批判”1872年莱比锡版(L Brentano 《Die Arbeitergilden der Gegenwart》 Zweiter Band 《Zur Kritik der englischen Gewerkvereine》Leipzig, 1872)。——第203页。
- 185 指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历史和它的理论”1878年不来梅版(F. Mehring. 《Die Deutsche Socialdemokratie Ihre Geschichte und ihre Lehre》 Bremen, 1878)。——第205页。
- 186 “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是1888年3月至1900年9月在柏林出版的资产阶级杂志。——第211页。
- 187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收到威·李卜克内西寄来的这一期“德国周报”后不久,在1890年12月4日和13日之间写的。12月13日恩格斯把这篇短评寄给考茨基,请他把它发表在最近一期的“新时代”杂志上。——第212页。
- 188 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1887年12月初工人和民主力量在巴黎举行了多次群众性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反对前总理茹尔·费里(绰号“东京佬费里”,因为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部署目的在于对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和东京即越南北部实行殖民地侵占的远征)做候选人,费里是被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即所谓的机会主义派抬出来争总统职位的,并且得到保皇派的支持。在第一次投票中,费里得到的票数寥寥无几,他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在第二次投票前迫不得已放弃候选资格。恩格斯在1887年12月5日给拉法格的信里,把候选人费里的失败评价为人民对联合起来的保皇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胜利。

1891年2月27日和28日,德国帝国国会讨论关于所谓军士奖金的军事预算条款。首相卡普里维说明要求拨款的用途,他说必须巩固军队中

的军士这一部分人,因为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军队中加强了。帝国国会根据中央党、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票数,批准按政府申请总额的80%拨给此款。——第215页。

- 189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社在1891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时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德文第三版(纪念版)写的。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就巴黎公社的历史,其中包括参加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做了一系列补充。恩格斯在纪念版中还收入了由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和285—294页)。以后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的单行本,通常都包括有恩格斯的导言。

起初,恩格斯的导言经他同意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8期上。在发表时,编辑部对原文进行了篡改:在最后一段,在原稿中所用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语被改成了“德国的庸人”。从费舍1891年3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这种任意篡改是不同意的,但是,大概由于不想使自己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种文本中出现异文,他在单行本中也保留了改换的字眼。本版恢复了原稿的文字。

恩格斯的导言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起用俄文发表,第一次是1893年在日内瓦。1905年“海燕”出版社(敖德萨)出版了按1891年德文第三版翻译并由弗·伊·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导言。列宁在校订译文时,消除了1905年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的前一版中的许多歪曲原意和不确切的地方,并且把“法兰西内战”和导言中先前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文句恢复了。后来弗·伊·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引证导言时,又对其中的许多段落重新进行了翻译。列宁校订和翻译过的地方,在准备本版时得到了考虑。——第216页。

- 19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216页。

- 191 指1813—1814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第216页。
- 192 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学生的体操团体中得到了推广。他们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做蛊惑者。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216页。
- 193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第217页。
- 194 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附近进行了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的会战,结果是法军完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8万多名兵士、军官和将军做了俘虏。拿破仑第三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监禁于威廉堡(在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结果是1870年9月4日法国宣布为共和国。——第220页。
- 195 指以梯也尔和茹·法夫尔为一方,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的法德初步和约。按照这个条约的条件,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最后和约是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第221页。
- 196 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公社的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1871年3月31日第90号上。——第222页。
- 197 恩格斯说的大概是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扬1871年5月11日命令的内容,这项命令发表在“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年5月12日第132号上。——第222页。
- 198 指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Paris,1851)。马克思

1851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0卷第13—17页),对蒲鲁东在这部著作中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第226页。

- 199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答复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霍赛·梅萨在1891年3月2日的信里提出的请求而写的,梅萨请恩格斯答应让该党全国委员会出版由他翻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的西班牙文译本。早在1872年梅萨就开始翻译这本书了。它的一些片断曾第一次用西班牙文发表在第一国际马德里各支部的机关报“解放报”(《Emancipacion》)1872年4月13日第44号、10月5日和13日第68号和第69号上。以后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梅萨继续翻译,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实际可能在西班牙出版这本书。

梅萨在1891年4月8日又写信给恩格斯,说已收到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的信,同时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对反对蒲鲁东思想的斗争,以及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都非常重要,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蒲鲁东的思想,其目的在于用冒牌社会主义的空洞词句来欺骗工人。恩格斯的信被作为1891年夏天在马德里出版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西班牙文版序言。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888年巴塞罗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作为附录载于该书。——第230页。

- 200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负责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它拟于1891年4月12日在米兰召开)的委员会的来信的答复。委员会是由米兰的各民主组织成立的,其成员包括意大利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委员会极力使计划中的群众大会具有广泛的国际性质,因而向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其中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等)以及许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或以书面表示自己对它的支持。委员会在给恩格斯发出这一正式邀请的同时,还于1891年4月2日给他寄去了一封专函,其中写道:“您是这场自由和压迫的搏战中的最著名的战士之一。您是德国和英国——在社会主义

义领域内——最杰出的活动家之一,因此您的表示支持我们的群众大会的来信,将会对全体劳动人民发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您能参加4月12日的群众大会,并且能像我们所希望的为保卫工人的自由和独立而发表意见,那末,对您的同胞和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我们的同志就会起更大的影响。”——第232页。

201 恩格斯在1871—1872年间担任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意大利通讯书记,1873年担任过总委员会意大利全权代表。——第232页。

202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校订的、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新版单行本而写的。恩格斯在导言开头,把他为这一著作的1884年版本所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79页)全部复述一遍。为了在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大量刊印了附有恩格斯这篇导言的小册子。

导言在工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获得广泛的传布,它以独立的论文形式登载出来。在单行本出版以前,它曾发表在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上,标题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它还稍经删节载于1891年5月30日“自由”报第22号,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1891年7月10日第10期,1891年7月2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4号,1892年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问题”(《Question Sociale》)的文集,以及其他机关报刊。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1891年版本译成许多种外文出版,所有这些版本都收有这篇导言。导言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1894年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上。——第234页。

203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234页。

- 204 指1849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以及为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而举行的起义(这些起义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阶段)。德意志多数邦政府都拒绝承认宪法。——第234页。
- 205 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后来发现一份手稿,它是为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问题的讲演的晨后一讲或最后几讲所准备的提纲,标题为“工资”,手稿封面上有“1847年12月于布鲁塞尔”字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5—660页)。从内容看来,这份手稿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的未完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补充。手稿于1924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社会主义经济”(《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杂志上,1925年用原文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杂志上。但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没有发现“雇佣劳动与资本”一著已定稿的完成部分。——第234页。
- 20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41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3—80页。——第237页。
- 207 恩格斯引“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47页)。——第240页。
- 20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77—187页。——第240页。
- 209 恩格斯指1891年五一庆祝活动。在某些国家(英国、德国)里,是在5月1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庆祝五一节的,1891年,5月1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是在5月3日。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许多城市的工人,在1891年五一经念日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在俄国,尽管沙皇当局对五一运动的参加者进行疯狂的迫害,1891年,人们还是第一次庆祝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节日。——第243页。
- 210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47页)德文第四版写的,该版于1891年在柏林由“前进报”社出版。这部著作在1880年首先用法文发

表在“社会主义评论”(《Revue socialiste》)杂志上,德文第一版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于1883年3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扉页上标的日期是:1882年)。恩格斯在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表示相信这部著作的内容对德国工人读者来说困难是不多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6页)。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仍由该报社于1883年出版。第四版是在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后一版。所有这四个德文版本,都以附录形式刊载了恩格斯的“马尔克”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第244页。

- 211 所列举的各种版本为:《Il socialismo utopico e il socialismo scientifico》,Benevento,1883;《Развитие науч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Женева,1884;《Socialismens Udvikling fra Utopi til Videnskab》,København,1885;《Socialismo utópico y socialismo científico》,Madrid,1886;《De ontwikkeling van het socialisme van utopie tot wetenschap》,Gravenhage,1886。——第244页。
- 212 恩格斯提到的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文本(它以“反杜林论”中相应各章的文字为基础)的补充,另行刊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反杜林论’的资料”部分。关于圣西门的补充见第20卷第669—670页;关于托拉斯的补充见第20卷第672—673页。——第245页。
- 213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为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3—178页)一书第四版写的序言,在该版问世以前,经作者同意,这篇序言曾以“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题发表在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41期。
- 恩格斯的这本书的经过修订补充的第四版于1891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此后再没有改动过。恩格斯这本书后来以德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的各种版本,都收有这篇序言。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刊载于1894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恩格斯的这本书的俄文第一版里。——第246页。
- 214 指恩格斯的这本书的以下各种版本:《L'origine della famiglia, del-

- la propriet  privata e dello Stato》. Versione riveduta dell'autore, di Pasquale Martignetti. Benevento, 1885; 《Origina familiei, propriet  e i private  i a statulu i》, tradus de Joan N dejde, in: 《Contemporanul》 No. No. 17, 18, 19, 20—21, 1885, No. No. 22, 23—24, 1886; 《Familjens, Privatejendommensog Statens Oprindelse》. Dansk, af Forfatteren gennemgaaet Udgave, besoeget af Gerson Trier K benhavn, 1888, 《L'Origine de la Famille, de la Propri t  priv e et del'Etat》, Paris, 1893. — 第247页。
- 215 爱·伯·泰罗“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65年伦敦版(E. B. Tylor.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sation》. London, 1865). — 第248页。
- 216 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J. J. Bachofen. 《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ber die Gynaikokratie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sen und rechtlichen Natur》. Stuttgart, 1861). — 第248页。
- 217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 第249页。
- 218 恩格斯引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86年伦敦和纽约版第124—125页(《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comprising a Reprint of 《Primitive Marriage.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 London and New-York, 1886, p. 124—125)。麦克伦南“原始婚姻”一著最先于1865年在爱丁堡出版单行本,而“古代史研究”第一版(该版收有“原始婚姻”一著)于1876年在伦敦问世。恩格斯在下面也提到这一版本。—— 第252页。
- 219 R. G. Latham. 《Descriptive Ethnology》. Vol. I — II. London, 1859.

马嘉人是一个部落,现在是居住在尼泊尔西部地区的一个民族。——第252页。

- 220 指路·亨·摩尔根的十四封“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在纽约的“美国评论”(《American Review》)杂志1847年2—12月第2—12期),以及他的“Ho-déno-sau-nee 或易洛魁联盟”一书1851年罗彻斯特版(《League of the Ho-déno-sau-nee or Iroquois》Rochester, 1851)。——第252页。
- 221 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70年伦敦版(J Lubbock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 London, 1870)。——第254页。
- 222 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顿版(L. H. Morgan 《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Washington, 1871)。——第254页。
- 223 阿·吉罗-特龙“家庭的起源”1874年日内瓦、巴黎版(A. Giraud-Teulon 《Les origines de la famille》 Genève, Paris, 1874)。
J Lubbock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 Fourth Ed London, 1882)。——第256页。
- 224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期经野蛮期到文明期的进步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L.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1877)。——第256页。
- 225 恩格斯曾经同爱德华·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莱马在1888年8—9月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这次旅行的途中观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84—486页。——第257页。
- 226 约·弗·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76年伦敦版第333页(J. F. McLennan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London, 1876, p. 333)。——第258

页。

- 227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了回答由维克多·阿德勒在1891年6月22日来信中向他转达的请他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请而写的。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91年6月28日至30日在维也纳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93名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党的状况和活动、关于争取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运动、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党参加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关于奥地利的社会改革等问题。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1891年7月3日的社论“在维也纳举行的我党代表大会”中总结代表大会工作时指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它的代表大会是会满意的,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明显地表现出了党的国际主义性质、在策略问题上的明确性和一致性。代表大会上的辩论是按照1888年在因斐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的主要原则进行的。——第260页。

- 228 1888年12月30日至1889年1月1日在加因斐(下奥地利)举行了统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奥地利几乎所有各省的社会主义者的73名代表。代表大会在发展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会上成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并通过了基本上以“共产党宣言”的原理为依据的“原则宣言”作为纲领。宣言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争取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使所有劳动者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消灭劳动者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和提高他们的精神水平等等作为党的任务。宣言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基础之一。此外,宣言的内容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宣言中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提出废除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实质上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对发展奥地利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第260页。

- 229 恩格斯指废除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反动政府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而施行的非常法。

关于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

奥地利于1884年在“反无政府主义者法”的名称下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根据这些法令,社会主义的和工会的工人组织及其机关报刊遭到警察当局的迫害和查封,它们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但是,在罢工运动增长和1890年5月1日奥地利工人群众性行动的影响下,塔菲政府于1891年6月被迫废除这些法令。——第260页。

- 230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著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是恩格斯为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范例,这篇著作是恩格斯在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写的。1891年6月18日,理·费舍以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随函寄给了恩格斯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直接促使他写了这一著作。从信里可以看出,这份主要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草案,曾经在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次会议上讨论过,其中的一次会议决定把草案寄给恩格斯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

从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给考茨基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接到草案后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批判。他打算对绪论部分提出自己的更加概括的表述,但是,由于受到提意见的日期的限制,只对有些条款写了草稿(见第一部分附件,本卷第279—280页)。恩格斯对草案中专门谈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按照他的说法,正是这一部分促使他痛击这种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驯、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恩格斯的批判意见,以及在这以前由于他的坚持才发表的卡·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见注131),对进一步讨论并制定纲领草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恩格斯的意见被考虑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党的执行委员会收到意见后不久在1891年7月4日“前进报”上公布的纲领草案来判断。草案的文字表明,考虑到恩格斯的批评而对草案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在绪论部分及经济要求那一部分。草案中专门谈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尽管恩格斯作了批判,但并没有作什么有意义的修改。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关于民主共和国、关于改造德国国家制度和为反对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残余而斗争的必要性等原理,都没有写进这一部分去。

正式的纲领草案发表后,在各级党组织里和在“前进报”、“新时代”

杂志上开始对它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不仅提出了个别的建议和修改，而且提出了新的纲领草案。“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就提出了它自己的由考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从恩格斯1891年9月28日给考茨基的信和9月29日给倍倍尔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对“新时代”编辑部的草案提出一系列批判性意见，但整个说来，他认为它比正式的草案较令人满意，并且对倍倍尔打算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支持这个草案表示赞同。

为了审查提出来的各种草案和建议，成立了以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纲领委员会；委员会根据“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草案制定出最后的纲领草案；恩格斯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最初的纲领草案所提的一些意见也得到考虑。

委员会草拟的纲领草案被提交到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恩格斯在1891年10月24日给左尔格的信里，谈到通过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成果时写道：

“使我们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党的纲领清除了改良主义的拉萨尔派教条，更明确地表述了政治要求 and 经济要求。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明确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作为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对最初的草案的批判意见可以认为是对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的批判。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长期不发表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直到1901年它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编辑部在发表这篇著作时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恩格斯的手稿是在威·李卜克内西遗留下的文件中找到的。

弗·伊·列宁第一个把“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著中的若干地方译成俄文，并在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加以引用。在准备把

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收进本版时,考虑了列宁翻译的这些地方。这篇著作用俄文第一次发表于1930年“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第263页。

- 231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寄给恩格斯的并受到恩格斯的分析批判的纲领草案手抄稿,迄今尚未发现。下面引的是由执行委员会公布的、已经考虑过恩格斯的某些意见和建议的文本(1891年7月4日“前进报”第153号)。为了便于同恩格斯的批判意见相对照,把绪论部分各段的号数用方括号标了出来。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

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草案

[第一段]工人同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手段——的分离和劳动资料转归一部分社会成员个人占有,导致社会分裂成两个阶级:劳动者和有产者。

[第二段]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政治依附的基础。

[第三段]在这种剥削制度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的积累在剥削者——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及其生活的无保障越来越增长,过剩的工人的大军越来越具有群众性,阶级对抗越来越尖锐,把现代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的军事阵营并构成一切工业国的共同特征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

[第四段]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无计划性,产生了那些使工人状况更加恶化的越来越拖长的危机和生产的间歇,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所有者阶级已经丧失相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

[第五段]对这种日益不能容忍的状态通过消除其原因而予以结束,并力争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

[第六段]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力求实现把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手段——转变成公有财产,把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已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并且还将由它继续创造,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九段]社会民主党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即同那种把国家放在私人企业主地位并从而把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的专为国库着想的国有化制度,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第八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七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为所有其余的阶级和政党都站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但却有它们的共同目的——保持和巩固现社会的基础。

[第九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八段]工人阶级在一切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有着相同的利益,随着国际联系和为世界市场的生产的扩大,每个国家的工人的状况越来越同其他各国的工人的状况相依存,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都要一致参加解决的社会问题。基于这个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感觉到并宣称自己同所有其余的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

[第十段]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不分性别和出身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在这个解放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不仅是雇佣工人的代表,而且是全体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表,它坚持能够改善一般人民的状况,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切要求、办法和设施。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目前提出如下要求:

- 1 凡年满二十岁的帝国公民,不分性别,在选举和投票的所有阶段,均可在秘密投票的情况下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

实行比例选举制。规定选举和投票在星期日和假日举行。对选出的

代表支給薪金。

2 人民根据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直接参加立法。在帝国、各邦、各省和各市镇实行人民自治。税收每年提付表决，有拒绝纳税的权利。

3 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问题。成立国际仲裁法庭。

4 废除一切限制或取消自由发表意见和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

5 取消一切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的国家经费的拨款。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应视为私人的团体。

6 学校的世俗性。公立国民学校实行义务就学。在一切公立教学机构中实行经费教育和经费供应教材教具。

7 用时刻准备保卫国防的精神教育全体公民。用民兵代替常备军。

8 免费的诉讼程序和免费给以司法上的帮助。由人民选出的法官进行审判。

9 医疗和医药免费。

10 为了支付一切应靠税收支付的国家开支，征收级差累进的所得税、资本税和遗产税。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以及使社会整体利益服从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的其他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的要求：

1 在下列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有效的劳动保护法：

(a)规定标准工作日，其长度最多为八小时。

(b)禁止使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工业劳动。

(c)禁止夜工，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为了公共福利等特点而需要夜工的工业部门不在此例。

(d)向每个工人提供每周一次其长度最少为三十六小时的不间断的休息。

(e)禁止用实物支付工资。

2 由帝国劳动部门、各专区劳动局和劳动委员会对全部工业企业进行监督，并调整城乡劳动关系。

3 使农业工人和仆人同工业工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废除奴仆规约。

4. [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似乎是第二点]确保结社权。

5 在工人参加保险机关的管理并具有决定性权力的情况下,把整个工人保险系统转归帝国经营。——第265页。

232 指1875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著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里,对这一纲领的草案(该草案只作了不大的修改就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0页和第11—35页)。——第265页。

233 恩格斯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页)。——第269页。

234 由于修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完成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后于1848年12月5日钦定(恩赐)的宪法,在普鲁士通过了1850年宪法。因为一心要消灭这部整个说来十分反民主的宪法中残存的民主成果,国王在1849年4月解散了众议院,而在1849年5月30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规定以高额财产资格限制和居民各阶层选派议员不相等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新议院的奴颜婢膝的多数,按照国王的提议通过了使1848年钦定宪法的反动原则加强了的新宪法。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上院(“贵族院”),议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它失去了立法动议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且只对国王负责。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叛国案件。1850年宪法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在普鲁士仍然有效。

所谓的宪制冲突,是指六十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的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冲突。1860年2月,这个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资产阶级首肯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1862年3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年9月底,组成了反革命的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10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1866年,当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

- 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础,是1867年4月17日批准的而后在1870年11月根据德国南部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加入联邦的条约而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1871年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反动基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组成来说是反动的联邦会议的赞同和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和帝国首相所拥有的不依赖于帝国国会的特权非常广。该宪法保存了分立主义的残余,德国一些小邦的特权。——第272页。
- 235 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两个很小的“主权”国家用一个名称联起来,这两个在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小国是:属于长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格莱茨和属于幼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盖拉-施莱茨-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第272页。
- 236 恩格斯指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所作的、得到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的演说,凯泽尔在那次演说中为政府的1879年度保护关税草案作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地斥责了在帝国国会里替为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利益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代表作辩护的凯泽尔的行为,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姑息放纵。
曼彻斯特主义,见注105。——第274页。
- 237 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特殊权利,这些权利在关于它们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1870年11月)中和在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年4月)中被确定下来了。其中,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保留了特有的烧酒和啤酒税、独立管理邮电。此外,巴伐利亚还保留了管理它的军队和铁路方面的独立性。巴伐利亚、维尔腾堡以及萨克森在联邦会议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问题方面的特别的委员会。——第275页。
- 238 指由于完成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1799年雾月18日(11月9日)政变而宣布自己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波拿巴的专政。这一制度取代了1792年8月10日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国制度。1804年,在法国正式建立了帝国,拿破仑被宣布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尽管制度交替更换,但第

一帝国的许多官僚机构却在法国继续保存下来,连在1870年9月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时也是如此。——第276页。

- 239 恩格斯指在1880年11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的纲领。1880年5月,法国社会主义者领导人之一茹·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纲领草案。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给伯恩斯坦的信里指出,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马克思口授给盖得的。恩格斯写道:“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提出了某些增减。”

马克思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页,纲领的实践部分(最低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35—636页。——第278页。

- 240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是在1888年巴塞罗纳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278页。

- 241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一文是1891年9月2日恩格斯写给拉法格的一封信,该信发表在1891年9月1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51号上,发表时略有删节,文字上也作了些修改。这篇文章被译成德文刊载在1891年9月16日“前进报”第216号“政治评论”栏里。恩格斯在1891年10月1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曾对德译文的质量表示不满意。

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在马克思主义派和再次企图攫取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机会主义分子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见注112)。由于领导马克思主义派进行斗争的恩格斯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可能派这一次也未能分裂工人的国际联合。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有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337名代表参加,就其组成来说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大会。在讨论代表资格审查结果时,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以及关于军国主义等问题。

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恩格斯在他的信里对关于劳工保护法的决议(他引用的句子是取自这个决议的引言部分和结尾部分)以及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作了评价。前一项决议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地方,应该利用这些权利来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代表大会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其中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的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党。可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决议案以这样一个相当含糊的号召结束,即号召各国工人坚决反对战争准备和军事同盟,通过使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完善化的办法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一旦发生战争,各国社会主义者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的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评价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281页。

- 242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见注134。——第281页。
- 243 恩格斯指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47—52期发表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一八九一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有一部分还刊登在1890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册上。——第282页。
- 244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在1891年10月13日和22日之间写的,它的初稿是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1891年9月26日“社会主义者

报”刊登了有关该年鉴出版的广告,广告说,年鉴打算概要地评论1891年在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并说明恩格斯将写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1891年9月23日劳拉·拉法格受工人党领导的委托请恩格斯为年鉴写一篇文章,并且告诉他说,文章的题目已由茹·盖得和保·拉法格提出来。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这项请求使他有理由就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对爆发战争的危险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把文章寄给劳拉·拉法格,同时在1891年10月22日的信中要求把文章转交给党的领导,并把党的领导对文章的意见告诉他。从保·拉法格1891年10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文章受到称赞并且收入1891年12月初出版的年鉴。

文章在年鉴上发表后不久,恩格斯为“新时代”杂志把它译成了德文,并且为它写了简短的前言,还写了结束语。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刊物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在1892年1月16日和2月1日的“社会评论”第2期和第3期上发表了从法文翻译的头两部分,编辑部给第一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给第二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和平”。1892年4月1日该杂志第7期转载了文章的结束语(译自德文,并稍加删节),标题是:“俄国的饥荒及其原因和意义”。同年出版了马尔提涅蒂译的该著作的意大利文单行本。

“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从德文译成波兰文,发表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杂志“黎明”1892年2月13日和20日第33和34期上;又用罗马尼亚文发表在雅西出版的“社会评论”杂志1892年1月和2月第2和3期上(删去前言)。同年,该著作还用英文在美国发表。

恩格斯这一著作的第一批俄译文于1892—1893年用胶版印刷出版;1906年该著作从德文译成俄文在彼得堡和基辅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工人党年鉴”(《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是法国社会主义年鉴,于1892年至1894年和1896年在利尔出版,编辑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第285页。

245 所谓“纯粹的”(或称三色的)共和派就是依靠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与

它有联系的那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该报从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阿尔芒·马拉斯特。

“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u travail》)是路易·勃朗的一本著作的名称,他在这本著作中叙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纲领;该书第一版于1840年在巴黎出版。——第288页。

- 246 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该党是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后来就以“爱森纳赫派”这一名称闻名。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尽管有一些不成熟的和错误的观点,但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出发点的。——第289页。
- 247 关于哥达的合并,见注132。——第289页。
- 248 恩格斯指的是1891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菲·拉萨尔全集的决议。——第290页。
- 249 恩格斯引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话:“合法性害死我们”,这句话反映出1848年底至1849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第292页。
- 250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一个法国近卫军军官在丰特努瓦战场上(1745年5月11日)说的话,这个军官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6年)时期曾得到法国人的称赞。当与法军为敌的英国、荷兰、汉诺威联军走近法军的时候,这个军官高呼:“英国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第292页。
- 251 关于色当战役,见注194。——第293页。
- 252 恩格斯引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第294页。
- 253 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1793年击退欧洲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联军的入侵。——第297页。

- 254 指1891年7月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公开表示沙皇俄国和法国相互靠拢的场面。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策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的行动。这个协定是1893年法俄同盟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298页。
- 255 指1891年9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12500万金卢布(5亿法郎)的利率三厘的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12500万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是,由于1891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结果大约只推销了9600万卢布的公债。——第299页。
- 256 关于十九世纪普鲁士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普鲁士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伴随着为容克地主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的掠夺),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46—257页)。——第300页。
- 2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55—759页。——第301页。
- 258 恩格斯指的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塞·沃邦的著作“王国什一税草案”(《Projet d'une Dixme Royale》)(1707年出版)和比·布阿吉贝尔的著作“法国详情”(《Le D'état de la France》)(1695—1707年多次出版)。——第302页。
- 259 “人民之友报”编辑部在1891年11月初给恩格斯的信中,邀请他参加拟于1891年11月22日在布隆(捷克称作布尔诺)举行的该报十周年庆祝大会。这次庆祝活动的组织者原打算使它成为一次反对反动的奥地利出版法的政治示威,但是由于警察当局的禁止,未能举行。
- “人民之友报”(《Völkersfreund》)是一家社会主义的报纸,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1881年在布隆创刊。——第304页。
- 260 青年捷克派是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党;起

初它加入民族党,成为民族党内的自由派;1874年,青年捷克派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自由思想党”,这个党在九十年代成为捷克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青年捷克派提出了把奥匈帝国改为奥匈捷三位一体的君主国的要求,力图使捷克资产阶级在这个君主国中居统治地位,用削弱德意志资产阶级阵地的办法来巩固捷克资产阶级的经济阵地和政治阵地。青年捷克党对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抱敌视态度,力图破坏它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第305页。

- 261 指1891年11月17日“每日纪事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拉法格先生事件”的通讯。

“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1855年至1930年(1877年起用此名称)在伦敦出版;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曾发表过有关英国工人运动的资料。——第306页。

- 262 关于1871年8月法国当局在拉法格和马克思的几个女儿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疗养地巴涅尔-德-吕雄市时对他们进行迫害一事,见1871年8月25日马克思给“太阳报”(《Sun》)编辑德纳和1871年9月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给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30—433页和第704—715页)。——第307页。

- 263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协会。——第309页。

- 264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英国版而写的。这个版本是1887年在纽约第一次出版的经作者同意的英译本的第二版。序言基本上由恩格斯1886年写的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60—266页)和该附录所包括的他所著“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同上,第21卷第198—205页)构成,只是文字上略有修改,个别地方有删节。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1892年英国版写的。——第311页。
- 26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45—353页。——第311页。
- 266 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粮食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粮食。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更迅速的发展。——第312页。
- 267 关于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做了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7—469页)。1831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法律,但很多工厂主并不遵守。
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的。——第313页。
- 268 “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有关于这个地方的详细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42—343页)。
“七日规”(《Seven Dials》)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区。——第314页。
- 269 指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ousing of the Working

- Classes England and Wales》.1885)。——第314页。
- 270 小宅子制——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给工人提供住所,房租由工人的工资中扣除(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9—470页)。——第315页。
- 271 指1886年1月22日至2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工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
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的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42—548页。——第315页。
- 272 “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赛·穆尔翻译,由恩格斯校订的,1887年出版。——第315页。
- 273 “公益”(《The Commonweal》)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年至1891年和1893年至1894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年至1886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317页。
- 274 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是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年、1842年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第317页。
- 275 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318页。
- 276 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年6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

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318页。

- 277 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1867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

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在英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秘密投票是在1872年实行的。——第319页。

- 278 马克思在他的许多著作如“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62—465页)中,有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反而做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他们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实现了革命所提出的要求,虽然是以面目全非、滑稽可笑的形式实现的。——第319页。

- 279 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1883年9月在南港举行的第五十三次会议的报告”1884年伦敦版第608—609页(《Report of the Fifty-Third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Southport in September 1883》. London, 1884, p. 608—609)。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成立于1831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协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形式发表。——第322页。

- 280 这篇文章是对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卓·博维奥批评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前一部分的答复。恩格斯的文的前一部分按照“1892年工人年鉴”上发表的文本译成了意大利文,载于1892年1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2期。1892年2月2日,“社会评论”编辑菲·屠拉

梯把载于“论坛报”的博维奥的文章寄给恩格斯,并请恩格斯对它作答复。恩格斯用法文撰文作答,于1892年2月6日随函寄给屠拉梯。屠拉梯把这篇文章译成意大利文,并经恩格斯同意,发表于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第4期,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答卓万尼·博维奥”,许多意大利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社会评论”(《Critica Sociale》)是一家意大利双周杂志,是社会党的理论性机关报,从1891年至1924年以此名称在米兰出版;杂志的编辑是菲·屠拉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传布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

“论坛报”(《La Tribuna》)是一家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83年起在罗马出版。——第326页。

- 281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用德文为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写的(“宣言”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这个版本由波兰流亡者翻译定稿并由“黎明”杂志社出版。这个版本被标为第二版,因为前一版(波兰社会主义者彼卡斯基译)由该报社于1883年在日内瓦刊行。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亲自指出过,最初的波兰文译本早在1848年就在伦敦发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页)。恩格斯在把序言寄给“黎明”社后,在1892年2月11日写给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的信中说,他希望将来能掌握波兰文,以便能深刻研究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到那时他就可以为下一版的波兰文“共产党宣言”写一篇更加充实的序言了。

“黎明”(《Przed świt》)是一家波兰社会主义的杂志,从1880年至1914年出版。从1891年起在伦敦发行,每周出一期。——第329页。

- 282 会议桌上的波兰——见注42。——第329页。

- 283 1789年7月14日是巴黎的人民群众攻下巴士底狱的日子,这一天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1792年9月22日是国民公会在1792年9月21日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这一天被认为是国民公会在1793年批准的革命新历

的元旦。——第331页。

- 284 1892年出版的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德文第二版,是1885年德文第一版的翻版,只作了恩格斯在这篇按语中所说明的修改。1892年版收有恩格斯为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80—194页),以及(在附录里)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一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和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

按语中提到的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页。在1847年法文版中出现,后来又被1885年德文版重复的这两处无关紧要的疏忽,曾被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门格尔在他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一书(1886年版)中利用来作为诋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实。在矛头指向门格尔的论战性著作“法学我的社会主义”中,也揭露了这些诋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13页)。——第333页。

- 285 威·汤普逊“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伦敦版(W.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Human Happiness》, London, 1824)。——第333页。

- 286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47页)的英文版写的。英文版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译者是爱·艾威林,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把他在1882年写的“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一文作为附录收在这一版中。

恩格斯在1892年6月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在7月间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于1892年第1期和第2期,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编辑部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删去了前面的七段,并在脚注中说,这几段文字的内容在德国是尽人智知的,不会引起德国读者的兴趣。

导言的个别部分曾以“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三次会战”、“工人政党”为标题,用法文发表于1892年12月4、11和25日,1893年1月1和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15、116、118、119和120号。导言还曾用保加利亚文发表于1892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删去前面八段)。

这篇导言的俄译文第一次于1926年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发表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第334页。

- 287 关于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见注132。——第334页。
- 288 指以下这几部著作: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E. Dühring,《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Leipzig,1875),欧·杜林“国门—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E. Dühring,《Cursus der National- 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2. Aufl.,Leipzig,1876),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E. Dühring,《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2. Aufl.,Berlin,1875)。——第337页。
- 289 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第337页。
- 290 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1—338页)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以及1877年7—12月和1878年5—7月的该报附刊。第一版单行本于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
-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1876年党的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该报从1876年10月1日起在莱比锡出版,用以代替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拉萨尔派的机关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zialdemokrat》);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该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第337页。
- 291 F. Engels《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Paris,1880。这本小册子是恩格斯根据“反杜林论”中“导言”的第一章和第三篇的第

- 一、二两章,并对它们做了一系列增补和一些修改而编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1883年德文第一版所用的书名。——第337页。
- 292 F. Engels. 《Socjalizm utopijny a naukowy》. Gen ève, Redakcyi 《Przed s witu》, 1882. 关于西班牙文版,见注211。——第337页。
- 293 F. Engels. 《Socialism utopic și socialism știin țific》. Bucu-re ști. 1891. 关于恩格斯这一著作的德文版、意大利文版、俄文版、丹麦文版和荷兰文版,见注210和注211。——第337页。
- 294 恩格斯指的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T 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 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 t é》. Stockholm, 1890)和“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Первобытноеправо, выпуск I, Род》. М., 1886)。——第338页。
- 295 关于“资本论”英文版,见注272。——第338页。
- 296 唯名论者代表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维和语言的产物,它们只能用来表明现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纪的实在论者相反,唯名论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创造事物的源泉。因此,他们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第339页。
- 297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同素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同素体是万物的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第339页。
- 298 约·洛克“人类悟性论”(J.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第一版于1690年在伦敦出版。——第341页。
- 299 自然神论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评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

- 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第341页。
- 30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引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3—165页)。——第341页。
- 301 指1851年5—10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第342页。
- 302 “救世军”是反动的宗教慈善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在英国创立,后来它的活动又扩展到其他国家(1880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才采用这个名称)。该组织利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进行广泛的宗教宣传,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其目的是使劳动群众离开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救世军的某些传教士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表面上谴责富人的利己主义。——第343页。
- 303 指比·西·拉普拉斯的著作“论天体力学”(《Traité de mécanique céleste》),第一版于1799—1825年在巴黎出版,共五卷。——第343页。
- 304 1522—1523年的德国贵族起义和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作了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第348页。
- 305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1688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第350页。
- 306 红白蔷薇战争(1455—1485年)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族和郎卡斯特族之间的战争。约克族的纹章上饰有白色蔷薇,郎卡斯特族的纹章上饰有鲜红色蔷薇。站在约克族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族的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结果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的统治,实行了专制政体。——第350页。
- 307 语出霍布斯“论公民”(《De Cive》)一书序言,该书于1642年在巴黎写

- 成,最初流传的是手抄本,1647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刊印。——第352页。
- 308 笛卡儿学派的哲学是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拉丁文为 *Cartesius*)的继承者的学说,他们从他的哲学中做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第352页。
- 309 恩格斯指的是1789年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阐明了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原则。1791年的法国宪法中包括了这篇宣言,根据它起草的1793年雅各宾派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被置于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国的第一个共和宪法的前面。——第352页。
- 310 *Code civil* (民法典)是1804—1810年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制订的(因此民法典又通称为拿破仑法典),系统地阐明资产阶级法权的五部法典之一。恩格斯把1804年通过的民法典称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11页)。——第353页。
- 311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态度。联合在伦敦革命协会中的、主要是联合在伦敦通讯协会和英国其他各大城市通讯协会中的法国革命拥护者(在协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中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宣传革命思想,提出实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讯协会都受到英国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的迫害。——第354页。
- 312 见注276。——第355页。
- 313 1824年英国议会在工人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通过了一项废除禁止工人结社(工联)的法令。1825年,议会通过了结社法亦称工人联合法,这项法律重申废除禁止工联的决定,但是严格限制工联的活动。例如仅仅宣传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就被看做“强制”和“暴力”,而受到刑事处罚。——第355页。
- 314 人民宪章——见注274。
-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于1838年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所创立。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见注266),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

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谷物法废除以后，同盟即不存在。——第355页。

- 315 琼生大哥(Brother Jonathan)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1775—1783年)英国人给北美美人起的绰号。

基督复活派是新教教会中的一个流派，十八世纪上半叶产生于英国，流行于北美。它的信徒力图通过宗教说教和组织新的信仰者的团体来巩固和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第356页。

- 316 指1867年得比—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实行的议会改革(见注277)。——第357页。

- 317 关于英国实行秘密投票和1884年议会改革，见法277。——第358页。

- 318 见注135。——第359页。

- 319 崇礼派(更流行的名称是皮由兹教派)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它的信徒号召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崇礼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义。——第359页。

- 320 恩格斯指的是路·布伦坦诺论述英国工联的著作和言论(见注184)。在这些著作和言论中，布伦坦诺竭力称赞英国的工联主义，说它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典范，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工人阶级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并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按照布伦坦诺和其他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说法，组织得很好的工会可以使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党成为多余的。恩格斯在“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这部著作(本卷第107—213页)中揭露了这种说法的虚伪性质和阶级内容。——第360页。

- 321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原拟于1892年4月17日在林茨开幕。但在4月2日，当局禁止代表大会在这个城市举行。因此，代表大会改于1892年6月5日在维也纳召开。虽然奥地利政府于5月底取消了它的禁令，可是代表大会还是于1892年6月5日至9日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研究了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通过了章程并对

- 党纲作了补充。——第362页。
- 322 恩格斯为“前进报”写的悼文“卡尔·肖莱马”于1892年7月3日发表在该报上,它还载于1892年7月15日“工人报”第29号和保加利亚杂志“日子”(《ДЕНЬ》)1892年第7册。——第363页。
- 323 欧文斯学院是曼彻斯特一家高等学校,它是1851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约翰·欧文斯在遗嘱中为它留下的资金创办的。——第363页。
- 324 关于恩格斯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一事,见注225。——第365页。
- 325 1890年7月1日至26日恩格斯同肖莱马到挪威和北角旅行。1891年7月底至8月恩格斯同肖莱马游威特岛,他们打算从那里去苏格兰和爱尔兰。但肖莱马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未能参加这次旅行;恩格斯同内侄女玛·艾·罗舍、秘书路·考茨基夫人于1891年9月作了这次旅行。——第365页。
- 326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基本上是作者根据该书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本卷第311—325页)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译成的德译文。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亦按1885年“新时代”杂志第6期上的德文照录于本序言中。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的。——第367页。
- 327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60—266页)。这篇文章本来是作为美国版序言写的,但恩格斯后来又改用了另一篇阐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文章(同上,第345—353页)做序言。——第367页。
- 328 1876年5月10日,为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拉得尔菲亚开幕。在参加博览会的四十个国家中也有德国。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被迫承认,德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言一出,报界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月至9月也专门就这件出丑的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这个事件叫做工业上的耶

拿战役,是借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10月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来作比喻。——第368页。

329 这两个片断大概是恩格斯在准备出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德文第二版时写的。——第384页。

330 恩格斯指的是1889—1890年在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造成了金融市场的恐慌、剧烈的通货膨胀、大规模的破产,国债亦因之停止偿付。这次危机是1890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之一,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危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的发展,因为英国在阿根廷是有巨额投资的。1889—1890年的危机加紧了欧洲金融资本对阿根廷的经济奴役。——第385页。

331 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信是恩格斯针对1892年9月5日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下列两个决议写的:一个决议是拒绝接受由负责筹备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发出的要求参加该代表大会的邀请,另一个决议是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来代替上述代表大会。这两个决议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所筹备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分裂的又一次尝试(这一次是由保守的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领导出面)。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为,他给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寄去了内容相同的信件,建议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手法。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在1892年10月2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说,它将抗议英国工联的行为,并确认自己赞同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第386页。

332 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

替。——第386页。

333 指正正在筹备中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它于1893年12月在芝加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是:承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和通过包括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在内的纲领。这一决议的通过证明反映广大劳动群众愿望的进步力量在美国工会中的影响增长了。——第386页。

334 1892年9月19—23日在马赛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除别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等)外,还讨论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不参加工联召开的讨论八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去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同年9月24—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503),大会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第387页。

335 “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是恩格斯在1892年11月9日和15日之间,就美国民主党上台一事而写的。民主党代表人物克利夫兰于1892年11月8日当选为总统,代替了共和党人哈里逊。恩格斯认为美国政府的这次更选同要求废除1890年采取的麦金利保护关税率的愿望有关。这套为保证资本家首先是垄断组织获得高额利润而实行的关税率,大大提高了进入美国的工业品的进口税,结果促进了日用品的价格上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在竞选期间攻击麦金利关税率的民主党人于1894年实行了新的关税率,新税率比1890年规定的虽然是降低了,但仍然带有明显的保护关税性质。

“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除在“前进报”上发表外,还转载于1892年11月21日“选民报”第270号和1892年11月25日“工人报”第48号。——第388页。

33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72—389页。——第388页。

337 恩格斯指的是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2期发表的一篇短文:“美国纺织工业在中国市场”。——第390页。

- 338 关于卡特尔,见注7。——第390页。
- 339 这篇卡尔·马克思的传记,恩格斯是应在耶拿出版的“社会政治科学手册”出版人之一路·埃耳斯特尔的请求而写的。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这篇传记还发表于1893年3月17日“工人报”第11号(标题是:“卡尔·马克思生平”),以及保加利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1893年第3期。——第392页。
- 340 卡·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7—98页)。——第392页。
- 341 指卡·马克思的以下几篇文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5—96、135—181和210—243页)。
-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392页。
- 342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简称;自1841年7月由阿·卢格主编,以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在此以前(1838—1841年)该杂志是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哈雷(普鲁士)出版的。1843年1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联邦议会并决定在全德境内予以查禁。——第393页。
- 343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

- 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和626—63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第393页。
- 34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第393页。
- 345 “前进报”(《Vorwärts》)是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国报纸,每周出两次。该报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直接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393页。
- 34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和444—459页。——第394页。
- 347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该报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马克思在该报发表过以下的文章:“‘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07—222和322—356页)等。“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还发表过恩格斯的文章“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的运动”、“奥地利

末日的开端”(同上,第223—275、297—315、505—515和516—523页)等。——第394页。

- 348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把正义者同盟——三十年代成立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改组之后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1847年1月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参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布的原则改组同盟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表示同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并在同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初和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上得到批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起草了于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

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394页。

349 下面是恩格斯为写“卡尔·马克思”一文而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书单的译文(日期写错的已改正):

马克思著作

(1)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

(2)关于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法进行的辩论的文章和关于摩塞尔流域农民的文章,1842年在“莱茵报”上发表。

(3)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

(4)同弗·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5)1844年在巴黎“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

(6)1846—1847年[误,应为1847—1848年]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

(7)“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8)“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9)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各种文字都有译本。

(10)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社论等等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

(11)1849年在科伦出版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中的辩护词。

(12)1850年在汉堡“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从1848到1849年”

(关于法国的二月革命)以及同恩格斯合写的批判文章、每月述语。

(1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在纽约出版(18[85]年在汉堡出第三版)。1891年出法文译本。

(14)“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在波士顿(1885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

(15)1852—1861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关于帕麦斯顿的若干篇(1856—1857年在伦敦作为抨击性小册子出版和传播)。

(16)“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6月28日—1857年4月1日先后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

(17)关于1859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间的外交谈判的文章,1859年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表。

(1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在柏林出版。

(19)“福格特先生”,1860年在伦敦出版。

(20)1864年的国际成立宣言以及总委员会的所有公告,包括1871年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几乎所有欧洲各国文字都有译本。

(21)“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1867年在汉堡出版,1890年出第四版。有俄文、法文、英文译本。

(22)(逝世后)“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册),1885年由弗·恩格斯在汉堡出版,1893年第二版在排印中。

(23)(逝世后)“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册),同前,将于1893年出版。——第395页。

350 在1849年2月7日举行的对“新莱茵报”的审判中,该报总编辑马克思、编辑恩格斯和发行负责人海·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在该报1848年7月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逮捕”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页)中侮辱和诽谤了普鲁士当局和宪兵。马克思在恩格斯在这次审判中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278和279—285页。

在1849年2月8日的审判中,马克思被控的罪名是,他作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曾经煽动叛乱,因为他曾同卡·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一起签署了这个委员会1848年11月18日发表的号召拒

绝纳税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页)。马克思在这次审判中的辩护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6—306页。——第397页。

- 351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第397页。
- 352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底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在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当局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397页。
- 35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397页。
- 35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第397页。
- 355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则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停止为该报撰稿,马克思所以停止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主要的原因是编辑

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因而使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第397页。

356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第397页。

3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第398页。

35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398页。

359 恩格斯指的是1861—1863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这一著作即后来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第398页。

36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98页。

361 恩格斯指的是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时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发生在成立大会(大会是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的)所选出的临时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所任命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里。1864年10月8日马志尼企图通过他的追随者、临时委员会的成员沃尔弗强迫起草委员会接受充满资产阶级民主和密谋原则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作为纲领性文件。10月18日马克思在临时委员会的会议上第一次看到了马志尼的文件并批评了它;由于马克思的坚持,这个文件以必须交给起草委员会做最后的审订为理由,实际上被拒绝了。10月20日起草委员会把这项工作委托给马克思,而在10月27日通过了他起草的两个全新的文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和15—18页)。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在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后来叫做总委员会)上一致通过。——第398页。

36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第398页。

363 见注134。——第399页。

364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5—125页)。

“人民历书”(《V olks- kalender》)是1875年至1879年在不伦瑞克出

版的社会民主党的年鉴,主编和出版者是威·白拉克。——第400页。

- 365 下面是恩格斯著作书单的译文。恩格斯最初写这个书单看来是在1889年,后来他大概在1892年底又加以补充(所以书单开始部分列有的某些著作的1889—1892年版本没有标出。日期写错的已改正)。

(1)(同卡·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合写,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2)“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英译本1887年在纽约出版。

(3)(同卡·马克思合写,无署名)。“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各种文字都有译本。

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作为编辑代总编辑执笔(代马克思)在科伦“新莱茵报”上写的文章。

同前,1850年在汉堡“新莱茵报。评论”上写的文章。

(6)“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在汉堡出版。

(7)“德国农民战争”,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重印出版,[1850年]出第一版,[1870年]出第二版,1875年出第三版。

(8)“论住宅问题”,三个分册。1872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出第一版,1887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

(9)“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出版。

(10)“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出版。

(11)“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起义的札记”,[1874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出版。

(12)“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78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重印,出第一版,1886年由苏黎世瑞士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

(1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二、三版均于1883年

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法文、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荷兰文译本)。

(1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见解而作”,1884年由苏黎世沙贝利茨出版社出版,[1886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第二版,第三版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和法文译本在翻译中)。

(1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根据“新时代”重印出版。

(4)“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由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

(5)“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由柏林贝伦兹出版社出版。

(16)“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1891年在汉堡出版。

下列著作的序言和导言:

(3)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的‘哲学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的德译本,1885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序言,驳洛贝尔图斯)。

(1)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83年第三版和1890年第四版(驳路·布伦坦诺)。

(1)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驳洛贝尔图斯),1885年。

(4)1849年发表的“卡·马克思在科伦的陪审法庭上”,1849年根据“新莱茵报”重印出版,1885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

(5)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重印本,1885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导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6)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49年根据“新莱茵报”重印出版,[1886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导言:威·沃尔弗的传记和“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7)西·波克罕“纪念一八六——一八七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88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西·波克罕的传记)。

(1)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赛·穆尔和爱·艾威林根据德文第三版翻译并由弗·恩格斯负责出版的译本,1887年伦敦容涅先出版公司出版(校订译文并写序言)。

(2)1846年 [误,应为1848年]卡·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弗·凯·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译本,1888年在波士顿和伦敦出版(关于自由贸易的序言,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

(3)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凯·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译本,1887年由纽约拉弗耳出版社出版(附录和序言)(序言还曾以“美国工人运动”为标题于1887年在纽约用英文和德文出版单行本。1887年由伦敦里夫斯出版社重印。并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1892年由伦敦容涅先出版公司出第二版(序言有一部分是新的)。

1890年5月仅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用俄文载于1890年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和第2册,用英文载于1890年4月和5月“时代”杂志,用法文载于“新思想”杂志,用罗马尼亚文载于1890年5—7月“现代人”杂志)。

(4)弗·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第401和402页。

366 卡·马克思曾计划写一部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史的著作。这里指的是他为此著作而写但没写完的导言。这篇导言最初于1856年6月至1857年4月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标题是:“十八世纪外交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1899年又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标题是:“十八世纪外交幕后史”(《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1855年至1865年在伦敦出版)和“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1851年至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支持者出版的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第403页。

367 恩格斯指的是1859年6—8月“人民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下列几篇文章:“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Quid pro quo》(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35—438、462—465和503—523页)。

“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而创办的。第1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2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该报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问题的研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该报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的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对波拿巴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该报总共出版了十六号就因缺乏资金而停办了。——第403页。

368 恩格斯写这篇给“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该报发表了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章。这组文章几乎全以巴枯宁派的材料为根据,凭空捏造在瑞士的第一国际组织的历史,为巴枯宁派、尤其是为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辩护,汝拉联合会是1870年4月4—6日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在瑞士罗

曼语区国际各支部中引起分裂以后组成的。这组文章采用了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许多诽谤性的杜撰。1892年11月12日发表的第十篇文章对历史事实歪曲得特别厉害。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驳斥。恩格斯把声明寄给柏林的倍倍尔,让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并在1892年11月15日写给倍倍尔的信里请他关心这件事,以便使声明能在该报下一号上刊登出来,因为不能“容许这种谎言再瞎扯下去”。

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论坛”报上,而1892年12月24日,该报除了刊载第十三篇文章外,还刊出了这组文章的作者瑞士社会主义者路易·艾里提埃的答复。艾里提埃在他对声明的答复里,以及在1892年12月25日专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大放厥词,企图驳倒对他歪曲第一国际历史所作的谴责。恩格斯在1893年1月20日写复信给艾里提埃,揭穿他支吾其词、企图推卸歪曲事实和偏袒巴枯宁派地阐述事实的责任,使对方知道,第一国际的历史是不容许捏造的。——第405页。

- 369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见注109。——第405页。
- 370 恩格斯把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和共同章程(1871年)的绪论部分对这一重要原理的表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页和第17卷第475页)同1866年出版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章程法文译本对这一原理的歪曲的表述加以对比。——第406页。
- 371 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见注97。——第406页。
- 372 指1871年公布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492页)。——第406页。
- 373 恩格斯叙述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2—465页)的大意。——第407页。
- 374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巴枯宁在1868年在日内瓦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

- 大利、瑞士、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407页。
- 375 见注134。——第407页。
- 37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65—515页)原是用法文出版的,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德文译本“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Ein Complo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的校订工作。——第408页。
- 377 恩格斯“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资料来源,是18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新闻”第284号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俄国民族学家列·雅·施特恩堡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结果的报道。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里几乎全部引用了这篇报道,亲自把它译成德文,为了想把若干地方搞得更准确、更清楚,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 “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一家社会政治性的报纸,是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63年至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1863年至1867年每周出刊三次,1868年起改为日报。——第409页。
- 37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9—50页。——第409页。
- 379 吉里亚克人是尼夫赫人的旧称,是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北部在中部的民族。——第410页。
- 380 十二铜表法是最古的罗马法文献,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编成,是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的成果,它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十二铜表法

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 ;法律条文写在十二块牌子上(铜表)上。——第411页。

- 381 “民族学评论”(《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一家俄国杂志,1889年至1916年由莫斯科大学附属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民族学部出版,每年出刊四期。

施特恩堡“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一文载于该杂志1893年第2期。——第413页。

- 382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于1892年12月底通过“工人新闻”编辑部向他发出的请他参加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请而写的。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93年1月6—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在代表大会以前和代表大会上,以全国工人患病残废保险基金会的领导为首的党的机会主义派和以保·恩格耳曼为首的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斗争。机会主义者利用自己对占党员多数的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的影响,使代表大会批准了他们事先(1892年12月)就通过的关于开除恩格耳曼及其拥护者出党的决议,他们虚伪地指责恩格耳曼滥用党的经费和破坏民主。为了掩盖自己对党内革命派的迫害,机会主义者故意把全部斗争说成是个人的意见分歧,在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党向1893年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谈到了这一点。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对代表大会隐瞒了恩格斯主张平心静气地解决意见分歧的贺信,也没有把它在党的报刊上发表。——第414页。

- 383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由于在法国的波兰流亡者以策划谋杀亚历山大三世的罪名遭到逮捕而写的。恩格斯从波兰社会主义者玛丽亚·门德尔森那里得到这次逮捕的消息后,立刻起来维护波兰革命者,揭露法国警察当局和沙皇政府警察当局的合伙阴谋。文章发表在1893年1月13日“前进报”第11号“政治评论”栏里,没有署名。编辑部在文章前加了如下的按语:“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我们已经在昨天作了简要的报

道,现在发表的是最有权威人士的来稿”。——第415页。

- 384 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其中包括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

恩格斯把法兰西共和国称做“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是指法国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执政党而言,一个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谓“机会主义派”),它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个是激进派,它是从“机会主义派”当中分裂出来的议会党团,仍继续坚持一些实际上已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抛弃了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1901年,激进派组成为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415页。

- 385 恩格斯指1891年7月在海军上将热尔韦指挥下的法国分舰队对喀琅施塔得的访问(见注254)。——第417页。
- 386 “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一文是恩格斯为了评论1892年12月—1893年1月意大利议会关于罗马银行的舞弊问题进行的辩论而写的,辩论的起因是议员科拉扬尼的发言。在辩论过程中揭露出的丑事涉及一些国家活动家,许多议员、律师、新闻记者和私人,这些丑事被称为 *pana-mino* (小巴拿马)。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当时与他通信的意大利学者、社会党哲学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寄来的材料(议会报告、报纸)。恩格斯考虑到意大利当局正在注意他们的书信往来,于是匿名发表了这篇文章;因为正如他在1893年1月2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指出的,署名可能“使罗马的坏蛋们找到我的意大利报告人的踪迹”。——第418页。

- 387 韦耳夫基金是由俾斯麦个人掌握用来购买报刊的一种特别基金。——第418页。
- 388 “那不勒斯信使报”(《Carriere di Napoli》)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88年创刊。——第422页。
- 389 “世纪报”(《Il Secolo》)是意大利激进派的日报；从1866年起在米兰出版。——第423页。
- 390 “议会报”(《Il Parlamento》)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报纸，从1853年起在都灵出版。——第425页。
- 391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请求，用法文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单行本写的，这个版本由“社会评论”杂志社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译者是庞·贝蒂尼(序言是屠拉梯翻译的)。该书还收有恩格斯为“宣言”1890年德文第四版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是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请求在1893年1月寄给他的。——第429页。
- 392 见注278。——第429页。
- 393 “欧洲能否裁军？”一文是恩格斯于1893年2月间就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出的军事法草案问题而写的。草案规定大大增加军队和追加军事开支的拨款，数量极大的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满，这一点甚至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因此在1893年5月，它被帝国国会的多数所否决。但是在1893年7月，在解散帝国国会和进行了新的选举之后，帝国国会批准了一个类似的军事法草案。
-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倍倍尔请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的立场表示自己的意见。恩格斯在把手稿寄往柏林准备在“前进报”上发表时，在1893年2月24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建议以一组文章(分为八篇)的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它，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893年3月底，这一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恩格斯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专门的序言。
- 恩格斯的这组文章还转载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选民报”1893年3月20、21、23、24、25、27、28和30日的第65、66和68号以及第69、70、71、72

和74号的附刊上。在前面加的编者按语中指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具有普遍的意义。——第433页。

- 394 后备军是德国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1813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在平时,后备军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在战时,后备军用来补充作战部队,以及(年龄较大的后备军兵士)用来担任警备勤务。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奥匈帝国,都仿效普鲁士后备军的样子建立了预备队组织。——第437页。

- 395 法兰克福和约——见注195。

提尔西特和约——见注34。——第438页。

- 396 地方部队从1872年起是法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在战时,建立这种部队是为了担任后方警备和保卫勤务。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参加地方部队服役6年并参加其预备队服役6年。

民军是1813—1814年在普鲁士出现的一种民团。根据1867年的法律,民军应由未曾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的、年龄从十七岁到四十二岁的应征人员组成,并且只是在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438页。

- 397 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早的大会战之一,发生在1870年8月6日,以麦克马洪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失败而告终。

色当会战——见注194。

在1870年8月6日的施皮歇恩(洛林)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溃了弗罗萨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军第二军团。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叫做福尔巴赫会战。——第440页。

- 398 指1893年2月3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中所作的关于未来国家的原则的演说。

在普鲁士军队、后来在德国军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而缓期服役的适龄人员组成的那一部分预备兵员,叫做补充兵;补充兵的服役期在1874年规定为12年,在动员时期它用来补充军队。——第441页。

- 399 指在1867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建立后,黑森—达姆斯塔德(这个公国的一部分领土加入了北德意志联邦)采用了普鲁士的军事制度。——第441页。
- 400 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在普鲁士近卫炮兵旅中服兵役。
库弗尔格拉班是柏林的一条运河,炮兵旅的营房就在运河附近。——第444页。
- 401 恩格斯指他在1860年3月底至4月初因父亲逝世而到巴门去了一趟。——第446页。
- 402 恩格斯举的是1892年11月26日“自由思想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老一套的诡计”,内容是批评新的军事法草案。
“自由思想报”(《Freisinnige 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德国自由思想党的机关报,1855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报纸的领导人是李希特尔。——第451页。
- 403 巴黎公债——见注255。——第458页。
- 404 恩格斯的著作在“前进报”(1893年3月9日第58号)发表时,这一段被删掉了。编辑部代之以用括号括起来的下列按语:“恩格斯这里指出了从前因士兵受到痛苦不堪的虐待而经常引起的那些后果。不论这些材料是多么客观,我们都没有加以登载,因为我们很了解司法当局的做法,它常常把为了提出警告而对事实作客观的叙述看成是故意要引起这种事实的再度发生。”
“前进报”编辑部对文章所做的删节以及促使它这样做的情由都证明,报纸编辑部被恩格斯著作的革命调子吓倒了,因为这个地方直接号召起来反抗对士兵所施加的暴力和专横。在单行本中,恢复了被删去的这一段,而删掉了编辑部的按语。——第461页。
- 405 关于在耶拿的溃败,见注34。——第462页。
- 406 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

- 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敌对阵营,这样终于导致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开始后,意大利退出同盟并于1915年归附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的国家。——第463页。
- 407 1866年8月23日签订的布拉格和约结束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约把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奥地利不得不放弃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斗争并同意成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固定下来。根据和约第五条,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一切权利让给了普鲁士(从奥、普在1864年战争中战胜了丹麦以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一直处于奥普共同占领之下),同时北什列斯维希必须重新同丹麦合并,如果当地居民通过全民投票同意这一点的话。但是普鲁士没有履行和约的这一条款,而把北什列斯维希据为己有。1878年,布拉格和约第五条被宣告废除。——第464页。
- 408 指普法战争时期在1870年9月至1871年1月巴黎被德军围困期间巴黎居民粮食紧张的情况。——第466页。
- 409 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469页。
- 410 恩格斯指的是关于议会议员支薪的法律草案和关于规定平等投票权的法律草案。平等投票权就是每个选民只能投一次票,而不是照当时实行的选举资格限制制度那样,一个选民能投几次票(按其住宅所在地、财产所在地等等)。靠1892年选举上台的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在人民群众要求废除资产阶级和贵族构成的上层社会的特权的压力下,曾提出上述两个法律草案,但都被上院所否决。——第469页。
- 411 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是恩格斯应奥地利5月1日的专刊“庆祝五一节”编辑米·沙赫尔的请求写的,米·沙赫尔在1893年1月14日就这个问题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

- 贺信是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为题发表的。这个专刊还刊载了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以及保·拉法格、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为庆祝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和关于无产阶级节日的文章。——第470页。
- 412 在1892年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取得了巨大胜利,获得了10万张以上的选票。——第470页。
- 413 恩格斯指政府参事查普卡在1893年1月17日奥地利帝国议会会议上承认(在他回答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质询时)地方当局在奥地利的一些地区破坏结社和集会权利的行为是非法的。——第470页。
- 414 这篇短文是恩格斯应捷克社会民主党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ální Demokrat》)编辑部的请求而写的,该报编辑部曾于1893年3月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筹办的五一专刊写一篇短文。这个专刊还刊登了保·拉法格、奥·倍倍尔和其他活动家给捷克工人的贺信。——第472页。
- 415 马克思曾于1848年8月底至9月初到维也纳去了一趟,目的是加强与奥地利民主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促使它们更坚决地同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同时也指望得到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经费。——第472页。
- 416 恩格斯指1890—1893年在比利时开展的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由于在工人党领导下进行了群众性的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1893年4月18日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4月29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作了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限制。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了以年满二十五岁,居住期限满1年作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对某几类的选民,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第473页。
- 417 法国的众议院设在巴黎的波旁王宫。——第474页。
- 418 给西班牙工人的五一贺信是恩格斯应西班牙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

名活动家帕·伊林列西亚斯的请求写的。伊格列西亚斯曾在1893年4月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社会主义者报”五一号写一篇文章。——第475页。

- 419 1808年5月2日,马德里爆发人民起义,反对占领西班牙的拿破仑军队。起义遭到法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但是起义为西班牙人民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奠定了基础。西班牙人民怀念为祖国解放而斗争的战士,每年都要纪念5月2日这一天。——第475页。

- 420 居住在日内瓦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斯托扬·诺科夫把1892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2期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写了这封复信。恩格斯通过诺科夫把信寄给编辑部,编辑部把信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1893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上,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编辑部在恩格斯的信后边写了一篇不长的后记,简要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首先是恩格斯的活动,举出对保加利亚有重大意义的恩格斯的几篇著作。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是一家保加利亚的社会、文学季刊,1892年至1893年在塞夫利厄伏市出版。该刊编辑是日内瓦大学学生斯·巴拉巴诺夫(赫利斯托夫)和克·拉柯夫斯基,他们在瑞士准备好材料,再寄给保加利亚的出版者去发排。该杂志刊载过几篇译成保加利亚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第3期上,除了上述恩格斯的信以外,还刊载了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传记,恩格斯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的一部分,以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三节。该杂志还发表过格·瓦·普列汉诺夫、保·拉法格以及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活动家的文章。

“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试图把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方法传入保加利亚。但是,杂志的出版者们的理论观点不明确,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问题上带来了混乱。编辑部的缺陷是脱离保加利亚的社会政治生活。“社会民主党人”曾反对为在保加利亚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斗争的季·尼·布拉哥也夫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第477页。

- 421 1892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2期刊载了译成保加利亚文的格·瓦·普

列汉诺夫的著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与饥荒的斗争中的任务”。——第478页。

- 422 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恩格斯在1893年8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了演说。恩格斯在欧洲旅行并预先访问了德国之后，来到苏黎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恩格斯以名誉主席的身分宣布代表大会闭幕。

恩格斯的演说当时被广泛地发表在工人和社会主义的报刊上。它的记录发表在1893年8月15日“前进报”第190号附刊和1893年9月1日“工人报”第35号上(略有删节)，同时还发表在1893年9月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55号和其他机关报刊上。

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12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8个国家的411名代表，英国代表团的人数比过去两次代表大会都要多得多，这证明旧工联领导人阻挠英国工人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企图遭到了惨败。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都得同无政府主义者作激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很多，他们不顾早先通过的关于只允许承认政治斗争必要性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迫代表大会一开始就辩论怎样理解“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们企图迫使代表大会接受他们把政治活动看做恐怖行动的理解。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代表大会对早先已经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作了专门的补充，根据这一补充，所谓政治活动，就是工人政党利用政治权利和立法机关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来夺取政权这个补充通过后，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退出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爆发战争时的立场。

在讨论关于庆祝五一节的问题时，代表们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坚持要把庆祝活动改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立场。代表大会认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关于第二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必须结合起来。但

是, 过分地强调争取改良的重要性这一点证明了: 对议会活动的作用的估计是过高了, 改良主义情绪在第二国际的各个党内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关于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代表大会否决了纽文胡斯关于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提案, 并且确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原则, 但作了一点补充: 号召工人为争取裁军而进行斗争, 责成社会主义者议员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第479页。

423 恩格斯指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见注134)。——第479页。

424 见注97和注241。——第479页。

425 恩格斯同倍倍尔一起(在苏黎世代表大会后)从瑞士回去的时候, 在维也纳逗留了几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此于1893年9月11日组织了欢迎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晚会, 据1893年9月15日“工人报”的报道, 大约有六百人出席了晚会。但是想向恩格斯致敬的人比这多得多, 因此又在1893年9月14日举行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大会, 大约有二千人出席。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维·阿德勒、奥·倍倍尔等人)在这次会上讲了话, 最后恩格斯作了演说。

恩格斯的演说的报道, 除载于“工人报”和“新自由报”外, 还载于1893年9月17日“前进报”第219号。——第481页。

426 恩格斯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于1893年7月9日组织的维也纳工人争取普选权大示威。共有四万多人参加了示威。在示威的时候举行了许多工人大会, 在维也纳市政厅大厦里也举行了工人大会。——第482页。

427 恩格斯从瑞士回去时, 在造访维也纳以后来到柏林, 1893年9月16日至28日他都在柏林。他在这里, 也同在维也纳一样, 受到了友好的接待, 恩格斯自己在1893年10月7日给左尔格的信里曾经提到这件事。在此期间警察当局也密切注视着恩格斯的行踪, 保存下来的维也纳警察局和柏林警察局的密探的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

恩格斯的演说是在柏林为欢迎他而在1893年9月22日举行的大会上作的。参加大会的达四千人。9月26日恩格斯出席了同志宴会,威·李卜克内西在宴会上祝酒,指出了恩格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作用。——第483页。

- 428 恩格斯指自己于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兵役。——第483页。
- 429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很大胜利的1893年6月的帝国国会选举。恩格斯在同英国报纸“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见本卷第631—636页)中对这次选举的结果作了评价。——第484页。
- 430 恩格斯在1893年到德国去之前,曾经在1876年8月初到德国去过,当时他是去海得尔堡处理家庭事务。——第484页。
- 431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答谢邀请他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国际代表大会而写的,发表在“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上(一同发表的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活动家的贺信)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杂志“日子”(《ДЪЛЪ》)1894年第4—5册上。

根据日内瓦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小组的倡议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于1893年12月22日至25日在日内瓦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阿尔明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俄国、法国和瑞士等大学生组织的代表共26人。代表大会研究了关于脑力劳动工作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关于反犹太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了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大会还建议在学生中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并决定在日内瓦设立旨在建立和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联系的国际书记处。

“社会主义者大学生”(《L'Étudiant socialiste》)是一家社会主义的双周报,从1891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起初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大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93年年底起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书记处的机关报。——第487页。

- 432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了重印他在1871—1875年写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

- 而写的,这些著作和文章集成单行本文集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Internationale aus dem 《Volksstaat》(1871—75)》)。这篇序言的俄译文最先发表于“知识”丛书:弗·恩格斯“1871—1875年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5页。——第488页。
- 433 卡·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弗·恩格斯的“再论‘福格特先生’”发表在1871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2—330页。——第488页。
- 434 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刊载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上,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1874年]莱比锡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Leipzig [187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21—540页)。——第488页。
- 435 指“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流亡者文献”发表在1874年6月至1875年4月的“人民国家报”上。这篇文章载于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文章的标题“波兰宣言”是作者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上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71—578页)。——第488页。
- 436 指“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载于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79—587页)。文章的标题“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恩格斯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上的。——第488页。
- 437 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法国众议院选举中,选出了5名布朗基主义者:瓦扬、博丹、肖维埃尔、马·桑巴、瓦尔特。——第489页。
- 438 法国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在1880年通过了一项赦免公社社

员的法律(7月11日颁布),这使公社的许多被流放的人和流亡者得以返回祖国。——第489页。

- 439 恩格斯说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是指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即所谓的“机会主义派”(见注384)。——第489页。
- 440 “社会主义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机关报”(《Le Parti socialiste Organ du 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Central》)是布朗基派的一家周刊;1890年至1898年在巴黎出版。——第489页。
- 441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是“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即最后一篇,这篇文章刊载在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0—623页),接着便印成单行本:《Sociales aus Ru land》,Leipzig,1875,恩格斯还为单行本写了一篇不长的导言(同上,第641—644页)。恩格斯把这篇文章连同导言一并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第490页。
- 442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前言(见注434)是恩格斯在1894年1月初把“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见注432)时写的。恩格斯在准备重印“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时,作了许多文字上的修改,并删掉旧的副标题:“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换上新的副标题:“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

在“前言”中,事件的日期有个别小小的疏忽。西班牙宣布共和的日期是1873年2月11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的日期是1873年5月10日。——第492页。

- 443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注441)是恩格斯在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写的。恩格斯在论文集的序(见本卷第490—491页)里说到促使他重印这篇文章并为其写了详细的跋的原因。

这篇跋的俄译文(连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劳动解放社”1894年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

国”里,小册子由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印刷。这本小册子的译文是维拉·查苏利奇同恩格斯商定后译出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小册子写了序。后来这篇跋连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各种名称在俄国一再出版。——第494页。

- 444 恩格斯指彼·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1874年‘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O 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 Verfasser der Artikel 《Flüchtlings-Literatur》 in Nr. 117 und 118 des 《V olksstaat》, Jahrgang 1874. Zürich, T ypographie der T agwacht .1874》)。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彼·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页。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就是答复特卡乔夫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9—609页和第610—623页)。——第494页。

- 445 指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1—3册(A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 lands》. Th. I — III. Hannover—Berlin, 1847—1852)。——第494页。

- 446 亚·伊·赫尔岑给“英格兰共和国”(《The English Republic》)杂志编辑威·林顿的信是他在1854年1—2月写的,并且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林顿的杂志1854年第3卷上。恩格斯所引赫尔岑给林顿的第三封信上的一段是从1885年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第9页转引来的,因此在本版中赫尔岑这封信的文字是照普列汉诺夫书中的那个样子。

赫尔岑给林顿的信的全文,见亚·伊·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国”。——第497页。

- 447 这里所引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杂志短评”,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5期。接下去引的他的另一篇文章“奥·哈

克斯特豪森男爵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7期。两篇文章都收在1879年日内瓦出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5卷,以“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为总标题。在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16—17页上;后面紧接的第二段引文在第15页上。显然恩格斯是从普列汉诺夫的书上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因为这两段引文同该书一样。——第498页。

44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6页。恩格斯在这里引“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时是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俄译文翻译回去的,因此原文中的引文同序言手稿中有关地方的德文稍有出入。——第503页。

44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13—116页。——第504页。

450 指载于1877年“欧洲通报”杂志第9册的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回答这篇文章而在1877年“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在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

“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家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从1866年至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8年以前该杂志的编辑兼出版者是米·马·斯塔修列维奇。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是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20年在彼得堡开始出版;1839年起成为当时最好的进步杂志之一。维·格·别林斯基参加杂志编辑部,亚·伊·赫尔岑等人为它撰稿。从1846年别林斯基退出编辑部后,“祖国纪事”的作用开始下降。从1868年杂志转到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手里以后,“祖国纪事”又走上新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间,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涅克拉索夫逝世(1877年)后,民粹派对该杂志取得了占优势的影响。

“祖国纪事”不断受到书报检查的迫害并于1884年4月被沙皇政府

封闭。——第504页。

- 451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是马克思在该杂志登载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后不久写的。这封信没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副本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杂志第5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504页。
- 452 K. Marx.《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I, Hamburg, 1867, S. 76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及其后各版里删去了这个附注。——第505页。
- 453 以下是引自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的几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29和130页)。——第505页。
- 45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7—18页。——第505页。
- 455 显然是指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党”(1876年秋至1879年秋)和“民意党”(1879年8月至1881年3月)的领导机关;后者曾宣布以恐怖手段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第506页。
- 456 这篇短文同“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一文一样,是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由他整理付印的“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目的是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三卷于1894年秋出版;1894年10月4日恩格斯为它写了序言。看校样花的时间比恩格斯预料的稍微多些。恩格斯在看校样的过程中把副本寄给“资本论”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以便尽快出版第三卷的俄文版,该版于1896年在彼得堡出版。
- 随着“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5卷第1、2分册)的问世,出版马克思这部天才著作的所有理论性各卷的工作宣告完成,从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所有部分也宣告完成,同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获得坚实的科学基础。

短文除载于“前进报”外,还载于1894年1月14日“社会政治中央

- 导报”(《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第16期上。——第511页。
- 457 恩格斯本来打算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加以出版,但这种意图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实现。1905—1910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对作者的手稿作了许多随意的改动、挪动和删节。直到1954—1961年才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完成了符合于马克思的计划和作者手稿的材料排列次序的新版“剩余价值理论”。见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第1分册(1954年莫斯科版)、第2分册(1957年莫斯科版)、第3分册(1961年莫斯科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6卷。——第511页。
- 458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库利绍娃和屠拉梯的请求写的,库利绍娃和屠拉梯在1894年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请恩格斯就当时意大利国内所酝酿的革命危机谈谈党的策略问题。这篇文章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发表在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上,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屠拉梯的译文有几处同恩格斯的手稿有出入。
- 这篇文章还载于德国报纸“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7月12日第24号,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意大利的状况”。
- 收在本版的恩格斯这封信,是根据用法文写的并发表在由费耳特里内利学院在米兰出版的1958年“年鉴”上的手稿译的。除了誊清稿以外,草稿也保存下来了。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在它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草稿。
- “社会民主党人”(《Der Sozialdemokrat》)是一家德国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1894年至1895年在柏林出版。——第514页。
- 459 恩格斯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9页)。——第514页。
- 460 “改宗的”共和主义者指意大利激进派,其领袖是费·卡瓦洛蒂。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在许多场合都同社会主义者趋于一致。——第515页。

- 46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页和第502页。——第515页。
- 46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9—130页。——第516页。
- 463 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机械工阿尔伯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更不用说“民主主义者部长们”了)只是资产阶级政府可怜的装饰品而已。
- “改革报”(《La Réforme》)是一家法国的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許多文章。——第517页。
- 464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3月25日至31日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争取普选权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写道:奥地利工人将用包括总罢工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争取普选权。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党章,并且决定继续每年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劳动者国际兄弟情谊的示威游行来庆祝五一节。——第520页。
- 465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邀请他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写的。这一邀请是“工人新闻”编辑赖施在1894年4月30日的信中向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的复信来晚了,因此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信才在报纸上发表。
-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于1894年5月13—15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工党在代表大会上实行了统一;社会民主工党是由1893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382)上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去的该党革命派于1894年1月成立的。统一是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机会主义者(以前在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中占压倒优势的全国工人患病和残废保险基金会的官吏)被排除出领导地位。但是在统一起来的党的执行委员会里,旧社会

民主党的代表占了一半,这些人虽然不是保险基金会的官吏,但仍然持温和的立场。

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代表大会提出把争取普选权作为最近的政治任务,并强调了工会在工人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党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结成联盟的必要性。但是没有注意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第521页。

- 466 恩格斯指的是1894年4月22日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事件。在这个城市和临近地区内,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处于极其艰难条件下并长期遭受失业痛苦的农业工人和贫农中间进行了争取保护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积极宣传。在这个城市里组织了一个计有两千会员的农业工人和贫农联合会。1894年4月21日,警察当局没收了联合会的宣传品,4月22日又逮捕了工人领导人亚·散托·科瓦奇。同一天,警察和军队在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开枪射击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散托·科瓦奇的工人。农业工人和贫农联合会被解散,散托·科瓦奇及其许多拥护者被判处徒刑。——第521页。

- 467 恩格斯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是科学无神论的基本著作之一,是恩格斯对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质问题多年研究的成果。据恩格斯自己说,从1841年起他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页)和“启示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7—13页)两篇文章里,已经部分地论述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

本文是为“新时代”杂志写的,发表在该杂志1894年第1期和第2期上。这一著作当恩格斯在世时还用法文在1895年4月和5月“社会发展”杂志第1期和第2期上刊登过,是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是在1906年。

“社会发展”(《Le Devenir social》)是一家法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95年至1898年在巴黎出版。——第523页。

- 468 安·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第108页(A. Menger. 《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 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Stuttgart, 1886, S. 108)。对该书的批判, 见“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95—516页)。——第525页。
- 469 恩格斯指的是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的领袖是伊斯兰教传教士穆罕默德·阿罕默德, 他自称为“马赫迪”, 即“救世主”。起义于1881年开始, 1883—1884年获得卓越的胜利, 几乎全部国土都从七十年代开始侵入苏丹的英国殖民军队手中解放了出来。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统一的马赫迪国家。只是到了1899年, 英国殖民军队利用这个国家由于不断打仗和发生部落纷争而造成的内部削弱, 同时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 才征服了苏丹。——第526页。
- 470 塔博尔派是十五世纪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捷克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他们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在塔博尔派中间, 以宗教形式传播着确立财产平等的号召, 他们并曾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塔博尔派, 是击退教皇和德国皇帝对捷克进行的五次十字军征讨的胡斯派军队的核心。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的叛卖行为——屡次反对塔博尔派并同外国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妥协来对付他们, 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 胡斯派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第526页。
- 471 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年巴黎版第1—8卷(E. Renan. 《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Vol. 1—8, Paris, 1863—1883)。——第527页。
- 472 恩格斯从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话, 并不符合于肖特的译文, 而是符合于奥·鲍利译的这篇作品的德译文[见“琉善文集”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13卷第1618—1620和1622页(《Lucian's Werke》. Bd. 13, Stuttgart, 1831, S. 1618—1620 und 1622)]。——第527页。
- 473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11—14和16章。——第528页。

- 474 恩格斯指的是威廉·魏特林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支部。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讲述了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14—232页)。——第529页。
- 475 格·库尔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年日内瓦版第Ⅷ、Ⅸ页(G. Kuhlmann. 《Die Neue Welt oder das Reich des Geistes auf Erden. Verkündigung》. Genf, 1845, S. Ⅷ und Ⅸ)。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穿了库尔曼的“预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629—640页)。——第529页。
- 476 “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的宗教派别。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个宗教派别是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第530页。
- 477 杜宾根神学学派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创立的一个研究并批判圣经的学派。这一派人批判新约诸书中的矛盾和历史谬误,但又力图把圣经里的某些说法作为符合历史的东西保留下来。可是这些从事研究的人无意中使圣经的威信受到破坏。——第531页。
- 478 对新约的批判,见布·鲍威尔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批判”1840年不来梅版(《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s Johannes》Bremen, 1840)、“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I—II, Leipzig, 1841);此书第3卷用“复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nes》)的名称于1842年在不伦瑞克出版。在宗教史文献中把前三部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称为复类福音作者。——第531页。

- 479 斯多葛派哲学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的,一直存在到公元六世纪。这个哲学派别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斯多葛派特别注意道德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的问题用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加以解释。他们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532页。
- 480 指康莫迪安的著作“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Carmen apologeticum adversus Judaeos et gentes》)——第533页。
- 481 喀巴拉(希伯来语,意为传统、传说)是一种对古老的“圣”书经文进行解释的神秘而具有巫术成分的方法,即对一些词和数码赋予特殊的象征性含义。这种办法曾流行于犹太教徒中间,后又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第533页。
- 482 诺斯替教派——诺斯替教的信徒。诺斯替教是公元一至二世纪时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的、犹太教的、各种多神教的以及唯心主义的希腊—罗马哲学的某些成分结合而成。诺斯替教的基础是关于“诺斯”(古希腊语,意为“真知”)的神秘学说——通过世界的神的始源的启示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派的特点在于强调物质是罪恶的,宣传禁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神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斥诺斯替教为异端,对诺斯替教派进行了残酷斗争,把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销毁。——第534页。
- 483 塔西佗“编年史”第12篇第52章和“历史”第2篇第62章。——第534页。
- 484 西维拉占语集——据传为古代一游方“女预言家”(库马城的西维拉)所作,在古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过很大作用。——第534页。
- 485 尼西亚宗教会议——第一次所谓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世界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是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的。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的信条(正统基督教会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从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可

- 以看出,教会和国家紧密联合了起来,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第535页。
- 486 E Renan 《Saint Paul》 Paris, 1869. 此书为勒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著作(见注471)的第四卷。——第538页。
- 487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5卷第28—30章。——第547页。
- 488 E Renan 《L'Antechrist》 Paris, 1873. 此书为勒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著作(见注471)的第四卷。——第549页。
- 489 曾德—阿维斯陀 是十八至十九世纪时对阿维斯陀使用的不正确的名称。阿维斯陀是流行于古波斯、阿捷尔拜疆、中亚细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教义是善与恶在世界上的斗争这种二元论观念。阿维斯陀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九世纪直到公元三至四世纪。——第550页。
- 490 指公元前六世纪的所谓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者叫做“巴比伦之囚”)。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97年攻占耶路撒冷和公元前586年最终灭掉犹太王国以后,犹太贵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强制移居巴比伦。公元前六世纪三十年代,波斯皇帝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才准许大部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第550页。
- 491 雅·菲·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册出版于1830年,第2册出版于1836年(J Ph Fallmerayer 《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Erster Theil—1830, Zweiter Theil—1836)。——第550页。
- 492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图鲁森所编的古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关于多神教诸神和英雄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 and 民族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第552页。

493 给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的信是恩格斯根据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在1894年7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提出的请求而写的。恩格斯还把内容相同的信寄给了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1894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马德里举行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党的一个重要阶段。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和出席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3年)的代表的报告,讨论了关于党的报刊问题和批准了新党章。代表大会收到了英国、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贺信,这是党的国际联系增长的标志。——第553页。

494 1893年9月4—9日在拜尔法斯特举行了英国工联第二十六届年度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就是承认(在工联普通会员中革命情绪增长的影响下)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原则,和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第553页。

495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是由一批英国社会主义者于1890年在恩格斯的参加下成立的。它是1890年在英国组织第一次五一示威游行(见本卷第69—76页)的一个委员会为基础建立的。同盟的宗旨是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等。1893年,同盟的代表参加了独立工党。

社会民主联盟——见注104。

独立工党是1893年新工联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弗·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社会民主联盟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

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

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和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工联代表大会委员会——见注332。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见注99。——第554页。

- 496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意大利劳动社会党活动家之一卡浴·德拉瓦勒于1894年8月30日写信邀请他参加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写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原定于1894年9月7—9日在伊莫拉举行，由于警察当局的禁止而未开成。

恩格斯的贺信以及代表大会收到的其他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保·拉法格、帕·伊格列西亚斯等）的贺信，曾经在1894年9月10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过，后来又载于1894年9月22—23日“阶级斗争”周报第38号。

意大利劳动社会党是1892年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893年采用这个名称，1895年起称做“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坚决地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线，而在九十年代，虽然犯了一些改良主义性质的错误，还是积极地领导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Lotta di classe》）是一家意大利周报，意大利劳动社

会党的中央机关报；1892年至1898年在米兰出版。——第555页。

- 497 恩格斯指1894年7月14日意大利议会通过的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非常措施的法令。这个法令是作为似乎只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而颁布的，但反动的克里斯比政府利用它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党人日益增长的影响。根据这一法令，意大利劳动社会党被禁止活动，工人组织被解散，工人报纸和杂志被禁止出版；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和审讯。但是，意大利社会党人不顾残酷的镇压，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斗争，他们于1895年1月在帕尔马秘密举行了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555页。

- 498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西西里岛社会党活动家之一科耳纳哥在1894年9月18日的信中向他提出的请求而写的。科耳纳哥在信里告诉恩格斯说，西西里岛社会党将不顾残酷迫害而进行改组，1894年10月初将恢复出版它的报纸“社会正义”（《Giustizia sociale》），他写道：“您，我们著名的导师，能不能给我们寄来几句表示赞同和同情的话。您能不能给西西里岛社会党寄来一封贺信，供我们在我们报纸的第1号上发表。您的支持将使我们在资产阶级面前具有更大的力量。”

恩格斯的贺信看来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只是到1895年6月30日才在作为“社会正义”报后继者的“解放”周报上发表。这封贺信还从“解放”周报被译成德文（略有删节）发表在1895年8月1日“工人报”第208号上。

恩格斯逝世后，他的这封信被再次用意大利文载于1895年8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16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对意大利的最后一话”，同时（略有删节）用德文以“恩格斯对工人的最后一封贺信”为题载于1895年8月13日“萨克森人民报”（《Sächsisches Volksblatt》）第95号。

“解放”（《La Riscossa》）是一家周报，西西里岛社会党的机关报；1894年至1895年在巴勒摩出版。——第557页。

- 499 这封信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的请求（由屠拉梯在1894年10月24日的信中提出）写的。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请求恩格斯在“社会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为了替政府镇压意

大利社会党人辩护而对意大利社会党人的活动散播的造谣中伤。

恩格斯的信载于1894年11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21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同时编辑部还加了如下的按语:“我们把全世界所有社会党的元老寄给我们的这封信奉献给已经卖身投靠或者正在卖身投靠的意大利报刊的鄙陋诡计。”恩格斯的信在“社会评论”发表之后,还从意大利文译成德文以“可怜的诡计和谎言”为题作为通讯发表在1894年11月6日“工人报”第89号,以“意大利”为题作为通讯发表在1894年11月10日“前进报”第263号。——第559页。

- 500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了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来说,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党人的1893—1894年的所谓“恶毒法”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纲领的绪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论点有一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见本卷刊载的“法德农民问题”。——第561页。

- 501 恩格斯指1894年11月10日“前进报”第263号发表的“再论党代表大会”一文。这篇文章对利用福尔马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机会主义言论来诬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科伦人民报”

(《K ölnische Volkszeitung》)进行了回击。——第561页。

- 502 “法德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它是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为“新时代”杂志撰写的。促使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言论,首先是他在1894年10月2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纲领的补充报告(见注500)。福尔马尔在说明他所建议的措施时,引述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仿佛那个纲领真是得到恩格斯赞同的。恩格斯对这种说法先已驳斥(见本卷第561—562页),但他认为有必要专门写篇文章来阐述在农民问题上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基本原则,有必要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以及在马赛代表大会(1892年9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9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加以批判。

恩格斯的文章不仅是对德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的打击,而且是对国际机会主义的打击。在恩格斯的批评的影响下,在1895年举行的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之前的辩论中以及在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的立场,其中包括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受到了谴责。但是,后来由于第二国际各党机会主义倾向增长,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问题的观点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被土地问题上的各种庸俗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观念所偷换。弗·伊·列宁坚决反对了这些观念,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恩格斯生前,“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曾转载于波兰杂志“黎明”1894年第12期,标题是:“农民问题”。

1903年2月,弗·伊·列宁为了准备在巴黎社会科学俄文高等学校作土地问题的讲演,曾把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565—569页)译成俄文(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的手稿已公布,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9册第295—300页)。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和某些个别的段落,本版基本上采用了列宁的译文。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一个俄文单行版本由格·瓦·普列汉诺夫校订并写序言,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第563页。

- 503 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

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原因是国内农民运动有了高涨,并且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但是,纲领也包含了许多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与私有者情绪、甚至对它的富裕阶层的剥削意图作了某些让步。在党的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对纲领的补充里,更加深了这些反映了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的错误。——第569页。

- 504 恩格斯提到的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第583页。

- 505 未署名的短文“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是恩格斯为答复“前进报”编辑部于1894年11月14日该报第266号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而写的,那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报道,对第四卷手稿的性质作了不正确的说明,并且毫无根据地猜测恩格斯放弃了出版第四卷的意图。

关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一著手稿的命运,见注457。——第588页。

- 50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4卷第4页和第7页。——第588页。

- 507 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祝贺“工人报”从1895年1月1日起改为日报(在这以前它每星期出两次)而写的。恩格斯寄给阿德勒的这封贺信载于1895年1月1日“工人报”第1号的“每日出版的‘工人报’”这篇通讯里。同时在贺信前面加有一段编辑部的如下按语:“我们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要求我们向奥地利工人转达他对奥地利工人每日出版的报纸表示的祝贺,接着他说”(接下去就是贺信原文)。——第590页。

- 508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

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写的。

从1895年3月6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是政府在1894年12月间向帝国国会提出的,1895年1月至4月间进行了讨论;同年5月该草案被否决)。

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1895年3月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结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版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做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

那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企图根据这一著作把恩格斯说成是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者。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保卫者。感到非常愤懑的恩格斯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了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进报”在发表导言上的这种不光彩做法告诉了他。

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专门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不再存在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险之后,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被发表。

可是,即使经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

质。要用改良主义精神来解释这个文件,就必须粗暴地伪造恩格斯的观点,就像爱·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在恩格斯逝世后所做的那样。伯恩斯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不让读者看到导言的全文,他们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观情况并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他们通过这一切办法做出诽谤性的断言,说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他们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中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几乎站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以虚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

恩格斯的导言曾经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登载在1895年“社会评论”杂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亚“事业”(《Дело》)杂志第1册上。

1930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第591页。

- 509 恩格斯在1895年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单行本时,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1、2和3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从1848到1849年”一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收入这个单行本作为头三章(恩格斯这里提到的也就是这几篇文章),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5、6两期合刊编写的“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页)中马克思所写的关于法国部分作为第四篇文章或第四章。恩格斯所引的这两句话取自述评中收入马克思著作单行本中作为第四章的那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4页)。——第593页。
- 5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593页。
- 5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7页。——第594页。
- 512 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萨克森森林。——第594页。
- 513 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

正统派 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 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两个保皇集团组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第598页。

514 关于“民族原则”,见注14。——第599页。

515 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见注195)的条款付给德意志帝国的50亿法郎赔款。——第600页。

516 普选权在西班牙从1868年(1868—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实施,并经1869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1873年宣布成立,到1874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第601页。

517 恩格斯援引马克思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这个纲领是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页)。——第602页。

518 1870年9月4日,在得到关于法军在色当溃败(见注194)的消息后,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

1870年10月31日,在得到关于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败和梯也尔根据国防政府的委托开始同普鲁士人进行谈判的消息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后,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和决定在11月1日进行公社选举。但是政府利用了巴黎革命力量组织性差的情况和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借助于国民自卫军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营,违背自己关于辞职的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

对这两个事件的评述并见本卷第220页。——第606页。

519 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在1809年7月5—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

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在1815年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仑同盟的最终胜利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垮台。——第607页。

520 见注416。——第608页。

521 恩格斯指梅克伦堡-施韦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政权和贵族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以1755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的贵族获得对自己过去的优惠和特权的确认,争取到自己的一半土地以及商业和手工业可以免税,自己在国家开支中的那部分可以固定下来,并且巩固了自己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第608页。

522 见注249。——第610页。

523 暗指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和几个德意志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在1866年归并于普鲁士。——第610页。

524 独立工党(见注495)执行委员会曾于1895年4月16日发信邀请恩格斯参加社会主义者五一联欢会。——第614页。

525 恩格斯于1892年4月1日对法国“闪电报”记者艾·马萨尔发表了谈话。4月3日,恩格斯审阅记者的记录,差不多完全把它改写了。1892年4月4日,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信里提到这次谈话,他说,如果该报任意改动经他审阅后的文字,他将反对记者的做法。谈话在4月16日转载于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由此可见,恩格斯显然认为发表出来的文字是符合他答记者问的内容的。谈话发表在“闪电报”上的标题是:“无政府主义。同德国社会党人恩格斯的谈话”;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标题是:“饥荒造成的和平”(最后两段被删掉)。

本版所载的谈话,删去了记者加在前边的按语和后边的评论。

“闪电报”(《L'Éclair》)是一家法国资产阶级日报,从1888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第617页。

526 指1892年2月25—27日柏林失业工人的发动。——第617页。

527 见注254。——第618页。

528 见注258。——第620页。

529 恩格斯用圣西门关于英、法、德三国人民合作的思想(见注128)来对比作为军事政治集团的三国同盟(见注406)。——第622页。

530 恩格斯于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5月17日恩格斯告诉左尔格可以在“费加罗报”发表的谈话里看到他对德国局势的看法,恩格斯把剪报随函邮去,但附带说明,他答记者问的这份记录,“像任何的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一般的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

访问记以“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谈话”为题发表在“费加罗报”。它还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1893年5月20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0号。

“费加罗报”(《Le Figaro》)是法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从1854年起在巴黎出版。——第624页。

531 指1893年5月6日帝国国会对军事法草案(并见注393)的否决,该草案规定在1893—1899年期间把和平时期的军队兵员人数扩充8万人以上并追加军费拨款。当天政府解散了国会,随后决定在1893年6月举行改选。——第624页。

532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8)中反对军事法的一部分人。——第624页。

533 意指六十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的所谓宪制冲突(见注234)。——第625页。

534 见注416。——第626页。

535 见注74。——第627页。

536 恩格斯就6月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成功,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话除发表在上述

英国报纸外,还以删节的形式发表在1893年7月1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8号,全文发表在1893年7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14期。载于“每日纪事报”的谈话,标题是:“德国选举。恩格斯先生的谈话”;“社会主义者报”的标题是:“弗·恩格斯和德国选举”;“社会评论”的标题是:“同弗·恩格斯交谈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第631页。

537 指自由思想人民党,该党于1893年5月由于德国自由思想党分裂而组成。后者由于党内在对军事法草案的评价上有分歧,于1893年5月6日帝国国会解散的当日发生分裂。该党议会党团中,以李凯尔特和巴尔特为首的一部分支持政府,组成一个叫自由思想同盟的党,议会党团中以李希特尔为首的另一部分,反对增加军费开支并反映了该党激进分子的情绪,把自己称为自由思想人民党。——第631页。

538 关于社会民主联盟,见注104。——第633页。

539 关于费边社,见注495。——第633页。

540 1893年5月被否决的军事法草案,稍经修改后,又由政府提交帝国国会批准,并于1893年7月15日为新的帝国国会所通过。

新的军事法使政府能够增加军事拨款并且使政府不再是要隔七年(如1874年、1880年、1887年的七年期限法),而是只要隔五年就可以增加军事预算,因此世称“五年期限法”。——第633页。

541 恩格斯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宣言是马克思写的,但是其中包括有恩格斯的材料,这些材料驳斥了普鲁士容克和德国资产阶级对阿尔萨斯—洛林的贪求,以及为此提出的军事战略上的论据。——第634页。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90年1月—1895年8月)

1890

- 1—12月 恩格斯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继续从事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这项工作他早在1885年就已开始,一直继续到1894年春天。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某些篇章进行了修改加工,把个别的章节重新写过,还根据他自己的研究做了许多补充,对文字作了总的校订。
- 1—3月 由于法德之间矛盾尖锐化,法俄有相互接近的迹象,以及爆发全欧战争的危险日益增长,恩格斯从事研究欧洲的国际局势。他结束了在1889年12月开始撰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该文是为起初在伦敦出版而后在日内瓦出版的“劳动解放社”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写的。该文的俄译文于1890年发表在这家杂志的第1册(2月)和第2册(8月)上;德文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作者还把它译成英文,于4月和5月发表在社会主义者贝·巴克斯主编的伦敦“时代”杂志上。
- 1月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英国非熟练工人的政治积极性的高涨,以及那些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新工联的活动;他直接帮助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

- 思·艾威林、爱·艾威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给德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海·施留特和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奥·倍倍尔的信中指出,这些工联同那些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旧工联完全不同,它们是按无产阶级团结精神进行活动的,它们的进一步发展能够使工联代表大会摆脱改良主义者的领导。
- 1月11日—2月8日 恩格斯在给施留特、给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弗·阿·左尔格,以及给倍倍尔的信中,赞同1889年秋天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开除它原先的一批领导人——那些执行宗派主义政策的德国流亡拉萨尔主义者。他把这件事看做是美国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
- 1月28日左右—5月25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资本论”的俄译者之一、民粹派经济学家尼·弗·丹尼尔逊的好几封信,信中报道了俄国的经济情况。
- 1月底—2月8日 恩格斯阅读英国费边社的创建人之一悉·维伯寄给他的一本书“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研究”,认为这本书企图根据庸俗的经济学理论推翻马克思的学说,并且企图证明能够通过改良主义道路、通过同资产阶级妥协来实现社会主义思想。
- 1月底—2月中 恩格斯根据报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信件研究德国在2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前夕的国内局势。
- 2月17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分析2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众议院复选的结果,他指出,同保皇党和军界相勾结的布朗热主义者的当选,是沙文主义思想在巴黎工人中传播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同这种沙文主义情绪进行斗争,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 2月21日—4月12日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重大胜利,恩格斯在为报纸写的两篇文章中,以及在给左尔格的信中,给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保·拉法格的信中,给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和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选举标志着俾斯麦统治完结的开端,并将加强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恩格斯特别强调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业区所取得的某些成就的意义。
- 恩格斯关于选举结果的文章,一篇于3月3日不署名发表在英国“新堡每日纪事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栏,另一篇于3月8日用“今后怎样呢?”的标题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3月20日和31日之间 恩格斯审阅载于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第十三版第六卷上的一篇他的传记,并为该辞典的第十四版补充和修改了这篇传记。
- 3月底—4月初 恩格斯阅读小册子“论社会主义”和“论历史哲学”,这是小册子的作者意大利社会主义哲学家安·拉布里奥拉寄给他的;他在给拉布里奥拉的信中给予第一本小册子以好评,对第二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恩格斯也把自己的著作“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寄给了他。
- 3月30日 由于在意大利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刊物上就政府关于在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建立巨型的资本主义庄园的提案展开了辩论,恩格斯写信给翻译过他的许多著作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帕·马尔提涅蒂。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金融巨头和大股份公司
- 对殖民地的奴役。这封信的一段于4月16日发表在社会主义杂志“激情和批评”(《Cuore e critica》)上。

- 4月1日 恩格斯得悉“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约·狄茨和该杂志的一个编辑、机会主义者威·布洛斯在4月份的“新时代”上发表他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第一章时作了很大的歪曲,他向狄茨提出坚决的抗议;恩格斯的文章按手稿重新发表在该杂志的下一期即5月号上。
- 4月3日 恩格斯写信给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劳动解放社”的成员维·伊·查苏利奇,感谢她寄来载有他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一章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他就此强调说,揭露沙皇政府的外交,对俄国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 4月9日 恩格斯在收到荷兰社会主义者斐·多·纽文胡斯关于荷兰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之后,写信给他,对荷兰社会主义者的成就表示满意,并且告诉他关于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的进展情况。
- 4月17日 恩格斯曾收到查苏利奇的信,信中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4月5日发表的俄国民粹主义者P·别克的一篇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其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表示不满,恩格斯在回信中建议查苏利奇和她的同道者在该报驳斥别克。恩格斯建议查苏利奇和其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积极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撰稿,以便加强俄国社会主义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查苏利奇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写的一篇答别克的文章,发表在4月26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4月19日 奥地利的一个职员伊·埃伦夫罗伊恩德要求恩格斯表示他对反犹太主义的态度,恩格斯写信给他,揭露了反犹太主义的反动本质。这封信于5月9日发表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工人报”上。

- 4月底—5月初 恩格斯积极参加根据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伦敦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的准备工作,游行和大会的口号是争取在国际范围内以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他把准备工作的情况告诉左尔格,同时还向他报道了在工人群众当中进行社会主义鼓动的成绩;给左尔格的信中谈伦敦示威游行准备工作的那部分,发表在美国社会主义派机关报“纽约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tung》)和“工人辩护士报”(《Workmen's Advocate》)上。
- 5月1日 恩格斯为经作者同意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写序言,序言简单地回顾了1848年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序言刊载在5月于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中。
- 5月4日 恩格斯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他后来在给倍倍尔和劳·拉法格的信中,以及在“伦敦的5月4日”一文中叙述了自己的感想。恩格斯把首次举行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看做是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检阅;他指出奥地利的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成功,他认为伦敦的成千上万人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胜利。文章发表在5月23日的“工人报”上。
- 1890年5月底—
1891年6月上半月 恩格斯从事(断续地)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的准备工作;为此他阅读了新的书籍,其中有俄国社会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法文本)和“俄国现今的风俗和古代的法律”(英文本);他对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对家庭那一章,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改正了一些不确切的地方;第四版于1891年10月底—11月初出版。

- 6月5日 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的领导者之一保·恩斯特的复信中,坚决反对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
- 6月10日 恩格斯写信给丹尼尔逊,对于伟大的俄国学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吊唁。
- 6月25日 恩格斯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写序言。
- 7月1—26日 恩格斯同他的朋友、著名的德国化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卡·肖莱马一起在挪威旅行。
- 约7月9日—9月22日 恩格斯同原先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波兰革命者、巴黎公社的将领瓦·符卢勃列夫斯基通信,并给予他物质帮助。
- 8月—10月初 恩格斯十分重视预定于10月在哈雷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他在给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信中指出,必须同“青年派”作斗争,因为它对党的领导进行了蛊惑性的批评。恩格斯还阅读了党的章程草案,批评了它的个别论点,强调指出,国会党团实际上凌驾于党的执行委员会之上,是不能容许的。
- 8月5日、9月21—22日和10月27日 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康·施米特和德国大学生约·布洛赫,他们二人曾请求他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原理;恩格斯在信中批评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的人,这些人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的唯一动力;恩格斯解释说,经济基础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上层建筑也影响历史的进程和经济本身的发展。
- 8月14日左右—9月12日 恩格斯在福克斯顿(英格兰的南海岸)休养。

-
- 9月初 恩格斯注意9月1日到6日在利物浦召开的英国工联的应届代表大会的进程。大会违反工联领导者们的心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恩格斯认为这是新工联的影响显著增长的一个证明。
- 9月7日 恩格斯答复“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上的一篇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说什么“青年派”对党的领导路线的评价是同恩格斯的观点相符合的。恩格斯坚决驳斥这种说法，认为“青年派”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歪曲。答复发表在9月13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9月9日左右—10月中 恩格斯积极参加定于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家广泛地通信。恩格斯认为有可能召开一次有可能派参加的统一的代表大会，他表示深信，在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必定是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恩格斯的提议被各国社会主义者会议全部接受，这个会议是根据他的建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0月中在哈雷举行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
- 9月12日和18日之间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机关报）停刊，恩格斯给该报读者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提到该报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这封信发表在9月2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10月1日 恩格斯写“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文章严厉斥责“青年派”又企图假借恩格斯的威望来反对党的领导。文章于10月5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柏林人民报”上。

- 10月11—19日 恩格斯密切注意10月11日和12日在利尔举行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进程,以及10月13日至18日在加来举行的法国工团(工会)代表大会的进程。这两个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有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恩格斯认为这两个代表大会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标志。恩格斯把两个代表大会的情况通知左尔格,并且告诉他,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集团——可能派——已经分裂为两派,一派由让·阿列曼领导,一派由保·布鲁斯领导。恩格斯指出,这两派都处于瓦解状态。
- 10月12日和19日之间 恩格斯整理1836年至1864年马克思的通信。
- 10月中 恩格斯根据报纸的报道和李卜克内西、爱·马克思-艾威林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理·费舍等人的来信,密切注意从10月12日至18日在哈雷举行的这个党的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恩格斯在给左尔格和劳·拉法格的信中对代表大会的结果表示满意,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并且通过决议,要在1891年党的下届代表大会以前拟定新的党纲。
- 10月25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波兰社会主义者路·克尔日维茨基寄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波兰文译本。
- 11月5日 恩格斯告诉左尔格关于自己的朋友和马克思家的亲密朋友海伦·德穆特逝世的消息。
- 11月27日—12月初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保·辛格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到伦敦去祝贺他的七十寿辰的。根据恩格斯的倡议,他们会见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爱·马克思-艾威林、约·白恩士、威·梭恩和罗·肯宁安-格莱安。
- 11月28日 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政党和组织庆祝恩格斯的七

- 十寿辰。他收到这些党和组织以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某些活动家寄来的大量贺信。
- 1890年12月—1891年2月 由于出版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路·布伦坦诺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恩格斯从事撰写“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这部著作，在其中彻底揭穿了布伦坦诺诽谤马克思对科学采取不诚实态度的谎言，这本小册子于1891年4月出版。
- 1890年12月—1891年1月6日 由于拟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以及就这个问题在党的刊物上展开了辩论，恩格斯整理发表马克思于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的手稿。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给拉萨尔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最完备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发表这个纲领性的文件是自己的义务，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党制定一个真正革命的、有科学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帮助党同党内猖狂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这一著作连同恩格斯的序言一起于1891年1月底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 12月上半月 恩格斯回答法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译者福尔坦的请求，同意在法国报纸“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这一著作；该报从1891年1月至11月发表了这一著作。与此同时，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在可能派贝·马隆主编的法国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转载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企图。
- 12月2—3日 恩格斯写信给“柏林人民报”、匈牙利社会主义报纸“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的编辑部以及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和个别的人，信中对他们在他七十岁诞辰时的祝贺表示感谢，同时指出马克思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些信发表在12月5日的“柏

林人民报”、12月14日的“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12月2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12月25日 恩格斯写信给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列·弗兰克尔,说明法国工人党和可能派之间斗争的原因;恩格斯指出,只有使可能派的领导者们孤立,才能消除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同时告诉弗兰克尔,正在准备召开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91

1月 恩格斯从左尔格那里和其他方面得悉,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者们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之间发生了冲突,后者宣称,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不得加入劳联,并建议党员以个人资格通过工会参加劳联;恩格斯收到劳联的领导者、改良主义者赛·龚帕斯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恩格斯在给施留特尔的信中批评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者们的态度,他们拒绝劳联的建议并且企图把党同美国工人的这个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对立起来,恩格斯认为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它将在客观上加强改良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1月10日左右—2月1日 恩格斯不止一次地会见被逐出巴黎的波兰流亡社会主义者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和他的妻子玛丽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门德尔森写信给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正义报”,提请英国社会主义者警惕沙皇暗探局在伦敦的两个暗探可能进行挑拨离间。这封信经恩格斯校阅过,发表在1月24日的“正义报”上。

1月底—4月 恩格斯积极参加庆祝五一节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同法国、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广泛地通信。

-
- 1月31日和4月22日之间 恩格斯不断收到拉法格夫妇关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详细报告。他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赞成工人党对可能派所采取的策略：不为表面上的统一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但是也不拒绝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实际的合作。
- 2—10月 恩格斯系统地阅读“前进报”，该报从1月1日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给倍倍尔和党的其他活动家的信中，他批评编辑部的动摇和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
- 2—4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经常不断地帮助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等英国社会主义者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而斗争。
- 2月5日—4月8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几个领导者、特别是该党国会党团的大多数不赞成在“新时代”上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而在该党内引起了辩论，恩格斯就这一辩论同“新时代”杂志的编辑考茨基，同左尔格、施留特、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通信。恩格斯在信中说明发表这一著作的必要性。
- 2月20—27日 恩格斯和费舍通信，因为后者建议再版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法兰西内战”；恩格斯认为这些著作的传播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同意把这些著作再版。
- 2月20日和3月6日之间 恩格斯阅读拉法格关于在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剩余价值理论的文章手稿，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
- 3—11月 恩格斯很想帮助在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和马尔提涅蒂通信，商谈有关在意大利出版自己的著作的问题。

- 3月4日—10月2日 恩格斯校订由法国社会主义者昂·腊韦译的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译本的一部分译稿,恩格斯还审阅由劳·拉法格校订过的那部分译稿。
- 3月7日 恩格斯写信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菲·屠拉梯,同意把自己的某些著作译成意大利文,并且编入计划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丛书。该信于3月10日发表在地意大利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评论”上。
- 3月17日 恩格斯写信向法国工人祝贺巴黎公社二十周年,他表示深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贺信发表在3月2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 3月18日 恩格斯完成了为他所准备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写导言的工作,预定用这篇导言来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在这篇旨在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导言中,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把资产阶级国家与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的巴黎公社相对比。导言发表在3月的“新时代”杂志上和5月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
- 3月21日 恩格斯写信给施留特尔,感谢他报告关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恩格斯批评该党的领导继续对“劳动骑士团”和美国的其他的群众性工人组织采取宗派主义路线。
恩格斯把2月底至3月初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寄给左尔格。
- 3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领导人霍·梅萨,回答他关于用西班牙文出版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请求;恩格斯在信中表示同意,而且指出同西班牙的也是以蒲鲁东主义形式传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 的影响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年夏天出版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以这封信作为序言。
- 3月25日和5月15日之间 恩格斯和拉布里奥拉通信,拉布里奥拉告诉他一些关于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情况,其中包括在罗马庆祝五一节时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件。
- 4月初 肖莱马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 4月9日 恩格斯在回答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邀请他出席定于4月12日在米兰举行的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信时,写了一封贺信,信中指出国际工人运动的成就。
- 4月10日和15日之间 恩格斯把自己的小册子“布伦坦诺 contra 马克思”寄给左尔格、费舍、纽文胡斯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 4月30日 恩格斯为将由他准备付印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写导言。导言发表在5月13日的“前进报”附刊上和6月底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
- 5月1—2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指出李卜克内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同时指出倍倍尔本人也很不了解发表这一著作的重要性。恩格斯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对于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的重要意义;他建议更多地注意掌握革命理论,注意革命理论的发展,开展科学讨论,等等。
- 5月3日 恩格斯参加伦敦庆祝五一节的群众游行和集会。
- 5月6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费舍关于在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成功地举行五一节群众游行的详细报告。
- 5月12日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 德文第四版,即由他修改和补充的版本写简短的序言。序言刊印在该书中,该书于当年下半年出版。
- 5月下半月 根据比利时工人党的一位领导者爱·安塞尔的请求,恩格斯组织英国新工联对正在罢工的比利时码头工人进行援助,为此他同这些工联的领导者约·白恩士和 E. 克累姆通信。
- 5月20日左右 恩格斯从施留特尔那里得知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矿工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美国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发行情况。
- 5月21日左右 恩格斯应德国经济学教授路·埃耳斯特尔的请求,把自己的履历和自己的著作目录告诉他,以供在德国出版“社会政治科学手册”之用;恩格斯寄去的材料刊印在1892年在耶拿出版的该手册的第三卷中。
- 6月 恩格斯阅读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并且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严厉批评这本书企图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批评它错误地解释黑格尔哲学的本质。
- 6月16日 恩格斯结束了为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写序言的工作,他在序言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评论家庭史研究和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重要派别,特别强调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所进行的研究的意义。序言于6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标题是:“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并刊印在年底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
- 6月18日和29日之间 恩格斯研究主要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受执行委员会委托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恩格斯指出

- 草案大体上消除了哥达纲领的最严重的错误,同时也批评草案的许多论点。他指出草案中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要求、国家制度民主化的要求和建立单一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并且强调说,这些缺点带有向机会主义让步的性质。恩格斯把自己的意见寄给党的执行委员会;草案接受了这些意见中的某些意见,发表在7月4日的“前进报”上,后来又发表在党的其他刊物上,供预先讨论用。
- 6月26日 恩格斯写信祝贺6月28—3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赞扬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增长。贺信发表在7月3日的“工人报”上。
- 6月26日—8月24日左右 恩格斯(断续地)在赖德(威特岛)休养,肖莱马和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乔·哈尼到他那里作客。
- 6月29日 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尖锐批评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领导者、机会主义者格·福尔马尔6月1日在慕尼黑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发表的沙文主义演说。恩格斯要求党取消福尔马尔用党的名义发表意见的权利。
- 8月初 恩格斯收到屠拉梯寄来的在意大利出版的宣传小册子,小册子是根据恩格斯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新版所写的导言编写的。
- 8月3日和18日之间 恩格斯收到拉布里奥拉关于意大利的局势、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的详细报告,其中包括关于对五一节游行参加者的审判和其他政治审判案的情况,以及8月2—5日在米兰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情况。
- 8月下半月—9月初 恩格斯通过报刊上的报道和爱·马克思-艾威林的信、德国和英国工人运动老战士弗·列斯纳和8月16日

- 至2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其他参加者的信,密切注意这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在给左尔格、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对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果做了良好的评价。给拉法格的信摘要发表在9月12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 约8月25—27日 倍倍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者维·阿德勒在恩格斯家里作客;恩格斯同他们谈论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结果。
- 9月3日左右 恩格斯接见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美国代表、社会主义者马克·维伊和阿·卡甘,后者是一家纽约犹太工人报纸的编辑。
- 9月8日—23日左右 恩格斯同他的内侄女玛·艾·罗舍和秘书路·考茨基一起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
- 9月14日和30日 恩格斯把9月初在新堡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情况通知左尔格,他认为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新工联”的重大胜利,因为工联的改良主义领导者想取消上次代表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的企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
- 9月24日和28日之间 恩格斯阅读由“新时代”编辑部拟定的并于9月14日刊登在该杂志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考茨基。恩格斯指出,这个草案比党的执行委员会所拟定的那个草案更可取。
- 9月29日左右 恩格斯在一个时期的间断之后,又开始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 10月—11月14日 恩格斯密切注视与众议院议员的补充选举相联系的法国政治事件,在这次补充选举中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院的候选人;在给拉法格夫妇、倍倍尔和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对于拉法格当选表示满意,认为这是工人党

- 的重大胜利,这证明党的团结社会主义力量的策略是正确的。
- 10月3日左右—12月1日 恩格斯同伦敦的斯万·容涅先出版社商谈关于出版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的事,为此他同译者、美国社会主义者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通信。
- 10月13日和22日之间 恩格斯写“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在其中就全欧战争的威胁拟定了社会主义者的策略,他强调指出,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坚决拥护和平。该文于12月初用法文发表在“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
- 10月14日 由于在“前进报”上转载“新时代”编辑部拟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坚决抗议把这个草案原先没有的一个拉萨尔论点加进去,这个论点认为,其他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说来都是反动的一帮。
- 10月中—11月初 恩格斯密切注意10月14日至21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写贺信给代表大会;在给左尔格、倍倍尔等德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他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把“青年派”的领导者开除出党的决议以及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言论的谴责;恩格斯由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而表示满意。
- 10月24日 恩格斯在给左尔格(恩格斯经常从他那里得到关于美国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的信中指出,美国工人运动之所以有些落在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后面,原因之一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工人的生活水平比较高。
- 11—12月 恩格斯紧张地从事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 11月 恩格斯阅读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普列汉诺夫的几篇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的文章,认为这几篇文章写得很好。
- 11月1日 恩格斯应施米特的请求,帮助他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向他提出许多建议;恩格斯一方面强调正确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方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间的原则区别。
- 11月12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原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恩·德朗克去世的消息。
- 11月13日 恩格斯写给布隆(捷克称作:布尔诺)一家奥地利社会主义报纸“人民之友报”编辑部一封贺信,以回答该编辑部邀请他参加该报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信。贺信于11月25日发表在该报上。
- 11月17日 恩格斯寄给英国自由派报纸“每日纪事报”编辑部一篇声明,揭露该报刊登的关于马克思家庭的诽谤性报道。声明于11月26日发表在该报上,标题是:“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
- 11月28日 恩格斯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歌詠团,回答它关于在他生日那天举行庆祝会的建议,信中强调说,他和马克思一样,原则上反对为个别人举行公开的庆祝活动;他认为,只有在这种活动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时,才容许这样做。
- 12月3日 恩格斯告诉考茨基,他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已进行到最后几篇。
- 12月中 恩格斯到赖德去旅行。

1892

- 1—3月 恩格斯几次拜访住在里士满的哈尼,和他通信,并且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 1月 恩格斯阅读德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沃尔弗的文章“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该文发表在1891年德国杂志“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恩格斯在稍后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篇文章。
恩格斯把自己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翻译成德文,并为它写了前言和结束语,在结束语中分析了俄国在1891年饥荒时的国内情况。文章于2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 1月6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信中分析了在美国由于试图建立一个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政党而引起的政治局势,同时指出,在美国资产阶级两党制的情况下,要在最近期间建立起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巩固的第三党,是行不通的。
- 1月11日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国版写序言,序言刊印在3月底伦敦出版的该书英国版上。
- 2月6日 在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纸“论坛报”上刊登了资产阶级政论家和哲学家卓·博维奥的文章,文章的作者硬说德国的社会党人不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形式。为此恩格斯写文章答复博维奥,指出他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该文发表在2月16日的“社会评论”杂志上。
- 2月10日 恩格斯应在伦敦的波兰流亡社会主义者的请求,为“共

- 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写序言 ;他指出 ,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争得波兰的真正独立。序言刊印在伦敦出版的该书波兰文版上 ,并于2月27日发表在波兰社会主义杂志“黎明”上。
- 2月中 恩格斯校订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译本 ;译者是艾威林。
- 2月19日 恩格斯写信告诉阿德勒 ,他决定把狄茨出版社给他的全部稿费交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党的经费。
- 2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请求 ,为倍倍尔从事议会活动二十五年写祝词。
- 3—4月 由于临近庆祝五一节 ,恩格斯帮助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制定策略路线 ,以期同英国的其他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采取一致的行动 ;恩格斯把在伦敦进行五一节准备工作的情况通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
- 3月初 恩格斯接见一个由于政府迫害而从德国流亡出来的德国矿工、民主主义者奥·济格尔 ;恩格斯帮他找到工作 ,并且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恩格斯阅读考茨基的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手稿的开头部分 ,并且把自己的意见寄给作者。
- 3月5日和16日之间 恩格斯阅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弗·梅林的许多著作 ;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给予这些著作以很高的评价 ,特别是梅林的“莱辛传奇”一书 ,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普鲁士的历史。
- 3月5日—4月19日 恩格斯在给拉法格夫妇的几封信中 ,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众议院中同一批以厄·格朗热为首的带沙文主义情绪的布朗基主义者(原先是布朗热主义者)结成同盟的行动 ,进行了批评 ;恩格斯表示反对这样的同盟 ,

- 他建议采取同以爱·瓦扬为首的所谓老派布朗基主义者接近的策略。
- 3月10日左右 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根据米兰代表大会的决议制定的意大利劳动党纲领和关于罗马失业工人运动的材料 ;恩格斯以后还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关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和工人阶级斗争的详细报道。
- 3月15日—9月25日左右 恩格斯和丹尼尔逊通信 ,从他那里得到关于俄国经济情况的材料以及俄国的经济学杂志和书籍 ,其中有“地方自治机关统计经济研究总结”第一卷 ;恩格斯在给他的信中指出 ,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必然引起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因此 ,必然引起农民公社的解体和大批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 3月17日 恩格斯写信向法国工人祝贺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 ;贺信发表在3月26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 3月20日左右—26日 恩格斯在赖德休养。
- 3月29日 恩格斯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写一个按语 ;该版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 3月30日 恩格斯在给施留特尔的信中揭示了阻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原因 ,他指出 ,美国资产阶级分化工人阶级 ,收买美国本地工人 ,唆使他们去反对各国侨民工人 ,同时挑拨后者自相倾轧。
- 4月1日 恩格斯同法国资产阶级报纸“闪电报”的记者艾·马萨尔谈话 ,谈话的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者对欧洲一系列国家的内外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的态度 ;在谈到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制造的爆炸事件时 ,恩格斯认为这是巴黎警察当局的挑衅行动。谈话的全文经恩格斯审阅和修改后发表在4月6日的“闪电报”上。

- 4月中 恩格斯接见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尼·谢·鲁萨诺夫,和他谈论俄国的经济情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个问题;恩格斯指出,民粹派的幻想必定要破产,因为他们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 4月20日 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写完了导言,他在导言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几个最重要的阶段,为此分析了几个历史问题和唯物主义哲学问题,并且说明了不可知论和在资本主义开始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该版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
- 5月 恩格斯从门德尔森那里得到在里沃夫和克拉科夫印的波兰文五一节传单。
- 5月1日 恩格斯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在以后几天,他写信给劳·拉法格和倍倍尔,认为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是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
- 5月2日和10日之间 恩格斯非常注意从5月1日至8日举行的法国市镇选举的进展情况,赞扬社会主义者在选举运动中的成就。
- 5月5日左右 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知在意大利各城市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情况。
- 5月14日左右—6月1日 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两人一起多次同当时也在伦敦的辛格尔会面;他们讨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
- 5月17日—6月 由于肖莱马患重病,恩格斯同肖莱马的兄弟以及给他治病的医生通信,并且到曼彻斯特去看望他。
- 5月31日 恩格斯写信祝贺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贺信发表在6月10日的“工人报”上。
- 约6月初 恩格斯把自己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
- 英文版写的导言翻译成德文。译文于9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
- 6月9日和17日之间 恩格斯多次接见到伦敦来参加国际矿工代表大会的德国矿工代表团;恩格斯同代表团的成员交谈德国矿工的情况和他们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
- 6月中—7月25日 恩格斯密切注意选举运动和从7月7日至24日举行的英国下院选举的进展情况;在给倍倍尔、劳·拉法格等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的信中,他赞扬哈第、白恩士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的巨大成就,并且指出,这将促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运动。
- 6月29日—7月2日 由于肖莱马逝世,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在那里参加他的葬礼;恩格斯写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学者的悼文。悼文用“卡尔·肖莱马”为标题发表在7月3日的“前进报”上。
- 7月21日 恩格斯写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该版于8月中出版。
- 7月23日 由于福尔马尔又发表了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辩护和为社会民主党同德意志帝国合作辩护的言论,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信中强调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并且拟定同他们斗争的策略。
- 7月27日—9月6日 恩格斯在赖德休养。
- 8月 恩格斯继续进行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研究,阅读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厄·勒南的著作。
- 8月2日左右 恩格斯从丹麦社会民主主义者格·特利尔那里收到关于丹麦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

- 8月4日和9月3日之间 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收到关于8月14—15日在热那亚举行的意大利劳动党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大会进程的报道。
- 8月12日和9月4日 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两封信中,对于在“新时代”杂志上刊登艾威林夫妇关于英国选举结果的文章时删掉其中批评社会民主联盟领导和费边社的段落表示不满意;恩格斯认为费边社是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感到恐惧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集团,他们企图使工人阶级从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而不容许在英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
- 8月19—23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左尔格和阿德勒,告诉他们英国社会主义者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他指出朗卡郡的纺织工人的情绪有了转变,他们绝大多数都赞成参加斗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
- 9—10月 恩格斯同原先的第一国际会员、德国医生路·库格曼通信,从他那里得到马克思的几本久未再版的著作。
- 9月5—26日 恩格斯注意9月5日至9日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做了评价。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拒绝参加将于1893年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而另外召开一个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恩格斯认为这个决议的目的是企图阻碍新工联同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因此,恩格斯劝告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不要接受这个计划,并且建议某些工联派自己的代表到苏黎世去;恩格斯还审阅倍倍尔根据他的建议就这个问题为“新时代”杂志写的一篇文章,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恩格斯还就这个问题写信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

-
- 委员会 ;恩格斯号召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给工联分子的企图以反击。
- 9月12日 恩格斯从施米特那里得悉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去的“青年派”领导者又在进行新的分裂活动之后 ,在给施米特的信中谴责他们的行动 ,并且指出 ,既然他们是脱离工人群众的 ,他们在德国就找不到任何的支持。
- 9月下半月 恩格斯注意分别于9月19日至23日和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的法国工团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 ,根据恩格斯的建议 ,两个代表大会都通过决议不参加英国工联将要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并且再次邀请它们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恩格斯赞同李卜克内西在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这篇演说强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
恩格斯多次接见柯瓦列夫斯基。
- 9月22日和11月17日 恩格斯接见俄国民粹派革命家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
- 10—12月 恩格斯在半年多的间断之后 ,又开始进行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 ,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这项工作上。
- 10月上半月 恩格斯阅读“青年派”的领导者之一汉·弥勒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建议他揭露这个小册子对党的恶毒的蛊惑性攻击 ,并且建议他同时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某些活动家的机会主义错误。
- 10月6日和15日之间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 ,帮助他准备在众议院的演说 ,演说的目的是揭露法国沙文主义者和阐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立场 ;恩格斯把从倍倍尔那里得到的

- 关于普法战争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作斗争的材料寄给拉法格。
- 10月中 恩格斯阅读法国律师、布朗基主义者和布朗热主义者欧·普罗托的小册子“沙文主义者和反动派”，这本小册子也是反对“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在给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的信中，恩格斯认为这是一本欺骗性的和诽谤性的小册子，是按照热中于使资产阶级法国和沙皇俄国结成侵略同盟的警察机关和沙文主义集团指派的任務写成的。
- 11月6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目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就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言论而展开的讨论，显得空洞、抽象；恩格斯建议在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追究福尔马尔向威廉二世和德国政府献媚的责任。
- 11月9日和15日之间 恩格斯写“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文章发表在11月16日的“前进报”上。
- 11月9日和25日之间 恩格斯为“社会政治科学手册”写马克思的传略，传略发表在1892年耶拿出版的该手册第四卷上。
- 11月14—21日 恩格斯注意11月14日至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水平比以往各次低。代表大会违反它在1891年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承担的义务，拒绝在5月1日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而把它移到星期日举行，恩格斯指出，代表大会的这种做法将被其他党看做是不遵守共同通过的决议。同时，恩格斯称赞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决议。
- 11月15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声明给同“青年派”接近的一家德国社

- 会政治报纸“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揭露在该报上不署名发表的瑞士社会主义者艾里提埃的一组文章以无政府主义精神伪造第一国际的历史;恩格斯的这封信发表在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论坛”上。
- 11月19日—12月22日 恩格斯在同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通信中,讨论1893年庆祝五一节的问题;他说明,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不遵守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所有国家同时举行庆祝活动的决议。
- 11月底—12月4日 恩格斯利用俄国民族学家列·雅·施特恩堡关于他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的社会制度和家庭风俗的研究报告,写“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文章发表在12月的“新时代”杂志上。
- 1892年12月—1893年7月 恩格斯在从事其他工作的同时,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德文第二版。
- 12月 恩格斯注意由于揭发和公布了在开凿巴拿马运河时与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有牵连的舞弊行为而尖锐化的法国政治局势;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他建议法国社会主义者利用当前出现的形势加强社会主义鼓动。
- 12月3—4日 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计划把“新时代”变成通俗的政治和文艺杂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和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这样的杂志以外,必须创办一种理论刊物,以便在那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
- 12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请他归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的手稿;恩格斯曾委托他辨认其中笔迹不清楚的地方。1893年1月初,恩格斯通过倍倍尔收到了这份手稿。

1893

- 1—5月 恩格斯继续进行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 1月初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邀请恩格斯出席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复信该党执行委员会,对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 1月3日左右—10日 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 1月10日 恩格斯从玛·门德尔森那里得知巴黎警察当局逮捕了五位波兰革命流亡者的消息后,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的文章,发表在1月13日“前进报”上。
- 1月中 英国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小组于1月13—14日在布莱得弗德举行代表会议,通过了建立独立工党的决议,恩格斯密切注视会议进行情况;在给左尔格的信里,他把这一事件当作英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重要事实来评价,并且表示赞同艾威林参加新党的执行委员会。
- 1月23日 恩格斯出席纪念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五十三周年的晚会。
- 1月26日和29日之间 恩格斯根据拉布里奥拉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揭露意大利几家同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有密切联系的大银行在金融上的鬼蜮伎俩。文章发表在2月1、2和3日的“前进报”上。
- 2—3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英国独立工党的发展并把这种情况告知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恩格斯在给他们的信里指出该党领导者哈第的一系列有

- 利于保守党人的政治错误 ;同时 ,恩格斯注意到新党成员中有健康的无产阶级成分 ,指示他们必须奉行真正的独立政策 ,这样做既能使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 ,又能迫使自由党政府让步。
- 2月 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军事法草案 ,恩格斯应倍倍尔的请求写了一组题为“欧洲能否裁军 ?”的文章。恩格斯指出 ,军备竞赛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 ,而且孕育着普遍的毁灭性战争 ;他提出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裁军和逐步地以民兵制度代替常备军的建议。这篇文章发表在3月1日至10日的“前进报”上 ,并于3月底出版单行本。
- 2月1日 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 ,该版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
- 2月2日左右 恩格斯应伦敦俄国犹太人流亡者社会主义小组“进步社”的请求 ,寄给它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的书籍。
- 2月4日 恩格斯认为引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研究工人运动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 ,他劝哈尼撰写宪章运动史。
- 2月6日左右 恩格斯读到倍倍尔2月3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提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的演说 ,以及社会民主党其他议员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 ;他把帝国国会被迫花五天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看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重人胜利 ;恩格斯对倍倍尔的演说给予很高的评价 ,并赞同为广泛传播这一演说而采取的措施。
- 2月7日 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 B 施穆伊洛夫请恩格斯帮助他写马克思传略 ,以便在俄国出版 ;恩格斯应此请求给他提了许多意见和指示 ,并把第一国际活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

- 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寄给他。
- 2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给丹尼尔逊,说明后者试图证明俄国在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是站不住脚的;他指出:俄国的农民公社只有在较发达的国家推翻了资本主义之后,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基层单位;在现存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对俄国是不可避免的。
- 2月底—3月 由于法国已经开始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恩格斯密切注意工人党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他在给拉法格夫妇的几封信里,建议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小组结成选举联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行动的自由和执行独立的政策。
- 3月1日左右—17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英格兰南海岸)休养。
- 3月13日 恩格斯为德国工人写一篇庆祝即将到来的五一节的文章;在文章中简略地评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文章于5月1日刊登在“前进报”出版的专刊“五一节”(《Mai-Feier》)上。
- 3月14日 恩格斯回答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F·维森提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者能不能对由选举产生的职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恩格斯指出,这在原则上是许可的;并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
恩格斯收到各国社会主义者在日内瓦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的会议拍来的电报,上有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签名。
- 3月15日 恩格斯收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为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拍来的电报。
- 3月中 恩格斯读发表在3月1日“新时代”上的列斯纳回忆马克思的文章,并给予好评。

- 3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复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秘书亨·德·劳埃德,说明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启程赴会。这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9月,趁举行世界博览会之便在芝加哥召开,组织会邀请恩格斯参加代表大会。恩格斯随函寄给劳埃德“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英文版。
- 3月21日 恩格斯在给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奥·拉迪姆斯基的信里,对后者告诉他关于“共产党宣言”译成捷克文一事表示欣慰。
- 3月28日左右—4月4日 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除了其他一些问题之外,他们讨论了辛格尔提出的以单行本分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建议。出版文集一事并未实现。
- 拉法格夫妇在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同他讨论了法国工人运动问题。
- 3月31日 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议员——倍倍尔、拉法格和白恩士在恩格斯家里会晤;恩格斯把这次会晤本身看做国际工人运动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
- 4月—7月初 恩格斯数度接见持普列汉诺夫的介绍信来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阿·米·沃登;恩格斯同他交谈了俄国的经济状况,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以及许多哲学和经济学问题。谈话当中,恩格斯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土地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他还表示,相信在最近时期俄国国内将出现一批新的坚强的工人运动领袖。
- 4月 恩格斯给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工人写五一节贺信;他强调指出庆祝这一节日对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意义;这些信刊载在:4月23日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报”上,标题是:“尽管如此”;奥地利“工人报”社出版的专刊“庆祝1893年五一节”(《Zum 1. Mai 1893》)上和5

- 月1日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报”上。
- 4月初 恩格斯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帕·伊格列西亚斯那里收到关于西班牙工人运动情况以及关于社会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斗争情况的报道 ;以后 ,恩格斯继续从他那里收到这种报道。
- 4月8日 恩格斯应捷克社会主义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约·克拉普卡的请求写一篇短文“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1848年回忆片断” ,文中强调不同民族的工人、其中包括德国和捷克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性 ,短文刊载在布拉格出版的专刊“1893年五一节”(《První máj 1893》)上。
- 4月24日 恩格斯动身到曼彻斯特去参加他的朋友 E 龚佩尔特医生的葬礼。
- 5月5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伊格列西亚斯的信 ,伊格列西亚斯在信中报道了西班牙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情况 ,并且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请恩格斯在5月7日伦敦举行示威游行时代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 5月6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为即将举行的五一节集会写给英国工人的贺信 ;同时 ,普列汉诺夫还告诉他日内瓦五一节示威游行情况。
- 5月7日 恩格斯参加伦敦的五一节示威游行。
- 5月11日 恩格斯同法国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 ,对国际形势和德国状况作了评述 ;谈话于5月13日刊登在该报上。
- 5月17日 恩格斯把他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最后几节的工作情况和关于写作国际工人协会史的意图告诉左尔格。

- 5月25日左右 恩格斯从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彼·拉·拉甫罗夫那里收到一本在日内瓦出版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其中载有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代表格·亚·洛帕廷的一封关于他在1883年9月同恩格斯谈话的信。
- 5月27日 侨居美国的俄国经济学家伊·阿·古尔维奇曾把自己的著作“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一书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在读完之后给作者回信,对这部著作给予好评。
- 6月9日 恩格斯写信给保加利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对寄给他一册杂志表示感谢,并对东南欧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成长表示欣慰。这封信刊登在杂志第3期上。
- 6月12日左右 恩格斯从屠拉梯那里收到“资本论”第一卷意大利文译本。
- 6月13日 恩格斯打电报给拉甫罗夫,祝贺他七十岁生日。
- 6月中 恩格斯注意德国选举的进行情况;他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中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并强调指出党的影响,尤其是在农业区的影响不断增长。
- 6月20日左右—27日 恩格斯读6月17日“社会主义者报”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为题发表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鉴于国内沙文主义情绪增长而写给法国劳动群众的呼吁书;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整个说来赞同这份呼吁书,但是指出,其中不合法地提出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国际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主张,这使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国际相互关系的原则受到破坏;他还指出,呼吁书中把法兰西共和国同其他国家的君主政体无条件对立起来的提法将会掩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阶级实质。

- 6月底 恩格斯就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问题对英国自由派报纸“每日记事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刊载在7月1日的报上。
- 7月5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尼·彼得逊关于丹麦经济状况的报道。
- 7月14日 恩格斯写信给梅林,对寄给他“莱辛传奇”一书单行本表示感谢,说他对这部著作评价很高,并举出德国和法国历史上的例子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他告诉梅林,他打算为“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新版做些修改。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一意图。
- 7月15日 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二版写简短的序言。
7月19日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鲁·迈耶尔来信对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中的某些原理提出批评,恩格斯在复信中指出,迈耶尔关于不可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强调,消灭城乡对立的最重要条件是,不仅使工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而且使农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 7月21—28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 7月29日 恩格斯立遗嘱;他把一部分财产和藏书遗赠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大部分财产留给马克思的几个女儿和外孙。
- 8月1日—9月29日 恩格斯去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旅行:造访科伦,后偕倍倍尔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到苏黎世,离开那里几天去格劳宾登会他的弟弟海尔曼,后回苏黎世并在瑞士逗留了两星期,然后经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离维也纳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林,再取道鹿特丹回伦敦。

-
- 8月中 恩格斯在苏黎世时几次拜访“劳动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
- 8月12日 恩格斯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闭幕会议,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并受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会议闭幕;恩格斯在演说中指出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功绩,说明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成就。
- 8月31日—10月13日 鉴于8月20日法国众议院选举,恩格斯在给拉法格夫妇的信里对以盖得为首的工人党议员能否把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团结在自己周围表示担心;他建议执行有助于这一团结的策略。
- 9月11日 恩格斯出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欢迎他而在维也纳举行的晚会。
- 9月14日 恩格斯出席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为庆祝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而举行的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指出社会主义者在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显著增长;讲话刊载在9月22日的“工人报”上。
- 9月22日 恩格斯出席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为欢迎他到德国而组织的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指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的巨大作用,并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讲话刊载在9月26日“前进报”附刊上。
- 10月11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拉法格寄来的关于10月7日至9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报道。
- 10月11—21日 鉴于爱·塔菲保守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提出奥地利选举改革草案,规定扩大选举权,恩格斯在给阿德勒、倍倍尔和劳·拉法格的信里分析了奥地利的政治形势,并建议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利用由于多数资产

- 阶级政党反对改革草案而引起的国内政治危机,加强社会主义鼓动。
- 10月中 恩格斯密切注意从7月底开始并持续下来的英国中部矿工反对矿主们宣布同盟歇业的斗争;他在给倍倍尔的几封信里谈到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还谈到一部分矿主被迫拒绝同盟歇业。
- 10月14—27日 恩格斯获悉福尔坦打算把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反杜林论”里的“暴力论”三章译成法文在社会主义杂志“新纪元”(《L'Ere nouvelle》)上发表,他为这事同福尔坦和劳·拉法格通信;他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只能由哲学专家来翻译,他只同意翻译“暴力论”。
- 10月17日 恩格斯在读了作者丹尼尔逊本人寄给他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一书以及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别·司徒卢威就这本书写的批评文章之后,写信给丹尼尔逊。他指出,丹尼尔逊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性的民粹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恩格斯批评司徒卢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想化,他证明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同广大群众的贫困化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像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更是如此。
- 10月22日和31日之间 恩格斯几次接见持拉甫罗夫的介绍信前来拜访他的俄国民粹主义者X拉波波特;恩格斯同他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俄国革命运动情况和其他问题。
- 约10月24日—12月23日 恩格斯继续从拉布里奥拉那里经常收到关于意大利政治状况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其中包括关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所支持的西西里劳动群众运动(“同盟”运动)情况的报道。

-
- 11月6日和12日之间 恩格斯读迈耶尔的“世纪末的资本主义”一书。
- 11月28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以及其他的组织和个人给他祝寿的贺信、贺电。
- 12月 恩格斯审阅由劳·拉法格翻译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上半部的法译文,并把他的意见寄给她。
- 12月上半月 恩格斯得到斐·沃尔弗病重的消息,到牛津去看望他。
- 12月1日 恩格斯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对祝贺他的寿辰表示感谢。
- 12月2日 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里分析了在美国阻碍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原因,他提到的原因有:两党制使握有统治权的政党能广泛欺骗群众,由本地美国人和移民组成的工人阶级成分驳杂,而且他们又分散成各个民族小集团,存在对黑人居民的种族歧视,以及无产阶级上层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恩格斯在那封信里还告诉左尔格,他已经把“资本论”第三卷的颇大部分准备好付印。
- 12月19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邀请恩格斯莅临指导,恩格斯复信祝贺大会;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知识分子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管理的各部门都将起重要作用。这封信刊载在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的“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上。
- 1 8 9 4
- 1月—5月11日 恩格斯继续进行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工作。
- 1—3月 恩格斯注意在奥地利展开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他在

- 给阿德勒、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强调指出，扩大选举权对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发展的意义。
- 1—2月 恩格斯同哈尼通信并给他以物质帮助。
- 1月上半月 恩格斯为他发表在1871—1875年“人民国家报”上的关于国际问题的论文集写序。在专门为这本论文集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里，恩格斯阐述他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和俄国农民公社的命运的观点。论文集于1月底出版。
- 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已完成很大一部分，他给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寄去头四篇，共20章（手稿的三分之一）。
- 1月3日 恩格斯读载于法国布朗基社会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上的裁军方案，这个方案是瓦扬为提交众议院而提出的。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里，在赞同方案的基本思想的同时，提了许多实践上的意见，并建议以他在“欧洲能否裁军？”一文中所述的建议作为方案的基础。恩格斯劝法国社会主义者就他们建议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问题事先同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商量一下。
- 1月6日和10日之间 恩格斯读十七世纪初英国作家罗·伯顿“忧郁症的解剖”一书，这本书是他的朋友、著名的英国地质学家G·W·兰普鲁寄给他的。
- 1月9日左右 恩格斯分别为“前进报”和“新时代”杂志写短文，简略地评介“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两篇短文分别发表在1月12日的“前进报”上和1月的“新时代”上。
- 1月25日 恩格斯应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的德国大学生W·博尔吉乌斯的请求给他写复信，信中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原理，其中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

- 经济基础(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反作用问题,历史上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地相互作用的问题等等。这封信由“社会主义大学生”(《Der 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杂志撰稿人海·施塔尔根堡于1895年10月发表在该杂志上。
- 1月26日 屠拉梯和他的妻子、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安·库利绍娃曾请求恩格斯就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正在展开的劳动人民群众性运动的条件下应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谈谈他的意见,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回答,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酝酿中的意大利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指出社会主义者应该执行的策略是,保证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这一革命并保持它的阶级独立性。文章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表在2月1日的“社会评论”杂志上,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 1月底 保·拉法格在恩格斯家里作客,并在那里会见白恩士。
- 2月9日左右—3月1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 2月23日—5月21日 由于英国议会选举即将举行,恩格斯在给左尔格、阿德勒、普列汉诺夫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分析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斗争,他指出,自由党力图保持执政地位,因此将被迫对工人阶级做些让步。在谈到英国没有独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原因时,恩格斯认为这是工人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宗派性质所引起的;恩格斯提出制定自己独立的政策作为英国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
- 2月底—5月 恩格斯读丹尼尔逊寄给他的两卷关于俄国的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统计资料。
- 3月6日 恩格斯读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改良派首领之一让·饶勒

- 斯在众议院所作的建议规定谷物进口由国家垄断的发言之后,写信给拉法格,批评这一建议。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条件下,任何国家垄断将只对资本家阶级有利;他还指出,只要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实行任何社会主义措施都不可能。
- 3月18日 恩格斯为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纪念给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写贺信。贺信刊载在3月2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
- 3月20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一批校样寄给丹尼尔逊,以便译成俄文;以后,他陆续把从印刷所收到的校样寄一份给后者。
- 恩格斯在给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P·穆索伊的信里,感谢他寄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党宣言”的罗马尼亚文版。
- 3月21日 恩格斯告诉左尔格,他已完成“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基本部分(约三分之二)的工作。
- 3月22日 恩格斯接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邀请他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请帖后,给代表大会写贺信;他指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贺信载于4月出版的小册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Verhandlungen des vierten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tagcs》)。
- 3月26日 恩格斯在给伊格列西亚斯的复信里对社会主义运动在西班牙的发展表示欣慰。
- 3月27日 恩格斯收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发来的贺信。
- 4月24日 恩格斯给巴门社会民主联合会主席艾伯勒写信,感谢这个组织寄给他一本贴有他的故乡巴门城的风景照片

- 的纪念册。
- 5月6日和7日 恩格斯接见法国工人党活动家阿·德尔克律兹。
- 5月11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部分手稿寄给出版社。
- 5月15日 恩格斯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写信给该党执行委员会,这封信载于社会主义报纸“工人新闻”和用匈牙利文载于5月18日的“人民言论”上。
- 5月23日 恩格斯为“反杜林论”德文第三版写序,该书于7月出版。
- 6月1日 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里感谢他寄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俄文第一版,认为译文质量总的来说是好的。
- 6月中 恩格斯收到左尔格寄来的关于美国矿工罢工运动的报道。
- 6月18日左右 恩格斯从匈牙利社会主义者M·德亚克那里获知准备把“共产党宣言”译成匈牙利文的消息。
- 6月19日左右—7月2日 恩格斯多次接见到英国来的李卜克内西。
- 6月19日和7月16日之间 恩格斯写“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这是他先前就这个题目所做的研究的总结;文章刊载在9月底—10月初的“新时代”杂志上。
- 6月27日 恩格斯认为广泛宣传“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有很大意义,他把这卷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寄给“新时代”杂志编者发表;这两章载于7月的杂志上。
- 7月19日—8月2日 由于苏格兰发生矿工罢工以及罢工委员会向恩格斯呼吁,恩格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通信,谈到给罢工者以物质

- 帮助,他本人也对罢工者提供帮助。
- 7月26日左右 恩格斯把“反社林论”第三版寄给拉布里奥拉。
- 7月30日和8月6日之间 恩格斯应伊格列西亚斯的请求,通知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以及英国的许多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将在8月底召开。恩格斯建议它们向代表大会致函祝贺。
- 8月7日左右—22日 恩格斯了解了8月5—6日举行的社会民主联盟代表大会的结果后,批评联盟领导者的宗派主义政策,其中包括代表大会所作的两个决定:一个是决定在将于1896年在伦敦举行的有工联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前夕另行召开特殊的“纯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另一个是决定把独立工党当作“非社会主义”组织而拒绝同它合作。恩格斯在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信里,建议他们在报刊上反对这一意图的实现。
- 8月14日—9月18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 8月15日和30日之间 恩格斯收到拉布里奥拉寄来的关于意大利状况的报道,以及关于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洛里亚及其追随者企图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资料;在以后数月中恩格斯继续收到类似的报道。
- 9—11月 恩格斯注视中日战争的战况发展;他在给劳·拉法格、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信里指出,不管战争结局如何,这场战争将推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 9月6日 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邀请恩格斯参加它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恩格斯致函该党一位活动家卡·德拉瓦勒祝贺代表大会,贺信于9月22—23日刊载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阶级斗争”上。

- 9月9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马尔提涅蒂的信,说他已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恩格斯的其他作品译成意大利文,并谈到发表这些译文的困难。
- 9月26日 恩格斯应西西里岛社会党人打算在巴勒摩出版的报纸“社会正义”(《Giustizia sociale》)编辑部的请求,给西西里岛的社会党人写贺信;由于该报被禁止出版,贺信于1895年6月30日刊载在西西里岛社会主义报纸“解放”上。
- 10—11月 恩格斯多次接见从瑞士被驱逐出境后暂住伦敦的普列汉诺夫。
- 10月 恩格斯根据报纸和伊格列西亚斯的来信注意马拉加的西班牙纺织工人罢工的进行情况;他赞赏他们英勇顽强。
- 10月4日 恩格斯写成“资本论”第三卷序言。
- 10月下半月 恩格斯注意10月14日和21日比利时下院选举情况,选举结果社会主义者赢得三十二席;恩格斯在给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者之一艾·王德威尔得的信里指出,这一事件对比利时无产阶级、对其他各国的工人运动都有很大意义。
- 10月27日 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请求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写信,驳斥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企图把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对立起来,并以此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这封信于11月1日刊载在该杂志上。
- 10月底—11月 鉴于福尔马尔在10月21日至27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纲领问题的机会主义的发言,恩格斯在给左尔格、考茨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信里对这个发言作了最严厉的

- 批评。他把福尔马尔提出的维护农民、包括大农的私有利益的要求评定为背弃社会主义原则。
- 11月初 恩格斯读刊载在“新纪元”杂志上的“共产党宣言”法译文,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 11月10日 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里评述英国工人运动情况;他指出建立同自由党、保守党相对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他提到,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者们仍然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而独立工党的领导则摇摆不定,并且放弃独立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勾结。
- 11月12日 恩格斯写信给“前进报”编辑部,严厉驳斥福尔马尔企图歪曲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这封信于11月16日刊载在该报上。
- 11月15日和22日之间 为了答复福尔马尔的发言,并且鉴于法国工人党于9月在南特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的绪论部分和补充中包含有机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恩格斯撰写“法德农民问题”。恩格斯批评这些发言和错误,并制定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的基本原理。这一著作于11月底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
- 11月下半月—12月上半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在反对福尔马尔的斗争中,他给倍倍尔出了许多主意,并批评李卜克内西的调和立场;恩格斯证明,为了党的真正统一,必须坚决反击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他认为这次辩论的结果是对机会主义的胜利。
- 11月22日 由于“前进报”刊登消息说“资本论”第四卷将不出版,恩格斯写了一篇短文驳斥这种说法。短文未署名于11月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
- 11月23日 恩格斯写信给阿尔明尼亚社会主义者 II 阿塔贝强

- 茨,感谢他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党宣言”译成阿尔明尼亚文,还感谢他告知阿尔明尼亚的状况;恩格斯指出,只有在俄国开展革命运动,推翻俄国沙皇制度,阿尔明尼亚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 12月11日 恩格斯把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友好地题赠给普列汉诺夫。
- 12月12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分别寄给左尔格和施留特尔。
- 12月27日 由于“工人报”从1895年1月1日起改为每日出版,恩格斯给奥地利工人写贺信。贺信刊载在1895年1月1日的“工人报”上。

1895

- 1—3月 恩格斯从拉布里奥拉那里得到关于洛里亚及其追随者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报道,这些人企图推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并反驳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提出的原理;恩格斯还从他那里收到刊载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杂志“评论”(《La Rassegna》)上的这一序言的译文。
- 1月 恩格斯开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全集;他着手搜集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五十年代刊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并为此同库格曼通信。
- 1月上半月 恩格斯获悉符卢勃列夫斯基生活异常困难,在分别写给瓦扬和拉法格的信里,他坚持要法国社会主义者向符卢勃列夫斯基提供经常的物质帮助。
- 1月1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分别寄给拉甫罗夫和阿德勒。

- 1月3日 恩格斯继续注意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内的反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他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保·施土姆普弗的信里指出,党内机会主义倾向趋于活跃的原因之一,补充党的队伍的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小资产阶级分子;恩格斯强调同这些倾向作斗争的必要性并表示相信革命派必将胜利。
- 1月9—28日 恩格斯在同阿德勒的通信中,讨论“工人报”改为日报后的领导问题;他为编辑部筹划物质援助和组织稿源等。
- 1月底—二月初 恩格斯认为恢复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真面貌有很大意义,他准备出版马克思同拉萨尔的通信。这一出版计划在恩格斯生前未实现。
- 2月 恩格斯读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这书是作者寄给他的。
- 2月1日和26日之间 恩格斯应普列汉诺夫的请求为查苏利奇延医治病。
- 2月上半月 鉴于“前进报”社拟将马克思于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专门为法国1848年革命及其后一些事件写的文章出版单行本,恩格斯为此同费舍通信,他建议把小册子的书名定为“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他还确定了书的内容、各章标题以及印数。
- 2月2日 英国和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就定于1896年在伦敦召开的应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定名问题征询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复信作答;他在给波兰流亡社会主义者维·约德科的信里,表示同意把这次代表大会作为例外,定名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联代表大会”,他解释必须这样定名的理由是,英国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都拥护工联。

-
- 2月14日—3月6日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写导言。恩格斯在这篇导言里,详细分析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工人运动的策略基础,他指出从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来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已经变化,其中包括由于军事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担心这篇导言会给恢复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不必要的借口,由于他们的坚持,恩格斯在校样中删去了几个地方,但这篇著作的革命实质还是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导言于3月底—4月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并收在4月中出版的书里。
- 2月下半月 恩格斯读劳·拉法格译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法译文手稿,并在译稿上做了一些修改。
- 2月20日左右 恩格斯从他亡妻的一个居住在美国的侄儿威·白恩士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罢工运动的消息,其中包括勃鲁克林电车工人罢工的消息。
恩格斯收到倍倍尔的报道,说德国政府打算要帝国国会通过矛头针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防止政变法及其他反动法案。
- 3月5日 恩格斯读了瓦扬寄给他的几件法国社会主义者打算提到众议院去的法案(关于农业公有地产、关于国营企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关于成立劳动部等等),写信给瓦扬,对这些法案的内容提了一些意见。
- 3月11日和4月6日 由于施米特和德国资产阶级经级学家威·桑巴特发表的“资本论”第三卷书评里,对价值规律、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作了错误的解释,恩格斯写信给他们,批判这些错误观点,并阐明对这些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实质。
- 3月12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劳·拉法格关于法国准备庆祝五一节的情况的报道。

- 3月16日 恩格斯写信给阿德勒,对他提了些关于研读“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意见和指示。
- 3月18日左右 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希尔施的请求,读他发表在“社会政治中央导报”上的、论证由于劳动强化而必须为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的几篇文章,并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希尔施。
- 3月底—4月初 恩格斯读拉法格“财产的起源与发展”一书;并写信给他,对该书总的给以好评,同时也对作者的个别见解提出批评。
- 4—5月 恩格斯写“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共两篇文章:“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恩格斯在第一篇文章里剖析了许多对“资本论”第三卷的书评;在第二篇以草稿形式保存下来的文章里,恩格斯分析交易所已经变化了的作用和股份公司的迅速扩展,他把这点看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新特征。这两篇文章在恩格斯生前未刊印。
- 4月 恩格斯继续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全集,为此同倍倍尔、费舍、梅林通信。
- 4月1日 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坚决抗议事先未经他同意而在3月30日“前进报”上以任意挑选的摘录形式发表他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因为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是无论如何要采取和平策略的拥护者。
- 4月初 恩格斯由于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阅读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鲍威尔寄给他的专题著作“论重农学派学说的发生。根据魁奈的未发表著作”。
- 4月15日左右 恩格斯把刚出版的由他校订并写导言的马克思的小册子“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寄给列斯

- 纳、查苏利奇、拉布里奥拉、瓦扬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
- 4月15日—5月29日 恩格斯就出版在1842年“莱茵报”上发表的马克思早期论文集子的问题同费舍和梅林通信。出版计划未实现。
- 4月19日左右 恩格斯从马尔提涅蒂那里得知,他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已译成意大利文。译文以节译的形式发表在5月1日的“社会评论”杂志上。
- 5月 恩格斯读考茨基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一书,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指出该书的缺点,其中包括对构成无产阶级先驱的中世纪城市的最无权分子的作用以及对十五、十六世纪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的问题研究得不够。
恩格斯身上出现后来使他死亡的病症食道癌的初步可觉征候。
- 5月18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捷克社会主义者格累尔寄给他的、维也纳出版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捷克文译本。
- 5月21日 恩格斯得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瞒着他准备出版一套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的书,他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对这事表示愤慨;他说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行为是力图在实际上不让他参预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 6月—7月24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治病,爱·马克思·艾威林、劳·拉法格、爱·艾威林和阿德勒等人去那里看望他。
- 6月17日左右 恩格斯从阿德勒那里收到关于奥地利政治状况的报道。
- 7月24日 身患重病的恩格斯从伊斯特勃恩回伦敦。

-
- 7月28日 恩格斯不顾病情严重,仍同爱·马克思-艾威林谈论英国独立工党内的状况。
- 8月5日(晚10点30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
- 8月6日和10日之间 各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以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活动家在唁电和唁信里对恩格斯逝世深表哀痛。
- 8月10日 恩格斯的遗体在伦敦附近的沃金火葬场火葬。追悼大会在滑铁卢车站大楼举行,恩格斯的亲友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团体的代表参加了追悼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挚友赛·穆尔、保·拉法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艾威林、安塞尔及其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在会上讲话。查苏利奇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向恩格斯的灵柩献花圈。
- 8月27日 遵照恩格斯的遗嘱,骨灰罐由他最亲近的朋友——爱·马克思-艾威林、列斯纳等人在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岩壁附近投入海中。
- 约9—11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弗·伊·列宁写悼念文章,全面评述恩格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革命活动。文章发表在1896年“工人”文集第1—2期上。

人 名 索 引

三 画

万德比尔特(Vanderbilt)——美国最大的金融和工业巨头世家。——第314、370页。

四 画

邓斯·司各脱, 约翰(Duns Scotus, John 1265左右—1308)——中世纪经院哲学家, 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 “牛津文集”这一巨著的作者。——第339页。

丰唐, 马利乌斯(Fontane, Marius 1838—1914)——法国作家, 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之一, 在巴拿马舞弊案件被揭发以后, 于1893年被判处二年徒刑, 但后来被宣告无罪。——第423页。

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鲁士将军, 1871年起为元帅, 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 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1835—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职; 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第5、6、9、39、54页。

太斯特勒尔, 海尔曼(Teistler, Hermann)——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青年派”领袖之一, 1890年为“萨克森工人

报”编辑。——第99页。

韦斯明斯特公爵——见格娄弗诺。

扎莫伊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Zamojski, Wladyslaw)——伯爵, 波兰大地主, 曾参加1830—1831年起义, 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第41页。

巴尔, 海尔曼(Bahr, Hermann 1863—1934)——奥地利资产阶级批评家, 小说家和剧作家。——第94、97页。

巴罗, 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领; 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问题。——第292、610页。

巴霍芬, 约翰·雅科布(Bachofen, Johann Jakob 1815—1887)——杰出的瑞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母权论”一书作者。——第246、248—250、252、253、255、257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革命家和政论家,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第一国际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

- 61、64、78、106、399、405—407、492、493、494、537页。
- 巴克兰德,威廉(Buckland, William 1784—1856)——英国地质学家和教士,在自己的著作中企图把地质学材料同圣经传说调和起来。——第342页。
- 巴斯特利卡,安得列(Bastelica, André 1845—1884)——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第一国际会员,巴枯宁主义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406页。
- 比万(Bevan)——斯温西市工联理事会主席,1887年为在该市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主席。——第67页。
-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1870—1871年在英国报刊上为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第112、113、116、163、164、168、174、175、182页。
- 比亚季尼(Biagini)——意大利财政部官员,1889年曾检查罗马银行。——第418、419、423页。
- 孔斯坦,让·安都昂·厄内斯特(Con-stans, Jean-Antoine Ernest 1833—1913)——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内政部长(1880—1881、1889—1892),实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第296、297页。
- 孔西利奥(Consiglio)——那不勒斯银行总经理,参议员。——第418页。
- 尤尔,安得鲁(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写有许多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第197页。
-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约60—140)——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610页。

五 画

- 本格尔,约翰·阿尔勃莱希特(Bengel, Johann Albrecht 1687—1752)——德国新教神学家,基督教经文的注释者和出版者。——第549页。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393、400页。
- 皮-伊-马尔加耳,弗朗西斯科(Pi y Margall Francisco 1824—1901)——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左派联邦共和主义者的领袖,职业是律师和文学家;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和1868—1874)的参加者,曾任内务部长(1873年2月13日—6月11日),共和国政府的临时总统(1873年6月11日—7月18日)。——第492页。
-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92—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17、22、24—29、31、33、46页。
- 白尔尼,路德维希(Börne,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60页。
- 白拉克,威廉(Bracke, Wilhelm 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

- 克的社会主义书籍出版者,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创始人(1869)和领导人之一,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但不够彻底。——第105、400、408页。
- 白恩士,约翰(Burns John 1858—1943)——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八十年代为新工联的首领之一,伦敦码头工人黑工(1889)的领导者;九十年代转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运动;议会议员(1892年起),曾任自由党政府中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905—1914)和贸易大臣(1914)。——第382、469、633页。
-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第301、620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大臣。——第274、317、357、374页。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团体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组织者;杰出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85、223、225、226、489、494、537、600页。
-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Boulanger, Georges-Ernest Jean-Marie 1837—1891)——法国将军,陆军部长(1886—1887);企图通过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惑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第51、85页。
- 布雷梅尔,尤利乌斯(Bremer, Julius)——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雪茄烟工人,马格德堡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第97页。
- 布伦坦诺,路约(Brentano, Lujjo 1844—1931)——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107、109—118、120—149、154、160—162、166—174、177、181—186、188—190、192—195、197—213、360、377页。
- 布罗德赫斯特,亨利(Broadhurst, Henry 1840—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工联领袖之一,改良主义者,职业是泥瓦工,后为工会官僚,工联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1875—1890),自由党议会议员,内政副大臣(1886)。——第382页。
- 弗拉维王朝(Flavian)——罗马皇朝(69—96)。——第532页。
- 弗雷西讷,沙尔·路易·德·索耳斯·德(Freycinet, Charles-Louis de Saulses de 1828—1923)——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历任各部部长,内阁总理(1879—1880、1882、1886、1890—1892);1892年由于巴拿马舞弊案件的揭发名誉扫地而被迫辞职并暂时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423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6、22、25、27、445、587、607页。

- 弗里德里希三世 (Friedrich III 1831—1888)——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1888年3月9日—6月15日)。——第8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Friedrich Wilhelm II 1744—1797)——普鲁士国王 (1786—1797)。——第27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 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 (1797—1840)。——第33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第41页。
- 弗洛凯,沙尔·托马 (Floquet, Charles-Thomas 1828—1896)——法国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众议院议员 (1876—1893),曾多次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内阁总理 (1888—1889);1892年作为巴拿马舞弊案件的参加者被揭发后被迫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423页。
- 弗洛孔,斐迪南 (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517页。
- 古利耶,保尔·路易 (Courier, Paul-Louis 1772—1825)——法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反对法国贵族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第133页。
- 古斯塔夫三世 (Gustav III 1746—1792)——瑞典国王 (1771—1792)。——第28页。
- 汉特,亨利·朱利安 (Hunter, Henry Julian)——英国医生,写有许多关于工人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第150页。
- 汉泽曼,大卫 (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德国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实行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392页。
- 加尔巴(塞尔维乌斯·苏耳皮乌斯·加尔巴) (Sulpicius Galba 公元前5—公元69)——罗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代为西班牙塔腊果纳省总督(执政者);尼禄死后,在68年6月被推为皇帝;69年1月奥托趁军队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统治的时机,策动禁卫兵把他杀死。——第546、548页。
- 加尔文,让 (Calvin, Jean 1509—1564)——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教创始人,这一宗派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第349页。
- 加里波第,梅诺蒂 (Garibaldi, Menotti 1840—1903)——朱泽培·加里波第之子,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曾站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七十年代初为企业家,意大利议会议员 (1876—1900)。——第421页。
- 加瓦齐 (Gavazzi)——意大利政治活动家,九十年代初为议会议员。——第420页。
- 卡贝,埃蒂耶纳 (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第68页。
- 卡利古拉 (Caligula 12—41)——罗马皇帝 (37—41)。——第546页。
- 卡尼茨,汉斯·威廉·亚力山大 (Kanitz, Hans Wilhelm Alexander 1841—1913)——伯爵,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之一;普鲁士议会议员和德意志

- 帝国国会议员,维护大地主的利益。——第575页。
- 卡诺,萨迪(Carnot, Sadi 1837—1894)——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历任各部部长;共和国总统(1887—1894)。——第489页。
- 卡普里维,列奥(Caprivi, Leo 1831—1899)——伯爵,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将军,德意志帝国首相(1890—1894)。——第215、277、296、482页。
- 卡特赖特,艾德蒙(Cartwright, Edmund 1743—1823)——著名的英国发明家。——第354页。
- 卡瓦洛蒂,费利切(Cavallotti, Felice 1842—1898)——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1873年起为议会议员。——第515页。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38、42—44、299、429、507、618页。
-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1868—1918)——俄国皇帝(1894—1917)。——第608页。
-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公元前625左右—562)——巴比伦王(公元前604—562)。——第534页。
- 尼禄(Nero 37—68)——罗马皇帝(54—68)。——第546—548页。
- 圣保罗,威廉(Saint-Paul, Wilhelm 1815左右—1852)——普鲁士内务部官员,1843年为检查“莱茵报”的特别书报检查官。——第393页。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01、244、539、621页。
- 瓦茨,约翰(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第151页。
- 瓦特,詹姆斯(Watt, James 1736—1819)——杰出的英国发明家,万能蒸汽机的设计者。——第354页。
- 瓦扬,爱德华·玛丽(Vaillant, Edouard-Marie 1840—1915)——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1889年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社会党创始人(1901)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225、489页。

六 画

- 多德威尔,亨利(Dodwell, Henry 死于178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第341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真姓为阿鲁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133、527页。
-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ssner, Otto Karl 1819—1902)——汉堡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第593页。
- 托洛尼亚,朱利奥(Torlonia, Giulio 1847—1914)——公爵,意大利贵族,罗马银行监事长。——第420—422页。
- 西吉达(马拉克西安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那(Сигида (Малаксияно),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1862—

- 1889)——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党员,因不能忍受监牢里的体刑而自杀。——第52页。
- 艾里提埃,路易(Héitier, Louis (1863—1898)——瑞士社会主义者,写有许多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著作。——第405—407页。
- 艾瓦德,格奥尔格·亨利希(Evald, Georg Heinrich 1803—1875)——德国东方学家,圣经的研究家和批判家。——第545页。
- 艾威林,爱德华(Aveling, Edward 1851—1898)——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政论家,“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之一;1884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女儿爱琳娜的丈夫。——第70、73页。
- 安敦尼·庇护(Antoninus Pius 86—161)——罗马皇帝(138—161)。——第532页。
- 安条克四世(名王)(Antiochus IV, Epiphanes)——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王(公元前175—164)。——第534页。
- 达尔布瓦,若尔日(Darbois, Georges 1813—1871)——法国神学家,1863年起为巴黎大主教,1871年5月作为人质被公社枪毙。——第223页。
-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256页。
-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1834)。——第35页。
- 吉芬,罗伯特(Giffen, Robert 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贸易部统计局局长(1876—1897)。——第321、377、577页。
- 吉比奇,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伯爵,俄国元帅,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的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第39页。
- 吉霍米罗夫,列甫·亚历山大罗维奇(Тихомиров, 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923)——俄国政论家,著名的“民意党”党员;八十年代末起为革命运动的叛徒,保皇派。——第18页。
- 吉尔斯,尼古拉·卡尔洛维奇(Гирс, 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 1820—1895)——俄国外交家,驻德黑兰(1863年起)、伯尔尼(1869年起)、斯德哥尔摩(1872年起)公使;外交副大臣(1875—1882),外交大臣(1882—1895)。——第17页。
- 吉罗·特龙,阿列克西斯(Giraud Teulon, Alexis 生于1839年)——在日内瓦任历史教授,写有许多原始社会史方面的著作。——第255、258页。
- 吉约姆,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第一国际会员,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407页。
- 考尔德,威廉(Coward, William 1656左右

- 1725)——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第341页。
- 考茨基,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新时代”杂志编辑(1883—1917),八十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写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著作,虽然著作中有错误,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后来完全转到机会主义立场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派的思想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第24页。
- 考茨基夫人,路易莎(Kautsky, Louise)——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1890年起为恩格斯的秘书。——第309页。
- 列奥波特二世(Leopold II 1747—1792)——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0—1792)。——第27页。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r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09页。
-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名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社会学中的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编辑之一。——第504页。
- 米凯尔,约翰(Miquel, Johannes 1828—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九十年代为普鲁士财政大臣。——第274页。
- 米克洛希奇,弗兰蒂舍克(Miklosish, František 1813—1891)——著名的学者,斯拉夫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奠基人;斯洛文尼亚人。——第21页。
- 米切利,鲁伊治(Miceli, Luigi 1824—1906)——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1861年起为议会议员,属于所谓资产阶级“左翼”;农业大臣(1879—1881, 1888—1891)。——第419、420页。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29、31—35、37、38、49页。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44、46、47、497、619页。
-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第55、56、62、282、294—298、415—417、458、622页。
- 亚马多(Amadeo 1845—1890)——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之子,西班牙国王(1870—1873)。——第492页。
- 伊壁鸠鲁(Epikouros)约公元前341—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392页。
- 伊格列西亚斯,帕布洛(Iglesias, Pablo 1850—1925)——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无产阶级政论家,第一国际西班牙

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1872),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1872—1873),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1879)创建人之一,后来成为该党改良派首领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554页。

伊里奈乌斯(Irenaeus 约130—202)——基督教神学家,小亚细亚希腊人,177年起为里昂主教;曾著书反对异教和阐明基督教教义。——第547、548页。

七 画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学者,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497—499、505、508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430、431页。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是个形而上学者,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副教授。——第97、98、334、337页。

君士坦丁(Konstantin 274左右—337)——罗马皇帝(306—337)。——第532、535、612页。

里维,莱昂(Levi, Leone 1821—188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学家。——第321、377页。

利文,赫里斯托弗尔·安得列也维奇

(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774—1839)——公爵,俄国外交家,驻柏林公使(1810—1812),驻伦敦大使(1812—1834)。——第17、37、38页。

吕克,哥特弗利德·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Lücke, Gottfried Christian Friedrich 1791—1855)——德国新教神学家,曾先后在波恩和哥丁根任教授,福音书注释者。——第545页。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著名的法国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国出席维罗那会议(1822)的代表。——第37页。

苏格拉底(Sokrates 约公元前469—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思想家。——第528页。

忒俄克里托斯(Theokritos)——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诗人。——第557页。

沃邦,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曾批评过法国的税收制度。——第301、620页。

希普顿,乔治(Shipton, George)——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彩画匠工联书记,1871—1896年为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第73页。

肖莱马,卡尔(Scharlemmer, Karl 1834—1892)——德国大有机化学家,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63—366页。

辛格尔,保尔(Singer, Paul 1844—1911)——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87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884

- 年起为国会议员,1885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60、77页。
- 伯恩斯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1—1890);1889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恩格斯逝世后,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第60页。
- 伯麦,雅科布(Böhme, Jakob 1575—1624)——德国手工业者,神秘主义哲学家。——第340页。
- 贝克尔,奥古斯特(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论家,瑞士正义者同盟盟员,魏特林的拥护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第529页。
- 贝纳里,弗兰茨·斐迪南(Benary, Franz Ferdinand 1805—1880)——德国东方学家、语文学家和圣经研究者,在柏林任教授。——第545、547、549页。
-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 Jean-Baptiste Jules 1763—1844)——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0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成为王位继承人和瑞典摄政王;1813年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约翰(1818—1844)。——第31页。
- 狄茨,约翰·亨利希·威廉(Dietz, Johann Heinrich Wilhelm 1843—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创办人,1881年起为国会议员。——第246页。
- 狄更斯,查理(Dickens, Charles 1812—1870)——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179页。
-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第416页。
-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第350页。
-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第350页。
- 克勒尔,恩斯特·马提阿斯(Köller, Ernst Matthias 1841—1928)——德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属保守党,国会议员(1881—1888),1894—1895年为普鲁士内务大臣,奉行迫害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第612页。
- 克雷兹(Kroisos)——吕底亚王(公元前560—546)。——第10页。
- 克里斯比,弗兰契斯科(Crispi, Francesco 1818—1901)——意大利国家活动家,活动初期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六十年代末起拥护君主立宪,所谓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87—1891和1893—1896);实行残酷镇压意大利工农运动的政策。——第418—420、426、556、560页。
- 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Christian, Herzog von Glücksburg 1818—1906)——1852年起为丹麦王位继承人,1863—1906年为丹麦国王,称克里斯提安九世。——第42页。
-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扎曼(Clemenceau,

- Georges Benjamin 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起为激进党领袖,内阁总理(1906—1909和1917—1920),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第297页。
- 克虏伯,弗里德里希·阿尔弗勒德(Krupp, Friedrich Alfred 1854—1902)——德国最大的钢铁和军事工业巨头。——第586页。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贵族的领袖;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349页。
- 克劳狄乌斯(Claudius 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皇帝(41—54)。——第534、546页。
- 李比希,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363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90—1900);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支持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77、105、135、272、289、290、632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第236、239页。
- 李希特尔,欧根(Richter, Eugen 1838—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思想党领袖,国会议员。——第451页。
- 麦金利,威廉(McKinley, William 1843—1901)——美国国家活动家,共和党领袖之一,1877年起曾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890年提出有利于垄断资本家的提高关税的法案;曾任美国总统(1897—1901),对外实行侵略政策。——第389页。
-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MacMahon, 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 1808—1893)——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法战争的参加者;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总司令,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第556、600页。
- 麦克伦南,约翰·弗格森(McLennan, John Ferguson 1827—1881)——苏格兰资产阶级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婚姻和家庭史方面的著作。——第246、251—258页。

八 画

-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利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第550页。
- 居利希,古斯塔夫(Gülich, Gustav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第22页。
- 林顿,威廉·詹姆斯(Linton, William James 1812—1897)——英国雕刻家、

- 诗人和政论家,共和主义者,“英格兰共和国”杂志出版者,该杂志刊登过赫尔岑的文章;1866年侨居美国。——第497页。
- 门格尔,安东(Menger, Anton 1841—1906)——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第333、525页。
-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Shaftesbury, Anthony, Earl of 1671—1713)——英国道德论哲学家,自然神论的卓越的代表人物;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第352页。
-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165页。
- 易卜生,亨利克(Ibsen, Henrik 1828—1906)——卓越的挪威剧作家。——第96页。
- 阿德勒,维克多(Adler, Victor 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89—1895年曾与恩格斯通信;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工人报”编辑,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第60、590页。
- 阿德里安(普卜利乌斯·艾利乌斯·阿德里安)(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138)——罗马皇帝(117—138)。——第532页。
- 阿尔比布,爱德华多(Arbib, Edoardo 1840—1906)——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属资产阶级右翼,议会议员(1879—1895)。——第421页。
- 阿尔勃希特,卡尔(Albrecht, Karl 1788—1844)——德国商人;曾因参加“蛊惑者”的反政府运动被判处六年徒刑。1841年移居瑞士,在那里以宗教神秘主义形式鼓吹近似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第529页。
- 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es)——十二至十三世纪统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柏尔人的封建王朝。——第526页。
- 阿尔摩拉维德王朝(Almoravides)——十一至十二世纪统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柏尔人的封建王朝。——第526页。
- 阿耳维西(Alvisi)——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参议员,1889年曾检查罗马银行。——第418—421页。
- 阿基米得(Archimedes 公元前287左右—212)——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和机械学家。——第439页。
- 阿克莱,理查(Arkwright, Richard 1732—1792)——英国企业家;占有他人在英国的许多发明专利权。——第354页。
-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Ariosto, Lu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201页。
- 阿那克萨哥拉(小亚细亚克拉左门的)(Anaxagoras of Klazomenae 公元前500左右—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第339页。
- 彼得一世(Петр I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21、22、26页。
- 彼得三世(Петр III 1728—1762)——俄国皇帝(1761—1762)。——第25页。
- 波茨措·油·博尔哥,卡尔·奥西波维奇(Потцо-дн-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伯爵,俄国外交家,原系科西嘉人,1814—1821年是驻巴黎公使,1821—1835年为大使,后来是驻伦敦大使(1835—1839)。——第17、38页。

- 波旁王朝 (Bourbon)——法国王朝 (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 和西班牙王朝 (1700—1868 和 1874—1931)。——第33、39、475页。
- 拉伯克, 约翰 (Lubbock, John 1834—1913)——英国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 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 金融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写有许多关于原始社会史方面的著作。——第254、256页。
-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 (1879); 1889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 卡尔·马克思女儿劳拉的丈夫。——第281、307、337、561、583页。
- 拉法格, 劳拉 (Lafargue, Laura 1845—191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卡尔·马克思的女儿, 1868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第307页。
- 拉弗勒, 艾米尔·路易·维克多·德 (Lavelleye, Emile Louis-Victor de 1822—1892)——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第128、186页。
- 拉梅耐, 费里西德 (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甫, 政论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529页。
- 拉普拉斯, 比埃尔·西蒙 (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他的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有力地动摇了宗教上的创世说。——第343页。
- 拉萨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律师, 1848—1849年曾参加莱茵省的民主运动, 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 是全德工人联合会 (1863) 创建人之一; 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60、64、67、77、80、105、106、135、265、288—290、334、363、490、602页。
- 拉斯克尔, 爱德华 (Lasker, Eduard 1829—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 支持俾斯麦政策的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第165、199页。
- 拉扎罗尼, 米凯莱 (Lazzaroni, Michele)——男爵, 意大利贵族, 切扎雷·拉扎罗尼的侄子。——第423页。
- 拉扎罗尼, 切扎雷 (Lazzaroni, Cesare 生于1825年)——男爵, 罗马银行总出纳员。——第421—423、425页。
- 罗班, 保尔 (Robin, Paul 生于1837年)——法国教师, 巴枯宁主义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 总委员会委员 (1870—1871),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伦敦代表会议 (1871) 代表。——第406页。
- 罗杰斯, 詹姆斯·爱得文·撒罗耳德 (Rogers, James Edwin Thorold 1823—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写有许多英国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第150页。
- 罗斯科, 亨利·恩菲耳德 (Roscoe, Henry Enfield 1833—1915)——英国化学家, 写有许多化学教科书。——第363页。
- 罗伊, 亨利 (Roy, Henry)——英国医生和经济学家。——第112、113、116、135、

- 137—139, 143, 159, 163, 164, 168, 169, 171—174, 182, 183, 204—207, 209, 210页。
-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 1835, 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第40, 43, 397, 403页。
- 帕涅尔,威廉(Parnell William)——英国工会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红木工会领袖;八十至九十年代赞成英国工联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386页。
- ## 九 画
- 柏拉图(Platon 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532页。
- 保罗一世(Павел I 1754—1801)——俄国皇帝(1796—1801)。——第17, 29, 38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首相(1868和1874—1880)。——第358页。
-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为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领袖。——第348页。
- 奎尔奇,哈利(Quelch, Harry 1858—1913)——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工联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左翼领袖之一,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进行过斗争,支持第二国际各党的左派;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386页。
- 律斯勒,康斯坦丁(Röler, Konstantin 1820—1896)——德国政论家和官员;他以柏林半官方的书籍出版局领导人(1877—1892)的身分替俾斯麦政策作辩护。——第610页。
- 品得(Pindaros 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曾写了许多瑰丽的颂诗。——第158页。
- 契普里昂尼,阿米耳卡雷(Cipriani, Amilcare 1845—1918)——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六十年代为加里波第派,巴黎公社参加者,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第617页。
-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玛丽-泰莉莎女皇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80—1790)。——第23, 25, 27页。
-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288, 517页。
- 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枪杀。——第75页。

-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349页。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第37页。
- 查理十二(Charles XII 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第19页。
- 查普卡男爵(Сzapka)——奥地利政府参事。——第470页。
-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那(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劳动解放社”创始人之一;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第61页。
- 哈第,詹姆斯·凯尔(Hardie, James Keir 1856—1915)——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职业是矿工,后为政论家,苏格兰工党(1888年起)和独立工党(1893年起)的创始人和领袖,工党的积极活动家。——第382、469页。
-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主。——第494、505页。
- 哈特莱,大卫(Hartley, David 1705—1757)——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第341页。
- 柯林斯,安东尼(Collins, Anthony 1676—172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第341页。
- 柯瓦列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写有许多原始公社制度史方面的著作。——第338页。
-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274、357页。
- 科柯斯基,赛米尔(Kokosky, Samuel 1838—1899)——德国政论家,1872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第408页。
- 科拉扬尼,拿破仑涅(Colajanni, Napoleone 1847—1921)——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八十年至九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者;1890年起为议会议员。——第419—422页。
-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341页。
- 洛伊特纳,卡尔(Leuthner, Karl 生于186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工人报”编委;1911年起为议会议员。——第482页。
-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67、244、342、380、501页。
- 欧文斯,约翰(Owens, John 1790—1846)——英国商人,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创建人。——第363、365页。
- 施杜姆,卡尔(Stumm, Karl 1836—1901)——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人,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第586页。
- 施特恩堡,列甫·雅柯夫列维奇(Штернберг, Лев Яковлевич 1861—1927)——俄国民族学家,由于参加民意党组织而被流放到库页岛(1889—1897),在那里

- 对当地居民进行民族学的研究;1918年起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1924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第410、411、413页。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传”一书的作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531页。
- 施瓦尔岑堡,费里克斯(Schwarzenberg, Felix 1800—1852)——公爵,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48年10月维也纳起义被镇压后任首相兼外交大臣。——第42页。
- 威尔逊,约瑟夫·哈弗洛克(Wilson, Joseph Havelock 1858—1929)——英国工联运动活动家,海员和司炉工全国工会的组织者和主席(1887年起);1892年起曾多次当选为议会议员,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主义者。——第382、469页。
-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制定资产阶级的殖民理论。——第164、176、183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61—1888)和德国皇帝(1871—1888)。——第5、9、47、599页。
- 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1888—1919)。——第4—6、9、10、54、608、618、625—628页。
- 威廉四世(Wilhel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第41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军,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第33页。
- 威斯特华伦,燕妮(Westphalen, Jenny)——见马克思,燕妮。

十 画

-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镟工;1867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支持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第77、105、135、165、199、289、290、441、602、625、632页。
- 俾斯麦,奥托(Bismark, Otto 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1878年他实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4—7、9—11、46、47、49、54、57、91、

- 215—217, 220, 283, 290, 293, 296, 319, 330, 376, 416, 426, 464, 465, 555, 560, 595, 599, 602, 610, 611, 625, 636页。
- 哥尔查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1854—1856), 外交大臣 (1856—1882)。——第17, 45页。
- 库尔曼, 格奥尔格 (Kuhlmann, Georg 生于1812年)——奥地利政府的密探, 自命是“预言者”, 四十年代用宗教的词句对瑞士的德国魏特林派手工业者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第529, 530页。
- 纳杰日杰, 若昂 (N dejde, Joan 1854—1928)——罗马尼亚政论家, 社会民主主义者, 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 九十年代转到机会主义立场, 1899年加入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 反对工人运动。——第247页。
- 涅谢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维奇 (Не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总理大臣, 外交大臣 (1816—1856)。——第17, 38, 40页。
- 纽文胡斯, 斐迪南·多梅拉 (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 1846—1919)——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 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1888年起为议会议员; 1889, 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九十年代转到无政府主义立场。——第281页。
- 热尔韦, 阿尔弗勒德·阿尔伯 (Gervais, Alfred Albert 1837—1921)——法国海军上将,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普法战争和侵华远征 (1860); 1891年率法国分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第417页。
- 茹柯夫斯基, 尤利·加拉克提昂诺维奇 (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俄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国家银行行长, 他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攻击。——第504, 506页。
- 桑基, 艾拉·戴维 (Sankey, Ira David 1840—1908)——美国新教传教士。——第356页。
- 翁伯托一世 (Umberto I 1844—1900)——意大利国王 (1878—1900)。——第422页。
- 乌尔卡尔特, 戴维 (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 反动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1847—1852年为议会议员, 托利党人。——第15, 16, 41页。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165页。
- 埃德, 艾米尔·德吉烈·弗朗斯瓦 (Eudes, Emil-Désiré-François 1843—1888)——法国革命家, 布朗基主义者, 国民自卫军的将军和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后迁英国; 回法国 (1880年大赦) 后为布朗基主义者中央革命委员会组织者之一。——第223, 489页。
- 埃伦弗罗伊恩德, 伊西多尔 (Ehrenfreund, Isidor)——奥地利银行职员, 维也纳银行和信用机关官员俱乐部会员。——第58页。
- 埃斯库罗斯 (Aischylos 公元前525—45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古典悲剧剧作家。——第248, 250页。

- 恩格耳曼, 保尔(Engelmann, Paul 1854—1916)——匈牙利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白铁工人; “工人纪事周报”编辑; 以左派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创始人(1890)和领导成员之一, 1892年被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 匈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者和领导人(1892—1894), 1894年起为“工人报”通讯员。——第414页。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传记材料)。——第15、25、34、40、58—61、63、64、68、70、77、78、80、81、83、84、88、89、92—106、109—111、113、116、119、122、130、131、133、137、197、198、203、206、207、212、213、215—217、229—233、235、243—247、257、259—261、266、269—272、276—278、282、283、287、298、304—311、314—317、322—328、330、332、333、337—341、346、347、361、362、364—367、371—373、380、381、383、387—389、393、394、397、400、405—409、414、430、431、435—437、439、441—448、461、468—470、472—474、477—487、489—491、494、503、504、510、514、515、518—522、527—529、533、548、553—556、558、560—562、575、579、583、585、588—591、593、612—614、617、618、620—623、624—626、628—635页。
- 恩斯特, 保尔(Ernst, Paul 1866—1933)——德国政论家, 批评家和剧作家; 八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 “青年派”领袖之一; 1891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 后来为法西斯主义者。——第93—99页。
- 格拉古(凯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C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53—121)——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23—122), 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 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之弟。——第610页。
- 格拉古(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63—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33), 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第610页。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派,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26、52、110—120、122—126、128、129、131、132、134、135、138—150、154、156—165、167—184、186—196、198—207、210—213、383、466页。
- 格雷维, 茹尔(Grévy, Jules 1807—1891)——法国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共和国总统(1879—1887)。——第489页。
- 格里马耳迪, 贝尔纳丁诺(Grimaldi, Bernardino 1841—1897)——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1876年起为议会议员, 属于所谓资产阶级“左翼”, 财政大臣(1879、1888—1889、1890—1891), 国库大臣(1892—1893)。——第421—424页。
- 格娄弗诺, 休·鲁普斯, 韦斯明斯特公爵(Grosvenor, Hugh Lupus, Duke of Westminster 1825—1899)——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大地主。——第59页。
-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Hyndman, Henry

- Mayers 1842—1921)——英国社会主义者;民主联盟的创始人(1881)和领袖,该联盟于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中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后为英国社会党领袖之一,1916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第71、72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60、424、468、540页。
- 马尔提尼,斐迪南多(Martini, Ferdinando 1841—1928)——意大利剧作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所谓资产阶级“左翼”,曾任教育大臣(1892—1893)。——第421页。
- 马尔提涅蒂,帕斯夸勒(Martignetti, Pasquale)——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意大利文。——第244、247页。
- 马赫迪——见穆罕默德·阿罕默德。
- 马可·奥里略·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121—180)——罗马皇帝(161—180),斯多葛派哲学家。——第532页。
- 马克思,亨利希(Marx, Heinrich 1782—1838)——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律师,后为特利尔司法参事。——第392页。
-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第15、40、47、60、61、63、64、67、68、81、90、94、96、97、98、100、103、105、106、107—149、154—213、216、217、226、230、234—236、239、240、256、258、288、289、293、294、301、307、309、315、319、327、333、334、337、338、341、342、353、364、365、372、376、392—394、397—404、406、429、472、477、479、481、483、488、490、498、499、503—506、510—514、516、560、585、588、591—594、597、598、600、602、634页。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父姓为冯·威斯特华伦 geb. von Westphalen)——卡尔·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307、393、400页。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44—1883)——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卡尔·马克思的大女儿,1872年起为沙·龙格的妻子。——第307、400页。
-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Marx-Aveling, Eleanor 1855—1898)——八十至九十年代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政论家,卡尔·马克思的女儿,1884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子;曾在弗·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和罢工斗争;曾参加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代表。——第70、71、73、110、129、130、133、186—189、192—197、201、202、205、307页。
- 马拉斯特,阿尔芒(Marast, Armo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民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第288页。
- 马其顿的菲利浦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ia 公元前382左右—336)——马其顿王(公元前359—336)。——第541页。
-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541页。

- 马特金,威廉(Matkin William)——英国工联活动家,木工和细木工工会领导人;九十年代反对英国工联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386页。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1849年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46、398页。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29—33、35、38、94、222、226、296、343、453、475、566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43、46、47、216、219、220、319、330、355、376、397、403、437、593、599、627页。
- 泰勒,塞德莱(Taylor, Sedley 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英国合作运动参加者,鼓吹工人参与资本家分红的制度。——第109、110、127—131、137、145、147、186—196、200—203、205页。
- 泰罗,爱德华·伯纳特(Tyler, Edward Burnett 1832—1917)——著名的英国民族学家,文化史和民族学进化论学派的创始人。——第248页。
-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提奇(Ткачев,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5)——俄国革命家,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第494、497页。
- 特利尔,格尔桑(Trier, Cerson 生于1851年)——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丹麦社会民主党革命少数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教师,进行过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改良主义政策的斗争;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丹麦文。——第247页。

十一画

- 盖布,奥古斯特(Geib, August 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财务委员(1872—1878),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7)。——第105页。
- 荷马(Homerus)——半传说中的古希腊叙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204页。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C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394页。
- 勒南,厄内斯特·约瑟夫(Renan, Ernest-Joseph 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因写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526、527、531、533、538、545、549页。
- 琉善(Lucianus 约120—180)——杰出的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第527、528页。
-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Bacon, ,

-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第339—342页。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96、201页。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首相(1836、1840),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214、221、223、296、556、599页。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同时,因写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345页。
- 康莫迪安(Commodian 三世纪上半叶)——拉丁诗人和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宗教活动家。——第533页。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贩卖政策。——第392页。
-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公,1814年起任波兰军总司令,实际上是波兰总督(1814—1831)。——第40页。
- 累瑟姆,罗伯特·戈登(Latham, Robert Gordon 1812—1888)——英国语文学家和民族学家,伦敦大学教授。——第252页。
- 累塞普斯子爵,斐迪南·玛丽(Lesseps, Ferdinand-Marie, vicomte de 1805—1894)——法国工程师和实业家;开凿苏伊士运河(1859—1869)的国际公司组织者;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在巴拿马舞弊案件被揭发以后,于1893年被判处五年徒刑。——第423页。
- 累塞普斯,沙尔·艾梅·玛丽(Lesseps, Charles Aimé Marie 1849—1923)——法国实业家,斐迪南·累塞普斯之子,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人之一;在巴拿马舞弊案件被揭发以后,于1893年被判处一年徒刑。——第423、424页。
- 曼纳斯,约翰·詹姆斯·罗伯特(Manners, John James Robert 1818—19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四十年代参加“青年英国”社,议会议员,历任保守党政府各部大臣。——第358页。
- 曼特耳,吉迪恩·阿尔杰农(Mantell, Gideon Algernon 1790—1852)——英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企图把科学材料同圣经传说调和起来。——第342页。
-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1月)和首相(1850—1858)。——第57页。
- 梅林,弗兰茨(Mehring, Franz 1846—1919)——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卡·马克思传的作者;“新时代”杂志编辑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创建德国共产党时起卓越的作用。——第205页。

梅萨·伊·列奥姆帕特·霍赛(Mesa y Leompert, José 1840—1904)——著名的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1872—1873),曾与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第230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派;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41页。

莫尔,托马斯(More, Thomas 1478—1535)——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大法官;人道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第24页。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Molière, Jean-Baptiste 1622—1673)(真姓为波克兰 Poquelin)——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159、169、174、183、207、209页。

莫斯赫(Moschos)——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古希腊诗人。——第557页。

梭恩,威廉·詹姆斯(Thorne, William James 1857—1946)——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书记;1906年起为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386页。

梭伦(Solon 约公元前638—558)——闻名

的雅典立法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许多反对世袭贵族的法律。——第504页。

十二画

费里,茹尔·弗朗斯瓦·卡米尔(Ferry, Jules-François-Camille 1832—1893)——法国律师,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70—1871),积极镇压革命运动;内阁总理(1880—1881和1883—1885);奉行积极的殖民主义政策。——第215、489页。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67、244、258、540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345、364页。

焦利蒂,卓万尼(Giolitti, Giovanni 1842—1928)——意大利国家活动家,所谓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1889—1890年为国库大臣,1892—1893年为首相;由于罗马银行舞弊行为的揭露被迫辞职,并暂时脱离政治活动。——第419、420、423、425页。

腊韦,昂利(Ravé, Henri)——法国新闻记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法文。——第247页。

琼斯,理查(Jones, Richard 1790—1855)——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衰落和瓦解,同时他却在许多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超过了李嘉图。——第197页。

- 提比利乌斯(Tiberius 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14—37)。——第546页。
- 博林布罗克,亨利(Bolingbroke, Henry 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第352页。
- 博马舍,比埃尔·奥古斯丹(Beaumarchais, Pierre Augustin 1732—1799)——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133页。
- 博维奥,卓万尼(Bovio, Giovanni 1841—1903)——意大利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和反教权主义者,1876年起为议会议员,那不勒斯的大学教授。——第326—328页。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Beust, Friedrich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伍,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教育学教授。——第447页。
- 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第475页。
- 斐洛(亚历山大里亚的)(Philo of Alexandria 约公元前20—公元54)——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第532、535、542页。
-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洛伦斯(Kelley-Wischnewetzky, Florence 1859—1932)——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流亡国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第311、367页。
-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左右—44)——著名的罗马统帅,国家活动家和作家;著有“高卢战记”一书。——第255页。
- 普里斯特利,约瑟夫(Priestley, Joseph 1733—1804)——著名的英国化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产业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家。——第341页。
-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杰出的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哲学家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创始人;1889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八十至九十年代曾与民粹派进行斗争,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后为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282、477、498、503页。
-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伟大的俄国诗人。——第32页。
- 斯蒂凡,亨利希(Stephan, Heinrich 1831—1897)——德国国家活动家,德意志帝国邮电部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第89页。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32、173页。
- 斯密斯,罗伯特·安格斯(Smith, Robert Angus 1817—1884)——英国化学家。——第363页。
- 斯图亚特王朝(Stuart)——1371年起统治苏格兰和英格兰(1603—1649、1660—

1714)的王朝。——第352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St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第197页。
 汤隆古,贝尔纳多(Tanlongo, Bernardo 约生于1820年)——意大利大企业家,1882年起为罗马银行经理。——第420—422, 424, 425页。
 汤普逊,威廉(Thompson, William 1785左右—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第333页。

十三画

蒙德拉,安东尼·约翰(Mundella, Anthony John 1825—189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工厂主,1868年起为议会议员,历任各部大臣。——第166, 181页。
 瑞日卡,扬(Zizka, Jan 1360左右—1424)——杰出的捷克统帅和政治活动家,胡斯运动领袖之一,塔博尔派军事首领,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第526页。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罗马最著名的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的作者。——第255, 534, 547, 552页。
 奥艾尔,伊格纳茨(Auer, 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来转到改良主义立场。——第77, 105页。
 奥尔良王朝(Orléans)——法国王朝(1830—1848)。——第50页。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Op-

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伯爵,1856年后为公爵,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曾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1856)。——第46页。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63—公元前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第546页。
 奥托(马可·萨耳维·奥托)(Marcus Selsius Otho 32—69)——罗马国家活动家,卢济塔尼亚省(比利牛斯半岛西南部)总督(执政者);69年1月他趁军队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统治的时机策动禁卫兵推翻加尔巴,加尔巴被杀后被推为皇帝;69年4月在绵延不绝的内战中战败后自杀。——第546, 548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派首领之一,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主义者。——第561, 562页。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年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中作了揭露。——第398, 403, 488页。
 福塞特,亨利(Fawcett, Henry 1833—188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 家,1865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159页。
-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ö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第356—357页。
- 福提斯,亚历山大罗(Fortis, Alessandro 1842—1909)——意大利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80年起为议会议员,所谓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第422页。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阶级思想家,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第348、349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第59、314、370、620、621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22、301页。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222页。
-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218、219、274、350、356页。
- 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éon)——见拿破仑第三。
- 塞琉古王朝(Seleucus)——统治亚洲最大的希腊化王国的王朝(公元前312—64)。——第545页。
- 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公元前4左右—公元65)——罗马哲学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所谓新斯多葛学派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伦理学学说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有过影响。——第532页。
- 杨楚克,尼古拉·安德列也维奇(Ячук,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1859—1921)——俄国民族学家,民歌搜集家;八十至九十年代为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民族学部部长。——第410页。
- 杨格,阿瑟(Young, Arthur 1741—1820)——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十八世纪末出版的“爱尔兰旅行记”一书的作者。——第150页。

十四画

- 歌德,约翰·沃尔夫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201、344页。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47年侨居国外,在国外建立了“俄国自由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文集和“钟声”报。——第494、497、505页。
- 玛丽-泰莉莎(Maria Theresia 1717—1780)——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女皇(1745—1780)。——第25页。
-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 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64、225、226、230、394、403、406、537、600页。
- 维伯,悉尼·詹姆斯(Webb, Sidney James 1859—1947)——英国政治活动家,费边社创建人之一;曾和自己的妻子比阿特里萨·维伯合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宣扬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来解决工人问题的思想。——第636页。
- 维勒,布鲁诺(Wille, Bruno 1860—1928)——德国作家和戏剧活动家,八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派”领袖之一。——第99页。
- 维特利乌斯(奥鲁斯·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 15—69)——罗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执政者),69年1月被推为皇帝,但是到年底在绵延不绝的内战中战败被杀。——第534、546页。
- ### 十五画
- 德拉瓦勒,卡洛(Dell'Avalle, Carlo)——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1894年为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成员。——第555页。
- 德留蒙,爱德华·阿道夫(Drumont, Edouard Adolphe 1844—1917)——法国反动政论家,写有许多反犹太人主义的书籍和文章。——第58页。
-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约公元前460—370)——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第339页。
- 鲁迪尼侯爵,安东尼奥·斯塔腊巴(Rudini, Antonio Starrabba, marchese di 1839—1908)——意大利国家活动家,大地主,温和的自由党人;首相(1891—1892和1896—1898);实行镇压工农运动的政策。——第419、420、426页。
- 鲁维埃,莫里斯(Rouvier, Maurice 1842—1911)——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历任各部长和内阁总理;1892年作为巴拿马舞弊案件的参加者被揭发后被迫辞职并暂时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297、423、425—426页。
- 摩尔根(Morgan)——美国上校,路·亨·摩尔根的兄弟。——第259页。
-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杰出的美国学者,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246、252、254—259页。
- ### 十六画
- 鲍格雷夫,罗伯特·哈利·英格利斯(Palgrave, Robert Harry Inglis 1827—1919)——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杂志的出版者(1877—1883)。——第322、379页。
- 鲍古斯拉夫斯基,阿尔伯特(Boguslawski, Albert 1834—1905)——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波兰起义(1863—1864);九十年代起积极为德国民族主义报刊撰稿。——第608、610—611页。
- 鲍洛施,阿路易斯(Barosch, Alois 1797—1869)——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布拉格的书商,奥地利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第472页。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

- 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派;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392、393、400、531、532、552页。
-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第340—342、352页。
- 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奥古斯特·亨利希(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August Heinrich 1798—1874)——德国资产阶级诗人和语文学家。——第465页。
-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 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他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第333页。
- 霍普金斯,托马斯(Hopkins, Thomas)——十九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333页。
-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489、517页。
- 赖纳克男爵,雅克(Reinach, Jacques, baron de 死于1892年)——法国银行家,经管巴拿马运河公司财务,在巴拿马舞弊案件被揭发以后自杀。——第424页。
- 穆尔,赛米尔(Moore, Samuel 1830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员,曾与爱·艾威林一起将“资本论”第一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64页。
- 穆迪,德怀特·莱曼(Moody, Dwight Lyman 1837—1899)——美国新教教会活动家和传教士。——第356页。
- 穆罕默德·阿罕默德(Mohammed Ahmed 1843—1885)——伊斯兰教传教士,1881年开始的反对苏丹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起义的领袖。——第526页。
- 穆罕默德·阿利(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1831—1833年和1839—1840年曾进行过反土耳其苏丹的战争,其目的是要使埃及成为不依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第40页。

十七画

- 戴克里先(Diocletianus 245左右—313)——罗马皇帝(284—305)。——第611页。
- 谦楠,乔治(Kennan, George 1845—1924)——美国记者和旅行家;1885—1886年游历了西伯利亚,后来他在一组题为“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的文章里叙述了这次旅行的印象。——第51页。

十八画

- 萨耳梅朗·伊·阿萨索,尼古拉斯(Salmerón y Alonso, Nicolás 1838—1908)——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马德里大学历史学和哲学教授;西班牙共和国临时总统

(1873年7月18日—9月7日)。——第492页。
魏特林,威廉(W eitt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

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第68、288、326、327、526、529、537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四 画

巴兰——据圣经传说,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巫师,巴勒召他来咒诅以色列人。——第536、538页。

巴勒——据圣经传说,是摩押王。——第536页。

巴录——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巴录书的作者。——第534页。

以诺——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以诺书的作者。——第534、543页。

以赛亚——据传说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作者。——第535、545、549页。

以斯拉——据传说是圣经中以斯拉记的作者。——第534页。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第543页。

五 画

尼哥拉——据圣经传说,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异教教派之一的创始人。——第538页。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第527、550页。

圣乔治——传说中的基督教“圣徒”,降龙者。——第193、201页。

叶甫盖尼·奥涅金——亚·谢·普希金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第32页。

六 画

米迦勒——据圣经传说,为天使长之一。——第545页。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之一;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第534页。

亚格斯都士——古希腊神话中克丽达妮斯特拉的情夫,他同她一起杀害了亚加米农;埃斯摩罗斯的悲剧“亚加米农”和“祭酒的报信人”(“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一和第二部)中的人物。——第249页。

亚加米农——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时古希腊军队的领袖,被自己的妻子克丽达妮斯特拉和亚格斯都士杀害;埃斯库罗斯同名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一部)中的人物。——第249页。

七 画

但以理——圣经中的先知,据传说是圣经中但以理书的作者。——第533、534、543、545页。

克丽达妮斯特拉——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的妻子,杀害了从特洛伊战争回来的丈夫;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中的人物。——第249页。

八 画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

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第249、250页。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阿基里斯是由于箭镞射中了他的脚跟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而去世的。——第323页。

佩雷格林——琉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中的人物,奸徒和罪犯,在传教士的外衣下进行活动。——第527—530页。

使徒犹大——据传说是新约中犹大书的作者。——第534页。

依理逆司神——古希腊神话中的三个复仇女神,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祭酒的报信人”和“厄默尼德”(“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部)中的人物。——第249、250页。

九 画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第527、531、538页。

耶和華——犹太教中的主神。——第549页。

耶洗别——据旧约传说,是暴虐残忍的以色列王后,废古犹太教,改奉阿斯塔尔塔女神(腓尼基神话中的农神和爱神);耶洗别这个名字在新约启示录中作为淫乱和渎神的化身。——第538页。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多人写成的。——第533—535、541、543、544、549页。

十 画

埃卡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

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捍卫者的典型形象。——第99页。

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悔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第527页。

十一 画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527、528、532、535、543—545、548—551页。

十二 画

雅典娜·帕拉斯——古希腊神话中主要神祇之一,战神和智慧的化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第249、250页。

十三 画

奥列斯特——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和克丽达妮斯特拉的儿子,为父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亚格斯都士;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祭酒的报信人”和“厄默尼德”(“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部)中的人物。——第248、249页。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官架十足、愚昧无知的化身。——第196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诙谐者,酒徒。——第201页。

塞米拉米达——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国势强盛、宫廷华丽和艳行营称。——第24页。

瑟息替斯——荷马“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

乖戾而又尖酸刻薄的驼背瘸子。——第204页。

十五画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

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第247、535页。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 “人民报”(《Das Volk》)——伦敦出版。——第403页。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莱比锡出版。——第112、114、116、131、160、162、167、170、172、173、176、117、181、183—185、188、196、198、199、204、488页。
-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马格德堡出版。——第93、97页。
- “人民论坛”(《Volkstribüne》)——见“柏林人民论坛”。
-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不伦瑞克出版。——第400页。
- “人民言论”(《Nápszava》)——布达佩斯出版。——第103、104、522页。
- “人民之友报”(《Volkfreund》)——布隆出版。——第304、305页。

三 画

-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维也纳出版。——第11、60、76、261、362、471、482、485、513、590页。
- “工人年鉴”(《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利尔出版。——第285、287页。
- “工人纪事周报”(《Arbeiterwochen-Chronik》)——布达佩斯出版。——第103、

104、522页。

“工人新闻”(《Arbeiterpresse》)——布达佩斯出版。——见“工人纪事周报”。

四 画

- “公文集”(《Portfolio》)——伦敦出版。——第41页。
- “公益”(《The Commonwealth》)——伦敦出版。——第317、373页。
- “今日”(《To-Day》)——伦敦出版。——第187、189、192、193、201、202、205页。
-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伦敦出版。——第112、162、168、174、182页。

五 画

- “民意导报”(《Безпартійний Народний Голос》)——日内瓦出版。——第504页。
- “民族学评论”(《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莫斯科出版。——第413页。
- “世纪报”(《Il Secolo》)——米兰出版。——第423页。

六 画

- “阶级斗争”(《Lotta di classe》)——米兰出版。——第556页。
-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伦敦出版。——第118、119、144、210页。
-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 Zeit-

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柏林出版。——第109、111、112、116、125、127、131、132、134、136、137、160、162、163、166、167、170—172、174—177、181、184、188、192—194、198—201、204、205页。

“自由论坛”(《Freie Bühne》)——柏林出版。——第94、96页。

“自由思想报”(《Freisinnige Zeitung》)——柏林出版。——第451页。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伦敦出版。——第403页。

七 画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出版。——第517页。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伦敦出版。——第118、119、144、211页。

“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伦敦出版。——第306—308、631、636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敦出版。——第118、119、144、187、211页。

“那不勒斯信使报”(《Corriere di Napoli》)——第422、423页。

“社会发展”(《Le Devenir social》)——巴黎出版。——第552页。

“社会民主党人”(《Der Sozialdemokrat》)——柏林出版。——第562、583页。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ъ-демократъ》)——伦敦、日内瓦出版。——第13页。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ъ-демократъ》)——塞夫利厄伏出版。——第477、478、635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苏黎世、伦敦出版。——第3、11、60、78、80、82、83、88—90、92页。

“社会评论”(《Critica Sociale》)——米兰出版。——第326、328、518、558—560页。

“社会政治科学手册”(《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耶拿出版。——第404页。

“社会主义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机关报”(《Le Parti Socialiste Organ du 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Central》)——巴黎出版。——第489页。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巴黎出版。——第63、102、215、283、332、474、519、623、630页。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马德里出版。——第63页。

“社会主义者大学生”(《L'Étudiant socialiste》)——布鲁塞尔出版。——第487页。

“时代”(《Time》)——伦敦出版。——第13页。

八 画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288页。

九 画

“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见“前进。柏林人民报”。

“柏林人民论坛”(《Berliner Volks-Tribüne》)——第97、405、408页。

“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莫斯科出版。——第409—413页。

“美国评论”(《American Review》)——纽约出版。——第252页。

“欧洲通报”(《Beaujour Européen》)——彼得堡出版。——第504页。

“前进报”(《Vorwärts》)——巴黎出版。——第393、400页。

“前进报”(《Vorwärts》)——莱比锡出版。——第337页。

“前进。柏林人民报”(《Vorwärts Berliner

Volksblatt) —— 柏林出版。—— 第 6、82、99、100、243、366、391、417、426、433、435、469、485、511、512、561、562、588页。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伦敦出版。—— 第175页。

“钟声”(《Kookl》)—— 伦敦、日内瓦出版。—— 第61页。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енныя Вѣстники》)—— 彼得堡出版。—— 第504页。

十 画

“凉亭”(《Die Gartenlaube》)—— 莱比锡出版。—— 第60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第397、403页。

“闪电报”(《L'Éclair》)—— 巴黎出版。—— 第617、623页。

“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出版。—— 第109、112—119、121、122、124、127、128、130、134、135、137、139、144、164、165、170、176—180、183、184、186—188、190、191、193—195、198—202、205、207、208、210页。

十一 画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伦敦出版。—— 第116—119、128、144、180、184、188、199页。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 伦敦出版。—— 第116—119、128、137—139、144—146、180、184、188、199、205、207—210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 伦敦出版。—— 第118、110、144、210页。

“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Sheffield Free Press》)—— 第403页。

“现代人”(《Contemporain》)—— 雅西出版。—— 第247、635页。

十二 画

“费加罗报”(《Le Figaro》)—— 巴黎出版。—— 第624、630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科伦出版。—— 第392、400页。

十三 画

“蜂房”(《Bee Hive》)—— 伦敦出版。—— 第155页。

“解放”(《La Riscossa》)—— 巴勒摩出版。—— 第558页。

“新堡每日纪事报”(《Newcastle Daily Chronicle》)—— 伦敦出版。—— 第6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科伦出版。—— 第89、234、394、403、591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伦敦、汉堡出版。—— 第397、403、593页。

“新时代”(《Die Neue Zeit》)—— 斯图加特出版。—— 第13、106、212、229、259、263、282、285、361、373、388、389、413、457、513、523、562、563、588、612页。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 维也纳出版。—— 第481、482页。

十四 画

“旗帜报”(《The Standard》)—— 伦敦出

版。——第119、144、211页。

十五画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393、400、479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莱比锡出版。——第393页。

“德国周报”(《Deutsches Wochenblatt》)——柏林出版。——第211、212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第394、400页。

“黎明”(《Przed świt》)——伦敦出版。——第330页。

“论坛报”(《La Tribuna》)——罗马出版。——第326页。

十八画

“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德勒斯顿出版。——第77、80、98页。

二十画

“议会报”(《Il Parlament》)——都灵出版。——第425页。

地名索引*

二 画

七日规——伦敦街区。——第314、371页。

三 画

大西洋——第311页。
 凡尔赛——第221、331页。
 士每拿(伊斯密尔)——第536、538页。
 土尔克斯坦——第50页。
 下萨克森——第567页。
 小爱尔兰——第314、371页。
 小俄罗斯——见乌克兰。
 小亚细亚——第20、533、548、549页。

四 画

巴登——第234页。
 巴尔干半岛——第20、21、39、41、48、51、300、458页。
 巴伐利亚——第23、275、567、625页。
 巴勒斯坦——第527、532页。
 巴黎——第27、33、38、46、49、58、68、69、71、197、214、215、217、218、220—227、229、282、331、332、354、355、386、393、394、397、399、400、403、415、416、458、462、479、484、489、538、565、594、596、598、599、600、604—606、609、617、618

页。
 木兰-萨克多面堡——第224页。
 旺夫堡垒——第224页。
 伊西堡垒——第224页。
 巴纳特——第51页。
 巴涅尔-德-吕雄——第307页。
 巴塞尔——第403页。
 巴塞罗纳——第86页。
 比利牛斯山脉——第307页。
 不来梅——第632页。
 不伦瑞克——第400、408页。
 木尔西亚省——西班牙的一个省。——第492页。
 日内瓦——第61、63、68、244、407、498、504、529页。
 什列斯维希——第294、295、464页。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42、46、567页。
 太平洋——第410页。
 以所弗——小亚细亚的一个古城。——第538页。
 以色列——第534、536、545页。
 中国——第312、357、389、390页。
 中维柳伊斯克——第498页。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编者注

五 画

白俄罗斯——第21、28页。
 北角——第365页。
 北明翰——第151、322、379页。
 布达佩斯——第103页。
 在加勒斯特——第33页。
 布格河——第27页。
 布哈拉汗国——第50页。
 布拉格——第464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186页。
 布列塔尼省——第397页。
 布隆(布尔诺)——第304页。
 布鲁塞尔——第86、234、281、386、394、400、403页。
 东普鲁士省——第25页。
 东头——伦敦东区。——第70、71、73、321、324、325、361、377、380、381页。
 东鲁美利亚省——第48页。
 弗拉基米尔——第329页。
 弗拉基米尔省——第507页。
 弗兰德——历史区。——第465页。
 弗里德兰德(普拉夫丁斯克)——第31页。
 弗里德里希斯哈姆——第28页。
 汉堡——第78、311、312、368、397、398、403、404、408、593、636页。
 加迪斯——第492页。
 加拿大——第276页。
 加利福尼亚——第67、312、368、481页。
 加利利——历史区。——第532页。
 加利斯河(基齐尔河)——第10页。
 加斯梯里亚——第96页。
 加特契纳——第62页。
 加因斐(海因菲耳德)——第260页。
 卡诺萨——第9页。
 卡麦涅茨(卡麦涅茨—波多尔斯克)——第454页。

卡塔黑纳——第492、493页。
 卢卑克——第632页。
 尼古拉也夫斯克(阿穆尔河岸尼古拉也夫斯克)——第412页。
 尼科美迪亚(伊兹米特)——第612页。
 圣斯蒂凡诺(耶希耳克伊)——第48页。
 瓦得(窝州)——瑞士的州。——第530页。
 瓦格拉姆——第607页。
 瓦拉几亚——第31、38—41、43页。
 瓦伦西亚——西班牙的一个省。——第492页。
 印度——第50、52、299、300、312、368、390、397、410、494、501、566页。
 幼发拉底河——第548页。

六 画

艾契(阿迪杰)河——第465页。
 安达鲁西亚——第492、565页。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第40页。
 达达尼尔海峡——第49、56页。
 达姆斯塔德——第363、365、366页。
 多瑙河——第17、39、42、43、48页。
 多瑙河各公国——见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
 伏尔加河——第17页。
 刚果——第322、379页。
 华沙——第40、42页。
 华盛顿——第259页。
 吉森——第363页。
 伦敦——第37、38、60、68—71、78、82、99、100、102、106、119、149、155、162、163、166—169、172、176、189、203、204、206、214、229、230、233、243、245、259、260、304、307、309、325、330、331、333、362、365—367、383、397、398、403—405、408、431、436、470、472、474、477、482、486、487、

491、519—521、555、558、560、562、573、589、590、592、612、613页。
 迈纳——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第550页。
 米海洛夫斯科耶——里海东海岸的一个居民点。——第50页。
 米兰——第232、429、594页。
 汝拉——地区。——第405、407页。
 色当——第220、223、293、440、634页。
 西伯利亚——第67、481页。
 西西里岛——第541、557、565页。
 兴都库什山脉——第50页。
 匈牙利——第41、42、46、234、319、330、355、376、430、521、597页。
 亚波(土尔库)——第31页。
 亚得利亚海——第21页。
 亚尔科——第492页。
 阿尔萨斯省——第7、47—49、53、217、293—295、437、464、600、622、634页。
 亚该亚——罗马行省。——第548页。
 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第17、50页。
 亚历山大里亚——第532页。
 亚琛——第37页。
 亚细亚——罗马行省。——第548、611页。
 伊塞隆——第234页。
 伊斯特勃恩——第555页。

七 画

贝耳特海峡——大贝耳特海峡和小贝耳特海峡。——第20页。
 贝内万托——第244、247页。
 贝萨拉比亚——第33、34、48、51页。
 别迦摩——小亚细亚的一个古国。——第538页。
 伯利维尔——巴黎的一个区。——第217、224页。

伯罗奔尼撒半岛——第550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16、20、28、31、35、39、40、42、48—54、56、300页。
 克拉科夫——第42页。
 克勒伏——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223页。
 克里木——第27、42、43、299、397、503、507页。
 克里特岛——第51页。
 克罗茨纳赫(克罗茨纳赫浴场)——第393页。
 里海——第50页。
 利尔——第307、337页。
 利物浦——第83页。
 吕内维尔——第29页。
 麦尔夫(马里)——第50页。
 麦尼尔蒙坦——巴黎的一个区。——第224页。
 麦茨——第220、223页。
 沙皇格勒——见君士坦丁堡。苏格兰——第349、494页。
 苏黎世——第234、337、365、386、387、397、403、479、480、483页。
 沃尔肖伐——第42页。
 希腊——第533页。
 希瓦汗国——第50页。
 犹太——第532、545页。
 芝加哥——第386页。

八 画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纳)——第39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220、232、559页。
 阿尔卡迪亚——希腊的一个地区。——第550页。
 阿尔明尼亚——第48、51、527页。
 阿富汗——第50页。

阿穆尔边区——第412页。
 阿速夫海——第27、329页。
 彼得堡(列宁格勒)——第20、25、28、282、416页。
 伯恩——第392页。
 波兰——第21—23、25—29、31—34、40、41、43、55、294、329、330、430、455、597、599页。
 波罗的海——第29、31页。
 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第507页。
 波斯(伊朗)——第22、50、526、549页。
 波斯尼亚——第48页。
 波士顿——第388、397、403页。
 波希米亚——见捷克。
 非拉铁非——埃及的古城。——第536、538、543页。
 芬兰——第28、29、31、34页。
 芬兰湾——第329页。
 拉芒什海峡——第166页。
 罗马——第422、525、532—534、539、542、545—548、560、565页。
 罗马尼亚——第48页。
 罗彻斯特——第259页。
 门的内哥罗——第48页。
 帕里——小亚细亚的古城。——第527、528页。
 佩特莫斯岛——在爱琴海。——第548页。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第20、51页。
 帖欣(策欣)——第26、29、30页。
 易北河——第460页。
 泽姆林(泽蒙)——南斯拉夫城市。——第42页。

九 画

柏林——第41、49、57、97、109、162、204、212、215、282、312、334、368、392、393、398、403、404、429、483、484、

540、547、594、604—606、617、628、631、632页。
 拜尔法斯特——第553页。
 保加利亚——第42—43、48、565、608、635页。
 查尔朱伊(查尔朱)——第50页。
 哈雷——第105、204页。
 侯德梅泽伐夏尔黑伊——匈牙利城市。——第521页。
 科伦——第392、394、397、403、461、628页。
 柯夫诺(考纳斯)——第454页。
 洛林省——第7、47、49、53、217、293—295、437、464、600、622、634页。
 洛桑——第530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341、393、400、437、561页。
 南港——第322、379页。
 南特——第561、571、583页。
 施皮歇恩——第440页。
 威尔士——第152页。
 威廉堡——第220页。
 威斯特伐里亚——第22页。
 香槟省——第438、461页。
 叙利亚——第528、533页。
 耶路撒冷——第532、535、543、545、549页。
 耶拿——第31、368、462页。

十 画

埃及——第533页。
 埃劳——见普略西什-埃劳。
 爱北斐特(马培河谷)——第234页。
 爱尔福特——第31页。
 爱尔兰——第317、318、374、375、494、565、636页。
 爱琴海——第55、477、548页。

高加索——第17、20、40、622页。
 高卢——历史区。——第548、611页。
 哥本哈根——第63、244、247、581页。
 哥达——第105页。
 哥多瓦——第492页。
 格奥克·帖彼——第50页。
 格尔伯多夫——第94页。
 格拉纳达——第492页。
 格拉斯哥——第365、382、386、387页。
 海得尔堡——第363页。
 海牙——第84、106、244、281、399、407、408页。
 浩罕——第50页。
 库弗尔格拉班——第444页。
 库页岛——第409、410、412页。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312、368、389页。
 马德里——第63、244、403、475、554页。
 马尔纳河——第298页。
 马拉加——第492页。
 马赛——第387、569页。
 纳瓦林(皮洛斯)——第39页。
 索尔福——曼彻斯特郊区。——第382页。
 索利曼(苏来曼)山脉——第50页。
 纽约——第259、311、367、397、399页。
 特尔米亚——见基特诺斯。
 特劳波(奥帕瓦)——第37页。
 特利尔——第392页。
 乌克兰——第21、28页。
 夏威夷群岛——第254、411页。

十一画

曼彻斯特——第322、363、365、368、379页。
 梅克伦堡——第567、608页。
 密德尔斯布罗——第382页。

莫尔达维亚(莫尔多瓦)——第31、38—41、43页。
 莫斯科——第20、33、329、410页。
 莫斯科省——第507页。
 基特诺斯(特尔米亚)岛——在爱琴海。——第548页。
 捷克——第472页。康乃尔斯威尔——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区。——第315、371页。
 绍林吉亚——第275页。
 设菲尔德——第403页。
 推雅推喇——小亚细亚的古城。——第538页。

十二画

博斯普鲁斯海峡——第20、40、48—50、54、56页。
 费拉得尔菲亚——美国的城市。——第368页。
 黑海——第17、20、29、50、55、329、477页。
 喀尔巴阡山脉——第55页。
 喀琅施塔得——第298、618页。
 喀土穆——第526页。
 莱巴赫(柳布梁纳)——第37页。
 莱比锡——第33页。
 莱茵河——第10、29、37、39、59、220、295、400、446、484、546、568页。
 普法尔茨——第234页。
 普勒夫那(普累文)——第51、627页。
 普略西什·埃劳(巴格腊提奥诺夫斯克)——第31页。
 普鲁特河——第17、39、43页。
 普鲁士——第22、23、25—27、30、33、42、43、46、47、49、58、217、272、275、276、295、416、437、438、441、450、455、565、586、587、599、625、626页。
 散得维齿群岛——见夏威夷群岛。

斯巴达——第560页。
斯德哥尔摩——第31页。
斯泰福郡——英国的郡。——第322、379页。
斯特拉斯堡——第186页。
斯图加特——第388、403、504、632页。
斯温西——第67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第31、32、296、437—438页。
雅典——第504、560页。

十三画

奥克斯河(阿姆河)——第17、50页。
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30、31页。
奥滕曾——阿尔托纳的区(今为汉堡的区)。——第632页。
顿河——第17页。
滑铁卢——第607页。
蒙马特尔——巴黎的区。——第332页。
塞尔维亚——第48页。
塞米格腊迪埃(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的历史区。——第51页。
塞纳河——第223、298页。
塞纳河岸讷伊(讷伊)——第223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43页。
塞维尔——第492页。
塔干罗格——第38页。
塔什干——第50页。
新拉纳克——第501页。

十四画

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第527页。

赫希斯特——第366页。
维尔特——第440页。
维尔腾堡——第275页。
维罗那——第37页。
维斯拉河——第17、295、455页。
维也纳——第33、41、56、58、69、70、472、481—483、594、604页。
银镇——伦敦东头的一个区。——第71页。

十五画

德勒斯顿——第80、234、604、632页。
德涅泊河——第17、33、455页。
德涅斯特河——第27页。
德维纳(西德维纳)河——第17、33、455页。
剑桥——第109、187、191、193、201、205页。
摩里亚——见伯罗奔尼撒。
摩塞尔河——第392、400、499页。
撒马尔汗——第50页。

十六画

澳洲——第254页。
澳大利亚——第276、312、368、481页。
霍尔施坦——第529页。
默麦尔河(尼门河)——第465页。

十八画

萨克森——第612页。
萨莫萨特(萨姆萨特)——叙利亚的城市。——第527页。

译 后 记

本卷包括恩格斯在1890年1月到1895年8月，即在他晚年所写的著作。

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二卷（1962年出版）翻译或校订的。有些著作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作者的原著所用文字和旧有的中译文。其中“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法德农民问题”、“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文章，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的基础上校订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是在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本局译校）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和“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二文，是在19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张仲实译）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在译校时参考了麦园的译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是根据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英文版第二卷译校的，同时参考了俄译文和德译文。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杜章智、张启荣、杨启潏、周裕昶、吴

惕安、杨冠森、冯世熹、齐淑文、宋书声、顾锦屏等同志。参加资料工作的有冯世熹、冯如馥、王锦文、陈家英等同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